

三联
耳关

生活周刊

2016.10.3
2016年第40期
www.lifeweek.com.cn



穿越北中国草原、林海与戈壁

最美长城

906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经济学人》(美国)2016.9.24

低利率世界

本周,日本央行承诺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保持在零左右;9月21日,美联储再一次推迟了加息;英国脱欧公投之后,英国央行紧接着将主要政策利率削减至0.25%。各国央行都在通过削减利率来重振疲软经济。同时,低利率环境也引来诸多争议,公司和地方政府养老金计划的赤字激增,银行举步维艰。



1



2



3



4

1 / 《时代》(美国)2016.10.3

危险的种族战斗

一个月前,美国橄榄球运动员卡佩尼克拒绝向国旗致敬再次成为美国境内种族冲突的焦点。他在赛前国歌演奏时单膝跪地已成为经典的抗议动作,一些非裔球员也开始仿效他。最近接连发生的美国警察枪杀黑人事件,让卡佩尼克在非裔国民里的地位快速蹿升。调查显示37%的白人对此感到反感,但卡佩尼克已经成为非裔国民的偶像。

3 / 《旁观者》(美国)2016.9.24

科尔宾又赢了

很多英国工党议员都想让去年当选的党魁科尔宾下台,他的极“左”倾向让他们感到不满和惶恐。可在9月24日这场政变色彩浓厚的选举中,科尔宾却以61.8%的得票率胜利连任,工党选民的拥护是他制胜的保障。想推翻科尔宾的工党议员们只能寄望于2020年大选的到来,或去尝试修改难以改变的选举法。工党何时能清醒?内讧如何能结束?

三联生活周刊

2 / 《纽约客》(美国)2016.9.26

变性超模

哈瑞·奈夫是T台界的新晋超模。2015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高学历的她身上更令人关注的标签是“变性人”。在此之前,也有不少成功的变性模特受人追捧。如今,奈夫已签约知名模特经纪公司IMG,逐渐成为更多人心中的缪斯。模特之外,奈夫是个文艺青年,爱读伍尔夫、契科夫,以及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

4 / 《新闻周刊》(美国)2016.9.30

CIA的女特工

CIA女特工们的工作与生活是什么样?影视剧里的浮光掠影或许有偏于她们在现实中的承担。如今,中情局有34%的高层领导岗由女性担当,而性别歧视的遭遇未曾绝迹。她们多因好奇与热爱投身于此,无论是出外勤还是做分析研究,这份特殊职业对专业性、保密性和思维的要求给予了她们很多身不由己,付出的代价都留在了个人生活中。



P32

封面故事

穿越北中国草原、林海与戈壁

最美长城

- 34 长城内外，北方中国的昨日与今日
- 38 呼伦贝尔，游牧摇篮的美丽和孤独
- 54 在宁夏，一场追逐长城的风光人文之旅
- 68 山河岁月，河西走廊上的长城碎片
- 80 柯瑾玲：一个裕固族手艺人的身份书写
- 82 长白山脉，关东之地
- 94 姚大力：长城之美在超越



P112 城市：新加坡故事，城市不是孤独的存在

社会

- 调查：向死而生：一颗器官的捐献与移植 102
 热点：乔任梁，明星的生存成本 108
 城市：新加坡故事，城市不是孤独的存在 112

经济

- 市场分析：煤价上涨与去产能的反复 100
 商业：三个关键词影响奥迪未来 120

文化

- 艺术：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 130
 话题：在博物馆“裸奔” 134
 戏剧：伪君子塔尔丢夫：摇滚明星和上帝 138
 电影：疾风之歌，次元破壁的火影忍者 142
 思想：肯尼斯·克拉克与《文明》 150
 书评：洪堡的旅行和自然观 152
 书与人：马丁·瓦尔泽和他的《童贞女之子》 154

专栏

- 邢海洋：农民和他们的户口 16
 袁越：防护林真的有用吗？ 146
 张斌：跪下，为了可以屹立不倒 148
 宋晓军：用中国制造推动“亚太再平衡”？ 149
 朱伟：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³⁾ 158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57

(本期封面供图：GAOPIN IMAGES)

| | | | |
|---------|----|------|-----|
| 环球要刊速览 | 2 | 声音 | 23 |
| 读者来信 | 8 | 生活圆桌 | 24 |
| 天下 | 10 | 好东西 | 28 |
| 理财与消费 | 20 | 个人问题 | 160 |
| 好消息·坏消息 | 22 | | |

2016年第40期，总第906期，2016年10月3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名誉主编 Honorary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王星 Wang Xing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蒲实 Pu Shi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程磊 Cheng Lei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聃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赵潇 Zhao Xiao 苗千 Miao Qian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非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王霄 Wang Xiao

发行物流 Issue Logistics

王荻 Wang Di

发行库管 Release Library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总监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内容编辑 Editor

薛凡 Xue Pe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徐睿洽 Xu Ruihan 刘凌 Liu Ling

艺术设计 Artistic Design

张莉 Zhang Li

技术支持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手机产品 MB Product

辛军 Xin Jun

平板产品 Tablet Product

连子君 Lian Zijun

活动事业部 Ev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庄山 Zhuang Shan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邢宇 Xing Yu

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文案 Official Documents and Letters

孙名梓 Sun Mingzi

活动专员 Event Executive

周宇飞 Zhou Yufei

视频事业部 Video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吴冰川 Wu Bingchuan 孙明楷 Sun Mingkai

节气刊事业部 Solar Term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创新产品中心 Innovative Products Center

松果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阿润 A Run 赵雯珺 Zhao Wenjun 李骁楠 Li Xiaonan 赵夫宏 Zhao Fuhong

孙正之 Sun Zhengzhi 刘小荻 Liu Xiaodi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孟佳 Meng Jia 赵卓 Zhao Zhuo 夏青 Xia Qing 尤帆 You Fan 奚牧凉 Xi Muliang

行政 Administration

叶秋菊 Ye Qiuju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吴泓林 Wu Honglin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不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二~扉1 · 甘肃省旅游局
3 · 红牛
19 · 周刊征订
53 · WWF
99 · 周刊松果广告
128~129 · 野生救援
133 · 周刊20年
137 · 书店广告
147 · 必益教育软文
封三 · 力度形象
封底 太平鸟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五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Vtpower
VITALPOWER MEDIA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造梦空间

就一个常人而言，概念上的虚拟现实还很神秘。受这期启发，一通恶补，这才意识到当今世界虚拟现实技术已经无处不在。游戏自不必说，回想起来，当我还在为3G影像叫绝时，世上早有了4G电影——迪士尼的影院里，环境仿真能让雷电当头、雨水沾身或浪花扑面；当海中大颗的珍珠飞奔而来，无人不伸出手想触摸甚至捞起；当佳肴呈现，四溢的香气令观者味蕾大开。还记得游览西安汉阳陵，一个展示手段很现代的帝王墓，还以仿真技术再现汉景帝刘启的生活场景，很有带入感。还有朋友在国外体验了仿真试衣系统，她的描述令我向往，只盼试衣革命快点到来，最好能跟网上购物结合，这样就不用买来退去了。想一想，阿尔法围棋这么强大，虚拟现实的未来也一定不是今人能想象的。

上海 冉子琪

如此“精准”

我们村村口有一条小河，河对面便是村里的责任田，小河上有一座砖桥，是村民下地干活以及进城的必经通道。这座桥修建时间比较长，加上近年来一些过路的机动车也不时从桥上驶过，砖桥早已不堪重负，逐渐成为一座危桥。对于这座危桥，村里的刘叔等人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两年一直张罗着要对这座危桥进行修缮。因村里没有什么实体经济，村民们的经济条件又都一般，虽然各家各户也都愿意力所能及地出点钱，但归拢起来一算，资金缺口还是比较大，无奈之下，刘叔一帮人便只有到镇上、县里的扶贫办想办法，可跑了几趟，都被领导以资金困难为由给回绝了。

中央提出精准扶贫之后，各级政府扶贫的力度是越来越大，邻近好几个村都因此受惠，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改变，这让刘叔又重新看到了希望。他想，毕竟我们村的经济还不如这几个村呢，人家能争取到扶贫资金，咱们为何不能？信心满满的刘叔为此还专门找人对危桥以及村里破败的民居拍了好多照片，准备再次向县里的扶贫办提出申请。不过扶贫办的领导对刘叔精心准备的照片等材料并没有多大兴趣，而是先问刘叔，你们村是县里、市里确定在册的贫困村吗？刘叔说村里人穷，啥也不懂，都知道自己村穷，但过去确实没人去做贫困村申报这个事……还没等刘叔说完，扶贫办的领导就不耐烦地下了逐客令，说你们村不是贫困村还来添什么乱，如果是贫困村别说是一座桥了，村里的路我都可以给你们修到每家每户门口，不是贫困村，就什么也别想了。

领导的一番话让刘叔当场就蒙了。刘叔说村里过去没有去申报贫困村的确失策，但村里经济的确困难，这都可以实地调查，而且国家扶贫与否的标准应该看是不是真正困难，而不应该仅仅看是否“在册”吧？毕竟新闻媒体上经常

报道有些贫困县、贫困村为了保住“贫困”的帽子，不惜花费巨资去疏通关系，如果扶贫资金给了这样的贫困县、贫困村，扶贫能产生效果吗？而中央提出精准扶贫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吗？为何中央三令五申强调精准扶贫，还会出现仅仅凭名册分配扶贫资金的现象呢？

领导听完这番话，笑着对刘叔说，你说得也挺有道理，但你老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现在各级政府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检查力度越来越大，一旦发现扶贫存在不“精准”现象，问责的板子马上便拍了下来，但来检查的领导平日里生活在市里、省里，并不了解基层，他们怎么判断乡里、县里的扶贫是否精准呢？还不是看书面材料，材料中显示扶贫资金给了在册的贫困村、贫困户，自然无可挑剔，如果给了其他人，到时就算解释半天都不一定会消除疑惑，搞不好还会惹来一身麻烦。如此一来，谁来管哪个村是否真正贫困？凭名册分配扶贫资金反而成了最安全的方法。

刘叔听完，半天说不出话，只是心里想，你们是安全了，可危桥安全吗？

河南 邵宁

特大暴雨的反思

两个多月前，武汉遭遇特大暴雨，一夜之间我们小区成了重灾区，停电，业主们的车都被淹了，水已过腰。第一天我们还心存侥幸，觉得渍水是暂时的，涉水去超市采购了三天的干粮。第二天，情况更加严重，水位仍然在上涨。我们居住的地方，由于地势较低，街道上的水不断倒灌进来，从楼顶望去，小区里的水和湖已经连成了一片。

由于家里有婴儿和老人，需要紧急撤退，我们首先拨打市政热线，询问何时能够恢复正常生活，工作人员说等他们回复。我们接着拨打网上公布的民间救援车队的电话，连续打了三个都没有人接，我想他们应该是太

忙碌。收拾好东西，我们去一楼等待小区自救队的救生船。历时两个多小时，救生船三次经过但不能停，因为有晕倒的老人，待产的孕妇等待救援。第四次，我带着宝宝上了救生船，同船的邻居们帮我拿包、抱孩子，我心头一热。小区有位大爷用门板和救生圈搭了一艘简易救生筏，老公用木筏推着70多岁的爷爷紧跟其后。小区外的情景也没有好多少，几个青壮年光着膀子站在水里安全护送我们到水位低的地方。一路涉水经过几个小区，门口都有青壮年在接应。街道上都是泡了水的汽车，只能涉水到安全的地方。公交车塞得满满的，“的士”车路过的不停车，幸好遇到一位好心的路虎车主，他搭载我们到了地铁口。

受灾前几天，我们没有等到任何官方的救援。市政热线打了好几遍，每次都没有明确回复。和我们一墙之隔的区政府在暴雨的第一天就有水泵抽水，媒体报道之前，保安连区政府的侧门都不让居民通过，居民只能硬着头皮涉过1米多深的臭水。小区对面的某单位，地势高，车位多，却紧锁院门不给车辆提供临时避难的场所，有几辆车子就被泡在院子门口。这几天都是居民在自救，互帮互助。

一周后，渍水仍然有1米多深，积水已经发黑发臭，大家心急如焚，开始集体向区政府求助，希望他们能够立刻展开救援，排水清淤消毒。当天晚上，区政府组

织相关单位在小区内搭建栈桥，与此同时，媒体报道政府为了保障小区居民顺利通行搭建栈桥，可以通到各个楼栋。这时，问题便出现了。第一，小区共有1000多户居民，有些老人撤退之后看到新闻报道便带着行李返回小区，却在大门口碰了壁。居委会和安保人员苦口婆心地劝阻，他们固执地仍然要回去住，问不让回去，搭桥干什么？第二，苦苦等待水退的车主们更加焦急，桥搭起来，即使水退了，车子也不能及时拖出来，没有购买保险的车主只能自己承担损失。客观地来看，搭建栈桥是为了保障居民的生命安全。栈桥通到各个门栋，挨家挨户敲门劝说，希望大家安全撤出，到政府安置点过渡几日。栈桥也方便志愿者清理大家撤退时留在门口的垃圾，经过暴雨和高温，垃圾不知成为多少病菌的温床。新一轮暴雨即将来临，栈桥也将作为短期内的出行保障，方便大家回家拿东西。

那之后的几日，我感受到信息不畅通带来的矛盾。居民、物业、业委会、居委会、政府、媒体，环环相扣，矛盾无处不在。值得庆幸的是，业委会及时建立了微信群，每栋楼都有独立的小群，第一时间向大家反馈抗灾的进度和困难。大家团结抗灾，相互救援，共享信息，互相鼓励。原本沮丧和疲惫的我，也感受到了大家的执着和热忱，积极配合，保持乐观心态等待早日回家。历时20天，在政府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排

水、消毒、检测后，我们陆续回到了家中。看着满院枯死的树木和泛黄的小草，心里酸楚，不知这些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

武汉 杨幸

处理违章

处理违章，本是一件简单的事。按照交规，该罚则罚，该扣分则扣分，清晰明了。却偏偏由于一些执法人员的处理方式和言语，让当事人满是憋屈和疑惑，竟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

限速60公里，没注意到，驾车时速达91公里，超速50%以上。按照新交规，应罚款1000元，一次性扣除12分，暂扣驾照，并重考科目1，接受学习再教育。遇到此类情况，只能自认倒霉，到车管所处理。到达违章处理窗口，工作人员告知，有一次性扣除12分的违章，需要到“副主任办公室”先处理。于是赶到“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倒是办事快捷，录入、打印、签字、盖章，按手印，几分钟内处理完毕，结果在预料之内，驾照暂扣、罚款1000元。继续回到大厅违章处理窗口，处理其他违章（只罚钱、不扣分的违章），工作人员又告知，没有驾照，需要把驾照拿回来才能办理。一阵愕然，我又赶到“副主任办公室”试图要回驾照，想着处理完其他违章再交过来。不料，“副

主任”也愕然，吃惊地说：“小伙子，你应该先处理其他违章，再过来处理这个12分的违章。再不济，你先将驾照的分数卖掉9分，再来处理也好，现在你的驾照已经锁定，一切都晚了！”我一头雾水，返回大厅窗口和工作人员说明实情，驾照被锁定，无法拿回来。不料，工作人员义正辞严：你学习了吗？接受教育了吗？现在当然拿不回来……想继续争辩，与工作人员好好理论一番，最后还是忍住了，继续争吵下去，被冠上“妨碍公务执法罪”拘留几日也不是不可能。

打车回家的途中，司机师傅也是一肚子怨气。“这活没法干了，跑十几公里硬是拉不上人，滴滴一来，没有活路，份子钱都赚不够。”人世间，庸庸众生，各有各的烦恼。我也顺便把自己的遭遇向师傅诉说一番，权当宣泄。不料司机师傅却来了精神，他对我说：“小伙子，怎么能这么处理呢？我们常在路上跑，怎能不违章，像你这样处理，我们早饿死了，别说一次扣12分，一次扣36分都是钱的事。”我一脸迷茫，望着司机师傅。他接着说：“一般情况下，你在车管所门口找人买分数，货比三家，总有人愿意以相对较低的钱做你这生意，你自己无法做到两个驾照分担一次扣12分的问题，但人家接你活的人就有这本事，小伙子，别那么单纯……”

陕西咸阳 苏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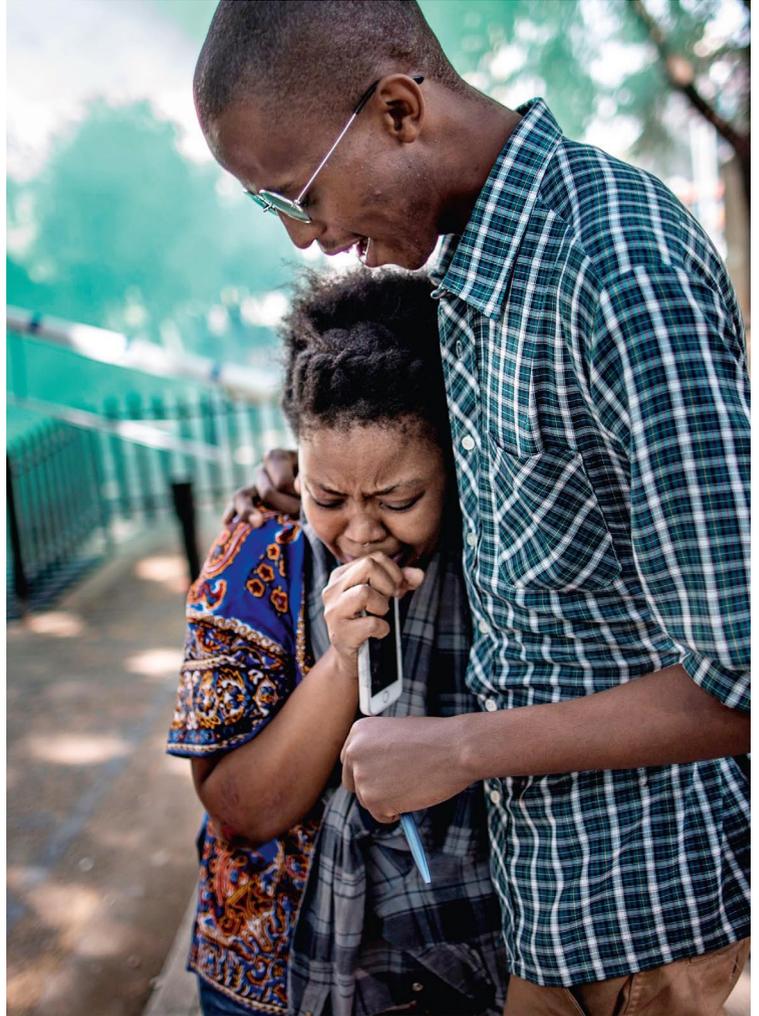
哥伦比亚 | 弃武从政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 9月23日正式对外宣布, 通过之前与哥政府达成的和平协议, 结束52年的反政府武装斗争, 弃武从政。这一协议的决定是在该组织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出的。“哥武”与哥伦比亚政府于9月26日举行最终全面和平协议正式签署仪式。此后, “哥武”成员将全部放下武器, 该组织将不复存在, 而是作为一个新的政治组织进入哥伦比亚政坛。图为两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员。



南非 | 免费高等教育游行

(右图) 9月21日, 南非约翰内斯堡当地学生持续游行, 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南非全国范围内发起的要求免费高等教育的游行已经进入第三周。图为一名男学生正安抚在冲突中受伤的女学生。



白俄罗斯 | 极限跑

(左页上图) 9月24日, 白俄罗斯民众在 Borok 参加极限跑, 翻越障碍物、过水坑, 挑战自我。

巴勒斯坦 | 丰收

(左页下图) 9月24日, 当地农民在加沙地带代尔巴拉赫 (Deir al-Balah) 的一家棕榈种植园内采摘成熟的棕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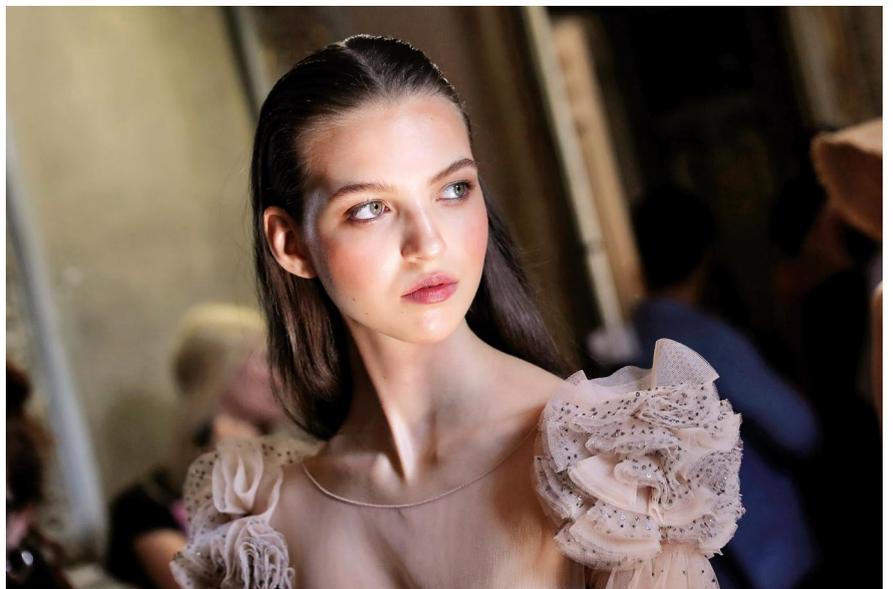


梵蒂冈 | 安抚

(右图) 9月24日, 教皇方济各在梵蒂冈城保罗六世大厅接见法国尼斯“7·14惨案”遇难者亲属。7月14日晚间, 法国尼斯发生卡车冲撞人群的恐怖袭击事件, 导致86人死亡, 434人受伤。

意大利 | 春夏米兰时装周

(下图) 9月24日, 2017春夏米兰时装周期间, 一位模特在意大利品牌“蓝色情人”(Blumarine)秀场后台候场。



农民和他们的户口

文 / 邢海洋

多地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统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其背后是否有着真切的利益考量？

家里地面要铺砖，我到北京六环路边上的“零工市场”去找干粗活的小工。忌惮于被众人围住脱不得身，我准备用低价战术来排除，我告诉大家，只出得起160元一天的费用。一位老年人应价了，可在回来的路上，他开始了攻势，告诉我小工现在的工钱是200元，他之所以答应是想看看活有多大，还告诉我他最多一天接过三个活。到了家里，他先表示这个活两天也干不完，再跟我商量能不能200元“包干”给他，我一答应又提出包一顿饭的要求，直弄得我招架不住，想请他走人。

可一干起活来，就发现这位老人是把好手，而且卖力气，除了点支烟，手上一刻不停，吃完饭也不休息一会儿。实际上，他才48岁，之所以显得那么老，是因为孙子都上二年级了。他一家八口，“老两口”、两个儿子和儿媳、两个孙子，没分家，全吃他们老两口。他也是个挣钱的好手，两个儿子干日工，他却能把日工变成包工。他一个人负责三个家庭的食物，三家房子每间300元共900元的租金，外加大孙子小学3500元的学费，一家老少全吃他一个。我颇难理解，他就一句话应对：“那能咋整？”早听说农村娶媳妇的困难，媳妇进门后的骄横，始信。

他找人算过命，他的“能人”已经到了。“能人”是谁？就是在新未来学校上学的孙子，考试排在班里前两名，意味着他家曾经的读书种子又发芽了。这位干零工的老者告诉我，他爷爷是金陵大学的毕业生，爸爸是黄埔七期毕业，1949年后家境一败涂地。父亲53岁的时候生的他，他可是赶上了好时候，娶上了媳妇，若是像他大姐那样早生30年，地主成分的他恐怕连媳妇都娶不上了。

下午两点活就干完了，当我把他送回市场，那些找活的人飞速地聚拢过来，围住了汽车。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早晨散工们都爱答不理，可到了下午都这样急迫，原来都是做完了一份工要干第二第三份的。对

他们，时间就是金钱，路边甚至有专门拉他们去上工返回的小面包车，提高通勤速度。这位来自安徽的老人，光他的村子里就有百多口人在这个市场打散工。北京副中心建设如火如荼，处处都在景观提升、铺路栽树，他们为什么不找份长工做？原因是长工的工钱只能到年底结，而他们这样做散工，只要肯做，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

北京市政府的搬迁在通州引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包括农民工的生活。一位年轻的散工找到了一份一天500元的工作，架电线。通州几乎所有的村庄夏天都在煤改电，一下子创造出对青壮男劳力的需求。可一入秋，电线架设好了，上电线杆的高薪活也就消失了。秋天煤改电进入到各家各户安装空气源“热泵”的阶段，水暖工的需求增加了，可因为不是高空危险工种，工钱就没有电工那么高。副中心的建设带动本地用工的价钱飞速上涨，远高于周边区域。在这人手短缺的秋收季节，顺义的一份大工，也就是技术工的日薪是180元，小工是130元，通州则分别要价到300元和200元。并且，顺义的工匠是本地人，通州是一色的外地人。

可农民工也有自己要高价的理由：他们中的很多人原住在市政府所在的潞城镇的村庄里，那边村子拆迁，农民工向宋庄迁移，一下子租房就紧张起来，房价也翻倍上涨。如果向前回溯，通州的出租房价格经历了几轮波动。过去，通州农村的房子都是按院子出租的，少见群租房，一个完整的农家小院，住上一家人，生活成本并不高。五六年前朝阳区有一次大规模的拆迁征地，农民工向东举家迁移到通州，房价曾有一轮上涨，此后才有很多人家在院子里建满了排子房，变为群租院落。

不过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通州农村的房租原地不动，一二百元就能租住一个单间，对农民工来说这里的居住成本远低于临近的朝阳区。随着地铁的通车，政府所在区域的房价先涨了起来。即便如此，离地铁稍远地区的房价仍维持着低价，原因是这里产业政策调整，各村开始清退低端的小工厂、小作坊。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收紧也逼走了大批人，村子里房屋还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空置。可当潞城镇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铺开，群租房的供给和需求的天平倒转过来，

一房难求了。农村劳作本来季节性就很强，现在他们除了看天吃饭，还需看政策的变化了。

我问老者，家里是否还有耕地，他告诉我有五六亩地，按每亩800元的价格包出去了。家里还有一亩大的宅基地，住起来比这里的群租房宽敞多了。

说完外乡人再来说说本地农户。我表妹前几年嫁到了远郊的一个村子，都快出北京了，对面就是香河县。家里突遭变故，5亩地的葡萄园没人打理了要出租，一年的租金是5000元。地里种的都是盛产期、树藤手腕粗细的巨峰葡萄，让地荒着秋天请大家随便采摘点“野生”葡萄也不止这个价钱啊，可他们还是不得不租出去，因为葡萄藤怕冷，在北京的气候条件下很难越冬，深秋的时候必须埋进土里，这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5年前我家盖房子，请了两位燕郊的木匠，一对父子。有一天儿子要提前歇工，一问是要带媳妇去做产检。说起来他家这个后代可是来之不易，前一位媳妇就是因为不能生育才离婚了，现在这个媳妇是位白领，一家电器城的管理人员。老木匠告诉我，他把家里的承包地刚给卖了，5万元一亩。这么低的价钱，那时候燕郊的房子可都是七八千元一平方米了，一亩地大约666平方

米，在上面盖成容积率为“1”的房子，也得四五百万啊。老木匠很无奈，就一句话，不卖不成，开发商厉害。燕郊的土地出卖一向缺乏透明度，近两年才有了公开市场拍卖。一条反腐消息揭开了当地土地市场一角：原三河市市长、书记李刚在承德任上翻船，供出受贿一个多亿，开发商动辄就“进贡”1000万元。如今北三县的房子卖疯了，距离北京中心60公里的香河县都卖到2万元一平方米了。可据媒体披露，那里的土地几乎均以底价成交，开发商不必多费分文就能拿到一、二线大城市开发商倾家荡产才凑齐的地价。万科的人去香河参加土地拍卖，居然遭到拦截和殴打，当地土地市场水深可见一斑。木匠一家就是这个土地生态链上最底层的一环，被压榨到了极点，可他仍能获得儿媳妇的尊敬，就是因为他还有最后的本钱——宅基地。听他的意思，到了“占”房子拆迁，他得豁出去了。

北京城扩张到六环路，建成区戛然而止。环路外边是村庄、工厂和田野的世界，环路内则是商品房的世界。外面的农民和里面城市人的生活迥然不同：村子里有了红白事情，村民们会把村子里的道路封住，吹吹打打一整天；村委会是一人一票的直选，选举季节候选人家访攀亲好不热闹。村头高挂的大喇叭经常



2014年12月9日，北京一处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准备下班

广播“新农合”的信息，提醒村民报销医药费；到了节假日则是广播村民到村委会去领钱。大部分村子都把土地出租了建设工业园区，村民们能从中拿到一些分红和逢年过节的红包，每个月多则上千，少则几百。不过这些钱和城里人的工资就没法比了，年轻人还得靠进城工作，养家糊口。

自从免除了农业赋税，村民的福利在逐步提升。上世纪60年代的合作医疗，个人出一点，集体出一点，而国家不出钱，不属于国家医保。而“新农合”所需资金，是个人出一点，集体不出钱，国家出一大部分，比合作医疗更优越，已经接近发达国家针对农民和其他低收入者的医保。农民的养老金被称为“新农保”，过去的“老农保”主要是农民自己缴费，实际上是自我储蓄的模式，新农保则是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三合一”，比职工养老保险还实惠。职工养老保险没有得到国家补贴，全靠个人和雇主筹集。

问题是，新农保补贴虽有其名却少得可怜，农民60岁后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55元，这55元基础养老金是国家财政补贴的，剩下的则是个人和集体储蓄。新农保按年交，农民一年缴纳一两千元都嫌多，故而每月能够支领的数额也就几百元，和城镇职工的养老金差上一个数量级。一条六环路，住楼里的老年人的生活是旅游、养生、美食，村子里的人则是冬天晒太阳、夏天纳凉。一条六环路内外连寿命预期都不同：农村人很少去医院，到了不得不送医的时候，很多都治不好了。

在社会养老保险改革推进前工作的职工，实际上并未向养老金体系的蓄水池里缴纳金钱，这点和农民的状态颇为相似，可退休职工有权利领取社保养老金，农民却不能。理论上，改革前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养老金权益来自对国有企业的贡献、国资的积累，可农民难道没有为国家建设做出过贡献？尤其是在农产品补贴工业品的“剪刀差”时代，农产品的价格被人为地压低，农民生活困苦，如今似乎更有理由享受国有资本的“利息”。

农民的福利，尤其是城市郊区农民的福利于是主要显现在他们对宅基地的使用权上。宅基地的特点是，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有权利享有，且是无偿取得，无使用期限限制，在理论上，宅基地使用权一旦取得，使用权人可一直使用下去。这几个特点充分显示出宅基地和房改前职工居住的公租房有着相同的福利分房本质。大城市的郊区，村民们都充分利用着他们的这一项福利：在宅基地上盖房出租。交通方便的城中村，房子盖成了楼房，一个农户几十套群租房的情况并不

鲜见。可城镇居民的公租房早由承租户购买，变身为商品房，职工拥有了自由处置的权利，农民们却没有。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职工的财富一大半来自自己的房子，农民们抱着金饭碗却没饭吃。

9月19日，北京市发布《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将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并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这是对2014年国务院相关政策的响应。两年来，30个省份陆续出台各自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均提出“取消户口性质区分”。自1958年开始、在中国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户口身份识别将不复存在。

名称换了，可农民似乎还是农民。比如北京版的《意见》提出“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还是农民所独有的权利。同样的户口本，本质上还是两种人。当然，农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应该得到提升，但公共服务的成本呢？废除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后，农民生产已经不再为财政提供支撑了，此时若财政资金源源不断地反哺农村，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因而，土地交换就成为农民向居民身份转换过程中一种可行的路径。在很多地方，当农村建设用地或耕地被征用时，村集体会得到一笔钱，通常集体会平均分给个人。但作为棚户区改造的统一行动，政府已经尝试用让渡土地使用权换取农民的社保，给予老年农民和市民类似的基础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但农民心里有杆秤，对于远郊区县，土地价值不那么高的地区，社保是相当诱人的条件，可到了近郊，农民们更偏爱房子，因为房子提供了更高的价值。可对于更为偏僻的地区，农民却没有值钱的资产跟政府换取福利。

农民手中最有价值的财产是宅基地，我国虽然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但农村村民对宅基地上的房屋享有所有权并可自由处置，又因为宅基地的发放方为村集体，故而宅基地在一个村集体内流转是合法的。可是，一个村庄里的村民房屋需求有限，支付能力更为有限，这就造成宅基地价格出奇地低廉，甚至不及同等面积商品房的一个零头，这也间接造成了农民的贫困。只有通过拆迁，农民才能合法地通过宅基地致富，可拆迁的毕竟是少数，是和城市规划有关的“偶然事件”，于是乎，村民把所有致富的希望都放在拆迁上，这也增加了政府与村民的博弈成本。

农民变居民，事关城镇居民与当地农民的公平，更不能忽视近郊与远郊、本地与外地农民的差别，给所有人以希望。☑



绘画·阿梗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栏目插图 | 范薇

创投娱乐化

9月17日，一场由创新工场、达晨创投、集结号资本等创业者和投资人演绎的音乐节举行。今年8月末，经纬中国还组织了一批中国创业者，赴美国参加狂欢活动火人节。资本寒冬之外，创投圈正涌现出一股泛娱乐化的景象，很多投资人变成网红投资人，将主要时间花在做PR、出席各种活动和娱乐化的节目上。创业市场制高点和重要节点被占领，后期创业已经进入了跨界和内容创业阶段。

扶贫不扶弱

9月14日，证监会宣布克拉玛依新油股份首发未通过，此为“IPO扶贫”政策出台以来的首个被否案例。截至今年8月，A股市场有800多家企业排队等待IPO，有6家企业来自贫困县。新油股份虽符合来自贫困地区，“即报即审、审过即发”的优待条件，但发审委认为其收入严重依赖中石油，具有不可持续性。该公司由央企干部下海创业，昔日东家中石油是其最大客户。

首部无人驾驶法规

自动驾驶技术进展神速，新加坡和美国先后有出租车上路，美国也将在9月下旬公布全球第一部无人驾驶汽车法规。新法规将重点保障无人驾驶的安全性，包含了15条安全要求。此前美国各州各自为政，加州就要求自动驾驶车必须有方向盘。因“无法可依”，谷歌等公司已与许多州政府起了“冲突”。交通部颁布的法规虽允许各州制定规范条款，但高屋建瓴，有利于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规范。无人驾驶大规模应用指日可待。





进口引擎

在总体阴沉的全球经济中，美国是亮点之一，也是新兴市场出口大国为数不多的增长来源。可美国从中国的商品进口总值自3月以来不断萎缩，7月更是同比降4.2%，新兴经济体引擎或出现故障。美国需求复苏，美元强势使进口商品更加便宜，进口减量颇令人费解。IMF的数据，以价值计算，2013至2015年美国从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进口总值不断下降，但那是因为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现在或因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趋势，从中国进口也降了。

Vanguard 纳入 A 股

9月20日，全球最大的ETF管理公司Vanguard宣布，公司总值达590亿美元的新兴市场股票指数基金已经完成过渡至富时新兴市场指数，纳入了A股，并于9月19日起生效。去年5月底富时集团宣布启动将中国A股纳入全球基准的过渡计划，Vanguard旗下ETF已于去年10月率先买入A股。Vanguard完成ETF对A股的纳入，令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进程又进了一步。

免费提现

微信支付宣布提现收费时，支付宝曾承诺不收费。可半年后，支付宝就扛不住宣布提现收费。包括百度钱包、苏宁易付宝、通联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台都迅速“蹭热点”，表态不收，大有收割用户的态势。实际上，不少银行早步入了转账免费时代，今年2月，工农中建交实现了手机银行跨行转账免费，7月12家股份制银行成立了“商业银行网络金融联盟”，电子渠道转账免费。



海外现金

苹果在爱尔兰和欧洲的“税收大战”使美国公司海外现金浮出水面。为避美国的35%的企业所得税，2015年美国公司海外资金量高达2.5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4%。美国的税率水平在发达市场国家中是最高的，高科技和医药领域的企业也持有异乎寻常高额海外资金。据预测，即便给予一次性税收豁免，现在过高的税率水平依然让海外资金望而却步，不会在美国本土投入长期实业项目。



椅子杀手

谋害你性命的不只是污染的空气和看不见的细菌和病毒，还有你屁股下的那张椅子——事实上，它们越是舒适，对你的危害可能就越大。发表于《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追踪调查了全球 54 个国家从 2002 到 2011 年间的国民健康数据，结果显示，60% 以上的人每日静坐时间超过 3 小时，而成年人平均每天坐下不动的时间达 4.7 小时。光是这一项，便导致了 3.8% 的死亡事件。研究者指出，将静坐时间缩短两小时，死亡率便可减少 2.3%。

好消息

睡眠止疼术

经常浑身作痛？根据英国华威大学的最新研究结果，或许你应该检讨一下自己的睡眠质量。

研究者发现，慢性疼痛患者的睡眠周期常受到干扰，而失眠和缺觉又会反过来加剧疼痛。如果能用认知疗法打破恶性循环，疼痛和失眠都能得到缓解。



变渣为宝

随着现磨咖啡日益流行，如何回收处理不断增加的咖啡渣也成了一个问题。发表于《美国化学协会可持续化学与工程学》上的研究指出，以咖啡渣为原料制成的一种新型泡沫滤纸只需 30 小时便可去除水中 99% 的铅和汞离子，从而实现双赢。



坏消息

每逢佳节胖三斤

芬兰坦佩雷大学的研究小组对 3000 名生活在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志愿者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每日体重追踪后发现，每当重大节日之后，人们的体重就会有显著的增加。美国人节后体重平均增加 0.6 公斤，日本人的节后体重增幅也达 0.5 公斤之多。



危哉格陵兰

格陵兰岛冰盖的加速融化一直令国际社会忧心忡忡，但根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最新研究结果，由于低估了冰岛火山活动对地幔的影响，此前 10 年中，格陵兰岛冰层损失的数量实际上每年要比预测值多出 200 亿吨，误差高达 7.6%。



两个人合作的话可以捕到鹿，如果自己单干，只能抓到兔子。嫉妒型的人选择抓兔子，因为这样至少自己不会比另一方差，乐观主义者选择捕鹿，悲观主义者选择抓兔子，信赖型的人会选择合作捕鹿。

——西班牙研究人员开发出的计算机算法把90%的人分成了四类，其中30%是嫉妒型，乐观型、悲观型、信赖型各占20%，还有10%难以界定

当你把蚯蚓放进嘴里的时候，它直奔你牙齿中间的缝隙而去。我的牙缝隙可是不少，70年代的谢菲尔德没人戴牙套。它把躯体缩成一线，拼命从缝间拱过；而如果它被昂贵的假牙桥所阻碍，迟迟无法取得进展，就会陷入狂怒之中。

——牛津大学学者查尔斯·福斯特获得第26届“搞笑诺贝尔奖”生物学奖，他曾在威尔士的山洞里体验了6个星期狗獾的生活，狗獾85%的食物是蚯蚓

总的来说，一个袋子的材料循环再利用的程度越高，袋子就越薄，用处越小。而苹果的专利申请说，这款袋子不同，它还有至少60%的可再生材料，但仍能保持强度。

——《泰晤士报》说，苹果公司正在为一种纸袋申请专利，就像所有最好的苹果产品一样，它有着明确的用途，形式简单，注重实用性，唯一奇怪的是苹果公司没把它叫做iBag

+/-

数字



(插图 山洋的)



如果你的节目没有龙或白色野马车的话，现在就可以回家了。

——艾美奖颁奖典礼主持人吉米·基梅尔说。意指本季获得12个奖项的《权力的游戏》以及《美国罪案故事：辛普森挑战公众》中，前者有吐火的龙，后者则是辛普森被捕前开着野马飙车



2147

万

根据万事达卡公司发布全球旅游目的地城市指数，2016年在132个城市中曼谷位居榜首，领先于伦敦、巴黎、迪拜和纽约。估计曼谷有2147万名国际旅客到访，超过伦敦的1988万人。

700

米

9月19日，在墨西哥科苏梅尔的铁人三项世界系列赛决赛中，还剩最后700米时，阿利斯泰尔·布朗利扶着他脱水的弟弟乔尼一起跑完，最后把他推过终点线，最终弟弟取得第二名的成绩，哥哥第三。尽管有人提出抗议，但比赛成绩仍被判有效。铁人三项官方规则中允许运动员接受赛事官员或其他运动员的帮助。



321

公里

世界气象组织说，世界上最长的闪电是2007年6月20日出现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一道闪电，它长达321公里。闪电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是7.74秒。美国每年大约会出现2500万次闪电，平均49人因此丧生。

尤里的漫游之旅

文 / 卡尔
图 / 谢驭飞



尤里在遇到米兰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结婚。他曾经谈过两次恋爱，但当对方提出要结婚时，尤里犹豫了，最后只好不欢而散。尤里那时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拥有家庭生活的准备，倒不是物质上的原因，完全是精神上的。尤里认为自己是个天生的漫游者，只有在漫游中才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发现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他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和庸俗的人群，他的心似乎只痴迷于远方，几乎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他要来一次生存冒险，哪怕冒着随时都有可能死亡的危险。就这样到了30岁，有一天他突然在夜空下发觉自己如此孤独，他有些恐惧，决定暂时放弃漫游，回归家庭生活。

尤里遇见米兰完全是偶然。有次尤里突发疾病晕倒，是路过的米兰救了他。尤里对米兰很感激，经常邀请她出来，两人渐渐发现原来他们有那么多的共同点。尤里觉得这就是上天冥冥中的安排，他终于鼓足勇气向米兰表白。米兰答应了，但提出一个条件：尤里以后要放弃漫游的想法。尤里同意了。一个新的家庭很快在这个混杂着幸福和不幸的世界诞生了。尤里相信他的家庭生活会是幸福的，因为他和米兰都是那种不耐俗的人，不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大吵大闹。两人对这一点达成了共识：他们走在一起，用婚姻的方式拒绝其他诱惑和种种可能，和这个充满孤独和纷扰的世界抗争。

尤里找了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和这座城市的千万人一样在早晚高峰挤地铁，每天西装革履、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尤里虽然很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但为了米兰他决定忍受下去：一个有了家庭的男人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尽管漫游的想法蠢蠢欲动，但还是要克制自己。不能因为一时冲动就抛弃一切，毕竟还有许多数不清的费用要交，所以必须努力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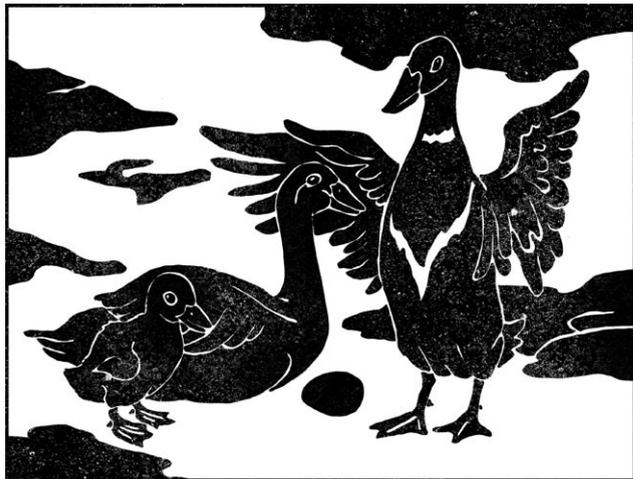
米兰似乎看出了尤里的想法，对他说不要违背内心，如果想出去看看世界，那就去吧。尤里说一旦出去，就可能一去不回，因为远方对他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他答应过米兰不再出去漫游，他要说到做到，现在最重要的是赚钱养家，其他的暂且放下。就算远方再迷人，他也要拒绝。尤里觉得自己有些口是心非，但看着怀孕的妻子，他知道他肩负的责任更大了。尤里时刻提醒自己：爱不是随心所欲，爱需要克制内心的冲动。人生不止有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房贷和孩子的奶粉钱。

尤里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去漫游。他曾想过等孩子长大成人后带着米兰去看世界上最美妙的风景。不过尤里要为此等上十几年，他无法知晓自己是否有这么大的耐心。也许突然有一天他忍受不了离家出走，一去不复返。又或者他接受了平庸的生活，忘记远方。他无法知晓未来何去何从，他只知道又被银行催还房贷了。■

童年危机

文 / 尚小右

图 / 谢驭飞



在我外甥女钱多多看来，年方9岁的她，遭遇了人生第一场特大危机——妈妈生弟弟了，她濒临失宠。今非昔比，之前她爸爸朋友圈还在发：“特意请假，保障多多首次期末考试！”今年就成了：“大家努力二胎吧，都会美梦成真的！”

其实一开始多多心态平和，笃定地告诉我：“妈妈说不会重男轻女。”虽然在她眼里，这话意味着“妈妈会魔法，能让弟弟和我一样体重”，甚至还窃喜不已：父母忙着照顾弟弟的头几天，也是她处于监管真空的时段——可以晚上10点再睡，睡前再吃一大根棒棒冰。然而没过多久，多多便得知亲友给弟弟的红包大都四位数起跳，她就再也无法维持平常心——要知道9年前她满月时，宾客人均才给区区几百元。在号啕痛哭前，多多大叫三声：“不公平！”

多多听不进“什么是通货膨胀”，更听不进让她放宽心的劝告。只要我谈及她弟弟，她翻脸比翻书还快——前脚还在跟我讨论《哈利·波特》的剧情，后脚就拿起铅笔对我念咒：“阿瓦达索命！”有时被我逼得急了，小学三年级的多多甚至会出其不意，拷问我的心灵：“小姨是你的话，会想要弟弟妹妹吗？”我被她噎得无话可说。坦白而言，身为从小看《家有儿女》长大的独生子女，我爱看情景喜剧拟真，可未必爱看情景喜剧成真。

也许心焦于家庭地位岌岌可危，多多丧着脸

对我说：“一有了弟弟，没人检查我数学作业了。”紧接着成绩直线下降。气得她妈妈边吃补品边训她，威胁要取消暑期旅行。“你如果考不上实验中学，参观牛津剑桥有什么用！”多多却越学越颓，而且对游泳、书法、跳舞等等兴趣班都没了兴趣。她妈妈则被新生出的“夜啼郎”弄得精力全无，也只能口头警告多多：“等我坐完月子再收拾你！”

还是多多的爸爸出面化解了她的危机。多多目前最大的梦想就是先当新娘后当妈妈，她爸爸便让她打下手照顾弟弟，并把她抱着弟弟的照片传到朋友圈，注明“姐姐是个称职的小妈妈，很会照顾弟弟”，这令多多非常得意。更让她激动的是，爸爸要她给弟弟取小名和设计满月酒菜单。那几天多多威风得像广纳贤士的君王，决心让宾客当天吃遍各种口味的棒棒冰；我开玩笑建议她考虑叫弟弟“李才”，她不懂字面意思，却被我的理由打动：“先得有‘钱多多’，才能‘理财’。”

满月酒当天，多多玩得不亦乐乎，虽说她上方就写着“钱李府公子弥月之喜”。我边吃并无棒棒冰的酒席，边感慨多多忘性大，突然听见我爸对我妈幽幽地说：“政策出来时你如果要生，现在也该办满月酒了。”我悚然一惊，还没反应过来，只听多多的外婆大笑：“别再当爸爸，安心做爷爷啦！”接着她殷切地转向我：“男朋友谈多久啦？什么时候结婚？准备生几个？”

人鱼小姐的葬礼

文 / 夜溪
图 / 谢驭飞



入夜，皎洁的月光洒在被海水不断冲刷的礁石上，发出温柔而清脆的声响，海面倒映出坐在礁石上的人鱼小姐的柔美的身姿。风渐渐柔和，似是被温婉的人鱼小姐所感染，也一样变得温婉而优雅，缓缓地吹拂起一层又一层的涟漪，在月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圣洁。

今天是人鱼小姐作为一条人鱼生活在这世上的第500年，同样也是人鱼小姐的生日。没有什么人来给人鱼小姐庆祝，也没有人来跟人鱼小姐共享这个美好的时间。连人鱼小姐自己也早已经习惯了孤单，在她还不知道什么是孤单的时候。

人鱼小姐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这世界上的唯一一只人鱼，起码她知道自己是这辽阔海洋里的唯一一只人鱼。她曾在地中海的波涛里享受久违的阳光，也曾在西伯利亚的海岸上看着漫天遍地的雪花，她知道每一时刻哪片海水的温度，也知道哪片海里的鱼藻最美，可这么多年转瞬即逝，越活得久，望着满目的海水，她的内心就越觉得孤单和苍凉。

风渐大了，人鱼小姐站在礁石上，闭上眼睛，感受着海风的轻拂，嗅着大海的味道，一波紧跟着一波的海浪冲击礁石的声音传入耳朵，人鱼小姐知道这些美好转瞬即逝，太阳一出，她只能躲在大海冰冷的深处，以免被人类所发现。从没有人教过她要记得提防人类，可她的朋友一个个被人类捕捞走的记忆在她脑中挥之不去。她只有躲在大海的深处，才能避免被人类发现。只有当太阳隐匿在山下、皎洁的月亮升起的时候，她才

敢小心翼翼地冒出海面，去享受这几小时的空气和涛声。这样的日子，她有些倦了。

今天是人鱼小姐的生日，往年的生日总是由人鱼小姐自己为自己唱一支歌当作庆祝，可今年她有些不想唱了。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海面前她娇好的面容显得有些迷茫，每天单调而重复的生活，尽管确实美而优雅，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尽管在所有的大海里她可以任意畅游，可大海难道不像一个笼子将她牢牢地困住吗？调皮风吹拂起人鱼小姐的长发，人鱼小姐望着天空上几百年如一日的依旧皎洁的月亮，心中已然有了决定。是的，该做的都做了，那么，也到了该走的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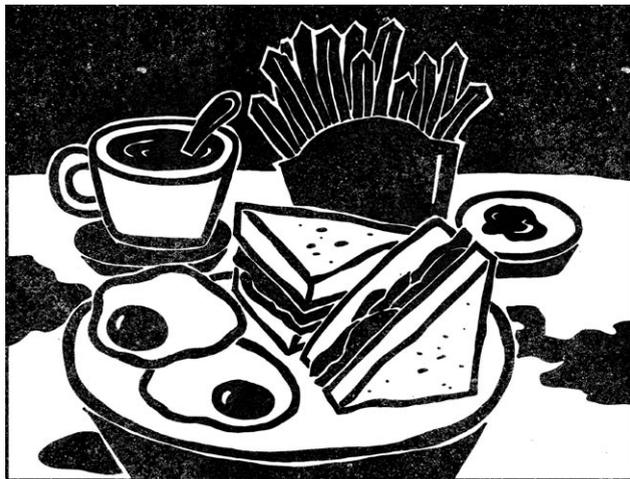
一段悠扬的歌声响起，人鱼小姐唱起了那首从出生就会的歌谣，这首歌仿佛早已刻在人鱼小姐的脑子里，伴随着人鱼小姐走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年头和一幅又一幅美丽的画卷，在这生日的当口，重新吟起这首歌，和往常一样，既是对自己生日的祝福，但同样也是对自己的挽歌，是的，该走了。

人鱼小姐跳下礁石，缓缓地向着岸边游去，月亮似乎也不忍看到这一幕，已经悄悄地躲到云朵后面，却似乎又被人鱼小姐的决心所吸引，露出一点头来打量着人鱼小姐的一举一动，近了，更近了，人鱼小姐似乎已经能看到岸边晚归的捕鱼人在高声庆贺一天的收获。

月亮重新从云后探出头，一望无际大海依旧如此安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而歌声却始终在海面上回荡……

胖子

文 / 阿之
图 / 谢驭飞



留学的第二个月，她就在墨尔本地的华人广告公司找到一份兼职。因为申请学校时语言成绩不够，所以得加读 16 周的语言课程。她心目中的理想职位，是去投资银行当名金领。为了保证工作量，她每天早上天刚亮就起床，然后到离家步行 5 分钟的咖啡书吧点杯特浓咖啡和煎蛋三明治，写一个小时的策划案再去上学。因为房租便宜，她选择租住在地广人稀的远郊，如果不想下厨，这家咖啡书吧是家附近唯一的去处。

几天都有个身形肥硕的白人男子和她差不多时间到来，坐在她隔壁桌点和她一样的东西，只不过分量是她的两倍。吃完后，他会赶在早晨 7 点钟的特惠时间之前，向吧台多要一份薯条。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她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把桌上剩下的小半瓶番茄酱统统倒光。他来店里从来不带任何东西，只有口袋里的硬币和钥匙哗哗作响，但大家都习以为常。他的时间好像多得用不完，不玩手机也不读报纸，单单把三明治里的荷包蛋戳破再涂在吐司上的时间就足够让邻近的她结束早餐着手写策划案了。

“他们换了一种番茄酱，糖变多了，但拿来做酱料的番茄好像快腐烂了。”这天早晨，她突然听到那个胖子和另外一桌的三个中年妇女搭讪，“他们肯定是为了多省钱才会进一堆劣质产品。真不有机，太不健康了！”她正在给吃一半的早餐拍照，刚发到社交媒体上并配好文字，只好删除了。她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大学室友在百老汇的演出剧

照——那个家伙本科毕业时跨专业到美国去学音乐剧，如今已经获得了第一个角色。她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胖子被过剩卡路里荼毒的身体，悲凉地觉得他和“健康”的距离，就如她和“梦想”的距离一样遥远。

“真可怕。”三人中的一个尴尬地笑着，避免和他进行过多的目光接触，另外两个则埋头进餐，结束早餐后，礼貌地和胖子道别，并祝他度过美好的一天。他的嘴塞满蘸着番茄酱的薯条，她听不清他是如何回应的。

“嗨，这本杂志是你落下的吗？”胖子从女人们的座位上拾起一本休闲刊物问她，她看到封面人物是某位绯闻满天飞的超级名模。他的搭讪方式让她觉得很滑稽，但她只是微笑地摇摇头。“那送给你吧。”胖子把杂志放在她桌上，自己起身离开了。她拿起杂志随手翻了几页，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页面都是广告。突然她看到封底的内页是一桩谋杀案的报道，遇害的是位华裔少女。左下角有嫌疑犯的照片，上头说他是被害人房东的丈夫，他比自己的妻子年轻十几岁。她盯着这张不清晰的图片看了很久，突然急忙把杂志丢到一边，从包里掏出帽子和口罩戴上，逃荒似的收拾好东西上学去了。■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碳纤维摩托车

莲花摩托车 C-01 由碳纤维包裹的引擎整流罩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机车配置 Brembo 全系列制动系统，Ohlins 前后避震器和车身主框架由 Kalex 制造。C-01 采用了很多 F1 专业赛车的材料技术，车架利用钛合金以及航天钢材合成，外围主要由大量碳纤维材料构成。



救生气囊背包

户外品牌 North Face 为传统的户外背包两侧安装了安全气囊，在遇到危急情况时，只需轻轻拉动肩带上的板机，气囊就会自动弹出。同时气囊还可以起到保暖或是帮助身体平衡的作用。

绿植灯

设计师艾米莉亚·卢克 (Emilia Lucht) 和阿恩·赛博恩克 (Arne Sebrantke) 带来的这款名为 Mygdal Plantlamp 的灯，实现了让绿色植物在密闭空间（吊灯或者台灯）内持续蓬勃的设想。灯具内部的 LED 灯与植物形成了一个自循环的迷你生态环境，无需人工照料，也可让植物生意盎然。



驱鲨手环

由鲨鱼专家和海洋生物专家联合开发的驱鲨手环 Sharkbanz，依靠专利的磁性技术，来干扰鲨鱼高度敏感的磁性受体，致使鲨鱼在人们频繁光顾的潜水地区失去活动能力，起到对人体的保护作用。



彩色透视腕表

豪朗时 Vortex Primary 的表壳以彩色玻璃窗和三维镶嵌工艺为灵感，以一系列原色材料组合，用 19 块不同颜色的玻璃板营造出炫目的色调拼接效果。表盘布局一反传统，左边透明视窗下的数字链带显示小时，中心的上半个视窗显示分钟，表壳重量仅有 48 克。



智能卷尺

由 Bagel Labs 公司设计的同名智能卷尺，拥有两种使用模式：线性模式 (string) 和轮圈模式 (wheel)。它采用了 Dyneema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而非传统的米尺，以达到使用时更加坚固和稳定的效果。



超薄洗衣机

三星安心添洗衣机可以在洗涤过程中不用排水就能添加漏洗的衣服。洗衣机提供了 8 公斤超大容量，机身更薄。泡泡净 TM 技术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洗衣方法，使冷水洗涤与温水洗涤一样高效，节约大量用来加热冷水的电能。





不朽之花

黎巴嫩珠宝品牌 Mouawad 的“不朽之花”首饰套装由 18K 白金项链、手链、耳环及戒指组成，祖母绿和白色珍珠镶嵌出“不朽的花朵”，它曾出现在古代苏美尔史诗中。



橙蓝手袋

Mark Cross 品牌的 Benchley 箱形包以蓝色和橙色皮革搭配白色手柄，它的外形基于传统的双筒望远镜包，18K 镀金金属包扣可以上锁。

彩色餐具柜

Finn Juhl 实木餐具柜，装在深棕色边框内的彩色滑动门如同一幅抽象绘画，侧面抽屉面板的配色是根据著名的 Goethe 色彩圈完成的。





茶香香水

Jo Malone “东方茶”系列香水，六种香水分别融合了中国、日本和印度不同品种茶叶的芳香，其中包括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茶、云南金针茶以及九州玉叶茶等。



玻璃落地灯

Venini 品牌的 Mae West 系列落地灯，创作灵感来自达利著名的梅·维斯特艺术装置，五种穆拉诺彩色玻璃灯罩分别采用了包括人脸、帽子、花瓶、烛台和巧克力罐的造型。



金椅

Moooi 品牌的“金椅”原型来自复古风格为学校椅，以金色合成皮革结合金色镀铬钢架，彻底改变了它之前朴素的面貌。

月夜花园

宝格丽“月夜花园”月相功能腕表，点缀钻石繁星的表盘以内填珐琅工艺雕饰，花瓣中嵌入了珍珠母贝，月相盘则由两个抛光的黄金月亮组成。



穿越北中国草原、林海与戈壁

最美长城





横亘在燕山支脉上的金山岭长城。戚继光任蓟镇总兵官时期（1567-1586年）主持修筑，是现存最完好的一段明长城，被称为明长城之精华

长城内外，北方中国的昨日与今日

主笔 / 陈晓

金山岭

2016年9月初，我们在北京东北边山里的长城徒步。虽然离北京只有100多公里，山里的世界却像另一个气候带，比城里清冷许多。我们到达这段长城时是一个阴天下午，灰云密布，细雨将至，长城挺立在山顶和云层的夹缝间，威严又寂寥。

这段长城名为金山岭，建于明朝。明代是长城修建的鼎盛时期，从东到西共修了6300公里。金山岭长城所属的河北蓟镇段是其中最重要也最完整的一部分。蓟镇段长城沿着燕山山脉构筑，东起山海关，经喜峰口、古北口、慕田峪，到居庸关东北的四海冶，全长660多公里。在沿边九镇中，蓟镇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从东、西、北三个方面拱卫着京城。其中号称京师西大门的居庸关距京城只有50多公里，有京城铁门之称的古北口距京城也只有100多公里。这段边墙是维系京城安危的重要屏障，因此修建时也格外用心。它被研究长城的学者认为是长城的“代表作”。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评价：“明长城是中国规模最大、最坚固、最雄伟的长城，而蓟镇段长城又是万里长城中，最坚固、最完善的一段。”

金山岭长城用条石青砖垒砌而成。据说烧制这种特别的长城砖，需要两个月时间。日本电视台NHK拍摄长城纪录片时，专门找到了烧制这种城砖的砖窑，拍下了烧制过程：首先将土坯自然干燥一个月，然后在砖窑中烧制两周，再加入水蒸四天，成品的耐久性也就更高，再烧制四天后就完成了。在长城建造的极盛时期，这种城砖在一个工厂中每周平均要烧制50万块，带动了制砖业的高潮，据说砖厂多达数百座。一块长城青砖的大小是普通砖的四倍，有的甚至达到20公斤。厚实的砖块一层层累积起来，覆盖住土坯的城壁。2016年9月，我们到达金山岭这段长城时，它已经矗立在此数百年，城墙有多处残缺，城上走道坑洼不平，有的城楼垛口也已坍塌半壁，却依然在崇山峻岭间呈现出巍然壮观的气象。

这段长城修建于明洪武年间，但改建它的是抗倭名将戚继光。明朝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王朝，北有蒙古，东有倭寇。16世纪后半期，在南方因为抗击海上倭寇而能力得到认可的戚继光，奉命前往北方戍边，担任蓟镇总兵官。看到京城以北山岭上的军事防卫设施后，这位名将的评价是：“缺乏厚度，容易攻溃，士兵于城

墙上无可藏匿。若大势突入，莫之能御。”他提出了一个改建长城的方案，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空心敌台的建设——那是一种形如垛口的堡垒，每隔不到百米就有一座，不仅可以监督警戒，瞭望城墙外的敌情，还可以让军团常驻。我们在金山岭长城段看到有的大型空心敌台分为几层，每道隔墙上都有瞭望窗口，既像迷宫，又能瞭望敌台外的情况。空心敌台中建有武器库、仓库、粮食库，平时有30到50名士兵驻扎于此。只要燃起烽火，就能迅速从这个敌台向下一个敌台示警。

经戚继光改建后的城墙生动地演绎了“防守亦是最好的进攻”。走在金山岭长城上，会发现有的路段特别狭窄，一堵堵2米多高、与长城走向垂直的短墙占据了主墙道的三分之二距离，墙上有网孔与射孔。短墙名为障墙，为这段地理位置重要的长城独有。这是戚继光的设计，其作用在于即便敌人攻上了长城，守城士兵还可据障墙战守周旋，阻止敌人冲上敌台。

戚继光对管辖范围内全长1500公里的长城进行了改造，建造了1017座空心敌台，还将作为太极拳根基的古武道加入到对守城士兵的军事训练中。因特制砖块而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城墙，加上为讨伐寇寇而经过军事训练的士兵，看起来都城北京的防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坚固程度——这便是万里长城的最后完成版。不同地方的长城依山势伸入顶峰，再落入低谷，形态各有千秋。金山岭这里的山不算高但很密，山脉挤压在一起，迂回重叠，长城因厚实城砖和防卫架势呈现出无可撼动的力量感，又因为这样褶皱的山势，有了一种百转千回的精巧和柔美。

到金山岭的第二天早上，细雨微歇，太阳将出未出，城墙围拱的山间浮现出一层薄薄的云海，又是另一种气象。站在城墙上向两边望去，墙内的山间有高架桥和高速路的身影，车辆流线般川流其上，更远处则是北京城影影绰绰的烟尘。墙外的世界就沉静得多，除了近处一小片白墙红瓦的村舍，其余尽是深青色群山。青山之外，层层叠叠还是青山。

贸易之战

这城墙两边的世界曾经被学者拉铁摩尔认为代表

着两种无法调和的文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游牧文明的特点是移动性，移动性的极端是马上的战士。农耕文明则偏重于财富的累积，其极端是有水的平地中精耕的田地以及由此集聚而成的城市。但两种文明从来不是鲜明和绝对分离对立的。“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将长城造起来，边疆却从来没有一条绝对的界限。”拉铁摩尔在《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中写道。长城筑造的边界是一个模糊或者说丰富的过渡地带，“它不但包含草原绿洲，还可以让森林民族以及草原民族互相渗透，它同时拥有农业经济和畜牧经济”。如果非要说长城内外的地区差异或者冲突，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通常的爆发点是贸易。

“草原自发的内部贸易较中原为少。”拉铁摩尔写道，“草原经济比定居社会的经济更重于自给自足，牲畜就可以提供食物、衣着、居住、燃料和运输。虽然没有内部贸易的经济必要性，但草原却有对外贸易的社会必要性。草原社会对中原地区贸易的需要，比定居农业社会对草原社会的贸易需要更高。”对普通百姓来说，漫漫长冬是塞外生活最严酷的考验，如果储藏的粮食不够，就不得不面对挨饿甚至死亡的危险。因为长城内的农耕地带带无限米粮，唯有打通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才能让长城外的生活不那么艰苦。每年冬季来临前，游牧民会来到戍边的兵营，请求汉地的士兵收购牛羊，一头牛换一担多的米或者豆子，有人带兽皮或者羊毛，换取草原并不出产的粮食。对草原上的贵族来说，贸易有另一层必要的意义——“因为草原社会里必需品分配的普及型，造成了必须用这个社会以外的奢侈品来区别贵族与平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但游牧社会的贸易请求，在当时并不被农耕社会的统治者接纳。中国农耕社会可以自给自足，与外族的交往和互通有无，被统治者认为毫无必要。到明朝嘉靖年间，明世宗多次以蔑视的态度，拒绝了蒙古族首领俺答汗通商互市的请求。

俺答汗居住在距离紫禁城只有400公里的呼和浩特，他是成吉思汗以后率先筑墙建城的蒙古领袖，他的王宫也是仿造中原式样。明世宗拒绝贸易的一个结果是，这位对中原文化颇感兴趣也颇有进取心的蒙古首领几次出兵大举进攻明朝帝国的北边。但他的大动干戈与成吉思汗不同，他并不想征服中原，只是要获得通商互市的贸易权。

这场战争也是明长城的起源。统理北方边防的官员翁万达建起了横贯东西的防卫体系九边堡，最西边的要塞就是嘉峪关。这座巍峨的边城至今保持完整，只有5000米的祁连山山峰高过它。传说当初的修建者计算精

妙，完工之后只剩余一块砖头，如今仍放在塔楼一侧。

但这道城墙并不能阻止游牧民族对贸易的渴求。1549年3月，明朝大军再度对抗蒙古突袭，双方在长城下决战。这次蒙古大军受挫于城墙，但撤退前传口信给明朝守军，倘若不许通商互市，他仍要派军攻进北京。九边堡固然横贯东西，但长也成为它的弱点——这么长的边界，一定有一个可以利用的地方。1550年，蒙古军队从山间奇袭北京以北防卫虚弱的古北口，攻入北京城。

我们沿着金山岭长城徒步到了古北口，这段十来公里的路程中，有一段需要离开城墙，从山中上下绕一个大圈再返回长城。这段路程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北京北面群山中的危险。在城墙防卫体系尚不够严密的时代，群山看起来是天然屏障，实际也是敌人的掩体。山都不算高，但草木杂乱，高过人头，人行其中踪迹很容易隐藏。俺答汗的军队从这里意外发动奇袭，打开了进入北京城的门户。

蒙古军队卷土重来，为的仍然是贸易，俺答汗的退兵要求是皇帝在北方边界设立贸易站。明朝廷在通商议和与继续征战之间选择了一个看起来更为安全，又不损伤王朝尊严的权宜之计——明朝政府在北疆开放了部分通商站，但隔年贸易站便陆续关闭了，代之以相当昂贵的代价，兴建或者改建最为坚固的明长城。据历史学家黄仁宇估算，明长城每修建1公里，花费约7700两白银。明代一共修建了约6300公里长城，这样算来，明朝修建长城至少花费了4850多万两白银。

之所以就长城的历史讲这么多，是因为若不了解这样的历史过程，便几乎不可能在长城沿线的旅行中理解这座城墙何以存在。走在金山岭和古北口之间的城墙上，看着古代的人们在虽然不算高但形势陡峭的山峰上，修建如此厚重的城砖建筑，不由得能体会到曾经两种文明之间的深深鸿沟——农耕社会对域外“土蛮”有多么强烈的恐惧和隔绝决心，才会在群山上一寸寸建起这么长的防卫设施；而城墙之外的游牧世界，对贸易有着多么强烈的需求，才会不远千里穿过崇山，一次次敲打长城的大门。

工业社会的领地

离开金山岭长城后，我们乘火车去往城墙以北的广袤塞外。从北京出发时还是暑热未消的盛夏尾声，列车奔驰一个晚上后，在清晨就驶入了秋天。车窗外是大片大片黄绿相间的农田，有时又换成大片大片微黄的草地，高高低低的山脉和弯弯曲曲的河流忽隐忽现其间。所有地面景物的上空，无一例外都是没有被高建筑物划

破的天空，辽阔完整。点缀其间的房子，冒着烟囱的工厂、站台，看起来都静悄悄的样子，几乎没有烟。

铁路是20世纪初来到这里的，这是长城内外所没有过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的新产物，“它反映了西方影响的进一步深入，即从商品贸易发展到国外资本的直接投资”。拉铁摩尔在书中写道。到今天，比铁路更为快捷丰富的路网早就覆盖了这里，一些新的资本和势力进入这里，它们大大改变了长城以北的经济格局。驱车行驶在陈巴尔虎旗草原上，绿草地看不到边际，常能看到矿厂的白烟弥漫上空。在兴安岭林区与草原交界的平地上，能看到大片翻开的黑土，那是林场从事的精耕农业。在从北京去海拉尔的火车上，和我们一个车厢的是两位来自江苏的投资者，他们因为没买到机票不得已才改乘火车。他们要去的地方是赤峰，那里面有他们公司投资的太阳能基地。

当年要用战争争取到贸易权的游牧民族，如今国际贸易的网络已经到了他们的家门口。雀巢公司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设立了分部，牧民们在家门口不远的地方，就可以直接参与奶品的世界贸易体系。但他们也同时承受着世界商业体系对这片土地资源的挤占，采矿，农业，太阳能这样的现代工业，还有旅游业……都借助道路的力量来到这里使用资源，这些产业还带来大量人口。虽然无法与长城内的城市相比，但呼伦贝尔地区的人口数量比以前已大大增加。从海拉尔通往满洲里的路边曾经有一个叫五间房的牧区，得名于这里最初只有五户牧民，但现在这里的白墙蓝底小平房已经增加到不止50间。传统游牧经济的移动性被削弱，甚至在很多地方消失了，因为没有可供移动游牧的草场资源了。

这些变化是连贯一体的，处在经济链条终端的游牧民们是所有变化的最终接受者。“游牧生活经常被外部观察者贬低为原始性的生活方式，但事实上，这是一种开发草原资源的颇有成效的经济专门化方式。”美国学者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写道。游牧经济退化后，羊会越来越多，因为“在生产同样产品的条件下，羊群更能适应贫瘠的牧场。绵羊和山羊，特别是山羊，它们尖锐的蹄子会踏坏草场，长期和过深的啃草也会破坏草场。于是表土层暴露出来，大风扬起沙尘，这样的结果常常被误以为是气候干燥造成的”。我们在长城以北牧区的旅行中，听到最多的话题就是牧民抱怨天干，说从2013年开始，一年比一年干燥。或许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在某种比不下雨的天气更为深刻的历史过程之中。

从一个旅游者的角度看，长城以北的广袤塞外风景依然绝美，走在路上看到的每一个画面都散发着远

方的召唤和诱惑。每年7、8月份，这里的旅游业都会进入一个旺季，物价高到完全不讲理的程度，但长城内的人们仍然源源不断驱车千里来到这个和现代都市完全不同的，有完整天空、草原和森林的世界。但在牧民和猎民眼中看到的却不一样，他们能看到这里的草和去年相比的长短，草原上水泡子大小的变化，还有很多他们熟悉的细微的生活细节在消失。我们无从判断这种消失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少数民族的命运悲歌，但它让这片土地具有一种独特的时间感。

我们在长城以北的旅行中体会到了这种时间感——虽然不是以战争的方式，但一些东西在缓慢但确切地消失中。资本的进入改变了对资源的利用方式，也改变了这块土地上的移动性。曾经附着在原有经济结构上的生活方式，那些细节，和人的情感，都像兴安岭森林中经年累月掉落在地，积成厚厚软毯的松针一样——这种消逝因为自然环境的广阔美丽而更显伤感。

这似乎是现代世界发展的大势。“在今日世界中，这种部落面对两种可能性：要么是革命，由一个世界突然跳到——不是转变到——另一个全无联系的世界，要么牺牲掉，像美洲印第安民族一样受到一个历史不能与他们原有社会协调的文化的压迫而消失。”拉铁摩尔在书中写道。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姚大力告诉我们，如今长城以北已经不存在像农耕与游牧那样鲜明的结构性矛盾了，这片广袤的土地正在和世界绝大部分人类能到达的地方一样，成为工业革命的一块普通领地。那长城现在标记的就是消失吗？就像NHK的纪录片最后提出的疑问：长城究竟算什么呢？在遥远攻防战的最后，留给世人的只有一座连绵不绝的巨大城墙吗？2016年9月的这个下午，我们在金山岭长城上徒步到一段已近完全坍塌的路段，城壁已几乎完全倒塌，残留的城基宛如一段破损的古道。我们在那里碰到了一位来自西宁的老人，他是一位普通工人，退休后想环游中国，于是从最西端的嘉峪关开始徒步长城，想要走完全程。冬天太冷的时候，就回到西宁家中，等到春暖花开时再上路，一路没有乘车，已经走了几年，终于走到长城的东边。远远看到他的背影，背着半人高的背包，在残缺的城基上缓慢地一步一步向上走，全白的头发在背包上闪现，其中蕴含的坚韧与力量感，和脚下的长城极为贴合，让人感动。坐在台阶上休息时，我们问他，如果想在中国旅游，有很多的方式和路线，为什么要选择徒步长城？他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带着有些为难的表情嗫嚅着说：“还能走哪里呢？整个中国，能够横贯东西这么远的，不就只有长城吗？”



(于慧众 摄)

上、下图：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设计了金山岭长城的障墙，敌人攻上城墙后，士兵仍可据守周旋



(于慧众 摄)

呼伦贝尔

游牧摇篮的美丽和孤独

主笔 / 陈晓





呼伦贝尔草原被认为是游牧民族的摇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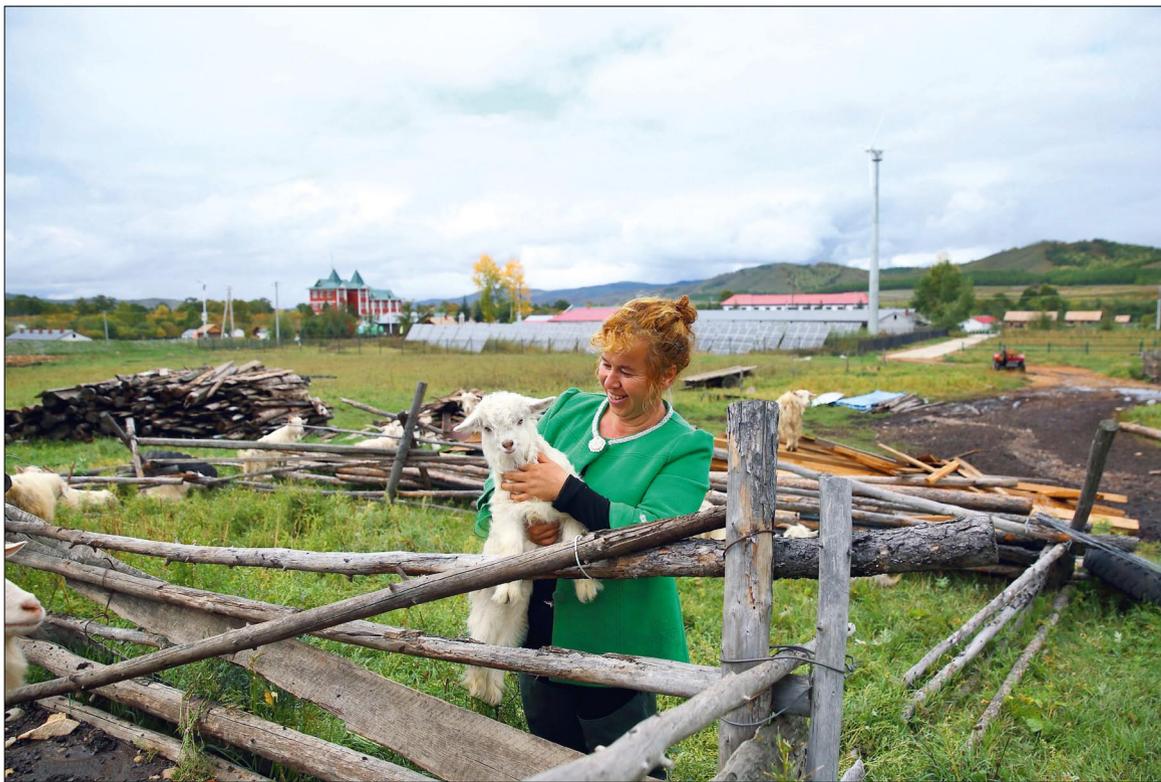
在这样苍凉无垠的地方生活，会给人的心理打下什么样的烙印，以至于跟现代生活隔着难以弥合的鸿沟，外人难以明了。那是一种潜滋暗长的分裂和距离感——这种分裂不同于当年长城内外所分割的两种文明，它存在于同一区域内，甚至曾经联系密切的人群里。

驯鹿

9月中旬，大兴安岭森林中一个接近黄昏的下午。树林里还很明亮，刚飘过点小雨，空气清爽澄澈，看不见身影的鸟儿叽叽喳喳错落鸣叫着。白桦树已有半数被秋风染黄，枝叶摇曳的黄绿树叶和白色树干，还有覆满地面的金黄落叶，在雨云的阴影下沐着日光。山林熠熠生辉，散发出自然悦目的光彩。

我们坐在林中的一个窝棚里，等着主人回来。窝棚倚树而建，树干就是棚柱，除了顶上那匹油绿色毡布，棚内所有物品都来自这片山林。一块大木板铺成的工作台上放着一只孢子的标本，僵硬的身体有种稚嫩的虚假感，像尊略显粗糙的蜡像。但眼神天真清亮，证明那是一只实实在在曾在林间奔跑的小兽。工作台一角的碎木废屑中，排着大小小用白桦树皮制成的储物罐，摸上去有鹿皮的质感。罐身刻有火焰、云朵状花纹，鹿皮的拉手柔软光滑。这些手工制品边，是一桶泡着兽骨、枸杞的白酒，半边小鹿头角挂在窝棚入口的树干上。

这是一个鄂温克家庭的驯鹿基地——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鄂温克人传统生活的展示基地，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西北部林区，在一大片草原的边缘。最近刚下过几场雨，草场意外返青，草原的青绿和林区树叶的灿黄，成为这片广袤土地最相得益彰的秋



(于慧众摄)

左图：大兴安岭林中一处鄂温克人的驯鹿基地

右图：在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河边境宁静美丽的小镇生活着俄罗斯族居民，这里曾经是个战火纷飞紧张地带

景。历史学家翦伯赞曾写过一篇短文《内蒙古》，将呼伦贝尔盟的草原部分比作曾对中原农耕文明造成巨大威胁，以至于不得不修筑长城抵御的对手的摇篮——“呼伦贝尔草原是很多游牧民族斗士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他们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由东向西，展开它们的历史性活动。鲜卑人如此，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也是如此。”“他们在呼伦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说在这个摇篮里准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当他们走出马门时，他们已经不仅是一群牧人，而是有组织的全副武装的骑手、战士。这些牧人、骑手或战士总想把万里长城打破一个缺口，走进黄河流域。他们或者以辽河流域的平原为据点，或者以锡林郭勒草原为据点，但最主要的是乌兰察布平原为据点，来敲打长城的大门。”

而在草原尽头层层叠叠静默矗立的无边林海，则被认为是强悍游牧文明的源头之一。“游牧经济多半起源于森林狩猎社会。”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中写道，“东北北部森林以及西伯利亚与唐努乌梁海南部森林中的猎户，可以驯化少量

的鹿。他们从森林到达两处地方：向北，将鹿带出森林，生活在广阔的冻土地带，放牧更大的驯鹿群。向满洲西部和向西伯利亚与唐努乌梁海南部，就到了蒙古高原的边缘。在那里，他们改养驯鹿为放牧马牛羊。”

与草原上的“骑士”相比，森林部落的生活更为孤立和神秘。他们以打猎和采集为生，用滑雪板作为出行工具，并且会驱使鹿群——一种与现代生活隔着更遥远距离的动物。鹿群大多生活在极寒的高山上，以灰白色苔藓为食。用掺着盐的豆饼驯养它们，将它们像草原上的牛羊马匹一样，成为山林生活中重要的同伴。在传统的山林生活中，鹿可以满足一个山中部落绝大部分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除了对动物皮肉的常规使用外，鹿奶和鹿血是伤者和幼童最好的营养品，鹿角和鹿骨可以入药，也是雕刻手工的好材料。森林浩瀚如大海，使鹿部落也要因时节不同在山中辗转迁徙。每到转场时，驯鹿就像草原上的牛马一样，负责驮起整个部落的家当。同时，驯鹿还是年老体弱者长途跋涉的坐骑。每个部落的鹿群中总会诞生一头纯白色的鹿，它的一生将担当起部落的精神图腾……山林中驯鹿文化与草原上游牧文明之间千丝万缕的联

系，从地名上也可以看出一二。内蒙古的两个重要城市——呼和浩特和包头，蒙古语意思分别为“青色的城”和“有鹿的地方”。“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直到13世纪或者更晚的时候，这两个城市的所在还是一个有森林，有鹿群触摸的地方。”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中这么写道。

2016年9月的这个下午，我们就身处在游牧文明更为深远的源头中。距离窝棚不远的更深的林中，是这个鄂温克家庭的驯鹿基地。褐皮白斑的鹿群，顶着树冠一样巨大分杈的浅木色鹿角，在略微阴暗的光线里漫步着。归巢的鸟鸣和厚厚的落叶掩盖了它们脚步声，再加上沉默悠然的姿态，让它们的行动像是在林间漂浮一样。

辽阔和寂寞

从呼伦贝尔盟首府海拉尔出发，一路往北，通往这片驯鹿生活的山林路上会先经过一大片草原。灰云由浅入深，从近及远地铺陈在无边无际的青绿之上。白蒙蒙的雨雾像村落的炊烟，袅袅飘荡其间。汽车穿过一条条雨云带，在忽而明亮的阳光和忽而淅沥的阴雨天间行驶着。

我们的司机是一位蒙古族人，既熟知当地风土人情，又对自己民族的过往有着强烈自豪感，每到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他会主动停车，带着一种稳重的满足感耐心等待我们逛荡拍照。一回到车上，他就成了民间史学的布道者，滔滔不绝地讲述他所理解的蒙古史：“蒙古人是世界上最好战，也最能打的民族。”“现在世界上不安生的地方，像中东阿富汗那里，都是我们的后裔。那是当年成吉思汗大军打到欧洲后，撤退回草原一路留下的人。”我们经过的这片大草原属于陈巴尔虎旗。说起这片草原上的蒙古族部落，司机说起来颇有些肃然起敬的样子。“巴尔虎是最原始纯正的蒙古族人，说的蒙古语就相当于汉语里的普通话，是成吉思汗大军里最善战的部落之一。”

但如果离开这些振奋人心但又难以确实把握的宏大历史，司机对自己经历的草原生活，最深的感受却是“非常寂寞”。现在正是打草的季节，沿途皆是一捆捆绑扎好的草垛，躺在秋天的草地上。这是牧民们在寒冬来临前为牛羊储备的过冬草料。远处还有打草机来回割着牧草，因为草原太过辽阔，一圈一圈移动的机器远看像是静止在旷野中一个小点。“我小时候跟着父亲和哥哥去草原深处打草，那时还没有这种机器。牧草比人都高，每个人进了一片草笼子后，什么

人也看不见，只有把打好的草拉出来时，能跟我父亲和哥哥见上一面。这种生活很寂寞的。”司机说，“为什么说我们蒙古人好客，因为我们生活的地方人太少了。小时候在草原上放牧，也是从早上出门一整天见不到一个人。最无聊的时候，我就跟狗说话。它做错了事，我就教训它，不管它听不听得懂。”

蒙古族司机回忆的游牧生活的寂寞，我们在鄂温克人的驯鹿基地也能感觉到。那些驯鹿是部落首领玛丽亚·索送给这个家庭的结婚礼物，只有纯正的鄂温克人才有资格得到这样的馈赠。但如今即使在鄂温克人的聚居地根河，据说纯正血统的族人也只剩9个，绝大部分使鹿部落曾经的族民都已经搬到山下城镇，过上了定居的生活。原始的部落早已经消散，这些驯鹿和它们的主人，正在成为森林游牧生活的“化石”。

我们是在去山里的路上遇到这位鄂温克人的。他开一辆三轮车，在满是坑洼的山路上摇摆着下山拉水，已经有四天没人给他送水和食物。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搬去了山下的定居点，只有他一个人住在森林里照看

(于晓众摄)



额尔古纳河畔，对岸就是俄罗斯

驯鹿。每天早上刚有天光时就打开鹿圈，将成年鹿放进山林里。傍晚时再将母鹿放进圈里让小鹿吃奶，喂它们吃灰白的苔藓。天黑以后，给帐篷中的炉灶喂进几块大木头驱除寒意，借着太阳能板储存的电量看看有时无的电视，直到储电的电箱亮起红灯，表示电量将尽，就该是睡觉的时候了。

不过这个时节对他来说还不是最寂寞的。“冬天大雪封山时，我最多有三个月没有见过一个人。”说起这段经历，鄂温克人露出点得意的神色。“每天把鹿放进森林后，我就在林子里四处转。走得最远的时候，翻过几座山。”他指着远处，“发现后面一样，还是同样的山。”

虽然表现得对独自一人的生活满不在乎，但我们的到来还是让鄂温克人很高兴。他热情地表示可以将唯一一项有床铺和被褥的帐篷让给我们，自己则打铺盖卷去火塘边的地上将就一夜。安顿完住处后，他骑上摩托车一溜烟窜出树林，去山下买菜准备晚饭。

最近的镇子距离这里来回也要几个小时车程。坐

在帐篷前等他回来那会儿，能感觉到林子里的天光和温度，像舞台拉开前逐渐暗下来的灯光，一层一层降下来。树林越来越安静，空气中的寒意也越来越重，这种清冷让人既想赶快离开，但又最终决定留下来。我想象暮色将近，鄂温克人带着奔驰几个小时买的食物回来，发现营地空无一人时会多么失望。对于从人头攒动的都市来到这里的人来说，这种林间的孤寂清冷自有其震撼人心之处。与其说是不想让鄂温克人面对我想象的失望，倒不如说是我在这日光将近的时刻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孤独，并被这种孤独给吓到了。

寒冷

上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曾遍访长城沿线的内陆边疆区域，从人口角度对比了这道城墙内外的巨大差异：“长城内各地即所谓‘中国本部’，包括清末时代之18省，其面积约为150万平方英里，人口在4亿到5亿之间，而长城以外各地及西藏，其





长城之外气候寒冷，呼伦贝尔盟最北部冬天气温达到零下 60 摄氏度，耐寒的骆驼作为鄂温克人的出行工具

面积为 300 万平方英里，人口只有 4500 万。也就是说，长城外的土地面积比长城内大 1 倍，但人口只占其 1/10。”虽然随着近代铁路网的进入，长城外的人口密度已经大大增加，但和因城市化同样人口激增的中原地区相比，仍然是绝对地广人稀的状态。一个从内地城市中来到塞外的游客，在大兴安岭山中，或者陈巴尔虎草原上，甚至是满洲里这个亚洲最大内陆口岸城市的街道里体会到的空旷和静寂感，或许并不弱于近百年前拉铁摩尔在探访这片土地时的感受。

拉铁摩尔曾据此提出一个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疑问：“从一个长江下游稻作省区的每平方英里 554 人，与黄河流域的小麦、小米、高粱以及棉花省区的每平方英里 183 人的比较中看出来，这么多的人挤在一片和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面积相似的地区中。虽然他们可以由陆地直接到达一片比密西西比河以西还要大的地区，汉族却没有永久性地大面积成功移民于长城之外，这是为什么？”

寒冷是一个简单但又确凿的答案。英国电视台 BBC 曾制作了一部《万里长城的塞外风光》，给欧洲的拍摄者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这里的寒冷。长城以外的中国北方，曾被称为东北九省。这片区域的纬度大约和巴黎相同，但却有全世界最严寒的冬天。越往北走，气候就越极端。呼伦贝尔盟位于北部之北，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让这里冬天的气温普遍在零下 40 摄氏度以下。甚至钢铁也难以对抗这里的寒冷。呼伦贝尔盟林区最有特色的民居木刻楞，是一种完全用圆木咬合而成的房子，不用一颗钉子，以保证房子严冬不会被冻裂。蒙古族司机告诉我们，去年是这里最冷的年份，根河宾馆干脆把名字改成了“零下 56 度冷极宾馆”。在最北端漠河，气温达到零下 61 摄氏度，一碗水还未洒到地上，已经冻成冰。

9 月，在长城内中原地区仍然很热，“秋老虎”散发着完全不逊色于“三伏”的热量。我们从北京出发时穿着短袖还汗流不止，但随着火车一路往西北，路

上的景色一点点笼罩上萧索的寒意。树越来越黄，人越来越少，显得天空越来越高远。在大兴安岭山中的夜晚，呼吸之间已能看到霜冻的白气。但对已经熟悉寒冷的当地动物来说，这样气温远不算舒适。草原上的马匹显得对阳光的暖意难以忍受。在穿过陈巴尔虎旗时，常常能看到马群头碰头挤在一起，站在草原中的水泡子里纳凉。不得已要走在路上的马匹，则总是啄米一样频频点头——这是它们对暑热特有的身体反应。

极寒的气温在当地动物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鄂温克人告诉我们，他的驯鹿去年被借去北京展览，因为不适应暖和的天气差点惹出一场事故。“它们不喝水了。它一不喝水就有麻烦了，我们只能买西瓜喂给它降温。”有了这次教训，今年冬天鹿群的外出巡游只能定在往南不远的哈尔滨。

再过几天，山中的颜色会陡然一变，树叶由绿变黄，红色的枫叶也会出现。山林斑斓多彩之际，气温会迅速降下来，很快草木摇落，北风和大雪将封存草原和山林。但对驯鹿来说，这样的寒冷都还不够，鄂温克人的驯鹿基地会在冬天搬去满归阿龙山，那里有更高也更冷的山林。只有在那样极寒的地方，才生长着驯鹿最爱吃的灰白苔藓。

在拉铁摩尔的边疆观中，游牧经济是粗放型的，是比长城以内农业精耕区域低两级的经济模式。但身处这广袤的苦寒之地，才能感觉到气候如何真切地决定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寒冷让此地的资源只能被粗放地利用，人们没有时间来和自然环境中的作物好好相处。他们只能顺应气候的变化，跟随寒冷迁移。而掌握了更高超农业技术的汉族人，即便能抗住迥异于中原的极寒天气，那些精耕的技巧也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严寒留给土地耕作的的时间非常有限，即便这么肥沃的黑土，每年也只能收一季庄稼。拉铁摩尔曾断言，中国北部的长城边疆，属于异质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具有相对静止性和排他性。“在工业社会前，长城内外两种文明的矛盾看起来是无法调和的。因为中国本部若不改变其经济惯式和社会制度，则无法扩展延伸至非农业的地区。若做出改变，中国社会则不复为中国社会。”

铁路

从海拉尔一路往西北，会经过很多山中小城。不管街边是方方正正、整洁漂亮的木刻楞，还是贴着塑料印刷字体招牌的粗陋现代建筑，但城中疏落的行人，

头顶高远的蓝天，以及远处正开始斑斓变色的树林，让这些小城都兼具洁净感和野性。早上或者日落时走在小城边缘，能听到城市和山林交接的深处，传来火车的长鸣。背着大编织袋、戴窄檐帽子面色黝黑的旅客，从车站的铁栅栏中稀稀落落走出来，在晨光或者暮光的掩映下，像是后面遥远的山中来客。

铁路是20世纪初进入这片地区的。“这是整个中国体制中所没有过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的新产物。”一本俄国人编辑的《北满与华东铁路》如此描述铁路对长城外广袤区域的变革意义，“它进行得非常迅速，尽管粗略，但征服了大片地区”。“铁路带来了经济上的干涉，而且还有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干涉。这一点在东北地区尤其特别，因为它的平均铁道里数一开始就比中国其他地区高。”拉铁摩尔在《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中写道，“中国现在要和其旧地理范围以外的政治力量做斗争，那些外来政治力量建立在资本主义及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上，是旧日边疆的传统方式不能与之抗衡的。

因为铁路而来的“现代化”和“西方化”，现在还保留在呼伦贝尔盟的城市街景中。位于呼伦贝尔盟南侧的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有一处被称为中国最小也最美的火车站。这是一栋低檐尖顶二层日式建筑，既有东洋建筑的韵味，在背后森林公园的秋色掩映下，又仿佛阿尔卑斯山脚的欧洲小镇门户。而在另一个森林公园莫尔道嘎沿线，随处可见的木刻楞建筑，则深受北亚西伯利亚农庄建筑风格的影响。房子由木头和手斧建造而成，地基是灌上水泥的石头，房屋主体的圆木间垫有苔藓，木板上面和泥，泥上铺马粪，密不透风，可以抗拒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远看房子敦厚齐整，像是北欧童话中的场景。

但随铁路而来的，远不止漂亮的西洋景观那么简单。最初建在这里的铁路，只有1287公里是由中国人自己投资修建的，1723公里属于中国东部铁路局，由俄中共同经营，还有1110公里属于南满铁路局，这是日本人控制的。其余段铁路由中国人经营管理，独立或与英日合作，但都是用日英贷款修建的。纷繁复杂的铁路庄家背后，是这片土地上新的势力战争。与长城划分疆界时代不同的是，来自西方的陆地文明和海上文明以铁路线为依据，同时进入这里，并为争夺资源和控制权大打出手。

1939年5月至9月，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军与苏军、蒙古军队几十万人，在呼伦贝尔盟与蒙古之间一片半草原半沙漠的荒原诺门罕展开激战，双方调用了除海军以外的所有兵种和现役装备，尽出主力大



(于晓文摄)



左图：家住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附近草原上的高大叔在采白蘑菇

右图：新采摘的白蘑菇要立刻清理干净，以保新鲜

动干戈。日本关东军在这场战役中的失败，推倒了日本法西斯最终覆灭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日本军部向西侵略的企图自此落空，促使日军不得不放弃北进政策而选择进攻太平洋。诺门罕战役因此被日本史学家称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

上世纪90年代，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来到呼伦贝尔盟，实地追寻战场遗迹——一片“在夏天日暮时分漂亮得教人透不过气，然而却几乎没水，根本不能耕作且到处是蚊虫的土地”。“几十年前人们竟然在这里浴血奋战，数万之多的士兵被击毙，被火焰放射器烧死，被坦克履带碾死，被因炮击而崩塌的战壕活埋，或者不愿意当俘虏而自杀，还有数倍于此的人身负重伤，失去手脚，想到这，心情不能不黯淡下来。”村上春树在书中写道，“这一带原本是牧民赶着家畜，按季节从这里移去那里的谁的东西也不是的土地，必须在此作战的几乎唯一的理由是军部的面子和万一碰巧的冒险疑算计。”据说参加战役的大部分日军是全副武装从海拉尔徒步赶到国境线，“看书时也只是作为知识认识到‘是那样啊’，而实际来现场一看，面对那一行为意味的现实性艰难困苦，我不由瞠目结舌，同时也深切地感到当时日本那个国家是何等贫穷。为了使日本这个贫穷国家生存下去，而在‘维持生命

线’这一‘大义’之下侵略中国这个更穷的国家，真是无可救药”。

如今呼伦贝尔盟境内的铁路沿线，已经听不到残酷且荒谬的战争悲歌了。莫尔道嘎林区的小镇太平，曾经是战火烽烟的焦点——既是日本关东军警备司令部所在地，也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始人之一赵尚志的活动基地。七八月份旅游旺季刚过，小镇从汹涌的游客人潮中松了口气，呈现出静寂美丽的面貌。街道两边是一栋栋齐整但空洞的木刻楞，偶有人影一闪，便消失在房屋或道路的拐角处。房屋背后是覆草的连绵丘陵，像一道望不到边的绿色矮墙。本想翻过去看看后面有什么，但每往深处走，都能听到丘陵脚下的房屋边，传出看不到身影但充满威胁的狗叫声。宁静美丽中又有点隐隐的紧张感，让人回想起曾存在于这个边城沉重而危险的火种。

马匹和猎人

从临江到黑山头，一路沿着额尔古纳河溯流而上。这段路程是最贴近国境线的地方，对面就是俄罗斯。傍晚登上临江边的山顶，对岸的风景像老式宽银幕电影的画面，在夕阳的余晖中徐徐展开。额尔古纳河上



（顺文叔摄）

浮动着太阳落山前的投影，像座金色的浮桥横跨水面。漫山遍野的青草绿树，从高处铺陈到河边。沿河公路上，一辆老式公共汽车翘头行驶，在浓荫中时隐时现。

对所有想进入这里的势力来说，俄罗斯人天然跟这里保持着最密切和最长久的联系。早在现代交通尚未进入这个地区前，额尔古纳河两岸的居民就有着贸易和族缘往来。“二战”阴云消失后，日本人几乎悉数退出了这个区域，但俄罗斯民族仍然借助贸易的力量留在了这里。在黑山头，一位俄罗斯族妇女颇为自豪地跟我回忆，上世纪80年代，她将几沓现金缝进衣服内层，从几公里外额尔古纳河边的口岸，到俄罗斯城市中买卖货物，赚取高额差价。直到今天，河对面村庄的牧民还常来这边的草原买牧草。沿着额尔古纳河流淌出的边境线，从临江到恩和，再到室韦、黑山头，都是俄罗斯族人的聚居地。他们大多是从长城内移民至此的汉族居民与俄罗斯人结合的后裔，住在草原和城镇交界地带，既精通草原生活的精神，又明白现代贸易的规则和奥妙。

高大叔就是这样一位新移民。他身材壮实，略带棕黄的眼睛，被两坨红彤彤的脸颊肉挤成一条细缝。长相算不上美男子，但在言谈姿态中，潜伏着一种打动人物的力量，既包含战斗民族的粗犷和野性，又不失

礼貌和见识。他说自己的家族在此地的历史始于上世纪初，爷爷从山东移民到这里，赶着马车去河对岸的村庄娶回俄罗斯姑娘。奶奶嫁过来后，虽然家乡只有一河之隔，抬头就能看到对面的村舍，但却再没回去过。

高大叔家在黑山头镇附近的草原上，那里是定点放牧和旅游业的交界地带。他有7000多亩草场，牧养着上千只羊、十几匹马，他还搭了两个蒙古包，在夏季时做家庭客栈接待游客。和那些在城镇中心的旅游从业者不同，高大叔对草原生活有着切身的理解。他家进门的土墙上挂着各式各样放牧工具：裹着毛皮的赶羊棒、用几股牛皮绳细细绞成的马鞭、麻绳搓成的三脚马绊，还有细长的套羊杆和粗大一些的套马杆……回忆起早年间草原生活，高大叔的讲述简单又充满情感。

“没有摩托车汽车的时候，我去哪里都是骑马，就算到200多公里外的室韦跟朋友喝酒，也是骑马去。带上两匹脚力好的马匹，去的路上骑一匹，走到水草好的半道，用马绊将走了半程的这匹马停在路上吃草，然后骑另一匹马接着跑。喝完酒往回走，再在半道换上这匹吃饱喝足的马，当天就能到家。”

“那时候的草原，水泡子还不少，夏天苇子长得比人还高，水边到处是山丁和柳树。我常常骑着马，背上双筒猎枪，带上几只草原大笨狗，就是现在家门口拴着的黑黄色那种。这种狗攻击力强，但比藏獒更好驯服。带着它去草原打猎，看到旱獭或者孢子，就骑在马上瞄准，枪响后，都不用下马，狗就冲过去把猎物给我叼回来了。”

“那时候草原上还有狼群。有一次和一个蒙古族朋友去草原深处赶马，太阳快落山时被七只狼跟上了，它们分两队包抄我们。但它们不想吃人，想吃马。马对草原上的男人来说是最重要的牲畜，我当然不能让它们把马吃掉。一路握着枪，紧赶着马跟它们周旋，不让狼群把我们前后围住。这七只狼一直跟到我们的牧民点上，始终没机会下口，最后跑进一家牧民的羊圈，咬死几只羊吃掉了。”

“马匹重要的那些年，盗马贼也特别厉害。有一年冬天他们从牧民村子里偷了70多匹马，想赶过冰冻的额尔古纳河去对岸卖掉。马群过河时挤来踏去，冰面破裂。全掉在河里冻死了。最后公安赶去时，冻死的马匹还保持着落水时的姿势，仰头扬蹄，什么样儿的都有。按说冻死的马肉淤了血，不好再吃了，但最后外面来收马肉的贩子全收走了。”

“冬天是打猎的好季节，可因为打猎死人的事也

有。大概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年根河那边的一个鄂温克人沿着额尔古纳河追猎物，追到我们这里，碰上俄罗斯族的一个猎人。两个人一起喝酒，都说自己的枪法有多准，最后决定比一比。先是鄂温克人一枪打中了百米外的一个目标。俄罗斯族猎人说，你站到同样的距离，头上顶个碗，我一枪能把碗打碎。鄂温克人也是‘虎’，真的顶碗站到百米外，俄罗斯人借着酒劲，抬枪就打，子弹正中鄂温克人的脑门。俄罗斯族猎人将他的尸体埋在了额尔古纳河边的积雪中，春天冰雪化了露出尸体，这事才被发现。鄂温克部落来了好几十人，背着猎枪找公安局要人，要求把俄罗斯族猎人带回山中处置。公安部门劝说了好长时间，不能用私刑，但保证会给鄂温克部落一个交代。最后那个俄罗斯族猎人被判了死缓。”

讲这些故事时，高大叔语调平静，棕黄色的眼珠眯缝着，看不出任何波澜。那些发生在草原上和界河边频繁的危险和死亡，仿佛都是这里理所应当的平常生活。如今，边疆生活中惊心动魄的部分已经消逝了大半。政府没收了民间的所有猎枪，终结了猎人这个职业。大部分草场也已经分到各户，草原的流动性已经大大降低，马匹不再是牧民最重要的牲畜。我们这一路上看到不少没有主人看管的马匹，散布在草原的湿地边，秋天的白桦林里。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它们都由头马带领着露宿山野，直到寒冬来临才会回到家中的马廊避寒。高大叔的十几匹马也这样放养着，虽然已经很少用马，但高大叔常常在早晚时分骑着摩托车到草原深处去看看它们，这些马匹代表着他记忆中的人马相依驰骋旷野的草原时光。

羊群

又是一个日暮。羊群像流水一样，挤在一起往同一个方向不知所谓地快速移动着，尖蹄急切踢踏在土地上，发出沉闷的嘚嘚嘚声。它们在躲避羊信的追捕。夏秋季节是草原上蚊蝇最厉害的时节。苍蝇喜欢把幼虫繁殖在绵羊肥肥的尾巴尖下，幼虫破壳后生出蛆虫，将绵羊的尾巴咬出一摊模糊的血肉。如果不把这些尾巴滴血的绵羊抓出来上药消炎，很可能整个羊群都会被传染上“烂尾病”。这个时节，羊信每天会提早一点把羊群赶回圈，将尾巴滴血的绵羊一只只用套羊杆套住，逮住后腿拖出来给它上药。

对羊群来说，要理解并配合这种充满善意的抓捕行动显然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在所有的草原牲畜中，羊群被牧民认为是最难沟通的一种。“它太笨了。”蒙



夏秋季节绵羊易感染“烂尾病”，羊信抓住患病烂尾的羊给它上药

古族司机回忆他小时候的放牧经历时，对羊群的智商大加抱怨。草原气候多变。夏季的雷暴，冬天的风雪，秋季的山火，春季的尘暴，都可能让天地瞬间变色，但羊群从不懂趋利避害。“风暴一来，它们立刻就会迷了方向。大雪来了，它们也待在原地一动不动，直到被大雪埋住。”传统的放牧都不设围栏的，牲畜在吃草过程中走失或者混入别家的羊群是常有的事。放牧者必须具备的一项本事就是能在一大群牛羊中辨认



出自己的牲畜，这不仅需要放牧者有极好的观察和记忆力，还要他和牲畜之间能在天长日久的相处中建立起一些微妙的心理联系。“如果是牛或者马混群，主人去找时，听到主人的声音，自家的牲畜是会给一点反应的，但是羊就做不到。”

几乎所有的老牧民都会讲出一大堆关于养羊的麻烦，这是游牧粗放经济中最费工夫的“细致活儿”。羊群特别容易受到一种致命病菌的感染，因此每年要

打预防针。春季和秋季，还要给它们洗药浴——每家挖出一个大土坑，泡好药水。羊群胆小，不敢下水，还得一只一只往水里推……但一路上看到最多的风景却是草原上的羊群，它们是这个时代放牧经济的胜出者——在牧民家庭的牲畜结构中，羊群的数量远远高过了牛和马。

拉铁摩尔分析过游牧社会中各种动物的作用：“马在战争中特别有用。使用骆驼的技术可以自由地在最



(于晓冬摄)

独自在草原深处放牧的老羊倌周金宇

贫瘠的草地上来往，也可以利用它到达距离较远、水草较好的地点。牛和牦牛生长在草地和高原上，比其他牲畜的乳及肉的产量多。喂养得好的牛，在拖挽原始粗重的车辆的力量上比马或骆驼要强。”

每种牲畜各有所长，分别满足游牧生活所需要的食物、迁移和征战，但没有一种动物比得上羊对草原游牧民族提供的经济价值。今日的蒙古人和古时一样，羊供给他们以羊毛，制造盖蒙古包用的毛毡。羊皮可以做衣服，夏天有羊乳，还可以做奶酪和奶油，供冬天食用。羊比其他牲畜更具有食住衣和燃料的基本经济价值，到今天仍然如此。在高大叔的院子后，用羊粪垒出一长排矮墙，是这个家庭足够用一整年的燃料。

拉铁摩尔曾总结草原游牧生活是移动性与固定性的平衡，移动性的极端是马上的战士，固定性则代表财富的累积。在不同的时代，两种特性有着不同的比例组合。以此标准来看，今天的草原在财富累积的需求上，已经完全压倒了移动性需求。马匹在牧民生活

中的边缘化，不能负重且移动缓慢的羊群比重增加，是这个时代牧民们找到的经济平衡。羊信的价格也因此水涨船高，草原上一个成熟羊倌一年的薪水有近10万元。在羊群的喂养上，也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类似田地精耕那样更细致的操作，比如为一只被苍蝇蛆虫烂尾的羊上药。

套住的羊被拉到羊圈外后，羊倌压住羊的腿脚，他的妻子则拨开羊的大尾巴，用镊子在血肉模糊的尾部夹出蛆虫，再用糊墙的刷子抹上掺有机油的黑色药膏——机油的味道阻挡些许苍蝇靠近，最后撒上一把炉灰。每只被抓住的羊都像末日来临一样，奋力踢蹬挣扎一番。等治疗结束后从地上一跃而起，劫后余生般围着周围的空地跑跳一圈，再回到围栏外，淡定地观看同类经历自己刚刚经历过的恐慌。

当羊倌和羊群忙碌奔跑，与苍蝇的蛆虫血肉模糊地搏斗时，半轮月影出现在天空。这是草原一天中最温柔的时刻。太阳落山的地方，玫瑰色的光辉透过云

层照耀着浅浅昏黑的大地。暮色从地平线上薄雾般悄然升起，天地之间一片青莲色。世界在安静下来，刮个不停的风声变弱了，房子围栏前一直迎风猎猎摇动的旗子也像累了一样耷拉下来。干燥而清净的空气中，散布着割了的青草气味，低头甩尾的马匹在山脊曲线中默默啃噬着寸草。

牧民

在黑山头的第二天，高大叔开着皮卡，带我们去陈巴尔虎旗的草原深处寻访那些尚在游牧的蒙古族牧民。历史学家翦伯赞曾经称赞呼伦贝尔不仅“现在是内蒙古一个最好的牧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草原”。但随着一些现代产业的进入，矿业、精耕的规模农业、旅游业都在分割着草场资源，可为游牧的草场已经大大减少。陈巴尔虎草原是游牧蒙古族人的保留地，这里没有耕地，没有旅游宾馆，看不到什么现代世界的标记，只有无边的甚至不乏单调的绿草地。

汽车沿着草场中仿佛通向天边的土道，颠簸在草原起伏的曲线中。远处，打草车穿梭在云层投射的阴影里，11个滚轮的搂草机，大蜈蚣一样横扫草地，把割好的牧草聚拢成一道道草线；像宫崎骏动画片《哈尔的移动城堡》中浑身披挂着绞盘链条的打捆机，沿着搂好的草线将牧草吃进肚子，然后从尾部吐出一个圆滚滚的草捆。

一大群羊像大片摇摇摆摆的厚实棉被，正从道路一侧的草场转去另一边。等羊群过路的时候，路边围栏里一位牧羊人对着我们喊了一声“高三儿”。“高三儿”是高大叔的小名。这位牧羊人叫达西尼玛，是高大叔打小认识的朋友。他穿着滚金边的深蓝色对襟长袍——这是陈巴尔虎地区蒙古族牧民的传统装束，身材高大挺拔，红黑的大脸盘，笑起来露出一口醒目的白牙。

达西家是最正宗的游牧牧民，住在距离城镇还有相当距离的草原深处。他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带着家里的牛羊制品，到黑山头镇上换草原生活需要的盐、糖等生活用品。从住的地方骑马到镇上要一天多时间，晚上就留宿在高大叔家中。现在公路边的牧民大都改为定点放牧，并加上点旅游贸易等混合经济，达西尼玛还坚持着父辈的生活方式——不会耕种，也不做其他产业，在夏牧场和冬牧场中间来回迁徙，放牧牛羊换取所有的生活物品。他说游牧才是养牛羊最好的方式，但这个传统也让他离市场也更远。牲畜的价格都掌握在中间商的手里。今年夏季没有下雨，牧草稀疏

短小，每亩地的出草率大约只有去年的1/3，为了让牲畜过冬不挨饿，达西不得不考虑卖掉一些羊减轻草场的压力。但外来的羊贩子把羊价一压再压，2013年以前每只羊能卖800元，现在的收购价不到400元。

为了节省成本，达西没有请羊倌，自己放牧1000多只羊。为了照顾孩子上学，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已经一起搬到城里，家里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达西一个人待在草原深处放牧羊群，其中的孤独和辛苦可以想象也难以想象。“为了孩子，就忍受两年吧。”他像下定某种决心一样，“啪”一声冲着羊群空挥了一下鞭子。

隔着围栏，高大叔和达西尼玛聊起了一些生活在草原更深处的幼时伙伴，听到的大多不是好消息。外人看来风景如画的草原，生活其中的人命运却薄如蝉翼：有得病去世的，有喝醉酒错手杀死妻子然后自杀的，最不幸的一个家庭，四兄弟已经只剩一个。两人倚在围栏边，略带点叹息和凝重的表情说着话，羊群已经自顾自啃着草往前，消失在一块缓坡的后面。

达西曾经有机会离开这里。上世纪80年代，他所在的公社选了三个牧民去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成之后就是国家的后备干部。但三个人都没法习惯城里的生活，一个得了抑郁症，一个天天喝酒，达西虽然没出什么事儿，但也半途辍学，回到草原继续放羊。当高大叔提起这段往事，达西只是淡淡咧嘴一笑。纯正牧民生活和城市的差距，是一个城里人无法理解、草原人也无法解释的话题。高大叔说大概是2010年，自己送孩子去城里上大学时，看到一个蒙古族孩子无法融入集体生活。“大家在操场列方队，他不参加，一个人蹲在操场边摆弄草玩。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排队，他说他不会。这个孩子后来退学回家了。”

眼前这块达西尼玛和祖辈放牧的草原像微波荡漾的大海，站在稍微高一点的地方，似乎就能将草原尽收眼底，但又感觉即便站到再高的地方，也无法看到草原的尽头。耳畔风声一刻不停，脚边的每寸草每朵花，甚至每块小石子都在随风微微颤动，但举目远望，整片草原又像块化石般一动不动。在这样苍凉无垠的地方生活，会给人的心理打下什么样的烙印，以至于跟现代生活隔着难以弥合的鸿沟，外人难以明了。甚至高大叔也说，和这些从小一起长大的蒙古族朋友之间已经疏远了。那是一种潜滋暗长的分裂和距离感——这种分裂不同于当年长城所分割的两种文明，它存在于同一区域内，甚至曾经联系密切的人群中。“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感觉过得不如外面的人，他们显得很冷漠，不愿意和我们交往了。”

孤独

我们在草原上见到的最后一个蒙古族牧民是周金宇。很多蒙古族人都取了一个汉族名字，用于和外部世界交流。他们的蒙古族名字通常很长，就只在同族人之间使用，就像是一种隐秘的符号。

周金宇是一位老羊倌，在陈巴尔虎旗草原上给人放牧几十年，现在已经年近六十，头发斑白，脸上布满如李尔王般深刻的皱纹。他放羊的地方在草原更深处，除了他住的蒙古包，一辆生满铁锈的水车，还有羊群晚上休息的圈栏，看不到其他人类的物什。陪着他的活物，除了羊群，还有一匹马。原本还有一条狗，但半个月前得病死了。“我哭了一整天，那是条好狗，能帮我赶羊呢。”周金宇说。不知道是因为太久没有人对话，还是天生如此，他话音有些混沌难懂。蒙古包前就是一个月牙形水泡子，一群水鸟在稀疏的芦苇上空盘旋，他放牧的羊群在远处草坡吃草。依然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依然让来者感觉到难以抚慰的孤独。

我们到的时候，周金宇正在帐篷中吃午饭。午饭是白糖掺面包和煮土豆，伴着手边一台 tecsun 小收音机放出的蒙语歌曲，沉厚的男声随着悠扬的曲调呢喃低唱。帐篷中除了一张床、一张吃饭的桌子和凌乱摆放的锅碗瓢盆外，还晾着两张熟牛皮，散发着一股冲鼻的膻腥味儿。这是周金宇的手作物。将生牛皮用水泡胀去毛，再用帐篷前一根树干制成的牛皮碾子将牛皮碾软，然后放进牛奶中浸泡数日，晾干后就是初度很好的熟牛皮，割成细条后绞成马鞭，或者编成套马杆的皮绳，能用很多年。周金宇制作的皮绳让高大叔赞不绝口，这是靠时间和专注累积出来的物品。他每天除了赶羊，就在帐篷里，听着收音机里的蒙语歌和蒙语新闻做手工，床边已经积了半口袋编好的皮绳和马鞭。“你们在外面问问有没有人要，让他来这里，100 块一条。”他用混沌的口音说。

孤独生活的劳动者大多有一双很灵巧的手。周金宇的生活让我想起了第一天在山中遇到的那位鄂温克人。同样是脸上布满灰尘，说话做事也有些大大咧咧的粗鲁劲儿，但手指却纤细修长。每天把驯鹿放进树林后，他就坐到白桦树林里的窝棚内，用白桦皮做各种手工物品。他还很自得地给我们展示他的车钥匙链，上面稀里哗啦挂了一大长串用鹿蹄磨成的挂饰，用鹿皮穿成，捏在手上有一种湿乎乎的质感。他还用鹿角雕成烟嘴，吃饭的间隙点起一根烟，用鹿角烟嘴叼着，

香烟凭空长出一大截，斜贴在他暗黑消瘦的脸上，他努力叼得自如的姿态显得有点滑稽。

那天晚上他为我们做了三个菜：辣椒炒牛小肚、辣椒烧泥鳅，还炒了一盘豆芽菜。“这个给你。”他颇为周到地说，“男人有了下酒菜，也要有盘给女人吃的菜。”吃饭前，他从墙角拎出一桶白酒，倒出满满一大杯，先泼一半在尚未熄灭的灶火里，灶台上噗地腾起一大团莲花状的火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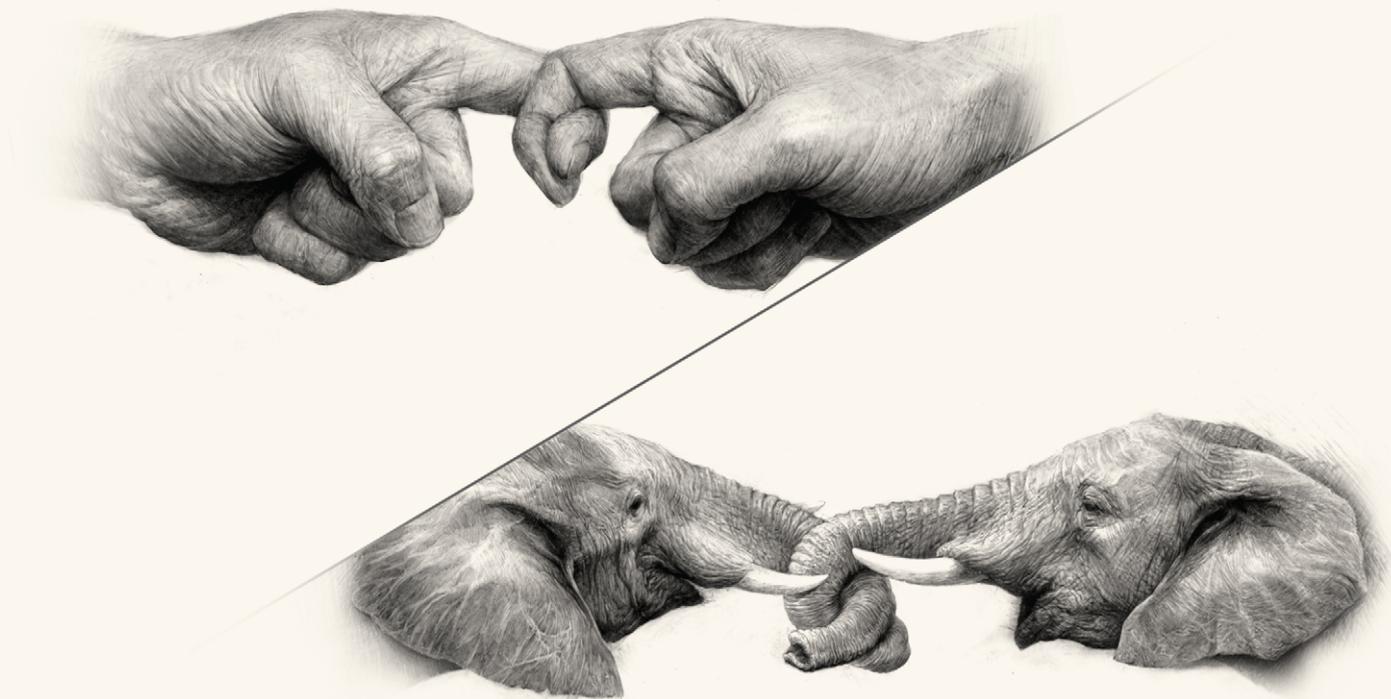
除了手工，能消解放牧生活孤独的，恐怕就是酒了。草原牧民和山中猎民一个共同的爱好是喝酒，都是那种不管不顾的喝法。这里因为喝酒引发命案甚至伤害亲人的案例并不少见，越是草原或者森林深处的人，喝得越厉害。

我们在山中夜晚的酒局也很快出现难以控制的场面。鄂温克人用水杯盛酒，一杯一杯喝下来，待客的热情已经渐渐被酒精催化为一种自说自话的欲望。他的话滔滔不绝，先是说这片森林的生活，白桦树皮烧成灰可以治小孩拉肚子，苦苦的归心草可以治心脏病，甚至摔伤重度骨折也可以依靠喝鹿奶痊愈，然后说到鄂温克族人越来越少，最后说到国家下拨给驯鹿养殖户的补助金没有到位，他们得不到新的鹿种，驯鹿也面临着种族危机……夜越来越深，他的话像桶里的酒一样无穷无尽，不能打断，也不允许结束。“我是主人，主人没走，谁也不许走。”说这话时，他的嗓音低沉有力，在漆黑的夜色中让人感觉可怕。

我开始觉得，我想象中的游牧者的孤独是难以靠近，也不可安慰的。经年累月的独自生活，就像时间冲刷出的深深的河床，孤独则像河床中的水流，沿着既定的轨道向前奔流。任何想终止这种孤独的行为，不过是在河流中激起一些不自量力的浪花。作为一个来自长城内的完全的外来者，我这才体会到高大叔所说的因为分裂导致的距离感——那是一种情感无法给予和交流的遗憾。我曾经想象这是一个善意且美好的山中夜晚。我们留下来和鄂温克人一起分担林中的孤独和黑暗，第二天早上能看到清晨的阳光从白桦林的枝叶间照进来，整片林子都好像闪着金光——鄂温克人说这是森林最美的时候。我们想象他清晨坐在白桦树下开始手工的模样，那是一种最接近森林猎民生活想象的美好画面。但我们最终没有在帐篷里过夜，而是像逃离什么一样连夜离开了森林，离开了酒桌边那位接近烂醉的鄂温克人。因此，我们没能看到清晨的白桦林，也没能看到鄂温克人在林下窝棚里平静专注手作的模样。■

勾起手指，连结拯救的决心

Link your fingers to support elephants



拒绝购买象牙制品，支持象牙禁贸。勾勾手指，把拯救大象的承诺传递下去。

Reject ivory and support the ban. Link your fingers to pledge your support for elephants!



拯救大象不能没有你！扫描二维码
或登录 <http://www.wwfchina.org/ivory>
传递爱的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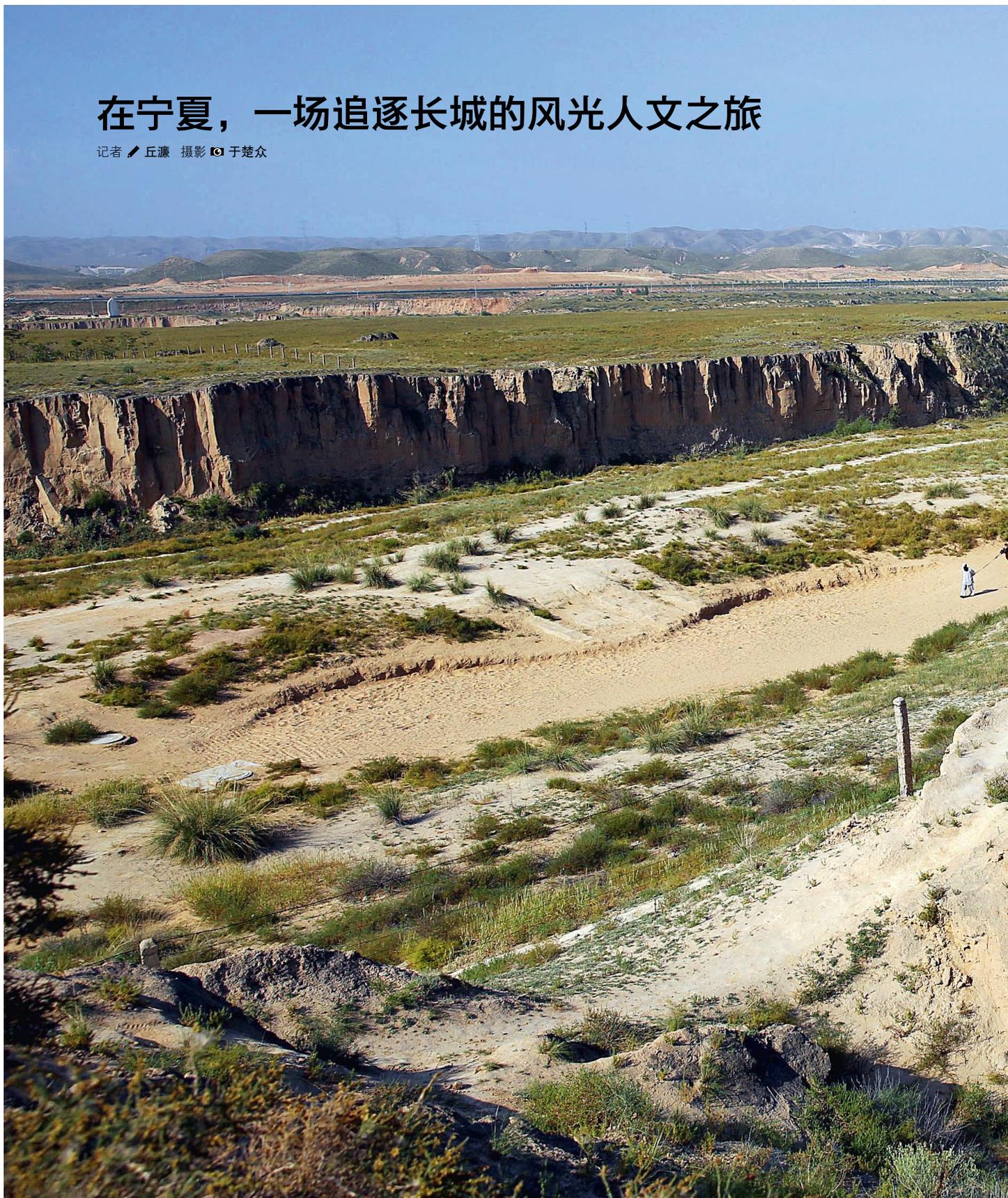
共同发起全球拒绝
非法野生生物贸易行动

TRAFFIC

the wildlife trade monitoring network
国际野生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在宁夏，一场追逐长城的风光人文之旅

记者 / 丘濂 摄影 / 于楚众





宁夏灵武市水洞沟景区里的明长城遗址和驼道



贺兰山三关口。远处为明代长城遗址

宁夏的长城遗迹多、保存完整、时间跨度大，这让它有“长城博物馆”之称。沿着长城旅行，既可以感受到路途中的迥异风光，也能体会多民族交往融合的今昔风情。

“长城博物馆”

傍晚时分，我随宁夏石嘴山市历史地理爱好者李玉红爬上一截子“土墙”向北眺望。远处渺茫的山口就是贺兰山一个叫作大武口沟的山口，因为过于宽阔，而经常成为蒙古军队长驱直入袭击的目标。我所登上这截“土墙”就是修建于明代的一道防范入侵的北长城。其实再往北还有一道明代早期的“旧北长城”。到了明代中期起义频发，牵制了边关的兵力，防线也就干脆南移来做消极防守。北长城一直蜿蜒到黄河西岸，冬天还能提防通过上冻的黄河而来的兵力。

与我们通常印象里以八达岭为代表的长城不同，宁夏的长城多用黄土分层夯筑。土褐色的墙体与周围的黄土大地难以分割，有时那些位于山间的隆起会让你困惑那究竟是地形地貌的一部分，还是一段人为工事。其实长城的修建在用料上从来没有一定之规，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它的基本原则。八达岭长城之所以用条石和大砖砌筑，是因为周边就有石材；有的沙漠地带的长城则是利用沙漠中生长的红柳枝、芦苇掺拌沙泥来夯筑，相当坚实。看到这样的景色，会很容易判断“月球上能看见万里长城”这句话的真伪。实在很少有人造建筑，如此精妙地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北长城只是宁夏境内众多长城段的一部分。翻开地图，就会惊讶于这个中国内陆面积最小的省区里，存在的长城遗迹的数量之多。官方确认的就有战国时代秦长城、秦汉长城、隋长城、宋代壕堑、明长城等，遗址长度1500公里。时间跨度大且保存有敌台、关堡、烽火台、站台等完整的防御体系是宁夏长城的特

点，因此宁夏又有“长城博物馆”的称号。银川旅游的新宠水洞沟景区打出一块响亮的招牌——“中国唯一从长城通向三万年文明的时空隧道。”这是因为此地有明代的长城和驻军用的城池红山堡，还有反映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水洞沟遗址，而将两者相连的是一个隐藏在山体内部、迂回曲折又四通八达的“藏兵洞”。里面议事厅、灶台、粮仓一应俱全，还遍布暗器装置和陷阱。驻守的明朝军队可在这里积蓄力量，也可以诱敌深入，实行地下加地上的联合打击。这是别处长城所不具备的立体防御攻势。

仔细观察宁夏古长城的分布和走势，还可以做出有趣的发现。比如宁夏北面的长城遗址和今天的省界几乎重合。这是因为宁夏西北是贺兰山，东北接壤毛乌素沙漠，它们都成为行政区划时的天然地理分界线。长城沿此而建，一是可以依靠山地形成的天险，二是确保优质的土地资源都在界内。再有就是不同时期的长城和一条条年均等降水量线走向接近。长城在 200 毫米和 400 毫米降水线之间移动，说明中原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对峙互进、此消彼长的关系。400 毫米降水线是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也是森林植被和草原植被的分界线，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居于界限两侧。当某一文明强大时，也会扩展到另一文明的地域当中。宁夏地区历来都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相互联系和交往的地区，两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吸收和补充，形成了今天宁夏的地域文化结构。

宁夏虽小，但是自然景观包罗万象。大山和大河是宁夏基本的地理格局。贺兰山和六盘山是一南一北两道天然屏障。巍峨的贺兰山挡住了风沙和寒流，六盘山是黄土荒原上的绿洲。奔腾咆哮的黄河冲破黑山峡的阻挡，进入宁夏境内变得温柔舒缓起来，滋养出富饶的北部平原。在山川平原之间，点缀着湖泊、湿地、峡谷、丘陵、沙漠和荒漠草原等各种地貌，袖珍的宁夏可谓是中国地理的微缩盆景。一种将宁夏美景尽览的方式就是追随长城去旅行，毕竟那些垛口形式的线段遍布于宁夏版图的许多地方，它分界线的属性还往往能让你同时领略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观。

于是我们以银川为中心，先是北上石嘴山，再向东去盐池，然后向南沿着贺兰山东麓停留中卫向南去固原，再由固原经过同心一路向北最终返回银川。驱车 2200 公里的旅行，遍及宁夏的东南西北，这一路我们主要涉及明长城的三部分遗迹。宁夏境内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年代便是在明代。境内从北往南分别有三道防线：第一道是从甘肃进入宁夏的中卫，从中卫沿

着贺兰山北上至红果子沟向东到黄河边，越过黄河向南到横城、盐池，向东一直到陕北，越过黄河再到山西和山海关，这是通常所说“万里长城”的一段；第二道从陕西的定边向西，经过宁夏同心的下马关，过甘肃靖虏卫的干盐池，一直到黄河；第三道是在固原，在原有战国秦长城的基础之上。

除了自然风光，沿途也可体察人文风情。长城曾意味着保守和隔绝，但它的实际作用却促成了民族之间的交往。比如，明中叶时期，明廷和内地人需要北方草原民族生产的马牛和毛皮，草原民族也需要内地生产的盐、茶、粮食等各种生活必需品。在和平年代，双方便沿长城一线开展了互市活动。万历《四川总志》便记载，在西北地区出现“商贩满关隘，茶船遍江河”的景象。红山堡一带的长城内侧更是形成了一条繁华的“宁（银川）盐（盐池）大道”，被称作“黄金商道”。

所以融合总是宁夏文化发展的母题，突破长城界限的移民贯穿了宁夏历史的始终。这种移民的方式，不仅是北方少数民族在宁夏地区的活动，也有汉族因为屯田戍边而来到宁夏土地的生活繁衍。它既出现在古代，也蔓延至近现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活动已经成为往日烟云，今天的宁夏呈现出汉回并重的人口结构。回族的形成和蒙古族的入主中原有很大关系——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后，他和他的继承者多次发动西征，征服了中亚、西亚各国，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伊斯兰化的突厥人被蒙古军队作为工匠、士兵带入中国，这批超过百万的“回回人”即成为今天宁夏回族的一支重要祖先。现代的宁夏移民则包括有支援三线建设的移民。李玉红谈到他生长的石嘴山市，用“年老和年轻”来形容石嘴山的历史。年老，是因为石嘴山的位置险要，是历代重兵守卫之地；而年轻，则指它是一座建成时间不久的工业城市。依靠贺兰山，石嘴山境内太西煤的储存丰富，50 年代当地开始发展煤炭工业，大量的技术人员、生产工人迁入。许多移民都来自同一地区企业的整体搬迁。“就像石嘴山的一矿来自辽宁本溪；二矿来自鹤岗、双鸭山；白茂沟矿主要来自甘肃山丹。”李玉红说。他的父母便是和工厂一起迁自甘肃兰州。如果说父母一代都还局限于老家人的社交圈，李玉红这代早已经认同了宁夏人的身份。

“宁夏有天下人。”地处西北边陲的宁夏，一直都是各民族东来西往、南去北来的会聚之处。开放与包容是宁夏文化的特质。回汉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新老移民之间相互支援，这便是我们在遍游宁夏之后感受最强烈的人文风景。



盐池：农牧交错带的生活

地图上，盐池县的兴武营位于一个特别的地带。它靠近宁夏东北部和内蒙古相邻的边界。沿着边界而走的长城在它的西面分岔成为两条，它正好夹在两条长城的中间。“营”字透露出它的历史作用。长城沿线，“堡”与“营”的称谓都是屯兵戍守的军事要塞。仅仅观察地图，兴武营这个地方就足够吸引人了。

为什么会有两道长城？查阅史料可知，第一道长城修建于明朝成化年间1474年。这道长城西起黄河东岸的横城，一路向东经过盐池县内，再到陕西定边县。到了1531年，明朝政府重新加固了兴武营以西至横城的那段长城，又在兴武营以东，抛开原来的长城，向南移约5公里修筑了一道新墙。秦始皇修筑长城劳民伤财为天下人所痛骂。明代时为了不使人们联想到秦时暴政，称长城为边墙。有点让人不解的是，第一道长城反而叫作“二道边”，第二道墙则叫作“头道边”。

生活在两道长城之间的人日常生活多少和它有

关。我来到兴武营的时候，正看到几个村民蹲在“头道边”的土墙上聊天。他们告诉我墙顶信号好，他们闲来无事都喜欢到墙头待着以便接收手机信息。早年间长城保护还没有严格执行的时候，村民碰到盖房子，或者地里坑洼的情况会从墙上取土。不过这夯土的长城并没有兴武营城的城砖好用。一位村民带着我去转各家各户，厚重坚实的城砖被用来盖房子、羊圈和砌井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拆城砖的高峰期。《银川晚报》曾经记载村民的回忆：“人们赶着马车、驴车，沿着城墙四面拆砖。因城墙高耸直立，村民便从城基拆起，下面的拆多了，上面的便轰然而下。”古老的兴武营城在40年前为村民提供了建筑材料，今天依然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恩惠着村民——不少家庭都挂出了写有各家姓氏的酒旗，这表明它们都是有接待能力的农家乐。还有许多游客像我一样，为了看长城与新武营古城而来。

“头道边”往南大概三四百米的位置就是兴武营



左图：沿着银川市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栈道可攀登贺兰山

右图：岩羊是贺兰山地区常见的野生动物

古城。城砖不见了，新武营看上去是一座黄土垒就的四方城池，城的西面和南面有城门和瓮城，一共占地有400多亩。怀着一种期待的心情我爬上其中一面城墙向内眺望。里面空空如也，只萋萋野草和凌乱的碎石。能看出曾经有人耕种和居住过的痕迹，地面留下了房屋、田地以及甬道的轮廓。不过这和兴武营真正的身世相距甚远。兴武营现在属于高沙窝镇二步坑村。村主任潘生文告诉我，在他印象里，他爷爷那代还有人生活在城中的房子里。潘生文的祖上是清代从包头逃兵役来到的兴武营。“村里人的祖辈大多来自同时代，或者更晚。陕西、山西和内蒙古的祖籍都有。大多是逃丁，还有逃荒。”问到村中人是否还和兴武营的建造与戍守历史相关，潘生文笑道：“人都不知道换了多少茬儿了！”

不过我所看到兴武营的衰败景象倒是和明朝初年人们的所见差别不大。《嘉靖宁夏新志》中记载：“（兴武营）旧有城，不详其何代何名，惟遗废址一面，俗称‘半个城’。”可见兴武营在明代时就已经是残破不堪的废城。而兴武营的前身，专家根据另外一处出土的墓碑推测，应当是唐代安置内附突厥而在边塞设立

的六个重镇之一的鲁州，之后朝代更迭，居民西迁，兴武营也就成了风雨飘摇的“半个城”。明代正统年间，兴武营在旧址基础上得到了重修，它塞外边防的作用得到了发挥。盐池博物馆有一枚刻有“兴武营守御千户所”的铜质印章，是二步坑村民耕地时发现。明朝共有65个守御千户所，1200人为一千户所，管理者正千户是正五品，副千户为从五品。这枚小小的印章便诉说了兴武营在明朝时拱卫边疆的历史。

站在城墙上极目远眺，北面就是内蒙古界内茫茫一片的毛乌素沙漠。修筑长城和城堡工事时遵循了“凡草茂之地，筑之于内；沙碛之地，筑之于外”的原则。对于盐池来讲，它包裹进来的还有一项特别的资源——盐湖。曾经盐池县城北、东、西南分布着大小20多个天然盐湖，因此得名“盐池”。后来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年产达5万吨的多数盐湖划归陕西、内蒙古管辖，县境还有惠安堡北、中、南三池。另外一天清晨，我们在盐池博物馆馆长王生盐的陪伴下，一路沿着长城驱车前往20公里外的陕西定边县花马池盐湖。王生盐说，花马池盐湖原来属于盐池管辖的。明朝正统年间（1444）先是在花马池盐湖边筑城，为

了“边备大固”。到了天顺年间，因其“孤悬寡援”而向西南改筑，花马池城即在今天盐池县城所在地。“花马池”的名字一语道破了盐在边塞地区的另一重价值，能够以盐易马。

长城南边则是荒漠草原和草原相结合的面貌。此时遍布草原之上的黄花蒿已经成熟枯萎，米粒大小的黄色花蕾在风中摇动着散发出清香。长城分割了农耕区和游牧区，它所在的地带则是农牧交错带。一度这里是中原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对峙的战场，当和平时代来临、大一统的疆域格局形成之后，这里最突出的矛盾则是人地冲突。某种程度上说，长城建设和守卫的历史为后来愈发强烈的人地冲突埋下了祸根。农牧交错带本身生态脆弱。它年降雨量稀少（盐池约300毫米，兴武营只有250毫米）且波动，人类在这里应该格外注意生产活动的规模，实际却没有。长城研究者、美国人石彬伦曾对修筑和维护长城所要消耗的资源做过调查：每烧制一块砖，士兵需要烧掉7.5公斤木柴。即便是夯土长城，士兵也需要用木柴生火做饭，卫戍部队的收入来源则主要依赖伐木业，维持城墙的开支仅有60%~70%来自财政拨款。明代官员因此抱怨说，这样的行为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地表砍得光秃秃的，马背上的敌人更容易入侵。

由于长期过度开垦荒地和超载放牧，草场退化和沙化严重，从2003年5月1日起，宁夏全境都实行封山禁牧。盐池的滩羊驰名全国。所谓“滩羊”，指的是羊生长的环境。它既包括山羊，也包括绵羊，只要在草滩上吃草，就可称作滩羊。盐池是宁夏唯一的牧区县，农业一直是以畜牧业为重心。潘生文告诉我，由于盐池降水少，灌溉要靠打井、投入成本高，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都依靠养羊，农耕是为放牧服务的。羊肉以及轻而暖的“二毛皮”都能卖个不错的价钱。禁牧之后，农民在田地里种植苜蓿草、玉米和萝卜用作喂羊的饲料，其他的蔬菜粮食每家也都会种些，为了生活上自给自足。

盐池滩羊养羊户协会的会长王志文并不忌讳他和协会中的农户将羊偷放出去吃“夜草”的行为。在他看来，今天的盐池滩羊越来越名不副实。“农民用玉米萝卜喂的羊还好。那些大型养羊厂的羊吃添加了激素的饲料，最多90天就出栏，那还是滩羊吗？”滩羊可贵，就在于盐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盐池草场里的土壤以灰钙土为主，有机质含量少，盐碱化普遍，矿物质丰富；而且这里盐湖多，水质碱性大，羊喝了这样的水会愈发细嫩；更别说牧草中包含的上百种植物，其



中的甜甘草、枸杞和紫花苜蓿本身还都是中草药。一只羊要吃够10个月才能出栏，你说肉能不好吗？”

宁夏禁牧已经13年，王志文认为生态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村里面带着大家在集体土地上种植柠条，那种植物根有两三米深，最热的时候其他植物都旱死了，可它还能吸上来地下的水，防风固沙效果特别好。以前刮大风这边看不到那边，现在绝不会有那种情况。”并且超载放牧的情况也不存在了。“村里三分之二的人都出去打工，只有四五十岁的人还留下来养羊。”以王志文所在的盐池县花马池镇柳杨堡村为例，全村养羊还不到1000只，草场面积则有将近1万亩，早已经大大低于国家一亩地一只羊的载畜量规定。曾经有专家建议，盐池退化的草场植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为避免草场价值的浪费，应该适时考虑调整禁牧政策，改全面禁牧为合理放牧，实施轮牧和休牧相结合。这些建议至今都还未付诸实践。“过去的农牧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在全反了。”王志文苦笑说。

贺兰山：神秘与险要

如果说宁夏长城遗址最多、形态最丰富的地区，那非贺兰山沿线莫属。从银川市向西望去，坦荡如



砥的平原尽头有一列错落的隆起，那就是贺兰山。它是我国不多见的一条南北走向山脉，全长220公里，宽约30公里。诸多王朝借助贺兰山的屏障来修筑长城，它们同贺兰山一起对由黄河水冲击形成的银川平原和卫宁平原形成最好的护卫。

贺兰山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迁徙通过的十字路口，这从神秘的贺兰山岩画就可以看出。1969年，当时作为下乡干部的李祥石前往贺兰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在一个清闲的午后，他想到去峰峦叠翠的贺兰口散步，发现了山口的巨石上遍布着各种动物、怪兽的图画，于是开启了研究的兴趣，这也逐渐引发学界的关注。在此之前，这些“石头画”不过是被村民当成“凶画”来吓唬孩子。贺兰山岩画的断代众说纷纭，基本的介绍是始自商周时代，下限到西夏时期，绵延有3000多年。3000多年来，贺兰山一带相继成为猗狁、羌、匈奴、乌桓、鲜卑、羌、柔然、突厥、回鹘、吐蕃、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活动的地方。那些图画，应当是他们狩猎游牧、祭祀巫术方面的写照。

岩画遍布于贺兰山东麓的大小沟口，贺兰口是岩画最集中的一处。“岁月失语，惟石能言。”今天的贺兰口岩画景区立着冯骥才题写的一块石碑，那些缺乏因果、有如神刻的画面给人以无穷的遐想空间。千姿

百态的骏马形象吸引了我的注意，它们有的奔跑，有的跳跃；有的瘦削，有的肥壮；凿刻的风格也有不同，或显得飘逸灵动，或者粗厚凝重。对马匹的驾驭之于游牧民族的形成至关重要。按照中国边疆的研究者欧文·拉铁摩尔的观点，牧业是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在最初阶段，无论哪里的部族都是以种植为主的混合经济。随着占据易于耕作的黄土地带的华夏族的扩张，另外一些部族被挤到草原和农耕区的边缘。最终由于对马匹的成功驯化以及马具的应用，这些部族脱离定居生活，成为真正的游牧人。

“贺兰”二字有骏马之意。唐人杜佑在《通典·突厥传》中写“突厥谓马为贺兰”。那么这座山是怎样和骏马联系在一起的呢？古人已经注意到贺兰山上有岩画的存在，北魏时期郦道元便在《水经注》中写道：“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根据统计，贺兰山岩画中仅仅单独“马”的图案就有123处，还不算那些骑牧类的内容。所以学者如宁夏社科院历史所所长薛正昌认为，贺兰山的得名与贺兰山岩画中的骏马题材有关。

贺兰口的岩画曾被画家以长卷的形式完整记录下来，可是漫步在山口，试图将它们一一对应时，发现许多岩画已经漫漶不清了。查询资料才知道，早年间

左图：宁夏固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附近开凿有须弥山石窟

右图：贺兰山岩画是古代游牧民族的杰作



开发旅游时并没有对岩画保护采取足够重视，游人可以爬上去随意乱摸、乱拓片；1979、1983、1998年还有三次炸石修渠的行为，毁去大量岩画。另外的破坏则来自自然灾害。就像刚刚8月21日贺兰山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洪，将一批岩画顺着河沟冲下。我到的时候工作人员还在进行着寻找和清点岩画的工作。“不过这次灾难也有好有坏。”讲解员说，“好的一面是，我们又发现了7幅新的岩画。”

赵实对贺兰口景区中的岩画印象不深，因为在他行走贺兰山考察长城遗址的过程中，实在见过太多美

丽的岩画。他给我看相机拍下的一张触动他的岩画照片。那是在一个叫北盆口的山口附近发现的，是个游客难以抵达的地方。在一块小石丘上，密密排布了上百幅凿刻出来的人面像。他们有着纺锤形状的脸颊，弯弯的眉眼，有的头上还伸出了触角。“就这样铺天盖地出现在眼前，让人觉得直面古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巫术仪式的现场。威严但是不恐怖，神秘却没有距离感。我几乎要热泪盈眶了。”

赵实是《贺兰山长城考察与探索》一书的作者。走访加写作，这本书花了他8年的时间。这样偏门的



西夏王朝的遗迹保存不多，西傍贺兰山的西夏王陵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处

题材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找到了一位资助人，在香港印刷了 600 册。虽然书里有不少新的发现和观点，但并没有引起什么学术上的注意。美国记者何伟曾经描写过长城研究的尴尬以及长城研究者的群体。“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没有专门研究长城的学者。在中国，历史学家一般专注于政治体系研究，而考古学家则致力于挖掘古墓，长城在传统学术领域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此致力于长城探索的都是独立于体系之外的个人：“他们都是男性，体格健壮”，“偏执”，“是具有顽强意志的旅行家”。

赵实就符合这样的描述。他的真正职业是一名政府的公务员，外表却完全是一副常年日晒雨淋的模样，黝黑而瘦高。在那 8 年的时间里，他把所有的休息时间、节假日都献给了长城考察，扎营野炊在外是常事。他的腿上有伤，那是有一次驾驶摩托车去野外在山沟里摔倒，腿被排气管烫伤的结果。他给我介绍随身工具的时候，提到了几样特别的——金属探测器，能够发现有趣的遗留品；铁锹，不仅为了挖掘地下遗留，还可以应付陷车的情况；十分偏僻的地方要带卫星电话，不过从未用过。他最常用到的还是笔和本子，以及双

腿。长城吸引他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它们建在完全不可能的险要地带。“即便现在，到达也十分艰难。”

我们跟随赵实沿着贺兰山一路驱车向南，到达中间部位一个叫作三关口的位置，这是他想向我们仔细说明的一片区域。顾名思义，这是一个有着三道防御工事的山口。头关还划在宁夏境内，二关和三关的位置已经进入内蒙古边界。我们几乎手脚并用，爬上了二关一座黄土和碎石夯就的墩台残体，发现它的视野非常好，不仅山谷中的情况一目了然，还与头关和三关的墩台保持通视——三个墩台并不在一条线上，即使二关的戍守士兵没有留意，三关和头关的官兵也能直接沟通。爬上这个墩台之前，我还期待着能看到分水岭一般的景色：西部会有一望无际的腾格里沙漠，东部则有带子一样闪着光的黄河。一边是没有一丝生机的荒凉，另一边是黄河水灌溉下的“塞上江南”的万顷良田。遗憾的是这个位置不够高，空气也不够清澈透亮，那种景象只能存在于我的想象中了。

从这里看贺兰山各个山峰倒是清晰。向贺兰山北段眺望，它山势高耸，沟谷深切。正好是山阳展现眼前，植物稀疏，土层瘠薄；而向南看，贺兰山的走向渐缓，仿佛踊跃的兽脊，山阴处的灌木与乔木也都郁郁葱葱。三关口是北面贺兰山崇山峻岭的终结，山谷又开阔，难怪要采用三重防御体系重兵防守。赵实告诉我，长城在三关口以北主要是在山谷内修筑的短墙，守住山口即可；以南则是连绵不断的墙体来做整体防御，因为任何一点都很脆弱。

三关口当然还有不能一眼就明了的历史密码需要赵实为我们来破译。头关往南有一道土墙，身形高大，保存完好，就像一条色彩暗淡的蛇，在秋日的阳光下迤迤而去。那是明城墙无疑。而再往靠近山脊的高处看，还有一条与它并行的灰线。赵实认为那应当是秦汉时期的旧长城。另外一本由宁夏文物局许成和马建军两位考古学家合著的《宁夏古长城》推测秦始皇并没有向西、向北修筑新的长城，而是利用黄河天堑，沿河建城设障，驻兵戍守。对于宁夏境内是否存在汉代长城，则说尚未调查清楚。“黄河以西没有秦汉长城，这是史学界的普遍观点。”赵实说。他的证据是在这段垒石构成的长城遗迹边找到了陶器的碎片，那是轮制光面灰陶，属于汉代风格。为了寻找更多的支持，他还跑到了内蒙古狼山、桌子山和阴山地区的长城做考察。那里的长城在明代就弃之不用，因此保留了早期长城的特征，这种特征和贺兰山的垒石墙相似，进而更加确定贺兰山的长城应该为秦汉遗存。“所以

秦汉的长城防线应该比明代更为向外延伸。”

而在头关以东的低丘地带，赵实找到了《明史》中记载的西关门墙的旧址。它是为了防御蒙古人自三关口以南方向威胁宁夏镇城（银川）以南地区，在西侧贺兰山麓的明城墙内侧修筑的一道额外的工事。但受到风沙和流水的侵袭，不久就荒废了。赵实是先注意到一座烽火台，再和山脚与山坡的墙体痕迹相连，与史书对照后，才确定了西门关墙的位置。其实，若不是赵实来指点，我们根本无法发现城墙的踪迹——仔细看，曾经修建过墙的山体会留下凹槽，凹槽能存住雨水，有一条线比旁边长了更多的青草。那就是墙基的位置。这个发现后来得到考古部门的证实。

如果这两个说法都没错，也就是秦汉时的长城防线更靠外，而到了明代防线全面收缩。这种“保守到无厘头”的做法，赵实猜想是明朝政府为了缩减守军的结果，因为史料记载，朝廷经常受到守军逃离的困扰。“整个漫长的西关门墙北段漫长的地域只有三个墩台。”赵实说。如此一来，明朝政府安心地把防守的大部分任务交给了贺兰山这道天险。

银川到中卫：寻找失落的西夏王国

西夏是唯一一个以独立王朝身份卓然而立在宁夏大地上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的祖先党项族原居四川松潘高原，唐朝时迁居陕北。因平乱有功被唐帝封为夏州节度使，先后臣服于唐朝、五代诸朝与宋朝。夏州政权被北宋并吞后，由于李继迁不愿投降而再次立国，并且取得辽帝的册封。李继迁采取联辽抵宋的方式，陆续占领兰州与河西走廊地区作为粮仓。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它共传10帝，享国189年，都城兴庆府就在今天银川的位置。

西夏被蒙古所灭。双方一场关键性的战役叫作克夷门之战。清代人撰写的《西夏书事》里记载这场战役：“克夷为中兴府外围，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悬绝不可登。曩霄时（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尝设右厢朝顺监军司兵七万守之。安全（当时的西夏君主）闻蒙古兵深入，遣嵬名令公（西夏将领）复率兵5万以拒。蒙古兵至，遣嵬名令公自山坂驰下，击败之。相持两月，备渐弛，蒙古主设伏以待，遣游兵诱之入伏获之，遂破克夷。”

克夷门就是贺兰山三关口的位置，这里也离西夏帝王历代陵寝很靠近。但是赵实并不认为西夏一直以贺兰山为屏障利用先人修的长城来对抗敌人。“因为西夏南边有宋，北面是辽，东面有金，那才是西夏



犹如世外桃源般美丽隔绝的南长滩村是黄河进入宁夏后的第一个村庄，南长滩村小学如今只剩下最后一位老师

的防御重点。蒙古在西面的崛起是较晚的事情。”他在贺兰山里见过不少西夏遗迹，但它们并没有覆盖或者扰乱之前的长城设施。宋朝倒是利用过在固原的战国秦长城反击过西夏。

1038年西夏立国时，疆域范围在今宁夏、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内蒙古以及陕西北部地区。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接萧关（宁夏同心县往南），北控大漠，占地2万余里。占领这片广大地区后，它的经济方式发生了改变，成为一种农牧并举的半农半牧的经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杜建录院长告诉我，以往的游牧民族兴起得快，衰落得也快，因为游牧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一旦遇上了大的灾害，马上就有凋落趋势。而西夏能够安定下来，并及时调整了社会组织的方式，这是西夏能够较长时间存在的原因。

以儒治国是西夏政治文化的核心。“中国历史上，论重视儒学和孔子的程度，西夏可能比任何朝代都甚。第一次封孔为帝就是在西夏。”杜建录说，“党项族只占西夏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它建国前后，面临着如何摆脱部落制的约束，强化王权统治，如何有效管理文化习俗迥异的众多民族，如何对抗中原王朝和周边政权，

实现政治、文化和军事上的全面发展，都离不开儒学这条线。”杜建录认为，西夏王朝在理解民族关系上尤其重要，就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在宁夏的地域里少数民族主动认同和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以往都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你退我进，少数民族的文化间接受到影响。西夏时期算是一种真正的融合，一个转折。心理上，它认为自己居于西面是西朝，辽是北朝，北宋在南边算是南朝。但它都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国家的一部分。”

今天西夏王朝的遗迹已经非常少了。西夏王陵是最重要的一处，可是它只剩下光秃秃的夯土包，外面的木质宝塔建筑已不复存在。另外就是一些在贺兰山里存在的佛塔和避暑行宫的残留建筑。所以对西夏几乎彻底消失，有一种“屠城”解释——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过程中病故于六盘山，蒙古将领们悲痛万分，于是“戈矛所向，耆髻无遗”，这样西夏文化就遭受了灭顶之灾。按照杜建录的研究，其实并非如此。入元之后，西夏遗民被称作唐兀人或河西人，大量编入军队为元朝东征西讨，或者守卫四方。“唐兀人在元代被认为是色目人的一种，享有仅次于蒙古人的待遇。蒙古人虽然是统治民族，但是人口少，对于归附的汉

人缺乏信任，所以很倚重色目人来一同治理帝国。从现存文献来看，唐兀人在各级官僚机构中都有任职，且不乏高官。”对于西夏人的消失，杜建录的解释是他们最终融入别的民族。而那些贺兰山林里的寺庙，杜建录认为也许并不是有意被人破坏，只是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佛教信徒相对少了，也就荒废掉了。

旅游手册上介绍在中卫市下面一个叫南长滩的村子有党项族拓跋氏的后裔。传说是西夏被蒙古征服的时候，有一部分党项族人逃到了那里，从此落地生根。我以为是旅游宣传的幌子，没想到和杜建录求证，他说证据缺乏，但也没有完全否定，我们决定去看一看。

去南长滩的交通非常不便。它是黄河进入宁夏后的第一个村子。去那里需要先绕到甘肃界内，再走一段将近45分钟、两边都是矿山且完全没有手机信号的土石路。然后算是到了南长滩的北岸。接着乘坐一种可以把车都一起开上去的渡轮才能到达南长滩村。这种抵达的难度，让人觉得正是《桃花源记》里描写的祖先为了逃避战争灾祸才会到达的地方。并且村庄是极美的——黄河水突破一个叫作黑山峡的峡口蜿蜒而过，冲击形成了南长滩村的良田沃土。爬到山上向下看，一垄垄的玉米地、西瓜地、菜地形成或浓绿或淡绿的色块。还有葱葱郁郁的一片有300多年的梨树林，里面结满了橙黄色的香水梨。4月梨花开放的时候会格外美丽，村子淹没在白色花朵的海洋之中。

村子里最有文化的人是已经退休了的南长滩村小学校长拓兆柏。他告诉我，村里有一份族谱，但是只记载了从明末清初到咸丰年间拓氏的发展情况。他说据他太爷爷讲，村子在回族起义期间曾经遭到过血洗，他太爷爷当时年纪小而幸存下来。另外还有住在山上的四五家人免于遇难，因此再早的事情没人说得清。光绪年间，因为村子里打了水车，更多的人迁过来居住，村子里除了拓姓还有其他姓氏的村民。关于这个拓姓和党项族拓跋氏的关系，就没有更多线索了。

中卫市里为了帮助南长滩村发展，为村子硬化了村道，资助村民们改造房屋做成农家乐。村子的街道都以和党项或者西夏相关的名次命名，还配上了西夏文。一个叫“拓拔寨子”的度假村孤零零地立在村口，它的建造风格完全是凭借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些都没有让这个日渐凋敝的村子获得起色，每年过了梨花的花期，几乎就不会有游客再光临村子。因为地处两省交界，修路始终得不到解决。年轻人都离开了村子，留下的都是四五十岁年龄的村民。拓兆柏曾经任职的小学只剩下一位尚未退休的老师，带着几个学

前班的学生。等到孩子们到了真正上学的年龄，父母就会带着他们去中卫市租房子伴读。

固原至同心：融合之地

从中卫离开，我们继续前往固原。宁夏境内官方确认的最早一段长城遗迹战国秦长城就经过固原。但这里并没有之前在北段和西段长城所见到的作为地理分界线应有的景色。它的东面远远的地方是还没有发展过来的城市，西面是广袤的乡村。宁夏南部山区整个战国秦长城遗址，唯有固原这段保存得最好，这是因为明代时又对它进行了重新修葺和利用。从现代城市的角度看，固原只是西北大地默默无闻的一座小城。但它从战国到明代，都曾经是边塞重地。

战国时期，秦国昭襄王伐灭了居于陇东和宁夏南部的义渠戎国，设置了乌氏县，那成为固原的建制之始。为了防止匈奴的南侵，昭襄王修筑了长城。在此之前，秦惠王还设立了萧关，就在今天原州区开城至泾源县瓦亭之间的位置，目的也是防范匈奴，拱卫关中门户。尽管如此，仍然出现了汉文帝十四年匈奴攻破长城，取下萧关，直冲到距离长安仅300里的情况。基于这块土地扼守边塞的重要性，有了建设固原城的需要。于是汉武帝时设安定郡，治高平城，也就是固原市所在地。因为城坚池深，当时就有高平第一城的美誉。固原城迎来第一次繁盛是在隋唐期间，固原成为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关键驿站，商人、僧侣会聚于此。固原城的大规模修整和增筑是在明代。不仅用城砖包裹，还“增设角楼、铺房、炮台、水沟，加筑垛墙，疏穿池阱”，使得“陇右名城无出其右”。随着“元人北归，屡谋兴复”，固原城的军事地位在不断提升，成为明朝边防九镇之一。

30年代，历史学家史念海对固原的城墙做出比“比平遥好”的判断，这成为固原人心中的一个执念。可惜今天古城只剩下一座高大的靖朔门和大约50多米的城墙，另外还有两处土丘残余。上世纪70年代初的决定让城砖成为地下防空洞的建筑材料，使之再蒙巨大损失。唯一一个能够集中感受固原往日辉煌的地方是固原博物馆。它的级别甚至要高于位于银川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是宁夏唯一一个国家重点博物馆。我在宁夏博物馆参观时，屡次听到讲解员说“展品原件”在固原，都勾起了我对一个小城在历史中所扮演角色的好奇。

博物馆的华彩篇章都和固原在民族融合与文化交

流方面的历史相关。比如先秦时期体现北方青铜文化的一系列文物，它们从陇山附近大量的戎人墓葬中出土，既有中原文化痕迹，又有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尤其精致的是一批作为衣着装饰品的动物纹牌饰，有青铜制作，也有镀金而成。一枚直径只有3.1厘米的动物纹金扣饰只有贴在玻璃柜上才能看清上面精巧的图案：两虎分别口噬两鹿颈部，两鹿双眼圆睁，后肢搭于虎背之上，做挣扎状。它提示着戎人出没的环境森林密布，野兽成群。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两件由丝绸之路贸易而流传过来的工艺品——鎏金银壶，以及一只碧绿晶莹的玻璃碗。鎏金银壶上刻画的是引发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倾世美人海伦楚楚动人。根据专家鉴定，这是古代波斯萨珊王朝的工匠模拟希腊艺术风格的产物。而那件玻璃碗，腹部上下错位排列两周凸凹心的圆形装饰，先运用烧吹技术制成，再用雕花技术进行整形，也体现了萨珊玻璃器皿的技艺与风格。

中原文化、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构成了固原在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底色。今天的固原地区也就是简称“西海固”，包括西吉、海原、固原、彭阳、同心、泾源、隆德七个县市在内的宁夏南部地带，也是中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地。这里文化交叠与更替的过程，就好像是一部宁夏地域文化史的缩影。

北方民族大学回族史专家丁万录告诉我，回族先民定居宁夏，和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的到来有很大关系。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他和他的继任者多次发动西征，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伊斯兰化的突厥人被蒙古军队作为工匠、士兵、管理人才带入中国。另外一个促进伊斯兰教在宁夏传播的事实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掌控今陕甘宁青军政的安西王阿难达信仰了伊斯兰教，因为他小时候是被一个突厥斯坦的伊斯兰教徒养大。于是他就使归附于他的15万蒙古军队中大部分军士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元明时代，宁夏南部，尤其六盘山一代的气候较好，水草丰美，是政府重要的养马基地。元朝灭亡后，留居六盘山一带的蒙古人没有北上返回草原，明朝政府都给予了优待。这些蒙古人后来有一部分融入了汉族，另有一部分就成为了穆斯林。”明代时期，中国回族的共同体已经形成，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等到清代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大起义后，劫后余生的部分陕西回族、甘肃回族被清政府安插在今宁夏南部地区，又有一部分回族为了避害，以个人行为迁入西海固各处深山之中，加强了这一地区回族聚居的格局。

丁万录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回汉关系一直较为融洽和谐。这一方面是政府政策得当，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回族形成了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日常行为都以汉文化做基础，只是在涉及宗教信仰上有区别”。这种认同就包括几点：比如自元至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已经被逐渐内化入回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中。回族同样认可忠君爱国、孝悌之义的儒家传统；再有就是汉语的普及。回族是唯一一个自形成起便使用汉语的民族。虽然回族的先民使用过阿拉伯语、波斯语及突厥语族诸语言，但当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时候，使用汉语就是回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元明清各代，回族人在中国传统的诗词、书法、绘画、建筑，乃至儒家理学、科学等方面都有较高建树。

站在同心的清真大寺前，我就惊叹它将中国古代传统木结构建筑和伊斯兰装饰手法融会贯通的完美。它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砖雕。一进门的位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月藏松柏》的照壁。松竹梅兰层层叠叠繁复精美，勾勒的线条又很快简洁。据说是来源于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句，寓意穆斯林教徒内心清白。清真寺里广泛运用花草植被做装饰，用到的却是中国画里常用到的牡丹、荷花、石榴、葡萄。伊斯兰教义认为雕塑绘画中出现任何动物的形象都属于不义的行为。所以传统建筑的脊兽，同心清真寺的建筑中被巧妙的“转形”，用植物的自然生长状态的纹样来刻画屋脊，远看是脊兽龙飞凤舞，近观则是花卉植物。

汉族改信伊斯兰教也是回族的一个来源。我在同心就拜访了一个回族大家庭，男主人顾生忠告诉我，他家的先人是清朝初年从江苏来到宁夏的，先是到灵武，然后再到同心。因为同心这里很多都信教，先人受到感染，也入了教，这样算起来有300多年的历史。顾生忠家里挂着他父母由麦加朝觐归来获得哈吉称号的铜质证书，专门有一个空间，铺着洁净的礼拜毯。他父母都已经90多岁高龄了，是非常虔诚的信徒，每天都要保证5次拜功。回族有善于经商的传统，曾经许多家庭不太重视教育，让孩子没有完成高等教育，就早早地出来做生意。顾生忠这代人8个兄弟姐妹，有3个都在做生意，和买卖羊皮与羊绒相关。到了孩子这辈，父母都要求他们即使从商，学业也不能偏废。顾生忠骄傲地历数着孩子们考上的重点大学，脸上是掩不住的笑容。■

（实习记者赵钊君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曹伟、刘纲、石宇清、宋泽毅、樊雪崧、龙龙、刘颖对本文的帮助）

山河岁月

河西走廊上的长城碎片

记者 / 艾江涛 摄影 / 张雷





明长城最西端的屯兵古堡——卯来泉堡。
位于肃南县祁丰乡堡子滩村的这一古堡
遗址距今已有400年历史



“长城一方面阻止了敌对民族的袭扰，另一方面却促进了两边民族的融合。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本来经济互补，有了长城阻隔，迫使大家不用战争抢夺的方式，而用和平的方式进行交易。”

一路上，不断有人告诉我有关甘肃境内长城的知识：秦昭王、秦始皇，汉、明长城的区别，墙、关、堡、墩的形制，以及汉简中记录入微的屯军生活。与此同时，早年课本中那个宏伟而抽象的名词，之前登临雄伟奇险的八达岭、嘉峪关城墙，在我的心里一点点坍塌下去。长城，这个在历史风尘中难以遮掩的庞大无比的存在，正变得面目不清，层峦叠嶂。

车窗外，是河西走廊一望无垠的戈壁滩，午后尚且炙人的日光在碎石与沙砾的折射中发出点点光芒，

照样有生命顽强的骆驼刺、芨芨草散落开荒漠中的一点绿意。在西北荒凉而单调的景色里，一段城墙、几座烽燧，多少会给人带来一些发现的惊喜。望着那些经过千百年岁月侵蚀，已变得低矮的土墙，忽然想起长城研究专家、原甘肃省考古研究所书记边强的一段话：“目前为止，甘肃河西走廊所有的公路、铁路还是沿着长城修建，公路下面，就压着我们从汉朝以来的丝绸之路。”当年那些行走在丝绸古道上的商人与僧侣，在荒漠中看到城墙与烽燧，不知是否也会涌起一份归属与安定之感？

至少，长期以来，长城守护着塞内农耕文明的安全。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这道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分割开来的墙，还隐隐暗合于用以区分中国半干旱与半湿润地区的400毫米等降水线。生存缝隙中的文明冲突似乎不可避免。作为秦人故地，早在秦昭王时期，为了防御匈奴和戎狄侵扰，甘肃就修建了一条西起临洮新添镇三十里墩望儿嘴，穿越甘肃8县，长约



左图：阳关遗址，古丝绸之路必经关隘

右图：甘肃中部景泰县黄河索桥堡上方的明代烽燧

640 多公里的长城。而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出于同样目的下令修筑的万里长城，由于缺少实际遗存印证，在甘肃境内的走向一直悬而未决。

为了区分于暴秦所建的长城，汉长城称作“塞”，甘肃一段又称令居塞。地图上，令居塞仿佛一个“人”字形，经过从今兰州市河口镇至酒泉市北大河东岸长达 750 公里的一段长城，一路沿河西走廊继续向西北延伸，从安西到敦煌，一直修筑到新疆；另一路则向北从今酒泉鼎新分出，经金关，沿弱水进入内蒙古。汉塞的防御对象主要是匈奴与南羌。伴随着对匈奴作战的不断胜利与丝绸之路的开辟，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四郡（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列四关（玉门关、阳关、悬索关、肩水金关），成为首次经略河西的中原王朝。

明朝是最后一个大规模修建长城的王朝，为了对付残元蒙古部族的侵扰，在 200 多年间先后 18 次修筑长城。明长城称作边墙，甘肃境内的明长城由一条主干线与两条支线组成，主线东起景泰索桥关经古浪到武威，再北上民勤，折而西行过永昌、山丹、高台，沿弱水北上经酒泉新城堡达嘉峪关，长达 1600 公里。

两条支线，一条为自索桥至泗水堡的“松山新边”，一条则为沿黄河南岸分布，从临洮至靖远的“河南边墙”。

太多遗迹，太多历史，我们的行程一变再变，最后只能浓缩于河西走廊上从阳关、玉门关，再到嘉峪关、肃南县，结束于景泰县索桥堡的几个小点。

景色与日常

现在看来，当年的长城修筑者非常聪明，他们不仅因险设塞，用最节省的办法防守住主要路口与关隘，驻军屯垦之地也多为水源充足、牧草丰盛的地方。长城沿线设置的防守驻地，无不成为河西走廊日后城镇的基础。只是，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丝绸之路的变迁，有些地方如今已成为人烟稀少的交通要道，阳关与玉门关的命运正是如此。

沿敦煌市西南方向驱车 70 公里就是阳关遗址。沿途是一片片葡萄园，9 月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挂在枝头，惹人喜爱。司机徐善诚是当地人，据他介绍，以前这里的农民多种棉花，



景泰县寺湾乡，明代永泰古城

后来改种葡萄，一亩地的收入也从 3000 多元提高到 1 万多元。始建于汉武帝元鼎年间、作为丝绸之路南道重要关隘的阳关，如今只剩下一座汉代的烽燧，阳关故址据称在对面黄沙漫漫的古董滩上。今天外围看到的城墙与城楼，以及煞有介事的“阳关道”，都是后来旅游开发的产物。

虽然受到世博会期间的管控影响，仍能看到一拨拨的旅行团队。时空在这里呈现出一种滑稽的交错，人们一面雀跃着奔向新设的人为景点，一面又在“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感召下，渴慕着一份怀古幽思。然而，关城的界限并未消失，绕到已然倒塌半边的烽燧背后，向西望去，不断的荒漠连接着远山，你能清晰地感觉到出了阳关，便到了真正的异域。

景区的一座石头房子里，住着 66 岁的薛生虎，他已在此守护遗址几十年。小时候，当地人把这里的烽燧叫“墩墩山”，春游路过时，他们还曾经在此打土仗。对面的戈壁滩，由于人们经常能从那捡到箭镞、古币等裸露出来的文物，得名“古董滩”。

玉门关在阳关北面，同为丝绸之路要道。这座被称为小方盘城的遗址，经过 2000 多年的风雨，如今只剩下了了一圈泥土夯筑的墙体，但仍能从残存的内外女墙与马道，想象当年屯兵驻守时的火热景象。1944 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阎文儒先生在此掘获一枚写有“酒泉玉门都尉”的木简。1979 年，甘肃文物考古所长城专家岳邦湖、吴初骧等人，在距此 10 多公里的马圈湾烽燧遗址，发掘了大批汉简与珍贵实物。事实上，小方盘城只是玉门都尉治所，真正的汉代玉门关址则在马圈湾的南岸、古道所经的羊圈湾。

登上小方盘城，宽阔的疏勒河床上茂密的芦苇荡随风摇晃，河水缓缓流淌，远处的烽燧一路向西延伸而去。尽管由于上游修建水库等原因，流经此处的疏勒河水已变为涓涓细流，仍不难想见当年这里必定是水草丰美之处。更多的证明则来自附近的一段汉长城。

距此不远的汉长城，虽已颓毁，高处仍有两三尺多，通过脱落的墙体可以一窥其内部结构：台基之上，一层厚约 20 厘米的沙砾，上铺一层厚约 5 厘米的芦苇红柳，如此不断逐层向上叠筑。敦煌博物馆考古中心主任杨俊告诉我们，这是汉代长城烽燧的典型特点，除此之外，汉代长城还有石块垒砌、土坯砌筑、内用黄土夯筑外用土坯砌筑等几种修筑方式。长城旁边是大片长满红柳和芦苇的盐碱湿地，风吹过芦苇的声音极像淙淙的流水声，循声而去，却始终难以找到疏勒河水，原来这一段河水已然消隐地下。

距小方盘城东面 12 公里，便是一座汉代的军需

给养基地河仓城（大方盘城）。汉代屯军主要有三个来源：官方派遣的守军，官方招募的移民，流放罪犯。千百年来的政权更迭，当年屯军的后人早已杳不可寻。夕阳之下，这座夯土古城的断壁残垣，在荒凉的河滩上显得悲壮威严，依然见证着汉代玉门关以都尉治所、军需仓库、长城、烽燧为一体的综合防御体系。

作为明长城的最西端，嘉峪关扼守着南边祁连山与北边黑山之间，仅为 15 公里宽的河西走廊最狭窄地段，向称咽喉要道，天下雄关。事实上，直至今日，这里也是甘肃境内除兰州之外交通最为便捷之地，也是我们逗留最久的地方。

如今的嘉峪关市，因 1958 年成立的酒钢集团公司而兴，下设玉泉、文殊、新城三镇的农民多以土地流转的方式，为种子公司育种。农忙的时候，农民受雇于种子公司在地里干活，农闲则去附近的酒钢打工。沿途路过村镇，到处都是成片的葵花、玉米、甜叶菊等各种鲜花，在秋日的晴空下，村子里家家户户门口堆着晾晒的葵花籽、胡麻，田野里则是姹紫嫣红的花海。

何爱国是文殊镇纪委书记，他的另一重身份则是嘉峪关故事传说省级“非遗”传承人。他为我们设计的路线，专门避开嘉峪关城楼、悬臂长城、天下第一墩等热门景点。沿着悬臂长城背后的黑山，进入一个近些年才成立的金矿矿区，他带我们去看一处罕有人至的明代采石场遗址。一年多没去，记忆中的场景在矿区侵扰下已面目全非。山沟中一块据说刻有当年采石工人所写“天上天平云不平，河里水平浪不平；地上地平山不平，世上人平心不平”的石头已被铲平，另外一块刻有经文的尼玛石，在我们即将放弃时终于找到了。当年采石工人住过的地窝子则已被填埋。山沟中依然到处可见的是带有凿痕的巨石，令人讶异的是，何爱国讲述的当年工人的解石方法。

“以前铁质工具比较少，最多只能凿一指深，然后把红柳做的木橛一排钉进去，太阳一晒水一浇，放几个月，木橛膨胀的力量加上自然的力量，本身没有正规纹路的花岗岩，让怎么开就怎么开。”用以修筑嘉峪关城楼的石料解好后，一般在寒冷的冬天，通过浇水成冰的冰道向山下滑运。一个更有趣味的传说是，为了往山上运输修建长城的砖块，人们在山下养了一群山羊，令每只山羊每天背两块砖上山，天长日久，建城的砖块很快便都被运送上山了。

从悬臂长城往东而去，便是明长城的东线，经由五座依次相连的烽火台，在一片红柳芦苇环绕的湿地旁，是一座明代驻兵的城堡——十营庄堡。这样的城



嘉峪关故事传说省级“非遗”传承人何爱国在当地一处明代采石场

堡并不稀奇，在不远处的新城乡野麻湾村的一片甜叶菊地里，便耸立着另外一座建制更为庞大的野麻湾堡。

在悬臂长城往南至讨赖河的一段城墙上，何爱国为我们指出一处早年留下的豁口：“这里其实是闾门，白天开着，晚上关闭，和平时期，供关城内外的人们进出。”在边强的讲述中，长城同样不是一道封闭的墙，甘肃至今仍保留像“闾门”这样的地名，比如乌鞘岭一带，天祝藏族自治县之前的县府安门镇，本来就是“闾门”之意。“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长城一方面阻止了敌对民族的袭扰，另一方面却促进了两边民族的融合。怎么理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本来经济互补，有了长城阻隔，迫使大家不用战争抢夺的方式，而用和平的方式进行交易。”边强说。

在河西走廊的农村，耸立在田间地头的长城城堡与烽燧早已为当地农民司空见惯。两天前，《兰州晨报》记者王文元在兰州的黄河边和我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他告诉我，自己老家在武威市大靖营镇下的一个村子，

距离他家三四里地，就有一段长城。小时候大家都叫它边墙，读书后他才知道那就是明代的长城。由于长城边上有民兵训练的靶场，他还经常跑到城墙边捡弹壳玩。有一次跑到烽燧上玩受凉住院，大人怪他不该乱跑，印象里，乡亲们对长城还有一种朴素的敬畏感。

几天前，在我们从肃南县赶往嘉峪关的途中，路经高台县新坝乡暖泉村时，便发现这个村庄的老房子几乎全部建于一座四周围墙已残缺不全的古城堡中。暖泉村的老房子采用西北典型的夯土建筑，除了几户院落干净的房子还显出有人居住的痕迹，多数老房子已处于废弃状态。一个从地里开三轮车过来的中年农妇，已不清楚老城堡的任何情况，但她很快把我带到村口的一个老人家里。当我推开77岁的潘芙蓉的家门时，老人正在外屋昏暗的灯光下独自吃着晚饭。她停下还在蠕动的干瘪的嘴唇，指了指屋顶，灯泡昨天坏了。“这是万历手里打下的城。”在老人的记忆里，这座城堡以前有内外两道城门，中间城门上是神仙楼，

南边是财官楼，西边则是文昌楼。村里1000多口人都住在内城，挨家轮流在早晚时分，打开与锁上内城的城门。上世纪50年代村里成立初级社、高级社的时候，生产队挖取城墙上的土垫羊圈，大包干以后，一些农户仍会取土垫圈，城墙因此变得残破。

在断山口墩，何爱国拨开台基上的沙土，仍可找寻到当年烽火烧过的余烬。“你知道狼烟是用什么点燃的吗？其实并非传说中的狼粪，主要还是我们这儿所产一种叫狼牙刺的草。”很快，他又在附近找到一蓬蓬的狼牙刺，折下一段白色的枯枝，这种草非常耐烧，产生的烟随风不散。而在边强的《甘肃关隘史》一书中，用以发烟的燃料，一类是植物类的麦衣谷壳秕糠、草木碎屑渣末等，一类则是牛、马、羊、驼等食草类动物的粪便，当然，其中并不排除狼粪。古代诗文中以狼烟代指烽火，多半因为狼为边地常见凶兽，用以反映边疆烽火似乎更具荒寒凶煞的形象意义，相传日久，遂成专称。

根据2007年的调查统计，甘肃境内共发现残存的明代烽燧773座。这些烽火台上的守军多则2~3人，少则1~2人，沿袭汉代的烽火品约，明人在烟火的视觉基础上，加入鸣放火炮或火铳（枪）为凭的听觉信号，形成一套完备的烽火预警系统。明法规定：“令边候举放烽火，若见敌人一、二人至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通过长城沿线连绵不断的烽燧传递，军情一两日间便能从遥远的河西传递至京师。

位于景泰县境内黄河西岸的索桥渡，是明长城“松山新边”的起点，也是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据此300米远的索桥堡，是明末屯军驻守的重要城堡，在长城内逐步安定之后，这里逐渐成为一个古道上的商贸码头，繁盛一时。这座建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的古堡，就地取材，全部选用当地红色页岩垒砌而成。站在城堡上方的六座烽火台往下看，城堡的石块已多半散乱坍塌，下面就是滚滚的黄河水，沿河边台地生长的酸枣树随风摇曳，成为当年这套集长城、堡寨、渡口为一体的防御体系最为生动的风景。

祁连山下的牧场

在河西走廊的长城之内，伴随千百年来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对抗与融合，如今在祁连山北麓，与青海相接的地段，仍有以游牧为生的藏族和裕固族牧民。

当我打通李伟（贡布才旦）的电话，这位在嘉峪

关市工作、家在祁丰藏族自治乡的藏族人很快就热情地介绍起自己民族的起源。祁丰藏族原称东纳部落，藏语中“东”即长矛，“纳”则为黑色之意，合起来就是象征其身份的黑缨矛。史料记载，这支藏族来自西康地区，公元8世纪，吐蕃王朝东进北上时，组织远征军携带家属征战河西沙洲（今敦煌）、瓜州一带，后来由军转民，世代定居于今天祁丰乡一带。

李伟帮我们联系了他的表弟刘金贵（贡波扎西）开车来接我们，目的地是他的老家堡子滩村。路过一座明代的烽燧，我们到了距离祁丰乡20多公里外的堡子滩村。村子因一座明代城堡卯来泉堡得名，城堡又以附近唯一的饮用水源卯来泉为名。史料记载，这座明代的黄土夯筑城堡，最多时曾派驻守官1名，马步兵125名。在残破的墙体间，仍能分辨出瓮城形状与马道斜坡，城墙里面的土地看上去非常平整，以前曾被村民种上苜蓿和豌豆。

这里的草场依照四季分为四块，从祁连山的前山到后山，随着海拔高度的提升，分布着牧民的冬、春、夏、秋草场。每年7到9月份的夏场放牧结束后，牧民纷纷转场秋场，一直要到十一月再回到前山的冬场。我们去的时候，堡子滩村的牧民已基本转入秋场，偌大的村庄只剩下一两户牧民。事实上，由于用电与交通不够便利，全村村民早在1993年便集体迁居祁丰乡镇，从多数倒塌的房屋来看，村庄已成为一个冬春两季的牧民点，四季草场均有房子，更多时候牧民散居在草场上。

前天，黄彦峰家刚从青海拉来200多只羊，在附近的草场喂养几天后，将很快转入秋场。沿着起伏的草甸，汽车只能通到山脚，通往秋场的路，骑马要走将近一天。由于山里全无信号，牧民一般携带能覆盖5公里通讯范围的对讲机，如果山下家里有事，只能通过对讲机层层传递消息。

把我们迎进屋里，倒好茶，摆上水果，黄彦峰说，这里的藏民汉化严重，除了不吃驴马狗肉，其他与汉族一样。当然，显著的不同是藏民一般会起两个名字，一个汉族名字用作大名，一个藏族名字用作小名，黄彦峰几个月大的女儿起名黄薇，藏族名字要等再大一点到寺庙找佛爷来起。

近些年，不少牧民雇用汉民放羊。进山途中，我们便遇到一位这样的揽工汉。“宁让你到我家吃肉喝酒，不让你的羊吃我的草。”牧民之间的草场沿着山脊，在平坦的地方用铁网隔离，为了防止越界，必须将羊牢牢盯好。其他需要应对的还有隐伏于山野之中的雪豹、狼和猞猁等动物，由于禁止打猎，面对危险，他



左图：祁连山下山丹县军马场的羊群

右图：山丹县的农民正在收获土豆

只能靠大吼或者点燃包里带的炮仗吓跑对方。他放的700多只羊，最近已有7只失去下落，牧羊犬的嘴也在与狼撕咬时受伤。

我们到达祁丰的前一天，堡子滩村有位老人去世，许多牧民都赶回镇上。按藏族习俗，将老人遗体火葬之后，照例亲友们要聚在一起喝酒谈天，以表纪念。68岁的马柏成和大家聊到很晚，第二天，我们在家中见到这位藏族文化的整理者时，他看上去仍然精神饱满。

1983年，村里的草场按照人头划分，一个人分50只羊，然后依次划定草场。马柏成家七口人分到了适合放养350只羊的草场，草场面积达2万多亩。马柏成家现在有500多只羊，他尽量控制羊群的数量以避免草场生态恶化。祁丰乡的草场占据肃南县草场的四分之一，而堡子滩村的人均放牧面积位居全省第一。尽管如此，过度的放牧仍会导致草场的退化。2005年，牧区推行“退牧还草”政策，以牧民自愿的方式，以草定牧，将草场划分为禁牧区和休牧区，前者每亩一年可以补贴12.09元，后者则为0.98元。依靠放牧，马柏成家一年可以收入十几万元，一些牧场更大的牧

民能有二三十万元的收入。

与堡子滩村相邻的青稞地村，由于森林面积大，有限的草场退化严重，多半划为禁牧区。58岁的牧民乔占平，家里有五口人，女儿嫁到堡子滩村，一个儿子在西藏开车，一个在当地工作。他租用别人的草场，每年放养几十只牦牛。牦牛喜寒，夏天只能在祁连山根喂养，每年7月到10月，乔占平把牦牛赶到四周围起来的草场，就不再管了，最迟到11月，再赶回来喂干草。牛羔总被雪豹叼走，去年乔占平的20多头小牛被吃得只剩下12头。车开到没有路的地方，几匹马正在安闲地吃着青草，乔占平从草地上顺手拔下几根草，教我们如何辨识醉马草和喷嚏草，顾名思义，前一种草，马吃了会醉倒，后者只要闻一下就会喷嚏连连。

除了放牧，对乔占平来说，未来还可能到有景区工作的机会。距离青稞地村不远的地方，是一片即将开发的丹霞地貌，据说，等景区投资建好，村里的人可以到景区上班。

马柏成喜欢热闹，每年乡里祭鄂博的时候，他都要上去唱几首藏族民歌。因为喜欢传统文化，马柏成



开始有意识地向一些上年纪的老人收集民歌。63岁时，他又在乡上办的一个藏文班上课，开始学习藏文。马柏成拿出厚厚一沓纸，上面记载的全是他采集的藏族民歌，他将听来的藏歌先用藏文记录下来，再请信得过的人帮忙翻译成汉语。

其中一首歌的歌词颇有意味：“雪山的流水蒙古人喝，蒙古人人人手中执着一把弓，这是蒙古人彪悍的缘故；清凉的泉水藏族人喝，藏族人人人手里拿一串念珠，这是藏人虔诚信佛的缘故；渠里的流水汉人喝，汉族人人人手里拿着一张铁，这是汉族人人多势众的缘故。”足见在很久之前，这里就是蒙、藏、汉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地方。

古城边的沙地

河西走廊上世代居住的汉民，如今又如何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最东端、祁连山的余脉寿鹿山脚下，隶

属景泰县寺湾乡的明代城堡永泰城里，至今还住着一批当年从各地迁来的屯军的后人。

景泰境内的长城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永泰城的建立比长城晚了8年。作为长城沿线的一座军事要塞，景泰城诞生于“松山之战”。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东蒙鞑靼和西蒙瓦剌，势力依然非常强大，不断侵扰河西之地。明正统十四年（1449），鞑靼的阿赤兔部落先后占据大松山（寿鹿山）和小松山（昌岭山），以景泰为中心四处侵掠，饮马黄河。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兵部尚书兼三边总督李汶率兵十万征讨鞑靼，最终分兵七路在大松山发起总攻，鞑靼兵败，明朝重新占据黄河以北大漠以南的失地。为了稳固防线，李汶随后视察地形，上奏朝廷，仅用4个月时间便筑起自索桥至泗水堡的“松山新边”。“松山新边”的修筑，不仅使原来戍边河西的长城在空间距离上缩短了三分之一，还使明王朝的北方防线，自黄河沿岸向北扩展了300多里。修筑长城后，出于屯

兵需要，李汶又在长城沿线建立永泰堡、红水堡、正路堡、芦阳堡四座城堡。据史料记载，永泰堡当年驻守骑兵 1500 人，步兵 500 人。

“景泰县最大的特点，自古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的交界，丝绸之路发展以来，又成为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的接触带。”景泰县文化馆研究员苏永来，对景泰县的历史与长城了如指掌。景泰历来是农业县，但由于与游牧地区接壤，县城至今仍有两小块牧区，往北 20 公里与内蒙古的交界处，放养着几百头骆驼，而在西边与天祝藏族自治县接壤的地方，则养着珍贵的白牦牛。尽管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蒙古牧民与景泰汉民之间，至今仍会发生争地盘的现象，界碑也总被来回移动。

我们到达时，夕阳已近西沉，落日的余晖照在城楼耸立的古堡之上，周遭的一切显得荒凉而古朴。为骑马便捷，永泰堡的城墙被修成弧形，高处望下，犹如乌龟形状，因为也被称为“龟城”。古城中，整齐的道路两旁散落着土坯垒砌的民居，商店与为电影拍摄而临时搭建的房屋，透露出一丝现代气息。

57 岁的张银中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卖部，他居住的老屋至少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记忆里，老城墙以前只有南门，其他门都是后来陆续挖开的，城墙周围以前有完整的拦马墙（女儿墙），厚度至少剥蚀掉四五十厘米。张银中自称祖上从山西大槐树迁来。作为遗留兵户后代的一个证据是，村民姓氏非常杂，足有几十个之多。根据以前的传说，城下有十字地道，供城被困时守兵逃生之用。

张银中的传说，在 61 岁的村文管员白复荣那里得以完整呈现。大约七八十年前，村人用“问桌子”的办法，请神治病。所谓“问桌子”，是由两人抬着桌子，算命先生在一旁念念有词，桌子就自己开始动，在地上写字，算命先生据此猜测病因。请神之后，算命先生告诉病人院里有不干净的东西，后来在指定地点，果然挖出了一具死人头骨。同时挖出的还有许多大方砖，后来在一个老人的干涉下，挖掘没有再继续下去。

白复荣自称祖上来自广西白族，在过去几十年里，他已经见证了永泰村的三次人口搬迁。原来 1000 多口人，现在只剩下 70 户 300 多人，不少户口在此的村民，如今也多在县城工作居住。搬迁的主因，源于上世纪 70 年代时实施的“引黄灌溉”工程，增加出来的洪漫区土地，让附近村子显然具备了更强的人口吸纳能力。

尽管如此，在距离黄河较远的土地，至今仍以世

代相传的沙地为主。沙地，是景泰县的特色农业。为了保住薄土层中的水分，村民将附近沙地的沙石挖出来，在土上铺设一扎之厚的沙，播种时犁开沙石，将种子撒在土里，种子发芽后从石头缝中长出，不管太阳如何晒，土里水分不会流失，沙地实际上起到塑料薄膜的作用。按铺沙时间的长短，沙地分为新沙、中沙、老沙，效力依次递减，一般维持在五六十一年。铺沙的工作非常辛苦，过去只能靠肩扛手拉，后来工具逐渐变为手推车、拖拉机、挖土机，但危险依旧，每年都能听到因挖沙，人被压死的消息。因此在景泰县流行一句话：“挣死老子，吃死儿子，饿死孙子。”景泰县十年九旱，但这里地广人稀，只要遇到一个好年景，一次丰收便足以充饥，所谓“十旱九不收，收一收，吃九秋”。

白复荣一家三口，有四五十亩沙地。由于粮食产量低，收成刚刚够吃，没有余粮卖。文管员的职务，一年带给他 1000 多元的收入，他的任务是照看城墙和村里一所建校近百年的小学不被破坏。今年开始，一些村民将家中一两百年几乎没有产量的老沙地，以每亩 200 元的价格流转出去，由别人集中种植文冠果等耐旱的沙漠经济作物。

白复荣面色黧黑，讲话时总是带着一种谦卑的笑容。讲起当年剧组在村里拍摄电影的情景，他兴致很高。因为古城堡保存完整，这里先后拍摄过《最后一个冬日》《汗血宝马》《西部热土》《美丽的大脚》《决战刹马镇》《一个勺子》等多部电影。白复荣对 1985 年在这里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最后一个冬日》记忆尤深，至今还记得导演吴子牛的样子，说他“年轻，长着大胡子，人精干得很”。让他有些难以接受的是，电影拍摄中，一辆牛车从红水沟山沟进去，却从这边山沟出来。“电影都是胡拍的。看过拍电影后，我们再也不相信了。”白复荣抽了一口烟，笑着说。

回去的路上，苏永来告诉我，赫赫有名的大板瓜子正产自沙地上生产的紫瓜，而当地紫瓜中最负盛名的产地就是永泰村所在的寺湾乡，产量低，但是质量高。饭馆中所卖一种叫和尚头的面食也产自沙地，比普通面食贵出一截。

千百年来，这些长城边的子民们仍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景色粗粝，代价沉重，但留给人们的印象，永远是那么厚实、沉稳，如同这荒漠与山野间耸立的城墙。■

（参考书目：《长城》，马建华、张立华著；《西塞雄风：陇右长城文化》，薛永年著；《甘肃关隘史》，边强著。另感谢张林涛、白映栋、何双全对采访的帮助）



筑于约45°山脊之上的嘉峪关悬臂长城

柯瑾玲：一个裕固族手艺人的身份书写

记者 艾江涛



裕固族民族服饰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柯瑾玲

(张雷摄)

“好多人并不懂我们裕固族服装的做法，他们只想挣钱，甚至不知道白色头面奔丧才穿，红色头面迎亲才穿。”

从收藏开始

13岁起，在祁连山北麓草场放牧的裕固族牧羊女柯瑾玲，开始有意识地收藏本民族过去用过的老物件。起因源于母亲挂在嘴边的一句唠叨：这些东西现在不用，以后你们恐怕都不知道是啥东西了。从一件传统服饰，到一具马鞍，甚至一副眼镜开始，46年过去了，去年，柯瑾玲在自己创建的裕固族特色村寨里，单独拿出一间房子作为博物馆，展出自己所藏的上千件文物。

与所有酷爱收藏的人一样，柯瑾玲能清晰地说出每件藏品的来历与背后或幸运或惊喜的收藏故事。而且，她善于分析总结，记录了厚厚几本收藏笔记。作为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柯瑾玲收藏了很多马鞍，其中一具颇为特别，上面有精细的漆器纹样，在她看来，这是裕固族

与汉族文化融合的体现。与汉族农耕文化的炕箱相比，游牧民族的炕箱更为轻巧，多为一对，便于驮在牛背上搬家。从可以折叠的炕桌，到既是锅盖又可供奉食品的盏托，裕固族器具处处体现出便携、多用途的特点。

一副老旧的眼镜来自别人赠送；一个清代的铜脸盆被她收来时，正被主人拿来喂狗；一把早期藏刀是邻居干农活时挖出来的。25岁时，柯瑾玲看中一对木刻的绿度母和白度母佛像，倾其所有，花5000元将其买下。结果那年春节没有钱花，只得在工会救济下过节。

收藏的过程，也是熟悉本民族文化的过程。裕固族共分为大头目、八个马、杨哥、呼郎格、五个马、亚拉格等七大部落。在博物馆收藏的各部落的服饰和头面（服饰）中，柯瑾玲能分辨出每个部落的细微差别，如今，能做到这一点的裕固族人并不多。

另一方面，收藏需要不断地投入。1992年，一个偶然的机缘，柯瑾玲和几个姐妹到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参加了首届小商品博览会。在展厅外的地摊上，她穿着民族服饰，一边编，一边卖毛线马拉手，40天里赚了5200元。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本民族的手工

艺可以赚钱，可以更好地支撑自己的收藏，以及手工艺的继承与推广。

手工艺与传承

用柯瑾玲的话来说，自己从小就很灵，好动好学，加上母亲和姐姐擅做服装、刺绣、毯子，耳濡目染之下，她很早就学会了这些传统的手艺。

17岁时，初中毕业的柯瑾玲在张掖师范学院进修一年后，回到牧区当了小学老师。每到牧民转场，她就给留下的孩子做些缝缝补补的活计。当了8年老师，25岁的柯瑾玲被调到肃南县文化馆工作。由于喜欢画画，此前她经历了高考的八年抗战，一直到儿子3岁时，才如愿考取西北民族大学油画系。老师曾经调侃：“如果裕固族将来出个女画家，肯定是你。”但迫于经济压力，柯瑾玲放弃画画，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民族手工艺上。

20多岁时，一次在乡下看到很多皮雕作品，让柯瑾玲欣喜不已。再一打听，母亲的舅舅就是裕固族最后一个皮雕艺人。只是，这位舅爷早已去世多年，而没有小孩的舅奶并不喜欢与人交流。为了从舅奶那里打听到更多皮雕制作的细节，柯瑾玲一路教母亲怎么问话，拉着母亲和舅奶聊天，自己则在一旁边做饭，边记录皮雕制作工艺。此后，柯瑾玲不断搜集资料，只要见到传统皮雕就买下来，慢慢恢复了裕固族皮雕技艺。如今，柯瑾玲不但是裕固族传统服饰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还是裕固族皮雕的省级传承人。

让柯瑾玲欣慰的是，女儿像她一样从小心灵手巧，大学艺术设计专业毕业4年的她，服饰、刺绣、画画，无不擅长。自然，她也是裕固族皮雕的理想传承人。在柯瑾玲看来，皮雕技艺的核心在于皮子的特殊处理方式，在专利申请下来前，她不愿意多谈具体的工艺流程。某种程度上，她更看重工艺的地道，不愿将其作为产业发展。

另一方面，她觉得手艺可以挣钱，养活文化，是件好事。1992年从深圳回来后，她不断跑各地博览会，一手带着藏品展览，一手编织工艺品售卖。1999年，办了3年通行手续后，她终于去了一趟台湾。两个月内，她赚了5万元，回家后不但还清了之前搞收藏的所有欠债，还给身边每个人带回一件小礼物，让大家对她刮目相看。在肃南县，柯瑾玲算得上风云人物，胆大泼辣的她，不但是当地第一个下海的人，还是第一个与政府单位因为合同纠纷打官司的人。

2005年，从就职的县民族博物馆退休之后，柯瑾玲有了更多时间带徒授艺，除了给职业中学带手工艺与民俗文化的课程，她自己办的传统服饰培训班已毕

业300多名学生。去年，以尧熬儿原生态文化传承有限责任公司为实体的裕固族特色村寨开业。午饭之后，柯瑾玲带我们挨个看村寨中的牦牛帐篷，她希望在未来3年内，将裕固族10个部落的语言、饮食与文化在村寨复原，供大家体验交流。

我们从哪里来

无论是收藏，还是手艺，柯瑾玲所做的事情，无不隐隐指向自己的民族身份：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

记忆中，上世纪70年代，裕固族的汉化已非常普遍，与汉族同学一起读书，讲普通话。尽管母亲在家里听到她说普通话，会骂她“不像人样子”，可在学校，一旦有人将她的帽子脱掉，露出按裕固族传统所扎的七根辫子，她还是忍不住又羞又恼。裕固族的汉化，与1958年的“反封建斗争”运动不无关系。当时，藏传佛教的寺院被毁，头发必须剪短，这样一来，头面自然也無法佩戴。渐渐地，除了家中的老人，年轻人很少穿传统服饰，甚至慢慢不会讲裕固族语言。

据史料记载，裕固族人的前身为公元6、7世纪游牧于河西走廊甘州（今张掖）、凉州（今武威）一带的回纥人。11世纪，回纥人建立的甘州回鹘汗国为西夏所灭，回纥人开始漫长的分批东迁历史，并在此过程中与藏人、蒙古族人不断融合。裕固族人一般自称尧忽儿、尧熬儿、撒里畏兀儿，裕固族的名字则确定于1953年，寓意“富裕巩固”之意。

14世纪起，裕固族人在漫长的游牧生活中逐渐丢失了自己的文字——回鹘文，关于本民族的一切记载，只流传于口述记忆中。今天的裕固族分为东、西裕固族，分别是讲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和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两种语言，分享一些原始词汇，一近蒙古语，一近维吾尔语。好多裕固族家庭由东西两部构成，彼此交流无碍。

小时候，柯瑾玲在本民族的故事中泡大，她特别喜欢听爷爷讲动迁路上的故事：牛怎么带路，鹿怎么带路，狼怎么带路。裕固族流传的一首名叫《西至哈至》的歌曲，讲述了他们从遥远的西至哈至迁徙而来的故事。2012年，柯瑾玲参加了CCTV9与张掖电视台合拍的纪录片《天边彩虹》的拍摄，一个月内走了1万多里路，踏上西去的寻根之旅。到新疆哈密、吐鲁番一带，那里的维吾尔族人把柯瑾玲当亲人看待，说她是“几百年前的姑娘回娘家来了”，让她感动不已。

最近，柯瑾玲开始学习回鹘文。她希望以后能够教会孩子们本民族语言，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长白山脉，关东之地

文 / 张星云 摄影 / 关海彤

“关东”的概念自明清之后发生过几次变化，这块中国东北的边塞区域始终没有改变的，是长白山山脉的自然生态与当地人的关系。



由雨水和地下水补充而成的天池是长白山的核心，天池对岸便是朝鲜

吉林市满族博物馆副馆长开车带着我，在市里两次穿过“S”形的松花江和十里长堤，路过城北林立的化工厂，来到了吉林市市郊。副馆长是满族人，但他也没去过小白山望祭殿，只听说当地满联去年来过山上祭祖。“两辆大巴载着他们去的，大巴能到，咱们也能开到。”他一路停车一路问，看来那里完全没

有旅游痕迹，不过这也更加使我担心这座雍正命人建设的望祭殿现在是否还留有遗址。

小白山是一座典型北方的山，并不高，周边是农民村落和一年一熟的东北大米与玉米地。此时初秋，金色的水稻田里透着一丝棕色，阳光和煦。就这样我们开开停停，一路问人，终于找到了门路。副馆长把

车停在了一条上山小道旁，道前分别立着市政府和省政府文物保护两块碑，证明我们找对了地方。副馆长穿着西裤、衬衫和皮鞋向山上爬去，我们不能确定能找到什么。沿路，我们看到很多无头石像，大殿柱基散落在山上小道两侧，这让我很兴奋。但当终于爬到了山顶，看到的却是一片空地，杂草丛中裸露着被凿平的石头地基——望祭殿的遗址什么都没剩下。中间一座后人建的半人高红色石砖小庙取而代之，小庙里面立着“长白山之神位”，排位前面摆着烤鸭、烤鱼、五花肉、北京二锅头和农夫山泉等祭品。一个自带太阳能充电的小音箱一遍遍循环播放着诵经。

对这样的结果，满头大汗的副馆长和我一样有些失落。我们试图在平坦的石头地基上找到些当年留下来的线索，但显然是徒劳，什么都没有。山顶很静，只有太阳能播放器念经的声音。副馆长逛了一圈，就站在山顶的平台边沿开始打电话安排明天的工作。吉

林北郊的化工厂很多，即便如今东北重工业没落，经济下滑严重，这些工厂也还在维持作业。初秋午后的和煦阳光下，天空中透着一层薄薄的雾霾，降低了山顶的能见度。副馆长的身后，只能看到吉林市的新楼盘。

这座如今吉林省省会长春旁边的城市曾是历史重镇，是满族的发祥地之一，古为肃慎，汉晋为挹娄，唐为渤海国粟末靺鞨，辽、金、元代为女真。明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和管理女真各部，曾选择盛产松木、水运便利的吉林作为造船基地，辽东都指挥使刘清三次奉命到松花江造船，故吉林旧称“船厂”。明代西海女真乌拉部古城就在吉林市北郊的乌拉街镇。清初为了抗击沙俄，在此设立水师营，随后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城，改称吉林将军。

如今的吉林市区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当时称为“吉林乌拉”，满语意为沿江的城市。清军推翻明朝入关进入中原后，清朝统治者将长白山视为其祖先的发祥地，因此康熙曾东巡至吉林遥祭长白山。康熙皇帝不仅对长白山寻访、望祭、封禁，还撰文论证长白山为龙兴之地，更称“泰山为长白山之分支”，希望以此证明清朝入主中原是顺天应人。而雍正则在吉林小白山建设了望祭殿，每年春秋二祭，在殿内立“长白山之神位”。

现在小白山没有了清代皇帝的望祭殿，站在山顶也看不到其祖先发祥地长白山。这座历史上的满族重镇现在有四大民族共同居住，北边住着回族、东边住着朝鲜族、西边住着汉族，满族散居其间。封建王朝时代曾经在东北明显的满族文化如今已经所剩无几，自清军入关以后至中华民国，再到伪满洲国和两次闯关东，接二连三的历史事件逐渐叠加，“关东”的概念也被不断赋予了新的意义。

最初“关东”这一概念，自明初修筑虎山长城、山海关及其相连的长城便产生了，人们把明长城东端以西以南的地域称为“关内”，而把以东以北的地域称为“关外”或“关东”，现今我们叫它“东北”。

关东地域总面积达到124万平方公里，在这广大的黑山白水间，长白山成了这里历代少数民族信仰的核心。从先秦的肃慎族，到唐代的靺鞨族、松原时期的女真族，以及明清时期的满族，都保持了对长白山的崇拜之情，更将长白山视为民族的发祥地。时过境迁，我想从庞大的长白山脉中，找到一些关外少数民族对长白山崇敬的切实证明。于是，我才将旅程的起点设在吉林市。

上图：吉林安图县宝马古城是金代祭拜长白山的神庙遗址，处于长白山瀑布以北50公里处

下图：宝马古城遗址出土的迦陵频伽残片





吉林市满族博物馆以蜡像展示满族人的生活场景

然而我行程中的整个前半段都像在小白山寻找望祭殿一样，查找史料，试图通过散落在长白山余脉上的历史遗迹来复原当时外族与中原的关系，却各个扑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三女儿白花公主的点将台和明代乌拉古城都只留下个小土坡让我无力联想，而明末努尔哈赤起兵的新宾赫图阿拉建州古城则为了吸引旅游彻底改建，成了极其粗制滥造的旅游景点。

遥想当年，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一关外满族各部。当1644年多尔袞义无反顾挥师西来，奏请6岁的清顺治帝从关外盛京迁都京师，将绝大多数关东的满人带进关内，并安置派遣到具有众多人口积累与厚重文化沉淀的中原民族中间之时，清朝的最终灭亡和满族在东北的淡化，也许就已经埋定了。在这片关东之地，如今留给世人的，只有依然屹立不变的长白山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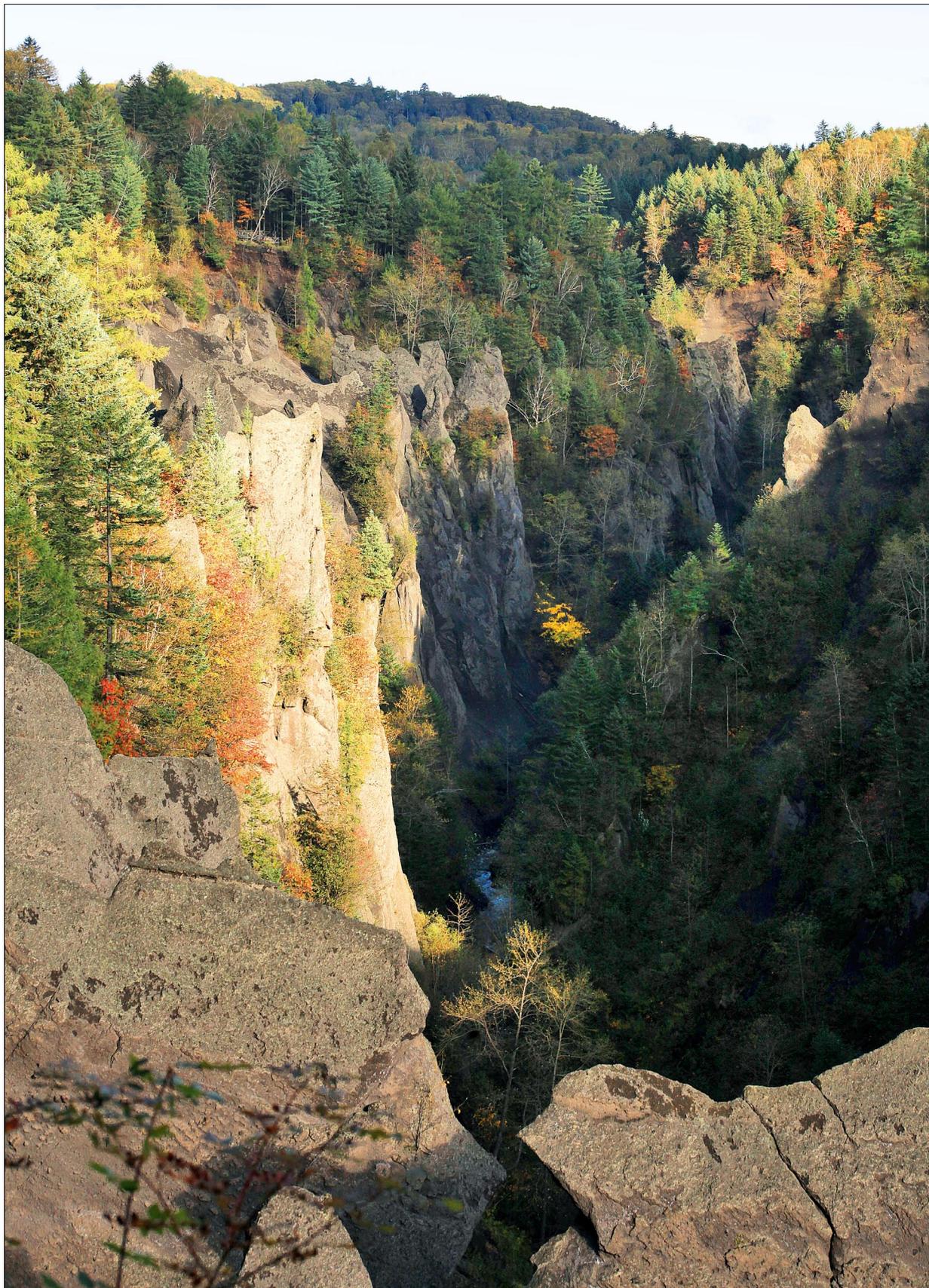
柳条边与封禁之地

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满族由诞生之初，

始终需要面对比自身雄厚甚多的中原汉族文化。

翻开中华史册，文化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靠弓马征讨天下，能够入主中原腹地者，并不罕见，满洲人在其中，仅是个最晚的到来者。即便只算确立起大一统中央王朝的，在满洲人建立清朝之先，还有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清朝定鼎京师前后，这个起家于白山黑水偏远乡野的小民族，他们的统治者不但有过思考，甚至还有过内部在决策层的矛盾交锋。一种意见是，可以仿照当年的蒙古，仍以故乡为根据地，进入中原后不必跟中原民族做过多的文化周旋，若不能长久驻足长城以里，索性重新撤回关外老家了事；另一种意见是，既然进入中原，就要有雄心远略，兵力严重短缺，就举族内迁，将本民族战略大本营彻底移至燕京地区，并不间断地向全国进取渗透，从而有效、持久地去控制和管辖这个国家。

结果，后一种意见成为最终的决策。清初定都京师建立统一的大清帝国，满洲人入关人口占了本民族的十之八九。然而即便如此，当时满族全部人口也仅几十万人，无法与已有近万万之众的汉族相提并论。



天池西坡，刚刚入秋的长白山峡谷

只不过从来在大历史中，都是只设“入口”而不设“出口”。

清朝执政者一反自先秦以来 2000 多年的惯例，不再修筑劳民伤财、蜿蜒万里的塞上高墙长城。康熙认为，长城再高也难阻断北方民族的军事袭扰，而唯一可以防控边地民族武力入侵的手段，则是息兵睦邻。他们召集蒙古王公来坝上秋狝，以自己剽悍劲旅的威力来展现国威，辅以联姻等情感方式宣示皇恩，巩固满蒙政治联盟。

清政权曾经面临着北部、西部游牧民族与中原汉地民族两个方向潜在的夹击态势。康熙和乾隆两朝皇帝从政 120 年，为了长治久安，穿梭似地北狩与南巡。满洲上层以儒学的“崇文”方式怀柔汉族封建阶层，以“宣武”与联姻方式收服边疆民族的王公贵族。此外，像清代确立的至今仍然实行的藏传佛教“金瓶掣签”制度，还有乾隆朝于回疆武力平叛后皇上又亲自迎娶维吾尔贵族女子容妃，也都用以维护江山社稷的安宁。

清朝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唯一不修长城的朝代。而为了保住被称为“龙兴之地”的满族发祥地长白山，从皇太极开始便设立柳条边，颁布法令严禁关内的汉人再出关，并拆除了大部分辽东长城。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代用柳条边取代了长城。

如今在东北，依然留下了一些柳条边的遗迹。并不像长城那般雄伟，柳条边只是在平地上一条一米高的土堤，土堤的外侧有一条平行的壕沟。当初土堤上每隔五尺插一根柳条，各柳条用绳连成篱笆状，称为“插柳结绳”。柳条边不似前代长城，没有凭险而设的坚固工程，也没有军事意义，边门只是稽查收税的封建关卡，同时又是联系广大东北地区的交通孔道。

始建于 1638 年崇德三年的柳条边直至 1681 年康熙二十年基本建成，分为三部分。以今辽宁省威远堡镇为交点向东南、西南、东北方向延伸，呈人字形。东段从威远堡镇向东南到辽宁省凤城市，西段自威远堡镇向西南至山海关与长城相连，这两段因修建时间较早而称“老边”，由盛京将军管辖。北段自威远堡镇向东北到吉林省吉林市北部的法特镇，相对于“老边”而称“新边”，由吉林将军管辖。清政府设置众多边门，对柳条边进行管理，原来分散居住的满族人民，被迁移到边门附近居住，充当看守边门的八旗兵。

从此，原明朝辽东城墙之外的满族聚居区成为无

人区。民国《辑安县志》描述为：“划为荒徼，人民不得越边垦植，盖自长白一带，乃清朝发祥之地，有偷渡者以犯边论。”

柳条边成了封禁长白山山脉的界限。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其长白山“龙脉”受损。另一方面，就是保护长白山山脉生产的皇室贵族所需要的人参、东珠等特产，以及供每年采捕供物及皇帝巡幸时围猎所用的围场。也正是在那时，顺治在吉林城旁的乌拉街设立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专门负责为清皇室采捕源自长白山山脉的贡品，成了清代四大朝贡衙门之首。吉林城和乌拉街都被柳条边囊括在了长白山的封禁之地中。

如今的乌拉街成了一个北方最普通的小镇，一条主街道两旁都是一两层的店面和小楼。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遗址早已不复存在，街上的三处旧府邸也在重新维修。除了乌拉街满族火锅，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当年的痕迹，只有乌拉街附近的打鱼楼还住着鹰把式，将曾经满族放鹰捕猎的传统延续下来，待每年冬天带着海东青到江边，供旅游的人拍照。

无论是明代的长城还是清朝的柳条边，世上的文化较量与折冲，本来就有规律难以对抗。曾经满族祖先关外的渔猎生活方式也因清军入关而产生了巨大的改变。自肃慎时代起，满洲民族先世绝大部分的生存过程都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途径，捕鱼业、狩猎业和采集业，是历史上长久维系的主要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既是物质生活的基础，是使民族得以坚持久远生存的保障，也是他们精神生活的固有前提，民族成员正是在这种生存状态下，获得了相应的精神观念及行为准则。

千百年间，满族初民总是依赖自然物产做衣食之源，人跟大自然的关系便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因为生产力低下，人们深知不可以去与自然界强大力量冒昧抗衡，心理深处生就了敬畏和崇尚大自然的心态。满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认定世间万物充满了神灵的存在，就是从这种拜自然的世界观中，生成和获取的精神依据。

清初时期，东北人口大规模向辽东集中进而再迁移至京师附近，这就造成东北地区大部分区域内人口数量锐减，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度和强度大大减轻，生态环境也就恢复到自然原始状态。此外八旗制度禁止满族人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活动，致使他们世代远离农桑工贸等谋生技能。

农耕文明离满族越来越远，而代表汉族中原文化的农耕则开始慢慢进入东北。

自顺治朝后期开始，无论是清政府采取政府鼓励移民还是禁止内地移民东北，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内地汉人流民移居东北的趋势。随着东北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类在东北活动范围的扩展，砍伐树木、开垦荒地和草原以从事农耕诸多新的人类生产活动不断影响着东北地区的生态资源和自然地貌，导致东北生态环境变化速度加快。乾隆帝时为了保障东北土地不被流民占种，同时为了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从而进行满人移旗屯田的计划，曾想通过把在京师的满人召回东北开垦以扩充经济，但最终也不尽如人意。

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柳条边荒废失修，形同虚设。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东北放垦弛禁，柳条边也随之完全废弛。至此，清政府出于通过开发东北进而增加税收、缓解土地矛盾的目的，在咸丰十年（1860）废弃了柳条边墙，使其走入历史，开启移民东北即闯关东的时代。现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柳条边这种严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北地区的深入开发，致使边疆空虚，从而为之后的朝鲜半岛人民大量越垦和俄国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严禁颇有得不偿失之效。如今，满族渔猎文明早已消逝在汉族文化之中，耕种最终取代了渔牧，一年一熟的东北大米成了全国最好品质的象征。

长白山原始森林

无法指望现在关东深处，还能在某一时刻瞥见唐、元、明、清的东北“原始景象”。这趟行程的前半段一直是这样，在长白山余脉寻找线索，前往，失望，直到我见到真正的长白山。

按照东海女真部落的族源神话，女真族成员都是天上仙女来人间洗浴时，误吞神鹊所衔朱果受孕而生下婴儿的子孙，后来被改编成了讲述爱新觉罗家族始祖布库里雍顺诞生于长白山天池的著名神话，仍为满族各个群体民间妇孺皆知。

而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长白山作为火山在过去400年里爆发过三次，分别在1597、1668和1702年，这使得长白山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植物垂直分布，即使从山底到山顶垂直只相差2000米，却浓缩了从北半球温带到北极圈植物水平分布2000公里的生态景观。虽然海拔不高，但长白山有着明显的四种植物带分布，从红松阔叶混交林带，到针叶林带，再到岳桦林带和接近天池的高山苔原带，堪称世界上森林景观保存最完整、生长最良好的原始生态森林系统。

9月中旬的长白山是旅游淡季，天气已经转凉，而“十一”黄金周的游客还没有到来。我乘车进入长白山最核心的森林，就这样跳上了长白山森林的画布。

整张画布，底色是酱棕色，那是初秋树林的基色。此时阔叶林已经开始发黄。漫天的黄叶掉落，茂密的针阔混交树林中，隐约显现着红、棕、黄、紫的颜色。阳光透过云间不时照射到树丛中，将桦树的白色树干照成了淡金色。时而太阳躲进云间，桦树的树干又变成了灰色隐匿进酱棕色的树丛里。树木有着自己的社会等级，年长年幼，看树干粗细便可一目了然，而很多枯萎的粗壮枝干或巨根矗立在明显的地方，更是一种历史的证明。

一切颜色都在树林的画布上跳动，活泼，惊艳，只有深绿色的湖水，静止在那里，那是一种极其深的绿色。紫色野花点缀在树林的土地上。长白山树林的地皮极其松软，有一种踩在初雪上的错觉。

继续向前，我们从针阔混交林到了针叶林，红松树的暗绿色成了主色调。视野一下开阔了起来，草丛越来越多，岳桦林仅剩的黄叶与残枝分散在山坡的草坪上。再往上，树木就没有了，只剩下几棵灌木。

向天池进发，山势逐渐陡峭，压低的云朵在我背后下降，阳光照射着天池流下生成的湍水，泛着金黄。高山苔原带的草甸一块棕，一块绿，一块黄，一块深红，像拼贴的地毯，偶尔深灰色的岩石裸露。再往上走，植被近乎消失，只剩下黑白灰似水墨画般的岩石和碎石。而我也最终到达了天池。

天池有一种独特的安静感。即使在山峰上有大风，但环山之中的湖却特别安静。此时下午两点，我站在天池西侧山峰，看到东北侧的低云缓缓地蔓延进天池，云来了。云倾斜而下，贴着湖面向我们飘了过来。与云一起来的，是更大的风，山顶瞬间变冷了。由雨水和地下水补充产生的天池依山流下的小溪汇聚成了二道白河，即松花江的正源。

如果说长白山景区一天就能逛完，那么长白山最宝贵的就是它的原始森林了。就像清朝设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来长白山打猎、采人参山货一样，当地人始终与长白山生态存在一种依存关系，如今即使汉族人越来越多，满族先民的后代越来越少，这种依存关系依然没有改变。

长白山天池景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几乎都会干点私活，当地人管它叫“跑山”。景区大巴司机驾驶座旁放着旧塑料桶，那是采蘑菇人的标准工具。“前天大雨，好多蘑菇都烂了。要是早的话，今年肯定是大

收。”司机对车上的导游说道，“我爸昨天也上山了，也采了不少。”

二道白河与林业局

当地人与长白山的依存关系，在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小镇得到了充分的显现。二道白河分为二道镇和白河林业局两个地区，两个地区分别由不同的机构管理。70年代初建立的白河林业局拥有自己的公检法机关，直属于国家林业局。而二道镇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管理，2006年成立的长白山管委会为吉林省政府直属，相当于市政府的行政管理职权，使用的是省下属的公检法。两个地方的警察都是分开的，要是夜里这个东北小镇出现了打架斗殴，被打的人躺在两区交界的马路沿上和沿下，都要分别向不同的公安局报案。

以前白河林业局最为风光，林业局职工管二道镇的人叫盲流或者老乡，指的是没有正经工作的人，带贬义。那时在二道白河，只有林业局的伐木工是正经工作。如今正好反了过来，二道镇因管委会的接管而大力发展旅游，白河林业局却极尽没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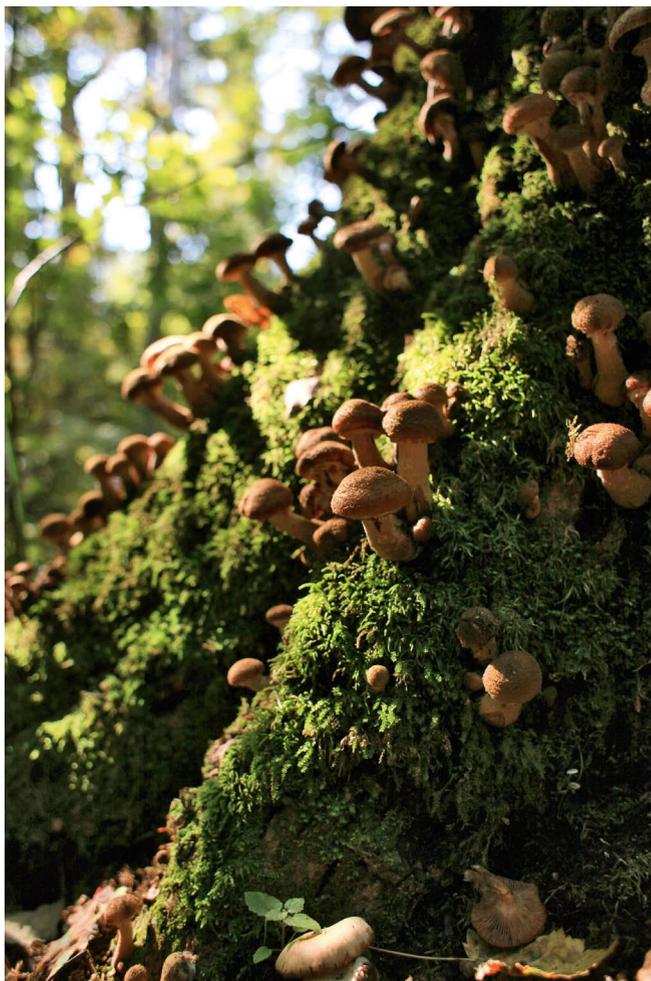
入夜，刘茂泉和波哥带我去吃晚饭，汽车从二道镇开进了白河林业局。相比二道镇高级旅馆和饭馆林立的气派，白河林业局则散发着旧时光的味道，街道两旁都是低矮的平房，曾经的繁华和现在的没落感一眼便知。刘茂泉把车停在烧烤店门口。这个深秋的东北小镇混合着旧小区、烧烤和酒的味道。

两人都是二道白河旁边光明林场的员工，同一年从林业局技工学校毕业。刘茂泉自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林场后，一天伐木工的班都没有上。“我上不了班，挣得还少还辛苦。早上起来天不亮就上山了，等到天黑了才回来，中午带饭，笼个火堆烤热乎饭就吃，受不了。采伐这玩意儿挺危险，还遭罪，我老多同学在这个工作当中受伤的。”之后他在镇上当厨师，再后来自己开起了餐馆，专门接待游客。“暑假的时候中国游客多，暑假前后韩国游客特别多。韩国人一直认为长白山是他们民族的发祥地，一到天池后跪倒磕头就拜。”而波哥明显老实，从伐木工开始，一步步一直干到林场副场长。

然而，长白山各大林场的砍伐工作越来越少，直到去年国家林业局全面禁伐，长白山林场的伐木工人们摇身变成了森林管护队。“管护队没什么用，我们防止有人在林地里砍树或烧火，但我们也没有执法权，

只能请人家离开。”林场工人的工资一直没有涨多少，一般拿到手的工资也就2000元左右，像波哥这样的副场长，一个月也就拿到2800元。然而长白山里没有农田，蔬菜、鱼肉都需要从沈阳或者敦化购买，外加逐渐兴起的旅游热，因此此地菜价极高。“我有时候看电视能看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菜价，比这块便宜很多。”刘茂泉说。

昂贵的生活支出和微薄的收入，使得大部分的林场工人常年通过“跑山”赚外快以贴补家用，官方用词则是“职工创收”。刘茂泉因为本来就觉得在山里干活“太苦”，外加经营着自己的餐馆，所以常年不“跑山”。而波哥则是因为不好意思，他说：“我都干到副场长了还跑山，采完蘑菇还要背着筐去镇上的集市卖



长白山林场里的榛蘑在雨后晴天生长得最迅速

给山货庄，镇子太小，大家都认识，一上午50个熟人见到我背着筐卖蘑菇，我根本拉不下来这脸。”

第二天一早6点半，刘茂泉林场的管护队长路哥带着我去“跑山”，路哥已经“跑山”十几年。9月中旬，松子已经全打完了，近几日没有雨，也没法去河边抓蛤蟆，但此时正是蘑菇收获的季节。

路哥骑着摩托沿着树林间的公路前进。在他的右手边，是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不允许任何百姓进入，绝对禁伐禁猎禁采山货。而他的左手边，则是分散在保护区周边的8个林场，总共占地19万公顷，常年来一直以伐木为主要活动。

雨后只要一有晴天，蘑菇就会冒出来。而蘑菇在固定的地方生长，因此“跑山”的人都是凭着自己的记忆寻找路径采蘑菇。把摩托车停下，进树林前，路哥看了一眼我脚上的哥伦比亚低帮徒步鞋，拿出一双长筒胶鞋让我换上。

有别于保护区里的原始森林，林场都是经过砍伐的次生林，因此灌木更加茂密。现在是榛蘑收获的季节，路哥背着筐，熟练地在同人高的灌木丛里找到被砍伐过的白桦树树桩，大片的新鲜榛蘑立在地上，焦黄色的。路哥用手把榛蘑掰下来，抖掉根部的土，放进背后的筐里。按路哥的速度，每小时可以采两筐。这样采榛蘑的上午，每年9月份能够有一周到十来天。

一路上的灌木非常茂密，视野最远端也不过两三米，要不是跟着路哥，我肯定就迷路了。路哥一路轻松穿行，而此时的我狼狈跟随。“有外地人不熟悉林场地形而走丢死在里面的。都说人迷路了之后，看着河水是倒流的。如果看到河水是倒流的，你就得拿树枝试一试，只有沿着河流往下走才可能走出森林。”

路哥把采下来的榛蘑放在家里晾干，再卖给当地山货庄，后者继而再卖给游客。路哥说以前山里根本没有人采山货，只有他们林场的人自己采，如今旅游带动了山货庄的生意，山货的价格也一路飙升。“现在哪里的人都进长白山的林子里来采，不过我们对自己的林场最熟悉，没人能比我们采得多。”

“靠着长白山，只要你勤快，就肯定饿不死，因为这个山本身是富有的，你上山无论采什么都可以挣钱。”路哥每年先到山上采天麻、木耳、牛毛广、猪苓，然后是榛蘑和冬蘑，爬上十几二十几米高的红松树上打松子。

在冬天降雪之前，还有一拨“放山”，就是几个人一起组队挖人参，当地人管它叫“棒槌”。按路哥

的说法，“放山”一般最好四五个人一个小队，人多了就乱了。一行人要在山里走一个星期半个月，背着吃的喝的东西，在山上住。所有人撒网状在树林里共同前进，每人各执一根木棍，在树干上敲击以相互提醒对方的位置，其中一名作为“把头”指挥队伍的整体前进方向。如果队伍中的其中一人发现了人参露出来的叶子，便会“喊山”，让队伍中的其他成员向他靠拢。“放山”人还会沿路辨认树干上的“兆头”。民国时期老“放山”人挖到人参后，会在附近的红松树树干上用刀砍出一块印记，称为“兆头”，其标明在此处挖到过几颗几品叶的人参，还有一些会刻上“来自哪个省的人在此发财”的字。按照“放山”人的说法，曾经挖到过高质量人参的地方更容易挖出新人参。后人路过“兆头”，都会取整块桦树皮点燃在“兆头”的树干上烟熏一下，称为“洗脸”，既有祭拜之意，也可以烟熏以防止树干腐蚀，更加保留“兆头”服务于后人，可谓古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的人都不讲究了，很多人在没有人参的地方砍出新的‘兆头’，故意误导其他‘放山’的人。”路哥自己最高曾经挖到过五六千块钱的人参，他知道有人挖一颗参卖过几万块钱，“挖一颗参一年的生活就够了”。

过了采人参的季节，长白山便进入了冬季。往日禁伐之前，每年10月到次年4月是伐木的季节，因为此时“木头紧”，容易采伐，而森林中的土地也被冻住，运木材的卡车不会陷车，那时是林业局工人最忙的时候。路哥骑摩托车进山采蘑菇的小道，就是当年基台作业拉木头的车辙。而今每年秋冬两季成了防火期，管护队轮流值班。“这就是林场。”是路哥反复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想表达的是林场内外的生活完全不同。

生态冲突

无论是曾经唐为渤海国粟末靺鞨，还是金、元、名的女真人，还是设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满族人，都在充分地利用长白山的自然资源。而今，二道白河的林业局工人和村民们依旧如此。但除了开发和旅游建设，自然资源的保护也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是除了周边的八大林场外，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建立的原因。

朴正吉就是既生活在长白山，却又有别于“跑山”和旅游的另一类人，他是长白山科学研究院野生动物专家。在二道白河见到朴正吉时，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三名当地警察围着他的电脑，正在调出闪存



长白山科学研究院野生动物专家朴正吉熟悉这片原始森林里的每一寸土地

上的录像和照片，让他辨认昨晚在保护区里拍摄到的熊照片。“肩胛骨很突出，是棕熊的特点，黑熊的话这个地方的毛特别长。这熊一米二长，五六岁的样子。”朴正吉一边分析道，一边拿个小瓶留下了一些警察送来的熊的毛发。

其中一名警察带着摄像机，告诉我们：“想采访一下朴老师，为管委会宣传宣传。”朴正吉很害羞，不愿意说。“没什么说的，我们现在的研究进度还远远不够，甚至连长白山熊数量都无法确定，对物种、对当地环境的研究更是还有很多需要去做，楼下的人也都可以说这些。”他说道。

朴正吉去年就退休了，今年又被返聘回来。他的办公室很空，除了两个书桌，只有一副羽毛球拍子和一双带泥的高帮登山鞋放在门边。送走了三位警察，朴正吉不紧不慢脱下脚上的低帮鞋，换上了那双带泥的高帮登山鞋，出门带我穿过长白山科学研究院的后院，跨过一条小河，就进入了长白山保护区的原始森

林里。“人们觉得长白山很大，但其实真正保护起来的原始森林也就这么一小块，总共20公顷。”头前带路的朴正吉回头向我说道。

我身处其中的这片原始森林也是红松阔叶混交林，给人一种极其饱满的感觉。看着并不像热带雨林那样茂盛，高耸的松树与桦树下，地面很开阔，灌木少，且长得不高，地上厚重的落叶层层堆积。这种空旷，给人的是另一种饱满感。

进入森林，就像进入了深绿色的油画。后调微微有一点落叶腐烂的味道，只能听到鸟叫和树叶沙沙作响。自然保护区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落木倒木一片，躺倒的树干树枝交错，上面苔藓包裹，早已和草甸融为一体。一套完整的自然体系安静地在这里。

朴正吉告诉我，这种针阔混交原始森林因为上方枝叶茂密，使得地面上没有阳光直射，并不会那么多灌木生长，这也就使地面上空地多，野生动物也愿意走没有灌木的地方。只有次生林才会出现很多灌木，



曾在长白山二道白河居住多年的作家胡东林在长春家中写作。他的桌前摆着长白山棕熊幼熊标本

因为灌木太多，野生动物也很少去。“野生动物和人类一样，都愿意走比较好走的地方。”野生动物与原始森林之间的关系，也是他1977年至今40多年来在长白山科学研究所研究的课题。一年接近200天都在长白山上，按不同的季节做不同的研究，春天研究两栖类、鸟类和鼠类，冬天根据雪地上的脚印研究熊、鹿等大型动物。

朴正吉对这片原始森林太熟悉了，40多年他始终走这条道。他可以随意指给我看，这是野猪的脚印，那里是松鼠叼过来的松塔，这片红松幼苗是松鼠在地里埋松子储存食物后长出来的。“现在这里建设的水电站数量很多，我们这个小范围内就差不多有20多个。河坝就更多了，河坝建成之后，对鱼类的生存非常不利。鱼类数量的减少接着会影响吃鱼的水獭和中华秋沙鸭的生存。”朴正吉指着水电站建的小引水渠告诉我，这种凹形引水渠因为两侧高耸的沿岸与水面存在落差，诸如孢子、松鼠不小心落入水中后不会顺流向下流，而是一直从落水的地点向岸边爬，但落差太高爬不上去，最终会被活活累死在引水渠里。

虽然如今外人必须持有出入证才能进入自然保护区，但朴正吉告诉我认识路的当地人还是随便进出。“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里的红松树面临根部腐烂，树干变成空心的问题。”朴正吉站在一棵布满伤痕的红松树前对我说，“当地人打松子都是穿着带金属脚钉的鞋从树干上向上爬，金属脚钉严重刺穿了红松树干，让很多松汁从树干流出，我们推测这种人为的松汁流出使得整棵红松树的营养输送能力和养分平衡被打破了，抗旱能力下降，才会导致红松的逐渐死亡。当地人打松子，100斤能挣2000多块钱，能挣钱谁不干。然而全球温带森林也就只剩下三处了，一处在欧洲，一处北美，另一处就是长白山。”

他近年来一直在研究植物种子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栖息地决定了野生动物的食物，像周边林场因为砍伐而出现的次生林，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就非常不好。”朴正吉说道，“比如我之前研究的蒙古栎这种树，因为产量高而曾经在长白山被大量砍伐，蒙古栎产生的坚果类种子也随之在一些区域消失，一些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便因此离开。和蒙古栎关联的野生动物

种类很多，我们自己研究的就有20多种，像兽类、鸟类很多都是吃蒙古栎种子，熊秋天也会大量吃这类种子，以增加自身脂肪的积累，为冬眠做准备。”

人为的危害还有很多，近几年被放生到长白山保护区的外来物种梅花鹿带来了新的传染病，大批野猪患上了乌肝病死亡。保护区周边农民们养的狗因为犬吠，而使得野生动物的活动半径进一步减小。从2007年，他还开始研究自然保护区附近道路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保护区周边的省二级道尽管已经设置了限速摄像头，但很多车还是超速驾驶，致使很多过路的野生鸟类、蛇、两栖和爬行类动物被撞死。

如今朴正吉的儿子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工作，儿媳妇在警察局，都没有离开二道白河。朴正吉现在觉得做单一的物种研究没有太大意思，他说：“我就是想通过与别人合作，从宏观角度，分析人类活动对原始森林和野生动物的影响。”野外调查40多年，朴正吉见过无数次熊，距离最近的一次他和熊只相差十几米。当时他顺着车辙路在走，一头棕熊正好要穿过车辙路，在路边碰到他，熊被吓得掉头就跑。“那熊特别大，一跑起来地都振动得咚咚响。”

新中国刚成立时二道接近30户人家，几乎都是猎户，种些地自给自足，原来主要以春秋上山采山货，冬天打猎取貂皮为生，家家都有双管猎枪。“那时山上狍子、野猪、鹿，到处都是。供销社收皮子，所以有人打猎。”70年代，国家林业局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开发狩猎队，那时候只有个别野生动物物种存在禁猎，连熊都可以随便猎杀。朴正吉有个朋友是当时森林警卫队的，从1970至1975年，这位朋友一个人就打死了百十来头熊。1985到1990年的5年时间，马鹿、鹿鞭、鹿尾都开始值钱了，从别的地方农村来了一些猎手，把马鹿打死以后，将值钱的东西拿走，整头鹿就扔山上不要了。“那时候想吃肉，你到山上去，听着乌鸦叫就能找到一头死鹿，割个腿回来就行，打猎多到那种程度。但是，几年时间这马鹿就快打绝了，目标太大好打，再说那时候几乎都是快枪。”刘茂泉的一名林场同事回忆道，随后全国禁猎便开始了。“派出所从猎户那里把枪收了回去，放在大锅炉里头给烧了。但偷猎的人还是有，利益越大越有人冒险。熊掌、熊胆、狮子皮，确实都是好东西，我们当地有专门贩卖这些人。”

胡东林就是最早一批混迹于长白山盗猎者之中的人。身为作家，从2005到2012年，他搬到二道白河居住，为了收集写作素材，认识了当地盗猎分子的头

目之一老孙。当地盗猎的有30人左右，有10人老了，另外20人还在继续干。这20人里有七八人每年打一两只熊。据胡东林所知，从2005到2012年底，保护区内外打死了87头。老孙在当地枪法最准，一生打死50多头熊，而老孙能当上头目的原因是他有优质的销售关系。他有4个打猎的师傅，下面有40多个徒弟，每个人打猎打熊得到的熊掌、打鹿得到的鹿茸，都卖不出好价钱，只有从他这里卖，才能卖出高价。就这样胡东林和老孙在山上混了很久。

2012年长白山出现了5头熊被猎杀的事件。盗猎分子很懂熊的作息规律，熊冬眠6月，6个月不吃不喝靠去年的脂肪运转。熊冬眠完很饿，在长白山最高地方的红松林还留有食物。盗猎分子就在那里放上炸弹，外面裹上臭鱼，引诱熊去吃。熊引爆炸弹，胡东林多年观察的一头母熊和它的三个幼崽全都被炸死了，盗猎者砍掌、取胆、挖心、去肉、扒皮。炸熊的盗猎者并不是老孙这伙人，但老孙把情况第一时间告诉胡东林。胡东林爬上山，到了猎杀熊的地点，用手机拍了照片后放到了网上。

事后由于众多媒体的压力，当地公安局对长白山保护区内的盗猎活动进行了严打，很多盗猎者被抓，公安局对老孙也进行了更严格的监管。然而一次老孙上山打野猪，被公安局的红外摄像头拍了下来，他因持有半自动武器而被判了两年监禁，直到今年10月刑满出狱。而胡东林在2012年得了脑梗，在长春卧床半年，再没回过长白山。虽然现在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但胡东林依然担心老孙在监狱里听了太多关于自己的坏话，出狱之后，不再认他这个朋友。“长白山是整个中国以及东北亚的生命线，它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气候调节功能保证了东北的粮食产量和环境平衡。但现在这里最大的冲突就是开发代替保护，开发的呼声太高，保护的呼声太小。”胡东林很无奈。

然而人类对长白山自然资源的破坏不止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上，一次长达7年的捡风倒木，一次捡松子破坏，都对长白山原始森林保护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虽然现在这些活动都已经停止，但长白山自然生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从古至今依旧是关东人民生活的核心。■

（参考书目：《满族书面文学流变》，关纪新著；《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从东京到盛京：努尔哈赤崛起轨迹探源》；《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陈跃著；《长白山生态文化探析》，张连伟、童琪著。感谢实习生郑亚博对本文的贡献）

姚大力：长城之美在超越

文 / 徐文齐

长城曾是历史上的华夏人群捍卫被他们向北一直推进到宜于雨养农业的地区尽头的那片生存空间的军事防御工事；以它作为轴心，“长城南北”成为研究中国北方不同人群及其文化之间冲突与融合的长时期互动关系的重大课题；今日长城，无论大体上完整地保存至今的部分建筑，还是剩留在某些地段的残墙颓壁，乃至部分依稀可寻的遗址，都已成为凝聚着对中国历史沉重而带有诗性的记忆的珍贵物质文化遗产。

这三者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内在关联。作为一座巨大军事防御工事的长城，在现代社会早已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但作为古老的帝制中国形成发育的一个全程见证者，它一直在耐心地、默默无言地讲述着迄今仍被我们忽略或误读的某些故事。而作为历史文物的长城，则具有一种可以从特定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的审美意义，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更是人超越自身潜能的极限创造出来的伟大奇迹。

因此，今日人们在认识长城时，也许应当有一种超越意识：长城没有能阻断位于它南北两边的人群之间的交流，它更像是一道铰链，将长城内外的中国疆域紧紧咬合为一体。正是在此种意义上，长城成为造就一个“大中国”的重要粘合剂。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更深刻地领略长城之美。

三联生活周刊：在历史上，长城一线，是否主要是划分农耕的汉地与游牧的草原社会的界线？今日长城的意义是什么？

姚大力：现在我们心目中的长城，作为从嘉峪关到山海关的一道线性的、封闭的军事防御工程，实际上是在明代建立起来的。明代还沿这道防御线设置了九个负责边防的军事指挥部。这就是所谓“九边”，也可说是九个军区，把长城全线联结起来。

明长城很了不起。特别是有些大的城关要塞或险隘地段的城墙，例如居庸关、八达岭长城，都修得雄伟壮丽。明以前，中国的城墙，很少有砖包墙，大都是夯土筑成的土城子。所以明以前的长城，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宏伟。

明代长城所在的这条线，其走向是有它的特点的。这条线跟华北季风区的边界线，基本上是重合的。

季风区意味着什么？季风会从大洋带来雨，所以，

这个季风区能够到达的边缘线，又几乎与17英寸的年降水量线相重合。而这条17英寸的年降水量，差不多就是维持雨养农业所必需的最低降雨标准。因此长城一线，就是能够从事雨养农业地域和不能够从事雨养农业的区域之间的分界线。

所以，第一，长城所在的位置具有相当恒定的地理特性。第二，长城呈现为一条线性的封闭的军事防线面貌，主要是在明代，更准确地说，是始于明中叶。第三，在此之前，当然早已有长城了，从战国开始，秦、赵、燕等国就都已经在建造长城了，但是当时长城实际上没有像明代这样严格的、线性的、封闭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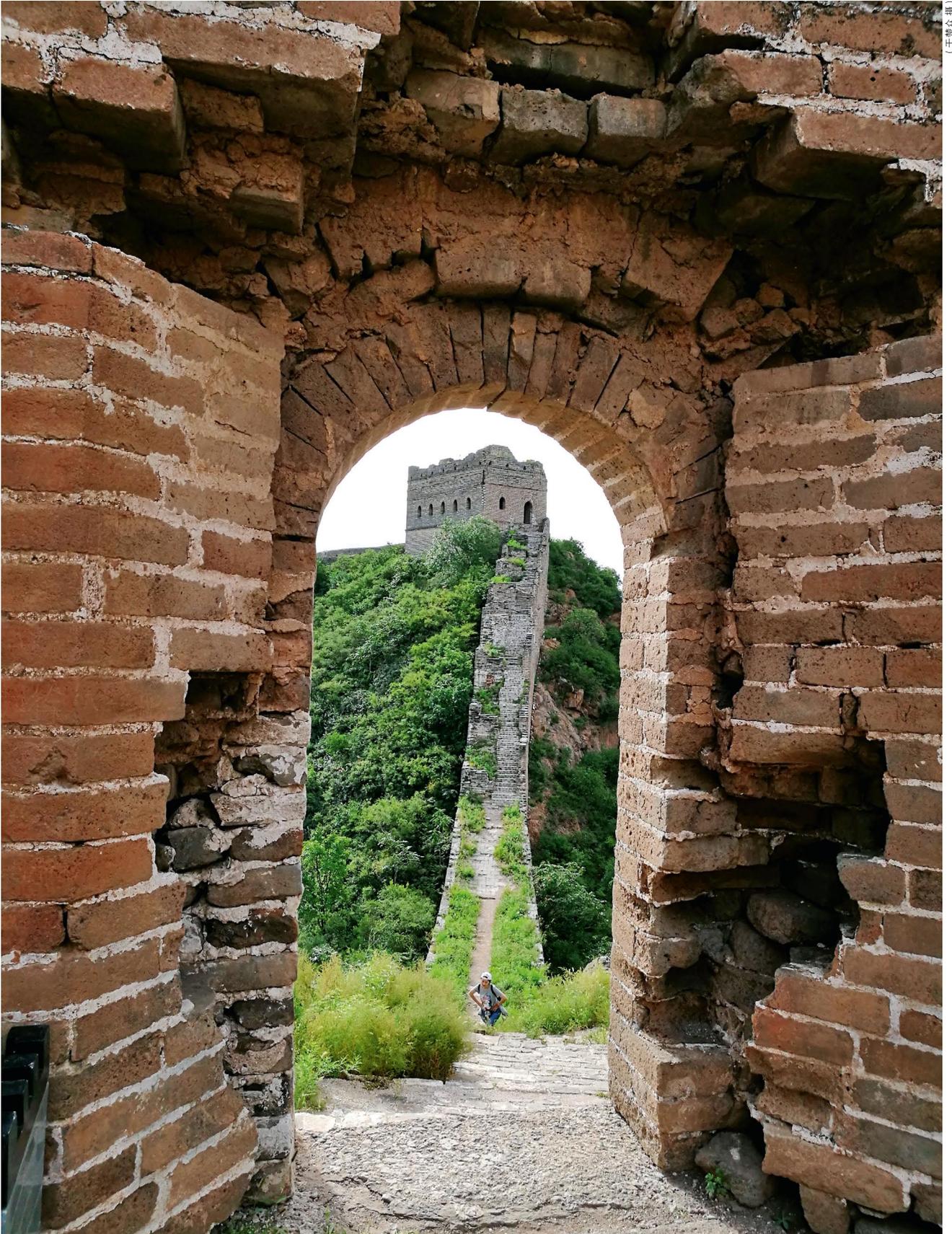
明朝之前的长城，可能在某些段落是连贯的，在有些地方就没有连贯性。另外，它也不一定形成一条线。也就是说，从战国以后历来的长城，并不是一条封闭的军事防御线，而是以构筑不完全连贯的若干重土墙的形式，在农牧混合带造成一个很宽的军事缓冲地区。

总的说起来，在建造长城的当日，直接目标是要用长城把它的南北隔离开来。不然花偌大工夫去建造它干什么？

然而实际情况是，造了长城，还是做不到将长城内外断然切分开来。从历史结果反观从前，这里就有一个超越长城的问题。你不肯超越长城，你怎么看得见长城之外那一大片属于中国的北方？

我们的国歌唱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句歌词将长城比喻为抵御外敌的一道摧毁不破的国防工事。可是历史上的长城只是划分中国内地和边疆的一道界线。长城不是历史中国的空间范围的边界。如果不是这样，那中国还要不要长城以北的那些地区？

从美学的意义看长城，也就是将它当年的实用功能，连同在建造它的过程中发生的被奴役劳动大众的孟姜女式悲情一起抽离掉之后，再回过去看它，它很美。不仅八达岭那一段如此，甚至断断续续地矗立在荒原上、历尽岁月侵蚀的汉代夯土长城，也有一种特别的美。面对着这项巨大的工程，你可能会心悸和感动。为什么呢？因为长城呈现的，是人类对于自我极限的超越，因为这种超越，才能做出奇迹，如果讲美，长城的美正美在这个地方。这种美又反过来使它得以超越对于一个特定国家或民族的意义，它属于全人类，代表的是人类所造就的奇迹之一。



金山岭长城



姚大力

前几年我有机会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帕米尔高原考察。清军曾在那里竖立过一块乾隆颁制的记功碑。再往前追溯，玄奘西行取经后的回程，以及为唐朝统率远征军的高句丽将领高仙芝都曾取道此地。而亚历山大东征时所建立的城堡，至今也矗立着。那时我就想到，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到怀着同样的敬佩和感动，去凭吊唐代及清代中国和马其顿帝国留在那里的这些遗迹？

高仙芝确实是人类能够超越自我极限而做出伟大奇迹的又一个典型。你到那里走两天，就算是坐越野车，都能感觉到旅行之艰苦与不易。有一个晚上扎营在离 Zor Kul 湖（即维多利亚湖，亦即玄奘路过的“大龙池”）不太远的一个山坡上。小帐篷搭建在倾斜的地面上，整整一个晚上，我一直不敢睡，事实上也睡不着，因为老担心自己会顺着低的那一方滚到帐篷外面去。狂风在帐外呼号，冷得几乎浑身僵硬。那一夜，考察队的所有成员差不多都未能睡着。高仙芝当年，是怎样率领骑兵由北向南穿越帕米尔的啊！

在那里，我碰到一对日本老夫妻。丈夫是退休的出版社编辑，妻子是庆应大学毕业的一位退休老师。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来到帕米尔高原了。他们就是为了追踪高仙芝的行军路线去那儿的，想把他可能遵循的每一条行军路线都走一遍。我问他们为什么会高仙芝如此着迷，他们回答说：romantic（浪漫主义）。

他们追寻的浪漫主义，就是人类鼓舞着超越自身

极限而做出不寻常之事的那种精神。这对日本老夫妻佩服的就是这种精神。他们并不关心唐朝的版图到了哪里。

长城作为一种既阻隔、又粘合南北的因素，可能让汉族和蒙古族共同感动的是什么？我想就是这种情怀，这种人类超越自我极限的精神。

三联生活周刊：长城内外，实际上还是一种民族的分野，就历史来说，长城之内大部分是汉族，长城之外的中国边疆地区则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很多人思考边疆问题时，立场是比较狭隘的，很少关注到生活在那里的各少数民族。这种视角在认识中国的北方民族时有害无益，该如何避免这种不良倾向？

姚大力：近几年我一直在讲，应当看到，所谓“中国性”（Chineseness），不只是由汉族及汉文化的那些特定属性组成的，里面实际上含有很多内陆亚洲（Inner Asia）的属性。从总体的格局看起来，可以说中国是由两个大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汉族和汉文化的地区，另一部分就是中国版图之中的内陆亚洲地区。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边界线，都不会跟民族、文化、语言、宗教等单元的边界线自动地、简单地互相重叠。如果说中国的国境线不但界分出一个政治尺度上的命运共同体，而且还划出一道在语言、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可以与相邻接的各国、各人群判然两分的边界线，这就太奇怪了！现代国家哪一个是这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思考中国性的问题上，“内亚”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该如何认识内亚？“内亚”的概念是从拉铁摩尔开始的？

姚大力：拉铁摩尔比较早就说到过，我倒没有去考证此前是不是还有人使用这个概念。我相信大概之前还有人。

内亚概念的界定，按我理解，与这个地区的河流，除了向北流注北冰洋以外，几乎没有流入其他海洋的。它们要么流入内海，要么在沙漠里头消失了，它一般不流入海洋，这大概是属于内亚的一个特征。

狭义的内亚，包括大兴安林东侧的草原地带、整个蒙古高原、新疆，西藏，再往西就包括现在的五个斯坦。这个是较为准确的大致的内亚概念。

三联生活周刊：在内亚形成了一种内亚边疆帝国。我们注意到在您的研究中，提到了两种认识中国的方式，一种小中国，一种大中国。您也提到了两种国家建构模式，一种是汉唐帝国模式，一种叫内亚帝国模式。这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姚大力：你只要看看《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明白了，看看秦统一的中国到底有多大。现在说到“秦统一中国”，我们往往会误以为就是将今天的中国疆域都统一了。可

是你到地图上查一查，汉唐虽然有一点不一样，但除了秦原来的地盘外，很多其他地区都只采取“羁縻”政策，也就是间接统治。到宋、明，对比可以发现，按汉唐帝国模式有效地管理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汉人的社会。除了这种地域上的界限之小，在文化上，其治理的理想目标就是想用单一文化去覆盖全部疆域。

内亚帝国模式则不然。新疆、西藏、蒙古、青海、东北，是谁将他们纳入中国版图的？那就是元、清。它们是从边疆发展起来的帝国，所以才名之以边疆帝国。这个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文化上不仅包容，而且有一种治理整个西北与中国的方略，这个方略与汉唐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如理藩院的功能，将那个地方的户口、驿站、行政全部管理起来了。在汉唐，这些都叫羁縻，中央王朝本身不参与管理，就是在名义上给一个官，就册封了，也不派人前去治理。当地受册封的首领，只要来朝贡就行，本质上那还是一种对外关系。这些人的档案和其王朝的档案，都在鸿胪寺——鸿胪寺就是当时的外交部。档案中规定，你来应该走哪一条路。为何要做这样的规定？你是外来的人，你不能到我的国家随便走的。所以我给你规定，你从哪里进入，你从什么路到什么路，你应该给我一些什么东西，我应该回赐你什么东西，这是外交档案。甚至还包括，你死了，我应该将官位封给谁，不然寡母带领一帮争权夺利的孤儿来吵，我也没办法。可见，汉唐模式对这些地区没有行使主权，它还是一种外交。当然这种外交还带有一种册封，册封也只是名义上的。清朝就不一样，对这个地方怎么管的，怎么设置驿站、交税、封爵……全都明确起来了，这不是汉唐制度里有的，汉唐制度全都是管理地方就是外交部的事情。

我们的历史书一脉相承地叙述一种延续的制度，即认为中国先有一个秦始皇的国家，沿着这个体制，越来越发展，这就不对了。

靠着这个体制，今天这样的中国会不会出现？西北主权还在中国？因此必须突破这种汉唐模式思维，进入到一种内亚帝国模式思维中，这样才能明白中国何以可能，才能发现新北方。

三联生活周刊：从边疆发现中国的概念，就是说，长城边疆主动参与中国历史创造，有一种能动性在里面。这该怎样理解？

姚大力：边疆帝国对国家建立的贡献就生动体现在这里。但是根据我们的标准历史叙事，边疆总在那里很消极地等待中央帝国来统一，一次又一次地统一，最终被纳入中国。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边疆人群也是很主动的。边疆帝国，不就是从汉唐式帝国的边疆发展

起来的吗？边疆有很多人群在非常积极主动地参与大中国的建构。这就表现在内陆边疆帝国模式。我们经常将宋朝时期的西夏、辽、金都看成历史的交响曲中间不大和谐的杂音。但从大中国的角度来看，它不是一个杂音，而是另外一条线。若讲一个小中国的线，从唐到宋，别的都是干扰因素；但从一个大中国的概念，不是一个干扰因素，它是一个积极的建构的过程，是在发育、孕育一个大中国的过程。

三联生后周刊：这个大中国的概念是？

姚大力：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是从现代中国的概念去思考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们理解，长城内外，历史时期，主要的结构性矛盾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拉锯与冲突；但是现在，在这种边界消失的情况下，本地区变得相对平和，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的结构性矛盾是什么？

姚大力：那就没有什么结构性矛盾。文化不一样，不一定导致冲突。整体上，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长城的消失，其实指的是长城功能的消失，是什么原因呢？是过去的朝贡体系被一种现代的国民关系或政治平等的制度体系所取代。也就是说，大家都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当大家都变成国家的主人，当然也还会有矛盾，但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国家体制内部的规定来解决。

其实，就是在传统时代，朝贡体系指导下也可能导致一定的和平局面。朝贡体系是长城内外的两方，甚至多方，在长期的关系协调中间（因为我们总要协调关系）形成的一种当事各方都接受的制度框架。在这个制度框架里，尽管汉地的政权经常是朝贡的接受方，但也不能否认，朝贡体系也可以倒过来，就是汉地的政权向草原进贡。谁向谁朝贡，可以随形势变化而转换，这正说明，这个制度框架是大家都接受的。当然，这个中间是带有不平等关系的性质的。但是古代没有平等的关系，古代人没想出来一个平等的结构。这个不平等，放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关系，它是双方接受的，而且关系是可以倒过来的，那就是凭实力说话。

最初，双方本都没有概念。汉武帝的时候，要么你来服从我，你不服从我，我就去消灭你，匈奴那边也是这样。这是大家刚刚开始接触对方时的情况。要么把你当作我的钱柜，我要什么你就给我；你不给我，我就打你。从没有朝贡的概念，到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而找到这样一种双方都可能接受的协调方式。汉武帝消灭不了匈奴，汉人到蒙古草原上，远征的时间很少有超过一百天的，因为它有粮食供应、后勤、马力等的限制。而游牧人打仗，经常采取的是，你进攻的时候，他们后

撤，致使你根本找不到他们。而当你有序撤退时，他们就出来了，把你的有序的撤退变成一场失败后的大逃亡。所以，双方都达成不了自己原来的目标，你不可能消灭我，我不可能给所有你想要的，那么怎么办，最终就磨合出来大家都接受的朝贡体系，而且可以互相逆反。

近代以前长期的长城内外的局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朝贡体系，来实现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与经济交流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国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国家的一系列制度。人民主权，主权在民，所以朝贡体系这种不平等的结构就被理想中的民主关系所取代。理想中的民主关系，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于是长城也就失去了它原先曾有过的军事防御功能。实际上，长城的这一功能在清代就已经不存在了。

长城的意义，应该被超越，不能仅仅从军事防御的角度去理解，要超越这种狭隘的保守的观念，所以你要超越它，才能发现美丽广大的中国北方，包括长城之内和之外的魅力北方。

三联生活周刊：在“长城边疆地区”这样的命名之中，长城本身似乎即喻指边疆而言。那么超越长城，是否意味着也要超越我们传统的边疆想象呢？您怎么看所谓边疆想象问题？

姚大力：“边疆”这个词，实际上是相对于汉族地区的一个概念。疆即界，所以边疆或边境本来都应该是指临近国界线的国内一侧地区，其范围也许与须使用“边境通行证”的区域比较相当。但是我们的边疆往往是边疆省份的指代词，因此它远大于须使用边境通行证的地区。另一方面，也不是含有国境线的省份都被认为是边疆的。东部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都有海岸国境线，但它们似不被人认可为边疆省份。

这样看来，所谓边疆，就只能是指中国国土之上的少数民族分布区。事实上，我们几乎把所有非汉族的地区，都叫做边疆。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说到边疆的时候，是否有一种刻板印象，会觉得那里都很穷很落后，需要我们帮助发展，需要改造？

姚大力：我看可以这样理解，但我认为这样的概念主要还是和那里多为非汉族聚居区的事实联系在一起。想象边疆的时候，会有这些落后的属性，但是在界定边疆的时候，并非将此当成主要条件。我们所谓的“落后”等等，往往也带有某种民族属性，即不是汉文化的就是落后的。所以这里的因果关系应当是：人们关于边疆落后的印象恐怕是从那里主要是民族派生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由落后派生出民族。这是一种汉族本位主义的反映。

这和美国的新边疆，frontier，也不是同一个意思。Frontier 是指白人在向西扩张的时候，最临近未扩张到地区的前沿。这与我们将在汉族以外的地区都叫边疆，还是非常不同。拉铁摩尔说的也是没有汉人的地区叫边疆，那个边疆和我们今天所讲的概念是符合的。

长城边疆是指长城以外地区，那就是少数民族地区。长城往北，还可以种地，就地理环境而言，那都已经很勉强了，并不适合种地。长城已经扩张到了不能种地的地方，当然若实在没有地了，跑到那个地方还是可以种，但实际上这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长城，在我们的理解中，是保护汉人的农业经济，是一种防卫的行为。拉铁摩尔的这个认识是对的，就是说，长城并不是汉人防卫的边界，而是其扩张的极限。因为在长城很大一片地区，你可以从事农业，我也可以从事牧业。它本来就不是专属于汉人的地方，而是汉人与非汉人混合分布的地方。那个土地是既可农，也可牧，然后我将你排挤走，那到底是我保卫我原有的土地，还是我把我的空间扩张到了可以从事农业的最大的范围？弄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事实。

三联生活周刊：修长城，这并不是汉族一个民族的行为，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也修长城，如北齐、北周，虽是鲜卑族，也修长城。

姚大力：那是这些王朝汉化的结果。他们将汉族的行为模式拿来使用。鲜卑人本来是和汉族对抗的，他们到内地来建立一个王朝，他在那儿守长城，在北面又出来一个柔然，这和汉族人守长城有什么区别？角色转换了。

三联生活周刊：普通人在思考边疆的时候，认为这种被界定为边缘的地带，是很落后的，但人类学思考边疆的时候，就会认为这可能是两种文化接触、碰撞、混合的地带，因此反而会有一些活力。长城边疆是否也有这种文化混合，显示出来某种特别的活力。

姚大力：这个要分开来看，如果这个边缘地带，它本身的规模很小，那就不是。在一个能够与他者的文化充分交流的地区，那里的文化往往更有活力。但农牧混合区的规模，没有办法培育出来一种足够强大的独立的社会或文化。这个混合区，只是两种独立文化势力的边界，一种缓冲带。根据《危险的边疆》，在辽河流域或白山黑水之间，那是契丹人及女真人起源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多种文化交融。那个地方的人群有多种选择，因此征服汉地的少数民族其原始的来源地，经常不是真正的草原。因为真正的草原反而和汉族隔绝了。其来源地，反而是既熟悉农业（辽河平原南部地区就是从事农业），也熟悉游牧。■



松果

一万个生活家

有营养，有态度



煤价上涨与去产能的反复

主笔 / 谢九

被视为严重产能过剩的煤炭行业，近期价格突然出现快速上涨，为“去产能”之路带来新的挑战。

最近两个多月以来，煤炭价格强势反弹，不同品种的煤炭涨价幅度大概在 20% 至 40% 之间，萧条已久的煤炭行业再度出现了“煤难求”“船等煤”等昔日的盛世景象。煤炭价格的意外上涨，也使得下游钢铁行业再度面临亏损的压力，中钢协不得不向发改委呼吁增加煤炭供应，以保障钢铁企业正常生产。

这一轮煤炭价格上涨的导火索主要因为去产能所致。作为去产能的重点对象，煤炭行业在今年上半年的去产能计划完成得并不理想，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退出产能 7227 万吨，仅完成全年 2.5 亿吨目标任务的 29%。7 月份，发改委要求：“各地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决策部署，倒排任务量、倒排时间表，确保 11 月底基本完成任务；中央企业和地方大型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力争 11 月上旬完成任务。”在硬性指标面前，下半年以来煤炭去产能加速推进，7 月底，煤炭退出产能距离全面目标完成了 38%，到了 8 月底去产能已经完成了 80%。

随着煤炭产能急剧萎缩，市场的供需矛盾开始显现出来。上半年，全国煤炭消费量同比减少 9750 万吨，降幅为 5.1%。尽管煤炭需求下降，但是煤炭产量下降更甚，上半年同比减少 1.7 亿吨，降幅 9.7%，产量降幅明显高于需求降幅。进入下半年以来，煤炭行业去产能提速，供需矛盾更加紧张，因此导致最近两个月以来煤炭价格快速上涨，国内炼焦煤主要煤种每吨上涨 100 至 150 元，涨幅超过 20%，进口煤涨价更是惊人，澳大利亚炼焦煤较今年 6 月初上涨超过 80%。

面对煤炭价格的快速反弹，首先坐不住的是下游的钢铁行业。2015 年，国内主要钢铁公司亏损 600 多亿元，进入 2016 年之后，由于煤炭价格下跌带来成本下降，加之房地产和基建的投资对需求的拉动，今年上半年钢铁行业实现 126 亿元的盈利。不过随着下半年煤价大幅上涨，很多钢铁公司再度进入盈亏边缘。如果煤价延续反弹的势头，下半年钢铁行业可能会再

度陷入集体亏损之中。压力之下，中钢协向发改委呼吁增加煤炭供应。

9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召集神华、中煤、同煤、陕煤等 24 家煤炭企业召开“稳定煤炭供应，抑制煤价过快上涨预案启动会议”，主要思路是通过释放煤炭先进产能来解决当前的供需矛盾。这次会议选定了 74 处煤矿为首批先进产能，参加调节市场供应任务。具体办法包括“当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达到 460 元、480 元、500 元且连续两周上涨时，这些先进产能可以对应日均增产 20 万吨、30 万吨、50 万吨”等等。

由于当前煤炭行业的主旋律仍是去产能，所以发改委此次释放先进产能的做法也显得颇为谨慎，比如市场原本预期可能会放开煤炭企业工作日的限制，允许先进产能的工作日从 276 个工作日调整为 330 个工作日，不过发改委对此并未完全放开，显示出在去产能的主旋律之下，即使面对煤炭价格反弹的压力，管理层也依然担心产能过剩卷土重来，只能在去产能和控价格的双重目标之间谨慎微调。

不仅是煤炭行业的去产能之路走得艰苦反复，此次面对煤炭涨价而叫苦不迭的钢铁行业，更是去产能的头等大户，其去产能之路更加曲折。由于国内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已经对国际钢铁市场产生了强烈冲击，钢铁业的产能过剩更是在近年升级为国际问题。今年 5 月中旬，欧洲议会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理由就是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尤其是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和对欧洲的廉价出口，为欧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及环境后果。今年 6 月份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钢铁产能过剩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在此之前，人民币汇率一直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今年二季度以来，由于美联储加息预期下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反弹，国内钢铁价格也随之走高，钢铁企业出现了近 10 年来最好的盈利水平。大量钢铁厂家迅速复产，4 月份的国内钢铁日均产量甚至达到了历史新高。按照预定的去产能计划，2016 年压减粗钢产能目标为 4500 万吨，但今年前 7 个月去产能仅完成全年任务的 47%，与此同时，大量钢铁企业在利润诱惑下偷偷复产，使得去产能之路陷入了市场和行政指令的两难之间。钢铁和煤炭的不同之处在于，

我国是钢铁的净出口国，去年中国的钢材出口量同比增长 20%，达到了 1.12 亿吨，创下历史新高，占去年全球钢材出口的一半，正因为如此，国内钢铁的产能过剩才成为全球性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我国煤炭行业还是净进口的地位，因此，相比之下，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更多只是内部问题，并没有引发国际关注，这一次煤炭价格上涨，首先做出强烈反应的也正是国内的钢铁行业。

煤炭和钢铁行业去产能之路的艰难和反复，也显示出依靠行政指令和市场调节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当前学术界的一大争论热点，近期国内经济学家张维迎和林毅夫就政府是否应该制定产业政策展开论战，当前去产能的现实遭遇其实很能说明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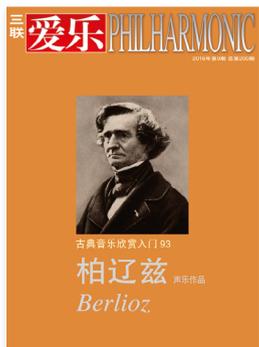
今年 6 月份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认为中国的钢铁过剩问题对全球市场造成了扭曲和破坏，而中国财长楼继伟回应称：“中国已不是中央计划经济，无法向企业下达去产能的量化目标。”虽然政府并没有直接向具体企业下达去产能的量化目标，但是上升到各个行业，还是有非常具体的去产能指令，比如钢铁行业的去产能目标是，今年压减粗钢产能 4500 万吨，从 2016 年开始，用 5 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 1 亿~1.5 亿吨，煤炭行业 2016 年的去产能目标是 2.5 亿吨。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人为制定的具体去产能数字如何能够确保其科学性和准确性？如张维迎所言：“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政府不要实行产业政策。”虽然去产能这一大目标毫无疑问是当前中国经济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具体到如何去产能，以及如何制定合理的去产能目标，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实践验证；尤其是政府和市场之手各自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可能也是去产能需要反思的问题。

从目前来看，去产能过程中政府之手扮演的角色还是远远大于市场之手，这就使得无论是钢铁、煤炭还是其他行业，去产能之路总是需要政策事后的修修补补。比如今年下半年煤炭去产能提速过快，结果导致供需在短时间内失衡，造成煤价强烈反弹，于是政策制定者又开始释放先进产能，而且对于不同的情形下释放多少产能都有详尽规定，但这未必能够适合当前市场的供需，一旦将来市场供需再度失衡，相关人士可能不得不对政策细节再打补丁，如此和市场反复博弈，大多数时候政策只能跟随在市场后面。

这一轮煤价上涨了钢铁的奶酪，因此钢铁企业齐声呼吁煤炭扩产，下一次钢铁涨价如果又触动下游行业的利益，也不排除会有相关利益方呼吁钢铁复产。作为供给侧改革的第一大任务，去产能之路可能会陷入循环反复之中。✎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6 年第九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93

- 柏辽兹，从音乐通往语言的途中
- 王立彬、雷苗苗、康啸、鲁瑶对《特洛伊人》、《浮士德的沉沦》和《安魂曲》的精彩解读

纪念册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 序曲 >》在以色列的首演

访谈 克伦佩勒访谈录：关乎人生的对话

话题 名家谈贝多芬九首交响曲（下）

对于法国古典音乐，我们了解多少？

爱乐笔记 她在我心中歌唱：女中音歌唱家费丽尔

现代音乐 专访当代作曲家西娅·马斯格雷夫

指挥家档案 听富特文格勒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中篇）

歌剧物语 陈银淑和她的歌剧《爱丽丝梦游仙境》

唱片说明书 卢德米拉·贝尔林斯卡娅的斯克里亚宾录音

作品 反讽与创新——那些 20 世纪的小夜曲

爱乐书房 古尔德的七宝楼台

听片购片与收藏 CD 时代的古乐第一厂牌 ARCHIV

《爱乐》2016 年订阅须知

2016 年《爱乐》月刊，每期 240 页，全年 12 期，零售单价：20 元，全年定价：240 元。

2016 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 8 折优惠，订阅年价：192 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肺移植专家陈静瑜和他的团队成员。通过他们的努力使无锡人民医院成为全球五大肺移植中心之一

向死而生：一颗器官的捐献与移植

记者 邱杨 摄影 LFphoto

一颗器官从捐献到维护、从转运到移植，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意外状况”，明晰其中的现实艰难、道阻且长，才益发体会出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可敬与可爱。

漫长的等待

“马上就要被推进手术室了，住院半年，准备了半年，说好了不怕的，但从被通知到现在，牙一直在打颤，很没出息吧。”肺移植手术前夜，16岁的任雪向班主任老师发出了这条短信，字里行间那脆弱又倔强的语气，是独属于少女的敏感纤细。

这个夜晚对任雪来说无疑是刻骨铭心的，为了这一刻，她足足熬过了漫长的4年。“就像长期走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看不到前方的光亮。”自从2012年确诊为特发性肺动脉高压——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这个平均存活率只有3.78年且无法被治愈的疾病，就像一片驱不散的乌云始终笼罩着这个三口之家。

今年春节，任雪病情急转直下。眼睁睁看着女儿的状态一直在走下坡路，任雪的父亲内心有如翻江倒海，尽管他仍然在妻女面前勉力维持着冷静自持。但在生死抉择间，再冷静自持的人也难免抱着赌一把的心态——“如果不做移植，孩子的最终结果都看得见，如果做移植，还可以搏一搏。”反复权衡后，这位中年父亲态度坚决：“除了肺移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春节刚过，一家三口就从北京赶到无锡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想在这里为孩子搏出一片天来。

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做。“肺移植不像肝肾移植那样被广为知晓，也就更难被普通人所接受。”任雪的床位医生张稷对此感触颇深，她几乎每天都会接到从全国各地打来的咨询电话，语气里满是犹疑摇摆和防备试探。“有一位从山东来的病人，他的主治医生是当地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就告诫他千万不要去换肺，太吓人了，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动物肺。”这让张稷哭笑不得，连呼吸内科的同行都抱有这样的偏见和误解。

“实际上这位病人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却迟迟不敢来，以致一拖再拖，最终没有等到肺源就去世了。”

或许这个社会给人的教训太多，人们对不熟悉的事物心存疑虑已属本能，更何况肺移植确实难度极大。肺是和外界相通的开放性器官，它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感染的风险，而肺移植就是在抗排异和抗感染之间踩着钢丝。因此，肺移植在我国一直进展艰难，甚至曾经停滞了多年，直到2002年起肺移植专家陈静瑜攻克技术难关，也使得他所在的无锡人民医院成为全球五大肺移植中心之一。

如今，在无锡排队等待肺移植的病人就有两三百名。由于床位紧张，部分病人甚至只能住在附近的小旅馆里等待肺源。据卫生部统计数据，全国每年约有100万器官衰竭患者，其中30万人急需器官移植以拯救生命，但能获得移植机会的仅有1万人左右，很多患者在苦苦等待中离世。事实上，器官供给是最关键的掣肘因素。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禁止死囚器官移植，使得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但由于此前过度依赖死囚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器官捐献机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当意识到捐献的肺源成了活命的唯一指望，人的心理往往会起波澜。“有一位老先生刚入院时，家属都不在身边。但肺源有不确定性，万一临时有了供体，谁来签手术同意书？”于是张稷便想请老先生先签字。但老先生对肺移植仍心存疑虑，尽管他心里的天平已慢慢倒向这边。张稷记得很清楚，老先生把一页半的手术同意书拿回去整整研读了两天，交回来时签的却是“有条件的同意”——第一，只接受单肺移植；第二，只接受同血型的肺源。但随着等待的时间越来越久，看着同层的病友来来往往，终于意识到肺源有多稀缺的老先生，最终也耐不住了，主动找到张稷：“所有条款我都同意，能不能一有肺源就给我？”

肺源也是任雪唯一能指望的救命稻草。为了等待合适的肺源，她已经在医院里守了将近半年，是病友中年龄最小、等得最久的一个。事实上，曾有两次唾手可得的移植机会摆在她面前，却阴差阳错地错过了。“今年5月和7月都有很合适的肺源，但她当时却出

现了全身血流感染，这时候换肺非常不适宜。”在张稷看来，任雪的病情实际上已经到了心肺联合移植的边缘，极为凶险，手术难度和术后早期恢复风险极大，如果再加上血流感染将很难控制，病毒会像种子一样在全身扩散。

两次珍贵的肺源都因同样的原因不得不遗憾放弃，对于任雪和父母来说，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不艰难。失落是必然的，16岁的小姑娘总是很羡慕那些处在术后恢复期的叔叔阿姨可以出病房走动，而自己却只能时时刻刻像只小猫蜷在病床上。她常常用充满期待的天真语气问张稷：“阿姨，您说什么时候可以轮到啊？”这让也是身为母亲的张稷颇为心疼。

而对于任雪的母亲来说，放弃机会让她承受着更沉重的心理煎熬。现实残酷，这个家庭已走到穷途末路，换肺是唯一的生机，作为母亲，她当然一万个希望孩子早日获得肺源。但她也深知，正因病情凶险，更要保持理智。“既期待又害怕，尽管孩子现在健康状况很差，但起码她还活着，我能看到她摸到她。但一上手术台，很可能就下不来了，一想到这里，我又想再等等。”这种矛盾心理折磨着这位文弱的母亲，最终理智压倒了一切，她说：“我希望孩子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手术。”

事实上，遇到肺源少的时候，张稷也很心焦。她总是忍不住催促专门负责取肺源的同事：“最近怎么还没有供体啊，我怕病人撑不住啊。”

尽管等待漫长，但和那些未能等到肺源就离世的人相比，任雪仍然是幸运的。这天晚上，医院传来消息，让她开始做好肺移植的手术准备。但无论是她，还是父母，都不敢轻易放宽心——只要一刻没亲眼见到肺源，变数就仍然潜藏其中。肺移植手术前夜，任雪一家注定辗转难眠，每个人的心都落不了地，害怕又是一场空欢喜。

第二天早晨，直到陈静瑜走进病房时，任雪的父亲还悬着一颗心。这位父亲一直表现得沉稳坚强，但此刻却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急切。他急切地询问肺源的

情况，仿佛置身黑暗的人终于找到了光亮的出口。体察到他的紧张忐忑，陈静瑜贴心地安慰道：“放心，肺的状态很好。”还不忘掏出手机，用视频向他展示刚刚取出来的肺源，只见视频里经过冷缺血处理的双肺洁白如玉。直到亲眼所见，任雪父亲的一颗心才算真正定下来。

小姑娘则抓住陈静瑜的胳膊，怯生生地说：“请您一定要亲自做这个手术啊。”作为国内肺移植的“头把刀”，陈静瑜亲自出马，对任雪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大的心理慰藉。事实上，陈静瑜平日里的的工作强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平均3天做一台肺移植手术，科内每年还要做1100多台普胸手术，而即将开始的这台手术正是他今年做的第80例肺移植手术。

中午12点，任雪进入手术室。在昨晚那条短信的末尾，她说：“无论我在哪儿，手术室还是ICU，我都会永远记住背后还有那么多为我加油的人，所以无论如何我必须咬紧牙坚持到底。”在漫长的等待中，酝酿出向死而生的勇气。

器官从哪里来？

就在任雪被推进手术室的这一刻，一颗新鲜的肺源正搭乘飞机从南宁机场滑翔起飞。“22岁，男性，摔伤，脑死亡。”这是此刻焦急守候在手术室门前的任雪父母，对这颗来自遥远广西的救命肺源仅有的几块模糊拼图。按照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他们无法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但肺源显然是所有人的关切中心，每当有病友前来安慰探望，开场白总是：“这个肺源从哪来的？”任雪母亲便不厌其烦地复述她所知道的几个仅有特征，仿佛在这一遍遍的重复中，也能为自己的焦急等待寻求心安。尽管她无从得知，这颗即将属于女儿的器官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悲欢离合。

器官从哪来？在同一座医院医务科里工作的钱共甸或许能解开这个谜题。今年33岁的他是无锡人民医院OPO（器官获取组织）的“元老”，对器官捐献的路径再清楚不过。作为无锡市乃至江苏省最早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他的使命就是发现潜在的、符合条件的捐献者，说服他们的家属，并协助完成器官捐献的全过程。正如移植界一直推崇的那句话：没有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就没有新生命的诞生。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难是开口说第一句话，家属正在伤痛之时，任何不够慎重的话都可能

2015年全国共有2766位心脑死亡病人进行了器官捐献，而当年全国肺移植共计149例，这意味着供体利用率不到6%，而国外的利用率则高达30%。

引起忌讳和不快。”钱共甸还记得自己参与的第一例器官捐献案例。那是2011年9月，一位年轻小伙因脑外伤病重，当钱共甸赶到医院时，患者已经脑死亡，家属们围在病床边哭泣。他在门外徘徊了很久，才鼓起勇气推门进去。“第一次谈话还是有点怕的。”事实上，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对器官捐献的接受度并不高，我国器官自愿捐献率每百万人中仅为0.6人。钱共甸说，“不少人没听完我说话就断然拒绝了，甚至还有过谩骂威胁。”

对于如何判断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有严格的标准。“简单来说就是，病情是否重到无法治愈，同时是否达到脑死亡状态。”病情的变化往往出现在午夜，自从当上器官捐献协调员，钱共甸是24小时随时待命，经常忙上整个通宵。

器官捐献的最佳时机是达到脑死亡状态的当天，因此协调员和家属的沟通必须争分夺秒。但由于老百姓对脑死亡认识不足，往往这个时候还会要求医生极力抢救。几天后，当家属终于接受脑死亡这个不可挽回的事实，并放弃抢救时，器官的捐献已经很被动了，肺源尤其如此。“这是因为脑死亡病人没有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机械维持，但时间长了就无法避免肺部感染。”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共有2766位心脑死亡病人进行了器官捐献，而当年全国肺移植共计149例，这意味着供体利用率不到6%，而国外的利用率则高达30%。

与文质彬彬、说话温言软语的钱共甸比起来，OPO小组的另一位成员姜武佳却是另一种风格。或许是因为当了多年护士长的缘故，她身上那股干脆利落的爽利劲儿，总让人感到放心。刚当上器官捐献协调员那会儿，很多同事都不理解甚至泼冷水，姜武佳却心直口快地反问：“我为什么要害怕？”在她看来，协调员是让更多人了解器官捐献的政策，并帮助他们完成心愿。

事实上，器官捐献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复杂的伦理情感问题。多年护士长的临床经验，让姜武佳跟家属接触起来自有一套。她最近跟进了一起ICU的脑死亡病例。“患者是中年男性，在私人企业里打工，是家里的主劳力，因脑溢血出事。”在接触前，姜武佳通常会提前了解患者的家庭状况，并摸清谁是家里能做主的人。按照她的经验，第一次谈话时，人数千万不能多。“很多人有人言可畏的顾虑，害怕被远亲近邻知道自己同意器官捐献，被指指点点。”姜武佳很无奈地说，“明明是爱心之举，却偷偷摸摸进行，

这就是器官捐献面临的社会现实。”

谈话当天，姜武佳把患者的妻子、独生子女和患者的哥哥叫到小会议室里。当她单刀直入地提出器官捐献的提议后，家属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反对。“这就意味着有希望。”她暗暗多了两分把握。根据她的观察，往往在这种场合，作为妻子反而不敢轻易表态。“这种心态很微妙，怕男方家人对自己有意见。”如果男方哥哥率先表达了意愿，孩子也不算反对，这时候妻子才敢说话。而“什么时候取器官”和“会不会恢复原状”，常常是家属最关切的问题。姜武佳会细细讲解，尽力消除疑虑。

这次谈话并没有明确结果，家属很客气地表示要回家商量商量。这也在姜武佳的意料之中，第一次谈话几乎很难达成结论，要经过数次的沟通协调才可能有结果。

第二天，患者的妻子找到姜武佳，很婉转地表达了拒绝。“她丈夫家是无锡本地人，乡下的风俗是死者要留一口气回到老房子里叶落归根。”这位妻子还有个心结——丈夫生前的单位同事里，有人签过器官捐献协议书，当时妻子觉得是件好事，开玩笑地跟丈夫说自己也要去签，没想到丈夫骂了一句：“你脑子进水了吧？”——“既然丈夫生前反对过，想必死后也是不愿意捐献的吧。”

姜武佳也遇到过主动捐献的家属。“死者通常是小孩和年轻人，家里人实在舍不得，希望孩子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她记得有一位8岁的小女孩意外脑死亡，孩子妈妈边哭边抱着孩子的头，不停地为孩子梳理头发，自言自语地说着话：“爸爸妈妈知道你喜欢帮助小朋友，你肯定会支持我们的做法……”但姜武佳也碰到过令人气愤的事，甚至有家属直截了当地问她：“器官有价目表吗？”心直口快的她当即反驳：“你是要卖器官吗？免谈！”直到患者去世前，家属还在拐弯抹角地打听钱的事，这让姜武佳很心寒。

无论是固守乡土观念，还是个人心结难解，姜武佳都充分尊重家属的意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更何况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器官捐献遵循无偿自愿这根红线，原则上是三代直系亲属签字同意。“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任何一个人坚决反对，无论这个人是远房亲戚还是朋友，我们都不操作。”与此同时，姜武佳还会主动提及，国家对于自愿捐献器官的家庭有少量的救助金。“虽然不多，但对于那些家境贫寒到交不起医药费的人家来说，也算是雪中送炭了。”



陈静瑜（中）的工作强度很大，平均三天做一台肺移植手术

转运“时间战”

正因为明白捐献器官的来之不易，任雪妈妈极为珍视这颗陌生肺源给女儿带来的重生希望。她紧张地守在手术室门前，担心正在转运中的肺源会不会超过“黄金6小时”。一旦电梯门打开，她就焦急地探头张望，以为是肺源回来了。她忍不住拿出孩子生病前的照片，一张张翻看：以前的女儿白胖可爱，现在却瘦得不像话，皮肤上露出一块块黑紫色的斑点，这是长期用药带来的副作用。这位低调隐忍的母亲从来不敢在孩子面前流泪，但此刻，当她站在手术室门前，思及女儿一路走来所受的罪，却难以抑制地淌下泪来。

就在她随着电梯门的开合，一次次张望等待的同时，刘东正带着肺源飞行千里而归。作为肺移植中心负责取肺源的医生，他每个月都过着“空中飞人”的生活。昨天上午，他刚刚出差回来不久，就接到OPO组织传来的肺源信息——广西贵港市平南县有患者捐

献器官。为了尽早赶过去维护器官——像这种脑死亡的情况，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呼吸，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肺源损伤——刘东当天中午就出发了。

无锡并没有直飞广西南宁的航班，他只得先从无锡坐半小时高铁赶到上海，再从上海坐飞机飞往南宁。当天的航班有些晚点，原本3个小时的行程，直到下午17点才降落在南宁机场。一出机场，刘东就赶紧打车直奔路途偏远的平南县，见到供体时已经是当晚20点半了。

“供体是一位年仅22岁的年轻男性，从楼顶不慎摔下头部着地，脑外伤严重导致脑死亡。”基于双盲原则，刘东对供体的信息也掌握有限。其实按照器官就近分配原则，供体器官通常是就近取用，据刘东了解，这位供体捐献的肝脏和肾脏，就分配给了南宁303医院。但由于无锡人民医院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肺移植中心，且绝大多数医院并不具备肺移植的能力，所以一旦各地有肺源，OPO组织通常会直接通知无锡

方面，也就常常出现为转运器官而千里奔忙的情况。刘东说：“本来供体也同意捐献心脏了，但很可惜就近没有找到合适的受体，从北京、上海赶来转运又时间太长、风险很高，医院不得已只能放弃了。”

当刘东辗转赶到时，距离供体确诊脑死亡已经接近24小时。而此时，远在无锡的任雪和父母尚未得到肺移植手术的通知。对于肺移植团队来说，只要没有亲眼见到供体，并对肺源进行评估维护，就时刻存在着变数。“即便供体家属已经签字同意捐献，也可能随时因种种原因取消捐献。”在刘东看来，“最常见的情况就是肺源未能得到很好的维护，导致肺水肿氧合下降。如果经过当地医院整晚配合治疗后，肺功能得以改善，那么肺源还能用，否则就只能取消，一切心血将付诸东流。”

这也是刘东心急火燎地赶到当地的原因，幸运的是这次的供体肺源质量不错，他很顺畅地就对肺源做起了维护。消息反馈到坐镇后方的陈静瑜那里，他才拍板通知任雪和她的父母做好第二天肺移植的准备。当天晚上，当任雪一家为这颗来之不易的肺源辗转难眠之时，千里之外的广西平南县，盯着器官维护的刘东也没法儿好好休息。

“为了降低肺移植手术的风险，我们当然希望肺源质量更好，器官维护的意义就在这里。”整晚上，刘东和当地医院都在忙着给供体吸痰、补充蛋白、泌尿等等。直到第二天早上，在提取器官前的最后一次评估中，肺源的各项指标已经逐渐提升，他才放下心来。

上午9点，是各家赶来的医生们约定的提取器官时间。在庄重的集体默哀仪式之后，在红十字会和OPO协调员的监督下，各家医生同时站上手术台，开始动刀提取器官。“场面很壮观，小小的手术台站满了人。”事实上，直到提取肺源的过程中，刘东还在对肺源的状态进行评估。“取下的肺源洁白如玉，是一颗难得的年轻肺源。”他不忘拍下视频，传给坐镇后方的陈静瑜。在随后的查房中，陈静瑜紧接着就把这则视频播放给任雪和她父母看，以便让他们安心。

取下肺源后，刘东的转运“时间战”才刚刚打响。肺源从供体身上取下，到植入受体体内血流灌注为止，有一段安全的冷缺血时间，如果超过了冷缺血时间，肺源质量将变差甚至无法使用。一般来说肺源冷缺血时间为12小时，刨除移植手术本身需要的5个多小时，事实上留给路上转运的时间只有6小时左右。

相较于国外转运器官使用的小型商务机，受制于

我国国情和病人经费所限，绝大多数器官异地转运只能通过民航运输。但民航运输往往又受制于很多不可测的因素——航班延误、高速路堵车、雾霾天气，乃至各种运输工具间的衔接，都足以让刘东和所有负责器官转运的医生们头疼。“这是一条艰难转运路，每个环节都要精心估算时间，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只能临时改路线，甚至有时还要通过微博、微信求助。”多年的经验让刘东和同事们形成默契，等到他顺利登机、飞机滑行起飞前，远在后方的同事们才将患者接进手术室。

但刘东也遇到过更惊险的事——航班倒是正常起飞了，却因为大雾落不了地，还没法儿打开手机通知后方。“航班通知只能备降到济南，我一听就说完蛋了，无锡和济南可隔了大老远。”他跟机组人员请求能不能备降到离无锡近一点的南京或上海机场，但协商无果后，仍然降在了济南。刘东又只能赶紧和航空公司、济南机场求情，争取让备降飞机早点起飞。幸亏济南机场特事特办优先放行，刘东所在的飞机很快又飞到无锡。此时的天气状况稍好一些，但仍然不是很理想，飞行员尝试了两次才成功降落。这颗肺源最终是有惊无险地送达手术室，刘东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事实上，一颗器官从捐献到维护、从转运到移植，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诸如此类的“意外状况”，明晰其中的现实艰难、道阻且长，才益发体会出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可敬与可爱。在陈静瑜的反复呼吁下、在全国器官移植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今年5月6日国家卫计委等六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相关文件，极大地提高了转运的时效性。“目前在转运这一环节上，OPO组织能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主要还是靠各移植医院自己的力量。”刘东的心愿是：“什么时候咱们也能像国外那样，OPO组织拥有专门的器官提取和转运医生，作为移植医生只需要在手术室门口等着。”

而此刻仍然守候在手术室门口的是任雪的父母，他们在望眼欲穿等待刘东带着肺源回来，掐着手指计算时间是否来得及。时针一点点划过，心里的焦虑一分分加重。下午15点半，距离肺源取出6个半小时，一路风尘仆仆的刘东终于赶到，将肺源送进手术室。晚上19点半，在陈静瑜的亲自操刀下，新的肺源在任雪的胸腔里灌注成功、重新跳动起来。这一刻，她获得了重生。■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任雪为化名。实习记者肖楚舟对本文亦有贡献）

乔任梁，明星的生存成本

记者 李翊

2016年9月16日，乔任梁在上海家中意外身亡。9月17日，乔任梁所属经纪公司发表公开声明，证实乔任梁在繁重的工作中，遇上外界种种对他不实的报道和中伤的话语后，患上了抑郁症，并非网传的SM性窒息而死。“外界发出的歪曲事实和中伤他的言论报道，使他被误解，种种被猜疑的声音给他造成无形巨大的压力导致病情加重，黑暗和绝望一度伴随着他。”

音乐和演艺

乔任梁是怀揣着音乐梦想进入演艺圈的。

“只记得因为喜欢王力宏，希望能和他面对面地见面，所以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跑去参加金鹰之星的比赛，没想到一路过关斩将地拿了冠军。和王力宏在后台合了个影，然后很满足地坐上火车回到上海。但深深记住了王力宏的一句话：‘没有音乐的世界是黑白的！’”乔任梁在自传写真集《私生活》中写道，“是王力宏的这句话鼓励了我，让我有勇气坚定自己的信念，就是去唱歌。”

2005年乔任梁参加湖南卫视的“金鹰之星”歌唱选秀节目获得冠军，开始被人关注，但是对他音乐之路影响最重要的一年是2007年，当他站在“好男儿”的舞台上，被更多的人呼喊，这种感觉是舞台下的任何一个人感受不到的。他曾经也站在舞台下面那样地呼喊过“王力宏”的名字，但当舞台上的那个人换成了他，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同学之外的无数年轻人呼喊时，那种震惊是无法形容的。“毫不虚伪地说我真的享受这一切。因为但凡是一个歌手，都会享受在舞台上征服别人的感受。”乔任梁这样写道。

那时候的乔任梁，有一张不算多漂亮但是很有特点的脸，看上去有点儿任性，天不怕地不怕，曾在比赛中说出“站在这个舞台上，让全世界统统记住我”这样的话，同时又因为给同来自上海赛区被淘汰的朋友送行违反规则被惩罚。对他的评价分属两个极端，有人很爱他，有人很不喜欢他。

乔任梁对摇滚有着虔诚的热爱，他有自己的乐队Pink7，上节目，就为了组合能够有一个更大的舞台。

在他看来，那段地下室的日子尽管条件艰苦，但是乐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积极的、乐观的。“觉得我们的人生就该是背起吉他闯荡天涯的那种生活状态，这样才能体现音乐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他曾在采访中说，“只要是跟乐队一起，站在舞台上的这个形式就是自己最喜欢的。”

但是现实很残酷，因为乐队里其他成员的风格跟娱乐圈不搭，他们又没能通过经纪公司的考核，公司拒绝签约整个组合。Pink7之后，乔任梁没有再组过乐队，因为对他而言，“组一个乐队其实就跟谈恋爱一样，万一去拍戏，乐队的兄弟们怎么办？这样很不负责任”。

“2009年，橙天给乔任梁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钻石》，相当英式摇滚的作品，制作人是黄义达。有一年时间，公司宣传人员的来电提示音乐都是他的歌。”曾经在橙天负责艺人宣传的王甜（化名）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那个时期，乔任梁的发展更偏重音乐。

王甜进公司的时候，乔任梁刚拍完电影《夜·店》，正处在跑全国路演的宣传期。接触多了，王甜便发现，这个外表看起来拽拽的小明星完全没有偶像包袱。“他很尊重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我们的时候习惯称呼为‘我公司的同事’，而不像其他明星要么不介绍直接忽略掉，要么就说是助理。”

那个时期，整体不景气的音乐市场并没有给乔任梁太多的机会。王甜说，作为新人，乔任梁虽然有自己的判断，但是他并不了解市场，职业生涯的发展以经纪公司规划为主，他会听公司的建议，而公司在规划的时候也会以艺人特长为主，为艺人打知名度，建立个人品牌。“乔任梁骨子里是偏向音乐的，橙天对他的规划是音乐影视双管齐下，第一步是让人记住他。毕竟橙天的资源强项在影视，而且音乐市场不太好。乔任梁也听从了公司的建议，他把这比喻为曲线救国，‘大不了我就把梦想先藏起来，但我不会放弃它’。事实上，他也确实做到了，2012年，时隔3年，他又出了专辑《Pin.K拼》，尝试了很多曲风。”

王甜是2014年离开橙天的，在此之前，她和乔任梁共事了5年，一起做活动、吃饭、过生日，她记忆中的乔任梁一直很开心的样子，“非常阳光、贴心、

善良，喝酒喝高了的时候都没有失态过”。与此同时，“乔任梁很直、不虚伪，看不过去的事情就要说出来；很要强，表现在对工作认真负责，答应了的事情就算出现特殊情况，迟到也要去”。

《夜·店》是乔任梁拍的第一部戏。前两次试镜，导演杨庆对他都很不满意，觉得他存在感太低，又不会说话。为了得到导演的信任，乔任梁在第三次试镜之前，做足了功课。他为自己的角色——便利店小哥写小传，还花了一周到便利店蹲点，观察里面的人是怎么工作的。从来没有演过戏的乔任梁硬是抓着导演聊了两三个小时，谈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最终，杨庆被乔任梁的敬业打动，让他演了男二号。

之后，乔任梁试过一年拍9部电影、2部电视剧，虽然演的大多是配角，但每个角色，他都认真琢磨。拍《查无此人》时，乔任梁要演一个有点神经质的人，为了这个角色，他减到了100斤以下，但他还是觉得不满意，就去问导演，怎样才能演出那种自己恨自己的感觉。导演就说：“你每天晚上收工以后，就对着

镜子打自己耳光啊，打5到15个。”导演当时就是说说而已，乔任梁却真的照做了，还录下来给导演看他演得对不对。所以2014年拍《死亡邮件》，乔任梁买SM道具学习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在王甜看来，乔任梁出道9年，演艺事业高开，但也不算低走。“毕竟他前期偏重音乐，后来才转向影视。2013年左右是音乐转影视的一个空当期。拍《陆贞传奇》开始小火，近一两年除了拍影视剧，还参加真人秀。如果他愿意工作，是会一直有综艺约的。2007年的‘好男儿’是品质最强的一届，十强里出来的也就井柏然和李易峰了，这两个人火也是最近一两年的事，之前也沉寂了很长时间。”王甜说，“乔任梁刚进影视圈的时候就说过，男演员不怕岁数大，越老越成熟，越成熟越有价值。他对自己的演艺规划有信心，不怕晚。”

2015年4月19日，某时尚杂志的作者半岛璞在采访乔任梁的时候曾经问过他：“有没有害怕过自己万不一红怎么办嘛？”因为在此之前，乔任梁向她



2013年9月13日，乔任梁在南京出席某活动时登台演唱

(neck 摄/东方IC)

“我从小就有一种‘我是大人，爸爸不在家，我就要担起保护妈妈的重任’的想法，所以我渐渐地变得坚强，变得独立。”

提到了曾经受到过抑郁情绪的困扰，练习瑜伽也是为了控制情绪的问题。“在从法兰克福回北京的飞机上，我还做了一套完整的瑜伽呢。”他这样对半岛璞说。半岛璞试图想解析让乔任梁抑郁的原因，至少从表面上，看看是否事业令他焦虑。

乔任梁的回答非常自在轻松：“不红我就回上海呗，我学数控的，念的是电机学院，当年就觉得自己以后会去三菱电梯或者上海大众。进了这行以后，虽然零部件方面我没再碰过，但如果要我去尝试，我觉得应该挺美妙的。”在这样的采访对话和他当时的语气中，半岛璞认为，乔任梁并不是一个对名声与地位过于急切的人。

这次采访之前，乔任梁刚从意大利拍戏回来，他还专门跑去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维罗纳跳了一回伞。“5000米的地方，缺氧、失重、自由落体，爽，真爽。”他说，不仅自己跳了，也逼着化妆师和助理都跳了。在意大利这个他认为就像是天堂的地方，乔任梁兴致勃勃完成的事还不止这些。在随后的采访中，他还提到他在米兰大教堂门口做了瑜伽，累了随时都能席地而坐弹吉他。他还进米兰的电影院看了意大利语的《速度与激情7》。他甚至还跑去圣西罗看了一场AC米兰主场的球赛。至于夜生活，乔任梁也毫无保留地告诉半岛璞，他带着经纪人、造型师去了米兰当地最红的一家夜店，“怀着考察的心态”。他微笑着说，发现米兰夜店的音乐和环境其实和国内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DJ特别帅。他站在DJ台旁拿手机一阵狂录，最后被DJ误会是同性恋，差点被人从夜店赶了出来。

“没有人会感觉这样一个对生活充满十足趣味的人会是那个抑郁症患者。”半岛璞说。

网络暴力和剧组规则

工作认真的乔任梁，生活上也很较真，所以有时候会给人不够圆滑的感觉。

在真人秀《我们相爱吧》之后，很多人都期待他

和徐璐成为真正的情侣，可是他却一次次澄清，自己绝对不会找圈内人。常被人吐槽“直男喜欢粉红色”这件事，乔任梁也没有忌讳。有一次大鹏采访他，问：“男人一般为了装深沉，都会说自己喜欢蓝色，你为什么这么直接就说自己喜欢粉红色？”乔任梁回答说：“粉红色是最桀骜不驯的颜色啊！”

王甜说，作为一个音乐人，乔任梁内心有不羁的一面，也有清醒的一面。资深“粉丝”黄小姐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乔任梁虽然爱较真，但其实是温柔敏感的暖男，细心到朋友一个很小的举动他都能看出对方情绪上的变化。“他拍戏的时候，每天都会为剧组的人买咖啡。发专辑的时候，哪怕是很久没有联系过的朋友，也会寄过去。”和乔任梁合作过的作家刘同也说，觉得乔任梁身上有种“傻实诚”的性格，喜欢做费劲的事，但人很实在。然而，与细心关照他人相对应的，是乔任梁会习惯性隐藏自己的情绪，“有事自己扛，报喜不报忧”。

乔任梁曾经自我分析说：“我是天秤座，天秤座的人优点多多，尤其具有艺术天赋，适合创造性的工作，所以我做了这份抛头露面的工作，准备将我的‘艺术’天分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天秤座的人不好的一面也很多，比如遇事爱思前想后，总喜欢给事情找到平衡点……但其实这样就说明天秤座的人遇事不够果断，也许费尽心思权衡后的结果不一定尽善尽美。但好的一点就是在每次衡量的过程中自己都能够从中吸取经验，有助进一步成长。”

乔任梁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家庭。爸爸是海员，妈妈做过很多工作，在乔任梁读小学的时候全职做了家庭主妇。因为做海员的爸爸常年在外，几乎是妈妈一个人抚养他长大，所以妈妈是他最佩服的女性。“小的时候不懂事，曾天真地以为爸爸是海员非常好，至少我家在整个弄堂里最早吃到带果肉的饮料，至少那时候国外的奶粉还是可以喝的，不论吃的用的都是进口的，让我很有优越感。直到我慢慢长大后每次都是妈妈一个人去开家长会，每次我的进步我的成长他都看不见时，我才感受到我是一个父爱缺失的小孩。”乔任梁在《私生活》中写道，“我从小就有一种‘我是大人，爸爸不在家，我就要担起保护妈妈的重任’的想法，所以我渐渐地变得坚强，变得独立。海员的家庭相比其他的普通家庭生活要优越一些，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我们家在生活上曾经遇到过些许困境，不得已跟妈妈搬过很多次家。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有一种很不踏实的感觉，但我尽量表现得很喜欢新环境的

样子，以免让妈妈担心。”

一方面希望被喜欢，一方面性格又太耿直，这里面自然会有压力。在自杀前10天的一次电话采访里，乔任梁就表示，自己性格偏内向，不太适合娱乐圈。也有致命的短板，“酒量不行”，但即使如此，还是透露自己，“元气满满，现在还在不断向上爬”。

梳理乔任梁的微博可以发现，早在2013年，已经频频出现“失眠”和“安眠药”的字眼。“演员拍戏作息不规律，也有精神压力，所以娱乐圈里，失眠是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件事。Kimi之前虽然一直说有失眠，但是情绪上变化并不明显。”黄小姐说，“粉丝”能明显感觉到乔任梁情绪有变化是在2015年。去年8月乔任梁刚去拍电视剧《定制幸福》的时候，黄小姐和一些资深“粉丝”去探班，乔任梁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不错。到了10月份生日见面会上，已经能明显感觉到乔任梁没有平时精神。“看上去很累。平时他在台上唱歌很嗨，但是那天很安静，后来是坐在地上唱完的。生日会结束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最近身体很不好，经纪公司让他回上海休息一两个月。”

黄小姐说：“从2015年5月份到10月份，同一时期交错发生了三件比较大的事情，Kimi的压力应该很大。他说不介意，过一阵子就好了。但他会看微博评论，那里面有人骂得很难听，甚至人身攻击。”

首先是《我们相爱吧》从播出以来，乔任梁不并被节目组炒作他和徐璐CP，发微博表示节目是节目，但私下不想被捆绑，引来网友一片谩骂。紧接着8月份，天津突发爆炸，乔任梁发了条微博说飞蛾扑火……结果遭到网友疯狂吐槽。乔任梁最后还是妥协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选择了道歉，随后删掉了微博，并向天津爆炸事故中牺牲的消防战士家属捐款100万元。

9月份，《定制幸福》监制杨文军在微博不点名痛批乔任梁：“再迟到一次就申请全行业封杀，严重抑郁症请回家治疗，不是你无数次挑衅剧组忍耐底线的理由。”曾在乔任梁进组后探过班的黄小姐告诉本刊记者：“从7月25日进组到10月14日，其中除了9月份乔任梁请了两天假回上海看病，81天的时间他都在剧组。进组的时候告诉没剧本，现场创作，他一直在剧组等，不知道今天几点收工，不知道第二天几点开工，也不知道今天自己要拍什么，到大半夜都不给第二天的拍摄通告，所有人只能干等，半夜3点多通知早上6点多的早工。”另一位资深“粉丝”则表示：“抗抑郁药吃下去会产生巨大的生理反应，比如严重

嗜睡、头痛、拉肚子、记忆力下降等问题。但剧组认为抑郁症是乔任梁的借口，污蔑他嗑药。超负荷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使他崩溃，即使如此，乔任梁因为觉得自己身体原因，没收最后部分的片酬作为对剧组的补偿。”

乔任梁去世后，杨文军在最近的一条微博中解释，最初签合同和试镜的时候，乔任梁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事，有说有笑，但后来就出现身体不好、迟到，拍了一部分又不好换人，而乔任梁本身也不愿意换，表示能带病坚持下去。“大家都认为这小问题可以克服，已经拍了一部分了，倘若你真的不拍了，那违约责任可能就要面临巨额赔偿了……我觉得有困难克服一下就好了，没必要，好好拍戏，还能火，能挣到片酬，多好啊。……我跟你较什么劲啊，可我一个人理解有什么用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几百号人盯着。”

10月中旬，由山影出品的电视剧《惊天岳雷》开机，乔任梁进组拍了不久就被换下，据剧组人员透露：在拍摄《惊天岳雷》期间，时任男一号的乔任梁在某天拍摄中场休息时忽然失踪，整个剧组到处找不到人。过了一会儿，有人在横店的一座城楼上看到乔任梁，他正在城楼上大喊大笑，和楼下的游客们激动地打招呼。“当时大家就想，他可能精神状况不太好。”之后，乔任梁被送往医院就诊。剧组考虑再三，乔任梁的角色最终被替换，这无疑再次给予乔任梁以重击。

经历了一系列工作不顺、舆论抨击过后，乔任梁没有选择休息，依然继续着高强度的演艺工作，这或许正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公开资料显示，从2013到2015年期间，乔任梁共拍摄电视剧电影16部，同时还参与了“我们相爱吧”等综艺节目的录制。按照影视剧拍摄时间通常比上映时间提前一年的规律来看，乔任梁在2014和2015年初拍摄了至少3部电视剧、4部电影。就在事发10天前，乔任梁接受了专访，透露自己刚刚杀青一部剧《雪女王》，近期有一个真人秀的邀请，但具体时间正在调整中，“得看看有没有时间”。他最终还是选择扛下了那份工作，另一位网友也发文作证，在拍摄该档综艺节目期间，乔任梁还同时拍摄一部电视剧。

2015年10月11日，乔任梁生日的前4天，他在微博中写下了自己的生日愿望：希望能有几天睡到自然醒，陪妈妈过生日，不准拉肚子，想唱歌，哪怕没人听。最后他写道：“最害怕自己什么都不怕的样子，终于有一天害怕睡过去就醒不过来。”



新加坡故事，城市不是孤独的存在

文 / 葛维樱

新加坡，城市还是国家？问题的答案在于，如何让居者有其屋。

很多人和我一样，到新加坡第一件事，就想学会分辨哪栋楼是组屋。下午步行在康柏谷组屋区，骄阳被高大绿树遮蔽，那些写着“叻沙”“烧味”之类招牌下的巴刹里，老人悠然用勺子吃炒饭，幼儿园孩子们在草地上跟老师读诗，“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今年初我走访新加坡做了一篇美食报道，尽管那一行

吃到许多华丽食物，组屋之下的巴刹却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喝一杯9毛钱的煎蕊，看着硕大的海鲜被做成平民的云吞和快炒，组屋是我可以感觉到的新加坡最直接的制度式甚至宪法一般的存在。当下住宅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意味复杂，越来越明显的阶级固化、身份认同、户籍制度和教育改革，无一不附加在住宅上，



左图：1965年5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考察安居工程时与当地孩子们聊天

右图：碳烤沙嗲串是新加坡组屋之下的巴刹美食，不过这样的露天烧烤现在越来越少了（摄于1963年）

在一个超级大城市里，我们似乎被戴上了能被住宅魔咒时刻收紧的头箍。压力越来越大，孤独感与日俱增。好奇的我收到了一份来自新加坡国际基金会的邀请：“你想知道更多吗？”

居者有其屋

从地点、高度、建筑外立面、窗户大小、阳台欣欣向荣的热带绿植上，确实很难分辨。“不设围墙的是组屋。”住建部公务员给我个最简单的细节。我发现新加坡步行确实不会遇到死路，也没有绝对的死角，总能看到几个围坐聊天的居民、一个通往大路的花园。在今天全世界高密度超级城市的行列里，在商业景观下重新定义这个几十年里一以贯之的公共住宅政策，依然像一个不可能却又现实的乌托邦。

作为亚洲最小的发达国家并且没有一厘农业土地，今年的世界城市峰会更集中讨论的，是每个城市自身条件下，与此对应的人的生活方式。年初为了寻

访美食，我对于新加坡的巴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号称全世界最“事儿”的政府，却让小贩们遍布全国，价廉物美之外，让大多数人住进塔型公共住宅，这不仅与美国式郊区梦相反，也是稻米文化养育稠密人口的城市典型。新加坡住建局告诉我，他们习惯了美国考察者提出关于民主和自由的批评。不过新加坡人号称是全世界最舍得花钱吃饭的国民。那么日渐增长的居住成本呢？法律规定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月收入的四分之一，更多的国民将比例控制得更低一点。

Lianne的家很有情调。厨房里小木柜上有33种欧式和清真的佐料，三室一厅一尘不染，两人座和单座沙发围合成一个小小的电视区，长长的窗户没有落地，围绕出阳台一片小区域是Linane的工作台和读书室。丈夫Ewen来自穆斯林家庭，他是不喝酒的DJ，拥有一项吉尼斯纪录和整整一屋子超过4000张黑胶唱片，这屋子不过十余平方米大小，却设计了各种明暗的唱片格。小朋友因为发烧没有去上学，但还是来跟我用中文打了招呼。同一楼住着她的发小Yoke。



(张 孙仰)

上图：新加坡政府让大多数人住进组屋（摄于1966年）

下图：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

Lianne 从衣橱里给我分享她的“宝贝”，穆斯林频繁的华丽节庆让这个华人媳妇拥有不少昂贵的礼服。她除了做幼儿园教师，还要去一些公共机构做兼职，社会工作可以换取很多日常费用的减免，新加坡普通主妇乐于参与。这是一个新加坡市民的典型家庭，房屋贷款一个月占他们收入的六分之一。90平方米的房子自从结婚他们住进来已经整整14年。

这样90平方米的“四房”（三室一厅），是新加坡目前最受欢迎的公共房屋，均价29.6万新元，约合人民币145万元。前往住建局的“摇号大厅”，巨型屏幕正在滚动播出房屋号码。大厅里人不多。“前两年申请人数减少到了最低值，这两年才略有上升。”住建局小心翼翼地调整着供需关系。除了1984年创纪录地达到十几万人申请，这几年基本都保持在3万以下，人口与住宅在可控的范围内实现匹配。90平方米是一个“新加坡式”的主流。四成国人的生活有赖于此，占人口最大比例。90平方米的申请条件也很

有代表性：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万新元、高于4300新元的家庭就符合申请条件了，新加坡的人均月收入是4622元。Yoke家也是同样户型，家里收藏了不少当代艺术品，夫妻虽然还没有孩子，但他们一直赡养着Yoke的外婆，这样赡养被政策鼓励，得到四房以外还有政府的奖励津贴。

新加坡是典型的稻米文化滋养的亚洲国家，重儒家礼仪，也深受英国殖民风气的熏陶。甚至并不是从一个农业社会结构发展成城市的，而是从一片沼泽而来。本地的朋友告诉我，新加坡的社会结构、阶级分层，就掩盖在运转良好的公屋体系之下，“潮州人把持政商两届，毕竟我们只有这么点大面积、这么多人口。”曼哈顿针尖式的金融中心建筑集群，我还去了新加坡最大的海水淡化库，总统府隔壁的公益艺术家村、文化公园式的残疾人自立局，这些地方没有醒目的外观，甚至有些地方有了年头仍在继续维护，却有看不见的价值。

“一看过去一大片平民的房子，这不是我们要的，就是要让这一切都看不出来。”为了这个效果，前任新加坡总规划师刘太格说自己花了很多心机。无论内外，道路循环，是为了“增加所有人的碰面机会”。这也是多年以来，新加坡严格按照人种比例分配住房的关键措施。74%比例的华族，马来族占13.3%，印度族占9.1%，除了宗教，住宅杜绝了民族聚居区。商品房强调私产属性，昂贵、豪华，而组屋的特点就是开放给所有人。组屋区的犯罪率最低，从1964年2月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至今，82%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组屋里。

“中国很多南方朋友来了，反而最羡慕我们的就是巴刹美食。华人出国旅游定居，最思念的一定不是酒店的菜，而是自己家附近那个吃到大的小吃摊。”刘太格对我说。华人爱吃。亚洲的弹丸之地都是美食天堂。比如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因为短时间会聚了大量外来移民，从而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美食文化。“有小贩中心，因为以前我们满街是小贩。不能给它都赶走，一边要推，一边要拉。”他是李光耀“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操盘手，一手打造了这样一个城市之国。

廉价与公共之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乌托邦构想席卷欧美。从柯布西耶的马赛公寓到普鲁维的meudon预制住宅，都

与欧美相比，新加坡的明智在于，房子是“为最穷的，但付得起房租的人”，而不是“最穷的，但付不起房租”的人建造。

旨在以低成本改善普罗大众的居住条件。从法国、荷兰、意大利到日本，大部分曾经恢弘的集体住宅，现在都陷入了钢筋混凝土的陈腐衰败之中。今天这些曾经的乌托邦却以破败压抑被市民抛弃，政府缺乏长期维护，周边配套基础设施不足，居民的素质不高。2014年《世界报》将这归结于当初的混合各个阶层构想的失败，和移民比例失调。

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计划正是始于60年代。从廉价住宅到公共住宅，是60年代末刘太格提出来的修改方案。“廉价是合理的。”刘太格说，“那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穷。一开始建设的能力有限，只能为最穷的人先建设。”

“买屋子最早我们是跟香港人学，华人都愿意把钱投在房子里。中国古话‘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么政府就来做开发商。”组屋从最初做一房式的小公寓，到后来越来越大。尽管房子只能做最廉价的，与欧美相比，刘太格说，新加坡的明智在于，房子是“为最穷的，但付得起房租的人”，而不是“最穷的，但付不起房租”的人建造。“这是英国殖民政府的熏陶。这个理念有合理性，而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公共住宅包含的是从最穷到中高收入的所有人群，贫民窟和种族村必须消失。不过李光耀只给了刘太格一句话，就是两三年之内，把所有还没拆迁的贫民区居民全部拆到公共住宅里。“没说先后，也没有任何具体的问题。”

“密度不是城市主动选择的，而恰恰因为没有选择。”世界上60%的人口居住在亚洲，土地却只占30%。刘太格是今年城市论坛的主持者之一。新加坡的“组屋”不同于我们经济适用房的样子。“邻里”也不只是一种人际关系。这些语词和对应的现实，让我好奇设计者刘太格的初衷。

“李光耀大我十四五岁，我们都吃过殖民地的苦。”刘太格一家在战乱中迁往南洋，“大人们生活在恐惧的情绪中，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带来强烈的不安。”他的父亲是南洋画派的代表人物刘抗，师从刘海粟，是

新加坡美术界的领袖。“我父亲在日本占领新加坡的大屠杀中死里逃生活下来了。”50年代刘太格考取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系。“母亲对我说那里可以半工半读，而新加坡没有像样的大学。”刘太格的母亲是满族人，出身官宦。6年后刘太格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取本校12年颁发一次的金奖奖学金，并获得耶鲁大学全额奖学金。“争一口气”的想法跟随了他一生。

刘太格在耶鲁第一年依然要挤出大量时间去餐馆打工兼吃饭，此后他得到了耶鲁规划院的额外奖学金，和前往哈佛学习的机会，但刘太格还是选择带着全部家当、一周生活费，前往纽约，任职于贝聿铭工作室。“20多岁就可以向贝老师学习”，而不是处于打分体系之下，这是刘太格的自豪。和李光耀一样，刘太格属于从新加坡最贫穷时代生长起来的人。

“我们东方人怎么一直尊重西方？虽然中国的文化艺术成就是世界水平了，但在城市方面，去了西方大城市，还是会诞生向往的感觉。”60年代刘太格接到了新加坡第一任建设部长张远横的邀请回国，担任总规划师。“欧美建筑师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了，我在美国不过是万分之一，比我能干的人很多，回新加坡却可以切实改善人的生活。”当时新加坡每四个人就有三个住在棚户区，“我能把所学用到这里，对新加坡起作用”。

他自己是一家几口人挤在小屋子里长大，从小骑自行车十几公里去上学。“当时的新加坡，是落后于仰光的，和很多英国殖民者深耕的有农业基础的国家更是无法相比。”新加坡没有农业，殖民时代里的新加坡人口稠密，卫生条件恶劣，移民不断增加，收入微薄。1936年殖民政府成立了改良信托局，存在23年只建造了3.2万个单位供人居住。60年代英国政府撤出新加坡。“160万人口，130万住在棚户区。”要拆除棚户区，兴建公屋，在新加坡政府，是“只有指令而没有步骤”，刘太格说。1960年的新加坡也是从廉价小公寓开始兴建，给最迫切的中下层居民居住，到了1968年，已经有大量三房式的组屋兴建，引起国民申请人数显著的增加。“我们是一个城市国家。60年代做规划的时候，已经懂得什么是好的规划理念。比如珊顿大道，原来是贫民窟，新加坡河北岸，破烂不堪，改成金融中心。玉廊原来担心有污染问题。而新加坡淡水靠马来供给，因此很早就扩大蓄水池。”

“传统中国城市，就相当方正。比如拿一张北京

老地图，东西向的路特别多，南北向特别少，甚至有些路不通。因为北京很偏北，多拉几条东西向的路，朝阳的面就增加了。北京的房屋南北向，有冷风吹过来，就设计曲折的路，这是很科学的。新加坡也有顾虑，我们尽量多朝南北向，是为了避免阳光。”

在长达30多年时间里，刘太格成为“居者有其屋”的操盘手，被称为“规划之父”。新加坡人对刘太格的亲近感在于他实际操作解决了生存的基本。他并不居功，他说：“最好的园丁是李光耀。”李光耀带领的整个新加坡开国政府，将“价值感”而非价值放在首位。比如建国时就设想，“怎么减少炎热的感觉？通过房屋走向设计，绿地植被和水道循环，运作几十年下来，新加坡现在的气温降低了4~6摄氏度”。同行的一位翻译说，自己30年前购买政府组屋的时候，薪水几百块，屋子也只花了1万多新元。组屋的价格一直配合国民的购买力。大兴土木解决了国民对组屋需要的激增，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政府公共项目拉动了整个经济，但同时规定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组屋，一旦购买私产组屋将被收回的。将新加坡的土地严格控制在政府规划管辖之下。“殖民政府留给我们大概30%的土地，大部分土地是政府回收和征用的。”70%的土地是新加坡国有。

尽管住建部是一个赤字单位，至今建设成本已经支出了244亿新元(1新元等于4.9元人民币)，但被《经济学家》概括为“以企业方式治理国家”的政府当然不会制造一个无底洞。“住宅不仅仅是建房，还要盖商业、工厂、学校、巴士线路。效果是，工厂和商业赚钱，拿出部分补贴廉价房。更重要的是，城市得到了全面化的开发，不只住宅，还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举个例子，园丁，就是新加坡特有的职位。新加坡有世界知名的园丁组织。那些付不起房租、房贷的人就可以有工作。这是个很高明的想法。”

从价值到价值感

我看到一份住建局的特殊补贴，是针对那些赡养老人的家庭给出的优惠房屋补贴。多代同堂在新加坡被政策鼓励，已婚子女愿意和父母比邻而居，可以优先选房，每年组屋里有三分之一提供给这些新婚夫妇。不难看出政府鼓励人口增长和以家庭为治理单元的方向。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家庭都在趋向小单元化的发展，但这个住房政策确实让新加坡的家庭“谱

系”不断扩大。接近一半的已婚子女和父母住在同一组屋区域内。“一碗汤”的距离,使经济发达的新加坡,尽管也出现了少子化和晚婚趋势,但比起香港、东京甚至北京、上海还是显得从容许多。

城市化当然不是完美的。在“城市病”席卷全世界,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乡野的时代,没有菜园子的新加坡人倒不焦躁。密度高、层数多,这样的规划和建筑对于新加坡城市的景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宜居和交通在1985年已经做到了。”刘太格提到的新加坡创纪录的速度是,一小时建好八个组屋单位,当时是1984年。增长并不是一直持续的,有些年份人数极多,比如1984年,大量4房式推向市场,引起了国人第一次以小换大的热潮。虽然经济结构在调整,但人们的购房能力跟不上私人产业价格的上涨。80年代完成了组屋数量的兴建以后,住建局已经成了亚洲最大的开发商,并贷款给居民。住建局的开支是独立核算,净赤字由政府拨款补偿,自60年代累积至今达到244亿新元。

联合国秘书长特使韩升洙说,对于人到底应该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一直以来观点都在变化。“1976年第一次联合国人居署的结论是,人应该生活在社会的基本层面,也就是在大自然里。结果这个判断不准确,到90年代又做出了修改,全世界一般人居住在都市里,却创造了80%的GDP。然而这个结论也不是万能的。人生首先是一个故事,不应该用成功与否来衡量。”

30多年过去了,城市面貌发生了最大改变的就是亚洲。新加坡有一些早期组屋区,就外观和硬件而言仅算得上经济适用,新陈代谢却一直人为进行。为了在外观上尽量柔和,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一直在进行环境保养翻新和维护。80年代末新加坡人已经有了更大的居住需求,4房、5房式的住房大量供应。住建局开始增加新镇,增加游泳池、运动场、大小公园等设备。底层空间改建托儿所、老人俱乐部等等。陈旧的老组屋区被政府不断拆迁兴建新屋,从中调节均衡社会经济结构。老组屋区有优秀的学校、博物馆和运动场,美食街区也是吸引年轻人到来的法宝。各个地点的连接也不都是公路,新加坡修建了长达150公里的环岛步道,跑步骑车的人从侧身一闪而过。“不能把老人们都放在一个社区里头,会出现活力不够的问题。”

像Liane和Yoke这样相亲相爱的好朋友又成为邻居,在新加坡并不困难。这些住宅95%处于新兴城镇,完全按照国家规划蓝图来实现。“现在全球,尤其是

亚洲城市,每个都有规划,规划这门学问其实还是在启蒙阶段,到底什么叫城市规划,里面的要素是什么,都不一定能够说清楚。比如,卫星城应该是多大、规定人数的限制、中央商务区比较理想的是多少。两条平行的快速路之间的距离是多少。这种技术问题,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这个不仅仅是国内,甚至某些先进国家都没有。”刘太格至今提起的很多导师,都曾经是美国、澳大利亚拥有规划、交通设计实践经验的大师,他们保持了一生的友谊,“都说规划师和交通设计师要打架,我的一位导师就是交通设计的专家”。在他对新加坡的早期规划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个像榜鹅卫星城这样的地方,几个“邻里”中心,综合商业、娱乐、行政和服务中心的功能,是以从家步行5分钟为标准兴建的。其实高密度不一定是坏事,如果为了节省能源,高密度更能够支持公共产品,公交的能源消耗远远比私有汽车小得多,这是一件好事。新加坡一方面已经做到,比如高密度的环境下,把环境做得优美,这种经验是有参考的价值。而且,怎样利用高密度的特殊的优势,把城市做得功能更完善,环境更优质。“公共住宅解决以后,回到那些买不起房的最穷的人,在70年代以后的新加坡,针对组屋兴建的新镇里,服务业开始兴盛,工厂、学校、商业中心容纳了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一个新镇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在本镇工作。90%的小学生在本镇就学。只有高级的商场、办公楼和文教中心,才处于市中心。”

海绵城市与第四空间

“‘地标’我是很不喜欢,这两个字是无辜的,但西洋式的地标就有问题了。”他为新加坡设计的天际线景观庄重而现代,颇有贝聿铭的风格。“巴黎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但是新加坡的起点不同。”以文化的影响来衡量一个城市的历史,只有短短50年建国史的新加坡,在艺术、文化和遗产上没有特长。“中国

老组屋区有优秀的学校、博物馆和运动场,美食街区也是吸引年轻人到来的法宝。“不能把老人们都放在一个社区里头,会出现活力不够的问题。”



左图：新加坡滨海蓄水池是全国最大，也是最具城市化的集水区，集水面积达1万公顷，相当于新加坡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
右图：丹戎巴葛摩天组屋区的一个篮球场。这里是新加坡组屋的黄金地段（摄于2015年）

早已经以文化、艺术、历史获得全世界的尊重，只需要在硬件上继续努力，而新加坡则不同。”

全球化给城市带来的深刻影响对于亚洲尤其突出。伴随快速城市化，城市经济指数级生长，城市规模快速扩容，也重塑了复杂社会里的经济网络。亚洲城市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快速增长的高速公路、新建国际学校和炫目的购物中心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向西方展示着一种“亚洲增长”。正是内城街区经历的转变，以决定性的方式重构城市驱动力、媒介、网络形态，对于新加坡这样面对多种族迁徙、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的地方来说，表现出了良好的应变能力。

“新加坡没有阶层固化问题？也有，但是穷人的孩子不至于太绝望。”刘太格说，单一规划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整合所有的资源，而不是各自买单。“有

意打破阶级和种族的界限。这就是公共住宅真正的‘手’。”在绝大多数生活场所里，巴刹、邻居、幼儿园、学校都是混合的。政府建组屋的每个地块，都严格按比例，把一房到五房综合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呢？那些孩子，即使大人改变不了工作能力，可是孩子看到有钱人的孩子怎么举止、怎么学习，他们很快就能学会，这个对于下一代技术能力提升，获取学历和找工作，都有很直接的效果。”

所谓公共空间，不仅仅是巴刹和组屋的开放。有机运转需要极其专业的技术，而文化认同则是更大的挑战。今年的世界城市峰会上，新加坡把已经进行了10年的“海绵城市”作为经验分享出来。我探访了一处新加坡最大的海水淡化处理和雨水收集蓄水池。城市内涝近几年正在成为新的环境问题，一个像海绵一



样的城市，可以吸水净化储存，需要时可以释放利用，使新加坡这样一个世界上最缺淡水的和最快速城镇化的国家，经过十来年的时间，成了“海绵城市”。从最开始的基本供水问题，到后来的水质污染、城市洪涝、淡水资源流失等问题，新加坡可谓是将有关于水的解决方案做到了极致。全岛三分之二的国土已经建成为城市集水区，其蓄水与供水量满足了全国用水需求的30%（剩余70%的水源供应分别海水淡化、新生水以及从马来西亚购买）。即使如此，计划2060年才能基本摆脱对于马来西亚的水依赖。

对于亚洲而言，城市是经济转型的中心。政府在塑造和引导城市体系的空间里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较已趋稳定的西方城市空间生产体系，亚洲在经济加速发展和转型压力下，空间体系仍在不断建

构，也不断发生问题产生经验教训。在今年世界城市峰会上，我见到了福岛的市长讲述核污染，也见到了卡塔尔的市长抱怨难民问题。对于每个城市，处于变动中的地方政治经济状况，都会发生不一样的结果。来自中国的发言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俊国说，政府不应该决定人民住在哪里。目前已经有50%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了，这也促使很多城市和郊区的地理边界在不断变动和重新划分。

“解密规划，实际上就是看有没有勇气来面对真实的问题。”从90年代开始，接受中国前副总理谷牧邀请，刘太格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了中国的城市规划。“‘城市特色就是建筑设计’，这是鬼话！”他说，“每一个城市的特色是三件事：一个是自然环境，没有两个地方是完全一样的自然环境；二、古迹的保留，比如中国的建筑，不管外国人怎么看，从广州到佛山就完全不同；三、人口密度，大城市高，到小城市就低。”他熟悉中国“城乡统筹”概念：把“镇”这个功能做完善，“乡”的人不一定要去城里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住在乡里，生活上可以去镇里满足，不至于让大城市的人口无止境地扩大。

“现在中国人去美国觉得大城市不错，但小城市你不一定看得上。但欧洲就不同，不但大城市美，小城市更美。”刘太格说，因为欧洲和中国一样，历史悠久文化昌盛。“以后去中国的人，我想兴趣点会在二、三、四线城市，因为发展得晚，很多东西还有所保留。从广州到佛山那么近的距离，建筑饮食就完全不同了。”他曾在法国工作过一段时间，每天下课就跟朋友开车去一个不同的村子吃晚餐。“从酒到芝士，很小范围里，每个村的食物都完全不同。中国也是一样的，每个小镇的菜色都有自己的做法，酒有自己的酿法。”刘太格感叹，“真正的美食和丰富性，只有古老的国家才具备。这是难以复制的、具有共性和聚合力的文化。”

以美食和生活为载体，实际上是一个更高要求的具有共同精神追求的第四空间。“像罗马、梵蒂冈那样，有广场，有纪念碑式的建筑，有一种精神自古而弥坚。这是我心目中真正伟大的城市。”近10年来新加坡修建了大量公共建筑、美术馆，举办音乐节和艺术节。“软件是文化教育。能提升全球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尊重。”新加坡近10年一直在扶持艺术，强调本土历史。“城市不是孤独的存在。城市里最重要的还是人、人性和人的生活方式。”

三个关键词影响奥迪未来

主笔 / 李三



奥迪股份公司管理董事会主席施泰德在品牌峰会上分享奥迪未来移动出行解决方案

“正如苹果能够不断打造一些像磁铁一样具有吸引力的产品，我们同样也能够做到。”这是奥迪董事会主席鲁伯特·施泰德在不久前一次被称为“时光之旅”的活动上对奥迪未来的表态。

汽车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到2025年，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去触动奥迪呢？施泰德（Rupert Stadler）提到了三个关键词：数字化、可持续和城市化。“这些对奥迪车型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乃至导致相关行业剧变。奥迪应该为正在进行的转变做好最佳的准备。”

三联生活周刊：在数字化的旅途中，奥迪将有哪些新的尝试？

施泰德：我们立志成为一家数字化汽车制造商。到2020年，奥迪所有的量产车型都可以实现在线联网进行数字化体验，这将是引领未来的一种设计，包括传感器、雷达、激光大灯等其他顶级科技，都会进一步巩固奥迪的领先地位。为了让奥迪在数字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我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点上，包括3D地图、导航等应用。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理解可持续？它和奥迪的产品战略有何关联？

施泰德：对奥迪而言，可持续非常重要，未来出行方案之一即插电式混合动力。现在我们有奥迪A3 e-tron，A6L e-tron今年就会上市，Q7 e-tron是在2017年上市。2018年，我们将推出首款纯电动SUV，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00公里。到2020年，将推出3款车型。到2025年，预计奥迪在全球销售的所有车型中每4辆就有1辆电动车。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城市化”是中国特有的命题吗？

施泰德：在中国，我觉得未来城市，尤其是一些特大型城市，他们会成为新决策的中心，决策的对象当然是交通出行。我们能做怎样的贡献？能让大家安心地呼吸新鲜的空气，以及高新技术的运用，自动泊车、自动驾驶等都是我们未来新技术的重点。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用户就会觉得开奥迪车是轻松和减压的，并且获得了额外时间。

其实早在2010年的时候，奥迪就推出了一个叫作“未来城市”的方案，非常具有前瞻性。现在来看，预言成真了。一些大城市的交通、环境等发生了什么？应该怎么解决？大城市的居民如何出行？这些，对我们面向市场推出的产品可以说有巨大的影响。我们现在也在顺应这样的潮流，推出一些适宜的产品，在包括中国、北美等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测试。另外我们要做的就是同时去优化两个“流”——信息流和交通流。我们的承诺，就是综合运用奥迪科技的亮点和优势，让奥迪客户一天内能够拥有“第25小时”。

三联生活周刊：“第25小时”在现实生活里意味着什么？

施泰德：现在有很多很棒的技术，如果没有这些，在大城市拥堵时，人们只能在车里待着，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就没有价值了。我们的科学家曾经在巴西圣保罗做过一个调研，统计数据表明，驾车人每年平均起来30天是堵在路上，他们的时间就这样浪费了，我们可不想让我们的用户也这样。所以应该有一套智能解决方案，比如自动驾驶。即使等待在途中，也应

该让用户在车里不仅舒服，而且有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奥迪的 2025 战略对未来出行有怎样的意义？

冯德睿（奥迪市场和销售董事）：具体到操作和实施上，我们的出行方案中有一项“Audi on Demand”应用。两年以来，奥迪在世界各地很多国家做过测试，不久前在中国香港做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测试。我们在香港选择了一个有 970 个住户的小区进行测试，它的车位像其他大城市那样，又少又贵，只有 500 个车位。联手小区的开发商，我们启动了“Audi at Home”，特别便捷，使用智能手机就可以预订奥迪车。

这个案例形象地说明了奥迪的未来战略。为何说它是可持续？因为它缓解了车位紧张的问题。为何说它是数字化？因为所有的预订都是通过智能手机来实现的。大城市买车、泊车越来越困难，出行成为一个瓶颈。对奥迪来说，我觉得有一点毋庸置疑，中国乃至亚洲，无疑是我们未来最大、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向公众提供怎样的交通解决方案，也因此奠定了我们向市场推出相应产品的基础。

三联生活周刊：2016 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奥迪今年的销量目标是多少？

施泰德：其实从 2014 年以来，奥迪每年在中国的销量都超过 50 万辆，并牢牢占据高档车市场 30% 的份额，继续保持着市场领先地位。对奥迪来说，中国不单是销售重点市场，也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

整个市场出现了新常态，增长不像以前那么迅猛。比如 7 月份，我们的增长达到了 6.5%，这就是一个新常态，也和我们的预测相同。我们的战略中有一个关键词是“可持续”，现在的增长应该说是一个可持续的增长。我觉得不能一味地说数字，它应该是一个平衡的、平稳的、可持续的。奥迪的合作伙伴们都跟我们有共识。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看待互联网造车？传统企业在数字化方面有哪些优势？你认为在这场竞争中，谁会获胜？

施泰德：如果我们做好准备的话，赢家当然是我们。我们不担心互联网企业竞争汽车的数字业务，我觉得只要传统企业做得好，一点都不用担心。

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一个初创企业。其实我们奥迪有很多细分的部门，比如说我们早就跟一些小型软件开发商进行了合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合作，很难相信奥迪现在能走得这么远。

2017 年，我们要推出新的奥迪 A8，自动驾驶的时速会达到 60 公里，没有别的厂商做到这一点。如果明年能做到的话，我们又将再次印证奥迪“突破科技，启迪未来”的核心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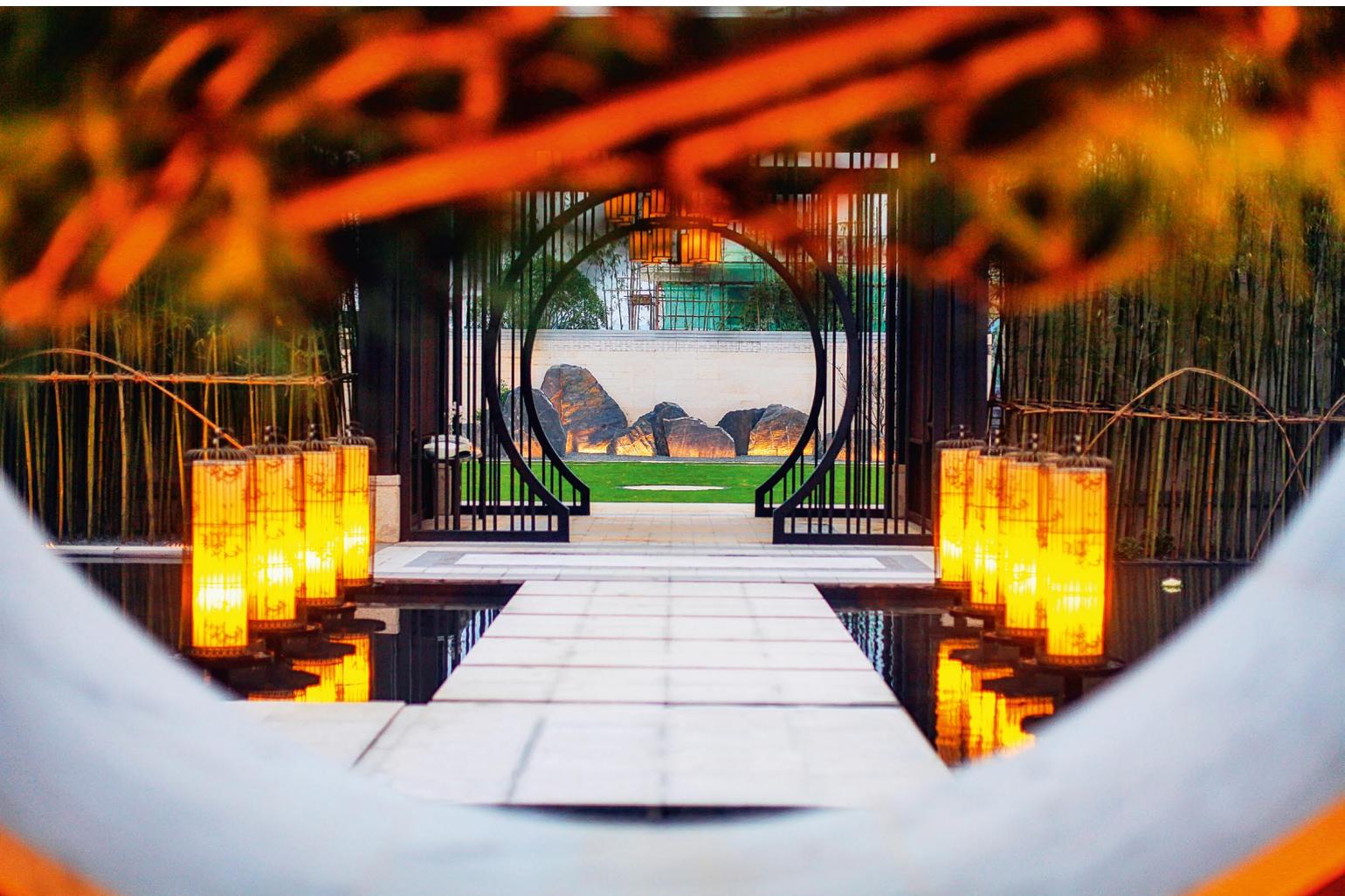
有一点我们会盯得死死的，绝不会放弃，那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既然是要合作，就要和自己的合作伙伴一起来做，而且要共同地去面对竞争，我们坚信会取得成功。我们和一汽-大众签署了一个合作备忘录，目的都是要推进我们在中国的合作，面向中国市场，面向中国用户，为他们推出更多的量身打造的产品，要继续改善我们的产品。

三联生活周刊：在对未来的评估中，奥迪对劣势和风险有怎样的认识？

施泰德：我们面临的风险可能存在于可持续化和电气化方面。有的时候，用户需要一个了解新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因为我们推出了很多产品和服务，但这个时候用户会觉得有一点担心，有的因为基础设施不够配套，还有一种可能是大家接触新的技术，还需要一些勇气。潜在的风险是，我们正在进行转变，但还需要将转变做得更快。不管怎么说，我们愿意，也将会为此做好准备，为这种迅疾的速度做好准备。

三联生活周刊：约车软件的出现，让用车更加平民化，这对奥迪个性化和高档用车的定位，是否构成影响？

施泰德：我们说的用车平台，包括 Uber、滴滴等等，毫无疑问深刻地改变了用车模式。车型不一样，质量也是千差万别，一些客人要选高端车，选好一点的品牌，为了享受更高端的服务，愿意多些花钱。有一千个理由证明了我们不能错过这样的服务机会，各种各样的网上租车服务，我们也有参与，无论设计还是各种产品，奥迪都是与时俱进的。☑



苏州雍锦园——漏窗借景

中国式居住的觉醒

文 / 程清

中国高净值人群对“家”的审美正在发生着变化，“欧陆风情”逐渐式微，中式传统的审美被推崇并贯穿至住宅产品的开发中，居住品味的兴起与流变，被解读为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回归。

中式居住审美兴起

越来越多的富含浓郁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住宅产品取得成功，泰禾院子系列、龙湖源著、绿城的桃李春风，都以中国传统文化贯穿产品，讲的是中国故事。不久前，蓝光地产在苏州的雍锦园和成都的雍锦王府

先后对外开放，这两座以中式园林为蓝本的“新中式”受到高净值阶层的追捧。

这股中式住宅风，也吹到了海外。知名豪宅开发公司 Domvs London 创始人乔恩·奥布莱恩说，过去 10 年前，中国客户的要求通常是建造欧洲风格的住宅。现在，他开始接到很多订单，客户要求建造风格是中式风格。他的公司考虑在杭州开发大型住宅项目，初步的规划已经开始考虑融入风水原理，要用中国的传统亭台楼阁来迎合市场的需求。

中国房地产指数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尽管总的来说高端买家仍然更喜欢西式风格的别墅公寓，但需求正在变化，从衣食住行至礼乐文章，一种寄情于山水

的生活愿景正在城市人心中泛起涟漪。

在过去 20 多年里，托斯卡纳、法式、西班牙式等西式风格主导着中国的居住审美。无法统计中国城市里有多少名为“东方曼哈顿”“阳光爱琴海”“剑桥名苑”“罗马花园”“香榭丽舍花园”的住宅小区。

“西化”似乎成为“文化”的代名词。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在一次聚会上与开发商开玩笑：“我觉得 20 年来中国房地产是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他们把整个欧洲，整个美国都搬到北京周围。我在北京看到一系列欧洲的地名，我的一个朋友，他搬到一个小区叫海德堡，他写文章时就写的是‘于海德堡’。我们希望像欧美人一样的生活，今天突然就在我们身边了。500 米以外就是欧洲，300 米以外就是美国。”

这种西化并非偶然，在张颐武看来，中国古代的居住文化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断档了，新的文化并没有及时有效地建立起来，于是造成了今天我们的居住文化传承性很差，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他的观察中，现代中国对住宅的审美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大宅。过去大杂院挤在一起太痛苦了，没有任何私密性，一旦条件好点，就想空间尽量放开。所以，改革开放后，房地产的第一步是满足了大。第二个阶段是“豪”，体现在风格追求上，恨不得把世界各大洲的风格全都搬过来。中国人与世界接轨，其实是向西方看齐，这是因为 100 年来中国人所有的文化想象都是在更优越、更发达的西方。

第三个阶段是“美宅”，当所有风格都试过之后，达到随心所欲又不逾矩的状态。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加和对中国传统居住文化的自信心重建，人们意识到，生活需要现代化，而情感表达却需要中国化，反映中国传统建筑的人文价值，于是以“中式”所包含的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符号重新被唤醒。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把这个称为“一个从肉体居住到精神回归的过程”。在过去的 10 年里，在房地产商品化的浪潮之中，购房者能够顾及的仅仅是肉体上的居住满足，而忽略了心灵的栖居。

“现在中国社会已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重构这个文化了。但这需要新的磨合，需要有人不停地站在文化角度提醒住宅建造者和居住者，否则居住文化重构的过程将变得更长。”周榕认为，从过去简单快捷的西式建筑风格到现在的中西合璧、洋为中用，这也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更加成熟的表现，这种既有现代建筑手段又有中国元素符号的建筑风格，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住宅领域的一种趋势和潮流。

人的需求决定了住宅产品的走向，而沉积了人文历史的建筑风格又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富康安逸。”当具有鲜明风格的建筑逐渐形成一个体系，它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最能体现城市精神与社会风貌的标志。作为一个人居群落最为直观的外在特征，建筑将文化载体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随着人与城市间关系的不断演进，住宅所拥有的“舒适”已不再指向单纯的身体需求，而更多是人们对栖身之所的心理需求。对地域的认同，对品质的追



成都雍锦王府



苏州拙政别墅外景

求，皆来自人们最为本真的对“家”的情感回归，中式空间此时便成为思维与情绪安放的场所。

“新中式”更像是“心中式”

蓝光地产决定将提供的高品质住宅产品以“新中式”的面貌展现出来，是有诸多考量的：中式传统和现代的生活方式如何融合？过去家族式的生活形成的建筑形态，如何改良以适应现在家庭式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东方居住理念能发展下去？空间审美与现代的高科技相结合如何找到平衡点？

在蓝光地产集团总建筑师郭震看来，房子给人带来的最大收益莫过于生活收益，中国人选择居所总是被强加了太多外在的、历史的东西，房子凝聚了人们的欲望、情感、审美、希望和追求。如同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教授凯文·林奇所说，“人类是最有领域感的动物，即善于利用空间来控制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会维护领域的所有权，以保证拥有其资源，从空间的控制产生心理结果，如担忧感、满足感、光荣感、屈从感”。

过去的住宅产品，西方建筑符号随处可见。在这个过程中，人迅速扔掉自己的生活习惯、文化、喜好，不去思考真正需要的居住空间是怎样，而是追求一些供别人观看、供自己炫耀的东西。

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在满足了安居乐业的最基本要求后，开始追求平和诗意的心境、田园风光的惬意，开始向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自得，开始向往逃离都市，归隐山林，出现了“逆都市主义”“新都市主义”“准都市主义”等各种“主义”。

郭震认为，人们在生活品质的追求上已经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面向未来的居住产品，一定是具备全球化审美的。因为环境因地域而有所区别，所以中式建筑更要注重风格和舒适度的统一，不断萃取西方现代化建筑对于舒适度上的考量。这种审美不仅仅是空间上，也是细节上的。所以，推出雍锦系列产品集中展示了蓝光对“新中式”的理解：现代化的精致，但却是骨子里的中国。

蓝光为其苏州雍锦园定制了“雍锦八景”，这之中有传统中式园林的硬景，如厅、壁、亭、阁、廊，以及软景涧、泉、池和桃、樱、梨、桂、梅、荷、海棠、玉兰等四季花海，松、竹、枫、柏等珍贵树种。同时，特邀苏州园林建造者传人“香山帮”，按“折、合、开”传统空间秩序，通过空廊、洞门、空窗、漏窗、透空屏风等苏州造园传统手法的应用，打造有步移景换的

小趣，又有登高望远的开阔，极目四野的舒畅，让客户的中式情怀在此落地。

完全的仿古，只是形式大于内容，并不能满足现代人的使用要求。在解决景观的功能性上，雍锦园做了许多创新尝试：增加软景资源，比如山水叠水的设计，引入瀑布般跳跃灵动的生活场景。同时，镜面水的设置增加景观互动性；为避免传统中式景观参与性不高的劣势，雍锦园开辟了更多公共空间，比如开阔的活动草坪、古筝台、瑜伽台等，以承载较大的人流量，提升功能性，让中式园林更好用。此外，还加入现代人生活场景：预留户外会客厅、老年健身器械、宠物活动区等配套设计，满足现代人更为丰富的生活方式。

环境的平和与建筑的含蓄烘托出“静”“净”相生的居住理念，使建筑序列与生活密切结合，尺度宜人，不曲折，造型简朴而精致。利用“墙”“院落空间”等中国建筑元素，通过空间、时间的对比和共性，探求一种和谐与共鸣，从而形成一种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的全新建筑环境，营造出纯粹地道的中式居住环境，又兼具现代气质。

成都的雍锦王府同样如此，黄铜、花岗岩、紫铜、汉白玉等传统型材的运用，为园林在细节处打上“中式”符号。建筑整体造型采用新中式风格，通过对传统立面要素的抽象化提炼，加入现代元素，在细节上保持了中式的语调及精致的美感，以虚实对比的设计手法体现中式建筑内敛而大气的特点，即便是公寓类型的空中别墅产品，也保留传统中式建筑屋檐、实墙等典型元素，又以现代建筑的材料和建造工艺，吸收现代居住的理念，在简洁中彰显细节，营造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谐统一。

李渔对于园林的论述认为“开窗莫妙于借景”，《园冶》中，提出“取景在借”的妙论，其借法多样：远、邻、仰、俯，各得真趣，于是出现了漏窗这一样式。在雍锦王府里我们也发现了漏窗，在内园水景的右侧，布满祥云图案的大理石透景景观墙，通过漏窗使被分隔的内景与外景空间融合，达到分而不隔的效果，使园内外的景色遥相呼应。

美学大家宗白华先生曾论：美的对象之第一步需要间隔。图画的框、雕像的石座、堂宇的栏杆台阶、剧台的帘幕、从窗眼窥青山一角、登高俯瞰黑夜幕罩的灯火街市，这些美的境界都是由各种间隔作用造成。正是这种间隔，戏剧化地生成了一种美感形式，将平常事物变得可观。

蓝光地产新中式的独到之处也就在于钢筋水泥的

包围中，它如同一本零落的线装书，优雅地插在现代城市的书架上。在郭震看来，未来中式空间是古典美学和现代审美的完美邂逅，没有刻意的渲染，也没有繁缛的修饰，一切看上去都简简单单又不失凝练气质，并回归人文价值。所以，郭震说：“蓝光的‘新中式’更像是‘心中式’，好的住宅产品应该刺破形式主义的皮囊，坦陈人的七情六欲，并继续深入，刺醒久已沉睡的灵魂。我们希望生活在这里的人，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根的情怀，是中国式的，也是世界的。”

中而新与现代雅致生活

中国人的家，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实现起来确实漫长而艰辛。这是每一个开发商在运营一个房地产项目时都要面对的问题，最终决定开发商在平地拔地而起过程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和承担起怎样的责任。是传承者、开拓者，还是复制者？突破还是融合？是摆在每一个开发商面前的现实问题。

居住需求带来的产品更迭代从未停止，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面积、绿化、容积率、配套、奢华程度等传统指标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未来人们的需求，提供什么样的居住文化，倡导怎样的生活方式，正在被产品提供者思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式居住开始觉醒。快速发展的现代生活逐渐把中国传统文化甩在人们的视野之外，那些传承着和谐雅致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居所，开始被人们渴望。

居住是个系统工程，一种好的居住应该要适应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和它们随之产生的文化。在张颐武看来，中式居住的觉醒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复兴。现在的问题是，用怎样的“新中式”去迎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说到新中式，不能不提梁思成先生。梁先生称：一等建筑“中而新”，二等建筑“西而新”，三等建筑“中而古”，四等建筑“西而古”。

成都知名画家廖新松是蓝光的业主，他更喜欢欧式风格，但仍被雍锦王府的“中而新”所打动，他欣赏能安放心灵的空间，能怀古思今，能游刃有余。住宅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主人的情怀和记忆。不论是过去达官贵人的“高树蝉声秋巷里，朱门冷静四贤壁”，还是寻常百姓的“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不管是如今藏匿于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还是处处体现了江南民居特质的“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都各自记录不同人生活的点点滴滴。

一座大宅、一方院落、一围老树，这种人文情结，是现代城市居所“空中楼阁”所完全无法比拟的。城市生活是具有吸引力的，但城市土地是稀缺的，密度较高的住宅是主流，如何在向上生长的居所中实现“中而新”？在著名设计史论家、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王受之看来，新中式住宅不再是中式元素在建筑中的简单应用，而是融合中式文化内核的产品。

回到现代，人们对院子的追求，显然是为了体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然生活，寻求一种“入则宁静，出则繁华”的生活追求。虽然当下以院子为主打的住宅产品总是会强调一定程度占地面积的“奢侈生活”，其实这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写照，催生的是人本上的真性情，是中国精英阶层对“处饰之终，饰终反素”的生活方式的向往，是对“平淡自然”“返璞归真”特征的进一步强化。

“我知道西方人的现代居住环境比东方的更科学，但是东方住宅形态和东方建筑形态中却有一种西方住宅所没有的人文的因素，它可能不是物理性第一的，但是绝对是心理性的，能够使你感动、喜悦、忧伤、悸动。”在王受之看来，将咫尺空间打造成可安放心灵的“家”就是“中而新”的突破点。在古典与现代、城市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中找到平衡点为创新的原点，提炼出赖特的有机建筑理念与中国庭院的围合哲学，让建筑生长在诗意的自然中。而这也正是蓝光地产等人居开发商正在寻找的融合点。

郭震指出，罗马人把希腊人的立柱搬来，以更科学、更精确的几何原理和人体比例关系加以改造，从而使它更秀气、更漂亮。拉美建筑师在挖掘印第安文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原理，又糅进已在南美扎根 300 余年的巴洛克风格，创造出形式多样、空间豁亮、色彩浓郁、讲究光影反差效果的建筑艺术。他们的学习或借鉴都着重在自己的创造，而且紧密结合本国、本民族的实际，把两种文化加以“嫁接”，从而产生出第三种形态的新品种。

“中国经济的发展，民族自信心的建立，必然引领中国文化的回归。”郭震说，国人的生活观，天、地、人是一个整体，人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世间，而是与天地四时、周围环境密切相关的。在这里，是隐于现代都市紧张生活的世外桃源。无论是儒释道诸家有关修身养性的哲理，还是与古琴旧棋、花鸟虫鱼共享一刻平静，又或是与三五老友大谈金石书画，怡情养性，非为生活而生活，而是为追求而生活，由物质上的享受升华为精神上的求索。“而这将是中国式居住觉醒的内涵。”

“骨子里的中国”

——专访蓝光地产集团总裁张巧龙

文 / 程清

我们现在的住宅产品大量借鉴西方的生活方式，“去西化”并非解决方式。在世界视角下实现新的中式住宅，让中国文化回归，让中国人找到理想的“家”，是蓝光地产的解决方案。继承与融合，是我们专访蓝光地产集团总裁张巧龙时，他提到最多的关键词。

问：中国高净值人群在选择居住产品上，发生了从欧陆风情到中式风格的明显变化，是什么让中式风格的居住审美兴起？

张巧龙：中国房地产发展的前30年，提供的居住产品基本都是“拿来主义”的风格。这种舶来品的居住文化，缺少深层次文化理解的支持，尤其是随着中国物质居住生活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层面的居住需求也不断增大，“拿来主义”的生命力到达了最高点。而真正决定建筑形式生命力长短的根本，是文化底蕴，是每个国家在漫长文化沉淀中所保留下来的

精华对我们造成的欣赏尺度的差异。

中国人含蓄、内敛、尚雅，中式居所追求的正是安宁静谧的氛围，追求天人合一的自然美，是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信仰和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审美尺度。这种文化理解不用你揣摩，它就在每个人的骨子里，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情结的烙印，它的生命力是持久的永恒的。不管舶来品如何华贵、如何气派都无法代替对“自己家”的向往。

问：新中式、新本土的提法并不鲜见，如何评价蓝光地产产品的新中式？

张巧龙：我们的选择是融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现代建筑技术及手段对中国文化进行表达。一方面，要符合当代人的居住要求，在居住的舒适度上给予硬性保障；另一方面，增加科技的技术含量，增加节能环保材料的使用，在更适合现代人生活方式上给予支持。我们对新的中式居住空间的理解，不是简单的中式元素的堆砌，而是汲取古人的智慧，回到东方文化的根基和精神气质的土壤里，延续中国传统家居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内涵，再使用现代的表现形式，提倡本国化、本土化的中式精致生活方式，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我们是骨子里的中国。

问：发展这类居住产品，是不是也意味着蓝光地产开始去迎合改善型居住需求并做出相应的方向调整？

张巧龙：我们的产品定位方向将以改善型产品为主。未来2~3年改善型产品要占到住宅产品系比重的70%，同时，产品设计向标准化和满足客户需求的方向发展。今年，蓝光地产针对改善型需求市场进行全新产品系塑造，目前已构建以雍锦系为主的高端改善型产品，以公园系为入门级改善型产品，构成全系改善产品线。由于市场导向与产品战略发生方向性的变化，因此蓝光地产的内部管理也进行了变革。管理是企业对自身竞争能力的塑造，如何打造、哪些需要着重强化，是我们重点思考的问题。

问：什么样的地块、城市，会选择类似雍锦系这样高端的、代表新中式风格的产品落地？

张巧龙：新中式风格只是我们提供满足现代人居住理念的产品的的方式之一，做好的产品是我们的终极目标。雍锦系的产品将更加关注智能化、个性化和舒适感，为业主提供更舒适的空间。我们为雍锦系建立



上图：苏州雍锦园入口处——香山帮匠人打造的“假山垒叠”

下图：合肥雍锦半岛匠心独具的建筑造型



蓝光地产集团总裁张巧龙

了非常细致的产品标准：在选址上要求必须在城市主流地段，周边有完善的城市配套或城市核心资源；在产品设计上以舒适度、个性化为首要考虑目标，考虑家庭三代人居住需求等。具体到城市布局上，这和今年的经营策略一脉相承：投资聚焦高价值区域。我们认为，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南昌、合肥等，是具有高投资价值的城市。从投资分配上来看，高价值区域投资额将占到80%以上。

问：高周转、规模化俨然已经成为房地产企业做大的唯一法门。似乎房地产企业的未来只有做大这一条路。对此你如何看？

张巧龙：地产行业发展到今天，市场终于要以淘汰赛的方式检验企业的诚意了。在目前的竞争中，一定的规模是需要的，甚至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没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必然会在融资能力、品牌接受度、材料采购、资源整合和占有、成本和风险控制等方面全面落于下风，让公司掌控资源的能力、城市覆盖的能力，或是实现战略意图的能力，都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当然，我们也注重公司在发展能力、盈利能力、治理结构、抗风险能力等指标上显著提升。

市场决定了企业必须选择高周转，房地产投资是中长期型投资，要求减少资金占用，少支利息，高周转同时可规避开发风险，包括政策、银行、税务、市场、材料成本等风险。房产行业是一个强调资金链的行业，唯有资金周转快，企业才可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问：高端住宅产品去实现高周转，你们实践起来有哪些经验？

张巧龙：一般来说，大家对“高周转”的认识与了解，是从项目的去化速度而来的，而去化速度很大程度上由供求关系决定。所以在目前“刚需库存高企、改善需求逐步释放”的市场环境下，刚需也不一定能“高周转”，反倒是改善型产品能“快起来”，因为市场需求是第一导向。

在改善型产品当中，我们仍会考虑产品的总价段、竞争力、内涵。因此，除了自然资源、城市资源等项目既定优势外，蓝光针对旗下改善型产品标配了智慧社区、绿色环保、生活家、金管家等服务，以提升竞争力。在产品的设计、施工工艺工法等方面，蓝光也通过合作伙伴的重新筛选确保项目品质显著提升。经过一系列调整，蓝光对“改善+高周转”战略有充分的信心。

问：未来的居住产品，核心是要把握当代人对传统居所审美，同时又能迎合当代人对居住产品的需求？

张巧龙：是的，中式风格的流行，并不意味着要杜绝外来的文化，本土化也不是简单地模仿过去。居住产品要有时代感，因为建筑是历史的，记载了所处时代意识形态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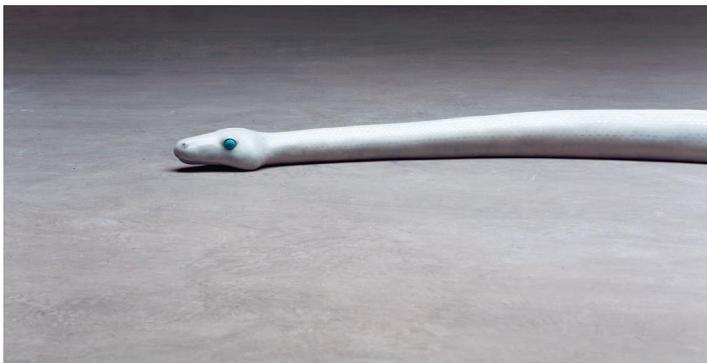
我们对居住产品的要求有一个大概的要求：要体现人们的幸福感，所以我们从居住文化入手，按照中国人当前的心理状态和价值观以及对社会的理解来造房子。世界视角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种，它帮助我们透过别人的眼睛发现自己，认清自己，继承自己。对于适应现代住宅的东西应该大力继承，对于无法适应现代发展潮流的东西应该有所革新。☑



向京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



《善待你的抑郁，它是一只忠实的大狗》



《行形》



新系列《S》

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

文 / 薛梵

“只有不属于时间的事物，才能在时间里永不消失。”

开幕式前，展厅里放着电影《皮娜》的配乐，是律动感很强的那一段，若隐若现，淹没在现场熙熙攘攘的气氛中。皮娜·鲍什（Pina Bausch）是向京非常喜爱的一位舞者，她们身上散发出某些相同的气质：执着、专注、敏感、纯粹，还有点神经质。

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算起，向京做雕塑有26年了。这次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回顾展”加“新作展”，她准备了5年，仍陷入焦虑。

向京的这种焦虑多半来自自我怀疑，如演员即将登场的紧张与亢奋。“艺术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玩意儿，你总需要一套自圆其说的东西，首先是说服自己，成立之后，才能去做一个展览。”向京不是一个文本先行的艺术家，她不爱给自己的作品套用理论，但并不排斥将创作动机分享给观者。她很努力地准备着，希望在登上舞台的那一刻，让观者同时接收到视觉化的雕塑和文本化的解读。因而，在展览之前，说服自己、在整个系列新作中“结构”出一条明晰的线索是她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结构”是向京很习惯用的一个词，在我们的几次聊天中，她反复用到这个词，来搭建自己的艺术世界。从感性到理性，从思维碎片到通顺逻辑，从雕塑作品到艺术理念，再从艺术理念回到作品本身都是她“结构”的过程。

2011年的“这个世界会好吗？”个展之后，向京开始投入新系列的创作，她想讨论的还是人性这个宏大话题。新系列叫作“S”，是策展人朱朱起的名字。“‘人性的，太人性的。’我想过用这类更直白一些的名字，也与我作品名称的一贯文法很匹配。但尼采我真心不敢用，承受不起。”向京不知该如何恰当地总结这批新作，朱朱看了之后，脱口说出“S”，向京觉得有意思，两人的直觉碰撞让她如释重负，这么暧昧模糊的一个符号稀释了她的某些焦虑。

走进民生美术馆一楼的展厅，两条巨蛇最先勾住观众的目光。一是色彩艳丽，一红一绿；二是体形硕大，曲卷而上，相互呼应。向京给绿色的蛇起名《行舍》，

意为行动的居所，寄居灵魂的躯壳。它是蓄势待发、伺机而动的，它的攻击性隐藏在缓缓前行的身体之中。另一条红色的蛇叫《行嗔》，它是行走的愤怒体，不静不止，能量毕现，躯体带着强烈的侵犯性刺激着观众。这一组以蛇为主体对象的作品一共三件，另一条白色的蛇《行形》被截成多段，蜿蜒匍匐在地面上，延伸到另一个展厅，如果只是走马观花，会很容易错过，它带着蛇特有的隐蔽性藏匿在暗处，善变又无处不在。

三条蛇代表三种状态，形状之外，“S”如一条路径，串联出向京试图结构的主题——欲望和关系。5年前在以动物和杂技为主体的作品里，她想探讨的是处境，是那种深处被动环境里的生存痛感。这一次，她把视线聚焦在更个体化的表达里。

“我特别强调在理解欲望时，尽可能去除掉伦理判断，就是在道德之外去观察人性。”向京想脱离欲望的对象，诠释欲望本身。她做了一件有关抑郁的作品，从反面去解读欲望。展厅的一角，站立的男人、伏地的女



向京

人面对着一只黑色的大狗，形成一个相互对话的三角关系，向京给这件作品起名《善待你的抑郁，它是一只忠实的大狗》。这是典型的向京式命名，一种掷地有声、有明确所指的表述。在这三个角色构成的家庭组合式关系中，大狗似乎变成了主角，它可以让人自省，也可以让人丧失自我。女子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地下，企图深入到人性内部的深井。

在“S”中，有一件群像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占据了几乎一整个展厅。这是一个有点戏谑、黑色幽默的叙事场景。S形的航线曲折破碎，水面上三三两两个人构成一组不同的关系，有彼此交流的，有相互协作的，有不甚友好的，被捆绑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微妙的关系也被放大了。隋建国在早期对向京的评论里说：“看向京的作品，哪怕是大庭广众之中，也会觉得你是在一个人在看。”孤独感是在不知不觉中钻出来的。

2002年，向京做了一件小群像作品《浅水区》，她营造出一个游泳池里的局部场景，只有4个人，戴着泳镜，观者很难通过眼神去透视内心，但每个人的身体和姿态又将各自圈在了各自封闭的世界里。向京在随笔集《细节》里谈到过这件作品：“公共场所人群众多的情形最容易遮蔽掉‘我’的存在，同时把人性暴露在面前。”她做群像，多半都有这种考量。“关系”是向京一直会探讨的问题，只是在“S”中，她想琢磨得更深一些。在做这组作品之前，朋友推荐向京读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我和你》，不同于西方传统中我与他者的对立关系，布伯强调“我”与“你”的关系，“对话”（conversation）是既保持各自特点又联系彼此的一种方式，这之间的张力也成为向京诠释“关系”的诉求。

展览之前，这些作品大多放在宋庄的工作室里，人物居多，也有动物。她每天穿梭在这些作品中，有时自己都会感慨：“我竟做了这么多！”在中国当代雕塑领域，向京无疑是高产的，这个圈子里，人人都知道向京对雕塑有多么热忱。事实上，雕塑是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需要不停地打磨、抛光、上色，有时甚至像个机器，重复着同一个动作。雕塑之外，她几乎没有生活。相对于更流行的观念艺术，雕塑简直像老古董一样，向京做的还是具象的一类，方法就更加刻板与老套了。然而，“只有不属于时间的事物，才能在时间里永不消失”。向京说。

向京做雕塑几乎不用模特，她害怕被模特的形象束缚，像是在写生一样，最后做出的东西只是一个人体，找不到灵魂。在她做的大小人体中，女性较多，“全裸”系列里忧郁、迷茫、坦诚的女性裸体甚至一度让她陷入女性主义的舆论漩涡中。她热衷于做女性人体，一是对她们的内心世界感兴趣，二是熟悉。向京可以极其

熟练地捏出各种姿态、各种面貌的女性，而对于男性人体的塑造，直到现在，她仍有些不自信。

《有限的上升》是一组有趣的人体尝试。她塑造了四个人体，三男一女，双手向上，去触碰所能达到的极限高度。每个人都很逼真，肋骨一根根暴露在皮下，却个个都是虚构的，有异于真人的头型、长到拖地的阴毛和超现实的动势。向京说：“雕塑让人深刻认识到什么是有限性。”在被各种局限性束缚的雕塑里，向京选择了可塑性最强的材料，去拓展更大的空间。一直以来，她都用玻璃钢做雕塑，因为玻璃钢没有性格，可以给它附着各种属性，相比之下，传统材料比如青铜、木头本身就会说话，甚至会代替作品本身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在这一点上，向京的控制欲很强，她的作品必须自己说话。

根据创作方法，向京把艺术家分为两类：方法论型和问题型，她将自己列入第二类。

作品《S》是一个丧失双臂的女人体，用朱朱的话说，这是一个“自戕”的形象。女人体侧面呈S状，紧闭双眼，沉浸在某种快感中。这是个无可言状的作品，所有的元素都透着不确定性，无法定义，不好解释，这也是新作与以往作品之间最大的差异。

向京很欣赏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美国最重要的摄影师之一，她自己给自己当模特，自己给自己当摄影。向京作品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与辛迪·舍曼有点像。有点反讽，有点荒谬，但相比之下，舍曼更犀利，她把种族、性别、阶级这些更庞大而尖锐的问题放在作品中，向京说：“她的作品中始终有一个隐秘的男性视线和一个隐秘的自我。”做了20多年雕塑的向京，正在将自己试图解答的问题更内化，从直白走向委婉，从单一变得复杂，把各个枝节的线索会聚到一起，或许会迸发出更多能量。

艺术之外，她依旧是一个古典主义者，用着不够智能的诺基亚手机，读诗、拍照、遛狗、聊星座。

这次大展之后，向京会休息一段时间。她说她会放下雕塑，去小村小镇走走。更早一些，她想的是“告别”雕塑，而不是“放下”雕塑。“我做了这么多年，几乎把自己完全封闭在雕塑里，除了雕塑，也许我该做点别的事了。可一旦我说告别，万一以后又忍不住想回归雕塑，那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回顾展的主标题叫“唯不安者得安宁”，出自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唯劳作者才得食，唯不安者才得安宁，唯沉沦于下层世界者才能拯救可爱的人们，唯拔出刀子者才得到以撒。”面对艺术，向京既是个不安分者，也在其中寻找安全感。■

（本文图片由向京工作室提供）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 《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有关品质》
《生命八卦》

限时 **8.5折**

典藏特惠

慢享20年的文字与时光

扫码直接购买



微信



淘宝

淘宝店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lifewee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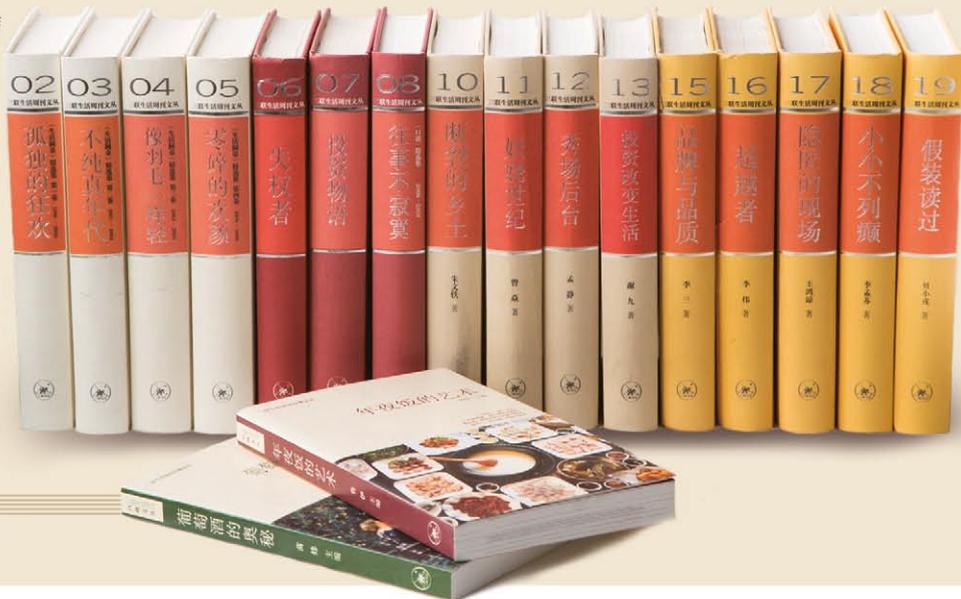
微信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进入微店

1995-2015年，
三联生活周刊20年的成长历程，
我们先后四辑出版这套精选文从，
包括经典栏目作品集及主创个人作品集。

《三联生活周刊》精选文从
与《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单本 **6.5折**

2本及以上 **4.5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年 | 孤独的狂欢 | 不纯真年代 | 像羽毛一样轻 | 零碎的欢颜 | 失权者 | 投资物语 | 往事不寂寞 | 有关品质 | 断裂的乡土 | 妖娆世纪 | 秀场后台 | 投资改变生活 | 生命八卦 | 品牌与品质 | 超越者 | 隐匿的现场 | 小小不列颠 | 假装读过 | 廿年「精装版」 | 廿年「精装版」 | 葡萄酒的奥秘 | 年夜饭的艺术 |
| 10元 | 8元 | 8元 | 8元 | 8元 | 8元 | 8元 | 8元 | 8元 | 8元 | 8元 | 8元 | 8元 | 8元 | 8元 | 8元 | 8元 | 8元 | 8元 | 78元 | 88元 | 48元 | 49元 |

如需购买整套文从产品，欢迎致电读者服务中心：010-84050451/84050425，或登录官网商城：<http://shop.lifeweek.com.cn/>



在博物馆“裸奔”

文 / 肖楚舟

是否只要宣称为“艺术品”，就有了无边界的自由？



9月初，法国吉美博物馆荒木经惟摄影展接近尾声，一位行为艺术家的出现却盖过了摄影大师作品的风头。

卢森堡籍行为艺术家黛博拉·罗贝尔蒂（Deborah De Robertis）在挂满荒木经惟摄影作品的墙壁前坐下，撩起裙摆叉开双腿，将半只西瓜放在双腿之间，直接用手挖起西瓜来。西瓜汁染红了她的袖口，血红的果肉铺了一地。很明显，她是在模仿荒木经惟一幅摄于1991年的作品：在这张被人称作“西瓜”的无题照片中，一位艺妓蹲在马路边，用手捧起瓜肉，吃一个跌碎成两半的西瓜，汁肉四溢的场面颇有荒木经惟一贯的、暴力美学式的色情风格。然而同样的场景出现在博物馆中，还是超过了日常规范的底线。几分钟后，罗贝尔蒂被博物馆保安人员带离现场。

这已经不是此女第一次在法国博物馆“裸奔”。通过罗贝尔蒂，我们也许可以对行为艺术与艺术的边界问题，对公共空间的艺术尺度做一些考量。

黛博拉·罗贝尔蒂1984年生于卢森堡，是一名摄影师、电影制作人和行为艺术家，曾在布鲁塞尔接受艺术与戏剧教育。罗贝尔蒂以执着于在博物馆身体力行地模仿有色情元素的艺术品而知名。她最初引起公众注意是在2014年5月，在法国奥赛博物馆，她穿着一件金光闪闪的亮片连衣裙坐在法国19世纪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的名作《世界的起源》前，模仿画中女子张开双腿袒露私处，并在两腿之间放置了一个摄像机记录观众的反应。在视频中，观众们先是有片刻的哗然，接着鼓起掌来。尽管大多数时候罗贝尔蒂都被博物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并很快被保安带走，但观众的掌声一直没有停。

此后她又在一系列卢森堡和布鲁塞尔美术馆进行了一些不那么公开的裸体表演，每次都随身携带一个摄像机，以记录观众的反应——在行为艺术中，参与到互动中的观众也是作品的一部分。

2016年1月，罗贝尔蒂再次因为在法国奥赛博物馆裸奔而名声大噪，她裸身裹着一件军绿色的大衣进入博物馆，在马奈1863年的名画《奥林比亚》前宽衣解带，意图与画中的妓女一样裸体横卧在观众面前，并与之前一样，不忘在头顶佩戴一个Go Pro摄像机。

保安很快发现了她的企图，命令她穿上衣服，遭到拒绝后他们报了警，此事使得罗贝尔蒂蹲了两天监狱。在接受关于这次事件的采访时，罗贝尔蒂对英国《卫报》记者说，当时有几位艺术家朋友陪同她，夹杂在观众中负责拍摄和鼓掌，“以免场面显得太尴尬”。但她发誓有许多“真正的观众”也一直在鼓掌：“大众是完全站在我这边的……我躺在那儿，和奥林比亚一样，头上箍着个摄像机，这非常幽默。但我也是在进行一次非常严肃的宣言，或者说是在提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罗贝尔蒂声称自己想要颠覆的是“艺术家与模特，或公众与模特，或权力结构与艺术世界”之间看与被看的关系，“马奈笔下的奥林比亚在被观看了一个半世纪之后，终于在上周活了过来，并拍下了观看她的观众”。她指责博物馆是“伪善的”，因为他们组织这些以裸体女性为主题的艺术展览招徕观众，却在罗贝尔蒂这样的行为艺术家进行裸体表演时“假正经”。言外之意，画里画外的裸体都是艺术，为何一个高高在上而另一个要遭到放逐？

这次在吉美博物馆的暴露行动，虽然不及之前的尺度大，但罗贝尔蒂仍然为此被保安强行请出了博物馆——即使在开放的法国，随意在公共场合裸露身体也是违法的。罗贝尔蒂在之前的访谈中就声称，对自己的牢狱生涯有所准备，并不惧怕。她的辩护律师陶菲克·布泽努恩曾为法国女性艺术家埃洛依斯·布东担任过辩护，后者因为在巴黎一间教堂袒露上半身进行抗议而被起诉，并且布泽努恩一直致力于推动法国裸露癖相关法律的变革。

在行为艺术家中，像黛博拉·罗贝尔蒂这样进行身体宣言的女性数不胜数，被逮捕或起诉的也不在少数。近年来，裸体上阵似乎已经成为行为艺术家们上头条的制胜法宝，其中尤以女性居多。瑞士女艺术家米洛·莫尔（Milo Moire）同样以裸体行为艺术出名，她曾在科隆、巴黎都有过全裸表演，今年6月她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用镜面盒子罩住全裸的臀部和胸部，邀请路人抚摸自己的身体，结果被伦敦警方逮捕。

2015年10月底，艺术家波佩·杰克逊（Poppy Jackson）在寒风中全裸坐在伦敦的一个屋顶长达4小时，在附近一位居民将她的照片发到网上以后，引起了一场网络和现实中的双重围观，她对自己表演的解释是：为了抗议媒体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和商品化，她是在赞美自己身体具有的权利。

1.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1974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进行名为《节奏0》的互动性的行为艺术表演

2. 荒木经惟摄于1991年的作品：被称作“西瓜”的无题照片

3. 马奈作于1863年的名画《奥林比亚》



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

同年4月，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艺术系学生莫妮卡·罗斯特沃尔德（Monika Rostvold）全裸坐在自己学校图书馆的台阶上长达45分钟，理由同样是“反对校园中对女性身体的物化”。

在裸体行为艺术中，女性出现的频次远远高于男性，可能是由于现代女性终于有意识且有能力，开始反抗长久以来女性被物化的现象。如此“壮烈”的反抗方式，也许是因为即使在现代性别平等的语境下，女性仍然难以逃脱自己符号化的身体枷锁，以及随之而来的性别歧视与侮辱。用身体说话，的确是最容易博得关注并引起社会讨论的方式。然而在公共空间进行这样的“创作”，到底是一种政治话语、艺术形式还是哗众取宠的方式？公众道德和法律是否应该为她们做出让步？现代语境下的艺术仍然是“美的形式”，还是一种形式上的特权？

现代行为艺术的边界问题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实际上任何时代，艺术的边界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因为艺术总是试图冲破常规、窥探未知，不时触碰到时代道德观念的底线。

罗贝尔蒂2014年模仿的那幅库尔贝的《生命的起源》，也曾经是一幅“秘密藏品”。1866年，库尔贝接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收藏家哈利勒一拜的订单，为他的“色情画”收藏绘制了这幅即使现在看来也尺度惊人的油画。后来的一个世纪中，这幅画流转在各个古董商手中，但由于它表达出来的艺术观念

太过前卫，一直都被掩藏在另一幅画之下，以私密方式传世。20世纪50年代，这幅画被拉康买下，即使在拉康家中，它也被掩盖在安德烈·马松绘制的一幅挡板画下面，被当作拉康招待宾客时的一个“秘密保留节目”。

同样遭到罗贝尔蒂“强行模仿”的《奥林比亚》，因为马奈当年以极具颠覆性和视觉冲击的方式来表现一位妓女，也曾引起一波争议。保罗·瓦莱里曾经在《马奈的胜利》一文中说：“《奥林比亚》这张画非常刺眼，她散发出一种神经质的恐怖气氛，她象征着耻辱和偶像的魅力，这是社会中的可悲现象。”

身体一直是西方绘画和雕塑艺术的重要母题。古典艺术通过运用特殊的技巧来再现身体，以赋予身体宗教式的崇高美感。但在现代艺术中，艺术与美似乎不再紧密关联，英国诗人、美学家赫伯特·里德曾这样概括艺术与美的关系：“艺术和美被认为是同一种看法，是艺术鉴赏中我们遇到的一切难点的根源……因为艺术并不必须是美的，只是我们未能经常和十分明确地去阐明这一点。无论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去考察这一问题，我们都能发现，无论是过去或现在，艺术通常是件不美的东西。”

但是否只要宣称为“艺术品”，就有了无边界的自由？毕竟即使是在被定义为“不限于经济和社会条件，任何人都有权进入”的公共空间中，个人的行为也是以他人最起码的“自在感”为限度的。裸奔艺术家们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强迫”观众观看，主动进入了他人的私人视域，即使罗贝尔蒂声称，“我并没有逼着他们看，他们完全可以离开展厅”。

裸露可以是艺术，但艺术不应被裸露绑架。南斯拉夫行为艺术之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1974年就曾经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进行互动性的行为艺术表演《节奏0》，表演形式是观众可以任意使用桌上的72种道具，对她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一名男子撕开了玛丽娜的衣服，此后她在表演中一直裸露着身体，直到有一个人用上了膛的手枪顶住了她的头部，表演才中止。阿布拉莫维奇一系列以自己身体为素材的行为艺术，都是为了寻求身心极限状态下的自我解放和某种自由度，探讨精神与肉体的关系和极限。

重要的是，阿布拉莫维奇的表演都是在得到场馆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并不以裸露为目的或者主要形式。如何运用自己的身体表达艺术观点，仍然是当代行为艺术需要思考的论题。■



色彩列传: 绿色

[法] 帕斯图罗 著 张文敬 译 定价: 67.00元

绿色是一种复杂多面的色彩,其象征意义曾是模糊暧昧的:它一方面象征生命、活力、机遇和希望,另一方面又代表着毒药、不幸、魔鬼以及一切彼岸生物。直到浪漫主义时期,绿色象征自然的意义才固定下来。如今,人们已把拯救地球的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



欧洲王室另类史

[美] 法夸尔 著 康怡 译 定价: 38.00元

从古罗马到爱德华七世统治下的英国,从凡尔赛宫豪华的房间到巴士底狱阴暗的角落,这里有最野蛮的教养、最致命的竞争、最病态的欲望、最诡异的行为,甚至有最坏的运气。这些故事让读者在忍俊不禁和唏嘘不已中惊叹——真实的历史远比虚构的艺术作品更好看。



致命药瘾: 让人沉迷的食品和药物 (新知文库65)

[美] 辛西娅·库恩等 著 林慧珍 关莹 译 定价: 4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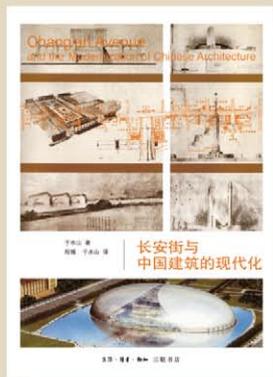
对世界上的12种“绝命毒药”进行了严谨而细致的介绍,其中不仅有毒品和药物,还有酒、咖啡、香烟、能量饮料……作者避免了极端威吓或盲目轻视的态度,理性地告诉读者在精神药物越来越多地变成日常饮食的今天,如何保护自己正确用药和远离毒品。



疫警时空

谭健猷 著 定价: 36.00元

禽流感、登革热、狂犬病、霍乱、疟疾、SARS……这些令人讨厌甚至恐惧的疾病,一直与人类如影随形。本书通过分析郑成功、亚历山大大帝、柴可夫斯基、同治皇帝、莫泊桑等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死亡病因,细细剖析流行疾病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



长安街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

于水山 著 程博 于水山 译 定价: 59.00元

在长安街的发展与北京城的改造过程中,政治显然担当了主角。但是,政府制定的文化方针又不得不通过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得以物化实现。想对北京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全面而平衡的理解,就有必要将政治议程纳入建筑的大叙事之中。



枪林弹雨中成长——华为人讲自己的故事(一)

田涛 殷志峰主编 定价: 46.00元

艰苦的物质环境,远离亲友的孤寂,疟疾、被打劫和战乱的干扰与威胁……一批批懂得敬畏、持续接力的年轻人努力开拓海外市场,成就了华为领先世界的地位,同时也磨炼了自己,留下了一段难忘的人生记忆。



伪君子塔尔丢夫：摇滚明星和上帝

文 / 驳静

德国导演塔尔海默从来不相信什么大团圆结局，所以他的《伪君子》是悲伤的。塔尔丢夫走后，留下一个洪水滔天的世界。人们受制于这个世界，犹如困兽，智识迷茫，善恶不分。

想象一个巨大的球体，中间挖出一块正方体，将它对半剖开，丢掉一半，剩下的一半横切面向外，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挖出的空间。再把这个立体空间镶嵌到一座剧场里，就有了柏林邵宾纳剧团（Schaubühne）的《伪君子》（Tartuffe）舞台。作为观众，我能看到球体直径圆周的那条线，这样一来，直观的感受就是“外圆内方”，像在做一道空间几何题。舞台内部则空荡荡的，只在中间放了一把扶手椅，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墙上再钉一块十字架，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而且，这个舞台没有可以称为门的存在，当然，演员可以进出这个舞台，但所经之路却是观众其实看不到的狭窄缝隙。这个缝隙如此狭窄，以至于演员只能侧身而入。为了让这种“挤进舞台”的入场方式显得不至于尴尬，演员还创造出若干个“壁虎爬”式的入场动作。

单一空间，单一场景，寓意着这里就是整个世界，这使得《伪君子》好像发生在显微镜下。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舞台可以旋转。一个半小时的演出过程中，舞台一共进行了4次逆时针旋转，演员们不得不随之滑落，或者攀爬于唯一可借力的扶手椅。由于它的单一空间，旋转这个动作正好完成了幕与幕之间的转换提示。

当晚演出结束时，我听到周围的观众也在讨论这个有趣的纵向旋转舞台。所以，第二天见到扮演塔尔丢夫的拉斯·艾丁格（Lars Eidinger）时，我首先跟他讨论了该舞台设计。谈到旋转时，他反过来问我：“你注意到了吗？最后一次旋转了两圈多，最终恢复原样。我觉得每次旋转都挺有深义的。而且好在，你的提问对象不是我们舞台设计。因为其实艺术家们总是尽量避免过度解释，而且重要的是观众对它的理解。

但从我的理解来看，我一开始就对这个舞台设计印象深刻，从排练的第一天开始，它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也就是说，排练期间，舞台没有再有过更改。对我而言，这个简单的舞台，充满了父权主义的意象。尤其是舞台中央的椅子，绝对是家长奥尔贡的位置，那是权利的象征。”

艾丁格还提到一个我本来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塔尔丢夫从来没有去坐过那张椅子。他说：“人们可能会以为，他侵入这个家庭内部，最终目的可能是坐上这张椅子，然而并没有，他意不在此。”

柏林邵宾纳剧团的《伪君子》就在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又充满寓意的舞台上演，单是舞台设计方面而上的创造性，就已经与莫里哀的原版喜剧给人的感觉相去甚远，但更多的改编在剧情，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塔尔丢夫的形象尽管并不一定更具有现代性，却几乎不是莫里哀笔下那个成为“伪君子”代名词的形象。

莫里哀这出《伪君子》写于1664年春天。17世纪的法国，正值太阳王路易十四治下，与此同时，教会是整个欧洲封建社会的灵魂，而“圣体会”就是其中实力雄厚的核心组织。当时，莫里哀只写了这出五幕诗体大喜剧的前三幕，路易十四听完朗读版，就决定让它在凡尔赛宫举行的游园会上演出。听到消息的圣体会，最后通过路易十四的母亲，而成功地阻挠了它的上演。

被禁演后，尽管路易十四最终撤销了这一成命，从剧情来看，莫里哀为了它最终顺利上演所做的妥协也很明显。塔尔丢夫是一个教会骗子形象，他进到当时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中，伪装成一个道貌岸然的信徒，获取了家长奥尔贡的信任，骗得财产继承权。最终的结果，是真相被揭穿后，宫廷派来的侍卫官废除了那一纸文书的法律效应，一切物归原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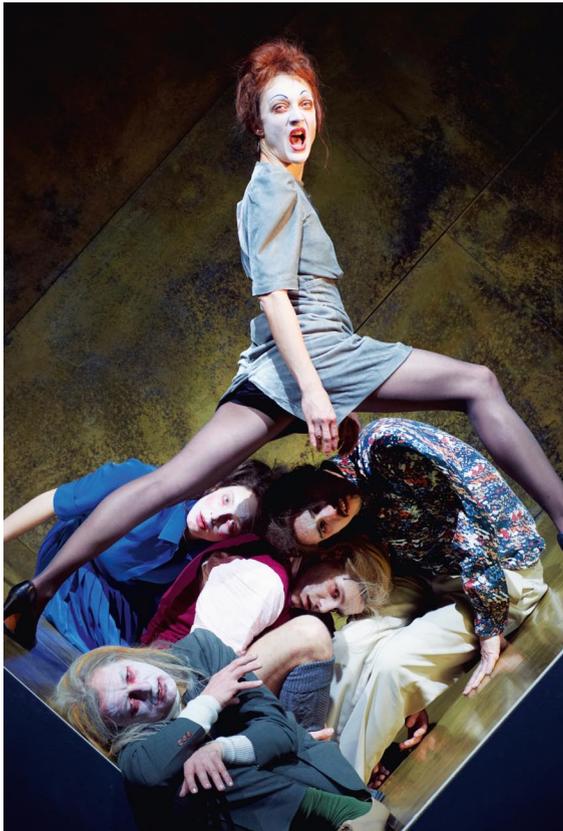
所以这个为路易十四所许可的结局，被导演塔尔海默（Michael Thalheimer）修改，最后一幕，宫廷侍卫官来到奥尔贡面前，下达驱逐的最后通牒。

整体而言，莫里哀写的是一个狡猾的骗子，为了骗取钱财而披着一身伪善的外衣。他假装自己是一个信徒，依靠谎言达到目的，但在塔尔海默的剧本里，



(Katrin Ribbe 攝 / 邵宾纳剧团供图)

1



(Katrin Ribbe 攝 / 邵宾纳剧团供图)

2



3

1、2. 柏林邵宾纳剧团演出的《伪君子》剧照
 3. 在《伪君子》中扮演塔尔丢夫的拉斯·艾丁格

他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嘴里没有谎言，取而代之的是真相，残酷的真相。但是这些残酷的真相在阿尔贡一家听来，却又完全不信。

塔尔海默曾在接受加拿大蒙特利尔一家媒体采访时，提到他所理解的莫里哀创作《伪君子》的目的，是让当时的人们对预言家保持警醒。“但我发现它却让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通常而言，塔尔丢夫从外部进入，他是一个入侵者，手段卑劣，欺骗背叛。所以我的想法是，社会本身是虚弱的，外来者进入后，是要去惩罚他们的。”

塔尔海默认为，本质上这还是一出悲剧，有点阴暗。所以他的版本，也的确没什么叫人开怀大笑的地方。

导演在对《伪君子》的改编上，更注重舞台的节奏韵律。当时剧团决定重排莫里哀的这出经典喜剧时，人们都以为一定是剧团的艺术总监托马斯·奥斯特麦耶(Thomas Ostermeier)将会是创作核心，而且，他的真实主义风格，似乎也的确更适合这类批判性题材。

艾丁格与奥斯特麦耶合作过两部戏，在这一点上也挺有发言权，他说：“奥斯特麦耶相信真实主义，他会要求我们一遍一遍排练，直到与他所认为的事实分毫无差为止”。而塔尔海默的舞台表现得更为意识流，艾丁格提到一个当初准备这出戏的细节：在最开始的将近四五周内，剧组每天只干一件事，那就是讨论剧情和台词，把他想要表达的东西灌输到演员头脑里，但是当他终于对所有的讨论结果满意后，真正在舞台上进行排练时，就让演员去发挥，并且不再更改半个字。“现在你看到的《伪君子》，同演员们首次排练发挥后的台词基本没有差别，大量的时间都花在舞台之外，排练的过程反而其实很短。而且，塔尔海默通常更喜欢积攒的情绪和能量在舞台第一次被表达的版本，他总是跟我们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感觉，记住它。”

邵宾纳剧院的建筑虽然可以追溯至20年代，但直至1962年，剧团才正式成立。在过去的50多年里，有过一些起伏。到了本世纪初，奥斯特麦耶担任艺术总监以来，邵宾纳逐渐累积了国际名声，尤其是奥斯特麦耶导演的《哈姆雷特》和《理查三世》两部作品，进行了全球巡演。

而这两部重要作品，都由艾丁格主演。他不是那种大众喜闻乐见的英俊男演员，今年刚满40岁，但在德国戏剧舞台上已浸淫多年。作为德国极有影响

力的舞台演员，近几年来，他也开始涉足电影。在此次飞来北京演出的航班上，翻找电影看，他发现自己跟法国著名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合作的《锡尔斯玛利亚》(*Clouds of Sils Maria*)竟然出现在“好莱坞热门电影”的分类里，他跟我开玩笑：“你看，我现在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好莱坞电影明星。”但是显然，相比于好莱坞，欧洲电影人更了解他。

实际上，他的确也更受阿萨亚斯这类欧洲导演喜欢，尽管戛纳电影节出身的阿萨亚斯如今更喜欢使用好莱坞一线明星，除了《锡尔斯玛利亚》，他今年刚凭借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的电影《私人采购员》(*Personal Shopper*)中，女主角依然是克里斯汀·斯图尔特(Kristen Stewart)，有趣的是，艾丁格同样参与了后者的拍摄。

不过，他自己说：“相比演员，其实我更倾向于视自己为艺术家。对我来说，表演是一种自我表达，要有情感介入。戏剧或者电影其实不太重要，甚至我也可以通过画画、摄影这些方式来完成，只不过我更中意戏剧表演而已。因为不像电影是能够被保存的，戏剧舞台就像时间本身，只存在于当下。你恋爱了，你度过了美妙的一刻，这些都是流动的，逝去了便不可追。就像生活，从不停歇。”

艾丁格说他最喜欢的角色“毫无疑问是哈姆雷特”，而且只爱莎士比亚，“如果后半生只演莎士比亚，也欣然接受”。

而且，在近一个小时的交流中，我发现艾丁格对戏剧和艺术的理解中，有许多颇有启发性的见解，我们一不小心就几乎把《伪君子》里的人物角色讨论了个遍，所以本文的对答部分比以往都要长一些，虽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艾丁格对《伪君子》和塔尔丢夫的理解，或许有一部分源自导演塔尔海默，更多地却来自他本人的生活，也许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德国视角样本。

三联生活周刊：你接触一个新角色时，你会参考前人的表演吗？

拉斯·艾丁格：不会，我反而会刻意避免这样做。我觉得借鉴别人在舞台上的表演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舞台表演本身就是一重演绎，借鉴别人的演绎，不如借鉴真实生活本身来得可靠。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为了表演塔尔丢夫，你借鉴

了什么样的生活？

拉斯·艾丁格：我想我的灵感来源，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时候我会观察大街上的流浪汉，他们有些疯疯癫癫的，失控地朝路人大喊大叫。《伪君子》一开场，就有将近10分钟的大段独白，内容引自《圣经》，而且越说越声嘶力竭，这个举动其实看着挺疯狂的。这也是许多人在观看这部戏之前，很少会想象得到的一个形象。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奥尔贡，家里的每个人都讨厌塔尔丢夫，到了最后，奥尔贡也识破了他的真面目。但奇怪的是，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试图得到他的亲吻。

拉斯·艾丁格：的确，《伪君子》里有许多画面，都有这类矛盾和悖论。亲吻某人，一方面意味着宽恕，另一方面，又意味着背叛。塔尔丢夫是一个类似摩西的角色，他所到之处，人们都会爱上他，毫无理智地，违背本性地。看不见他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恨他，可是一旦看到他，又无法抵抗。他就像是人民的中介，他们有的任何问题或欲望，塔尔丢夫都会挺身而出，去挑战权威。他也像是一面镜子，让人们反观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让我们来谈谈造型，你们每个人脸上都涂了一层白粉？

拉斯·艾丁格：白粉除了致敬莫里哀时期的表演，我觉得还有一个寓意是欺瞒，资产阶级总是自我欺骗，面对他人时也毫无真诚可言，那一层白粉就像是他们永远戴着的面具。

三联生活周刊：第三幕中，舞台旋转到菱形，塔尔丢夫坐在菱形的角上，低着头，手臂伸展，这个造型太像耶稣了。

拉斯·艾丁格：再加上他裸着上身，头发又是长的，就更像了对不对。这一幕，正是奥尔贡决定了把继承权给塔尔丢夫之后。所以所有人都在责怪塔尔丢夫，就好像他被放到十字架上，接受世人审判一样。整个画面的确就在叙述这样一个情境。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文身呢？

拉斯·艾丁格：文身这个主意是在排练过程中产生的。这是为了让塔尔丢夫看上去更狂热。文身内容全是来自《圣经》，因为你看，其实每个与《圣经》相关的段落，都有些表达狂热的意图。开始的那段十分钟的独白，唱念的也是《圣经》。也许，写满圣经的塔尔丢夫本人，就代表着圣洁的《圣经》。

三联生活周刊：但长发、文身和狂热，这些元素也会令人想到摇滚歌手。

拉斯·艾丁格：我想导演就是希望他能触发越多的联想，塔尔丢夫原本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你说的摇滚歌手其实和上帝的共同点在于，流行明星是新时代的偶像，80年代，我的房间里也贴满了他们的海报，我崇拜他们，就像有些人崇拜上帝一样。对那时的我来说，他们就是上帝，遥不可及，看上去又无懈可击。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幕戏，塔尔丢夫和埃米尔坐在台上，她正式勾引他的这一段戏，究竟有没有真正发生？

拉斯·艾丁格：这是意念中的勾引，或者说，表演上看，只是对话，而没有肢体动作。我觉得语言的力量这个时候可能比动作更有力，埃米尔的目的只是让在外偷听的奥尔贡能够发现塔尔丢夫的真面目，所以技术层面，必须使用语言上的诱惑表演。埃米尔清楚地知道塔尔丢夫的真面目，塔尔丢夫也未必不知道奥尔贡在外偷听。如果说塔尔丢夫是毁灭者，他会希望奥尔贡用这种方式得知真相，最残酷的方式。

我的理解是，它就像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小说《梦幻故事》，或者库布里克改编成的《大开眼戒》(Eyes Wide Shut)，潜意识或者意念的力量，与塔尔丢夫与埃米尔这一段情欲戏的精神内核如出一辙。对了说到这里，《大开眼戒》里，也有面具的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在这部戏里，有谁爱上过谁吗？

拉斯·艾丁格：我觉得塔尔丢夫肯定没有，他只是个媒介，他不会有所谓情感上的介入。但埃米尔——奥尔贡的妻子——是爱塔尔丢夫的。当然，她的爱，也不是个人的，而是因为，最终她理解了以前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大家长的妻子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最后一幕，塔尔丢夫离开后，她引用了一段《圣经》，她重又有了信仰，话说回来，这也是前面你说的那场“诱惑”戏的结果之一——塔尔丢夫反而成功诱惑了埃米尔，使她又爱上了上帝。

三联生活周刊：我觉得女仆桃丽娜也是个很有趣的角色，她一直是个冷静的旁观者，劝诫那对兄妹，要反抗塔尔丢夫，可是最后好像也被收服了？

拉斯·艾丁格：如果用“爱”这个字去定义的话，我觉得桃丽娜也陷于爱的情绪当中。她是最早看穿塔尔丢夫的人，最早发现他其实是摩西，是一个毁灭者。■



舞台剧《火影忍者》的主要演员

疾风之歌，次元破壁的火影忍者

记者 / 黑麦

在 1000 个火影宅的眼中，就有 1000 个漩涡鸣人。

2014 年 11 月 10 日，全世界最知名的日本漫画之一《火影忍者》在这一天落下帷幕，这一部从 1999 到 2014 年连载长达 15 年、承载了无数人回忆的漫画就这样走向了终点，B 站漫评人 LexBurner 在浅谈火影 15 年的回忆中写道：在这条纷纷扰扰的火影之路上，男主人公漩涡鸣人从“吊车尾”变成为木叶英雄，佐助从中二少年变为高二少年，在见证两人成长的同时，屏幕前的我们也逐渐长大了。与《海贼王》一并被称为“MG 番”（尽人皆知）的《火影忍者》也是国内大

动漫时代的领军作品，不少动漫家是在它出现后爱上动漫文化，在忍界大战后，望着鸣人与一护击掌后逐渐远去的背影，一代人的青春也就此逝去。

《火影忍者》讲述的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它在很短的时间内爆出久违的“查克拉”和具有影分身能力的男主角漩涡鸣人，一下子就成为漫迷的焦点，随后的第七班成立，到卡卡西决战再不斩，使火影忍者声名鹊起，而中忍考试让火影忍者的故事第一次抵达巅峰时期。很多观众仍旧记得，2007 年 2 月 15 日的那一集，修行后的鸣人带着更加成熟的自我，以疾风之名，使这部动漫成为真正的“燃剧”，一次次精彩绝伦的对决也似乎在阐释着一个残酷的现实——扭曲的万物，在毁灭后才能得以重生。在这 15 年中，

火影的故事也在成长，故事的后期少了些热血，而转入了阴暗和冰冷的英雄主义的色彩，故事的逻辑也逐渐转入有关人性的纷争，对于战争、和平、仇恨、友谊的理解和思考。然而，最终的结局是能够让人感到温馨的句号，这位金发少年用自己的忍者之路，在泪水和热血中，收获到最纯真的喜悦。

值得一提的是，《火影忍者》中的管弦乐、民族乐与重金属融合的热血式曲风。第一部的“go”，第二部中的“青鸟”曾红极一时，歌曲《英雄归来》(Hero's Come Back) 作为《火影忍者疾风传》第221集到250集的主题曲，伴随着“晓”组织的全军出击，以及长达两年的“回忆杀”和原创剧情终结，以“太子归来”式的神曲方式点燃了众多追番观众的热血之心。除了DJ Mitsu，增田俊郎与高梨康治所创作的古韵味十足的配乐，更是在全世界的动漫界刮起一阵猛烈的“木叶旋风”。增田俊郎曾是《虫师》的音乐作者，动画里那些时而如星空浩渺、时而如大河奔流、时而如溪水潺潺的音乐，为主题描绘出一个充满优美律动的世界；而高梨康治则更擅长金属式的音乐演奏，犹如他在游戏“格斗大会”上的表演，急促激烈，充满了强烈的戏剧性，音乐似乎可以创造色彩瑰丽、状貌诡谲的画面，并且重新指向人物的情感与性格，使影迷认识到，原来忍者不仅仅是像《甲贺忍法帖》中一样酷劲十足的冷门杀手，还可以是阳光开朗的搞笑少年。

2014年，当《火影忍者》在屏幕上完结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一动漫也会像木之本樱、樱木花道、犬夜叉一样只留下感动的背影而进入冰封的贤者模式，却没有想到《火影忍者》也会破壁——从二次元（动漫世界）转入三次元（现实世界），演变成为一种名为2.5次元的舞台剧。2.5次元是动漫文化的三次元理解，也是动漫文化的一种衍生舞台剧。在2000年左右，舞台剧版《网球王子》便深受好评，它的阵仗相当于流行演唱会的规模和配置，至今已随动漫原著推出三部，并拥有完全脱离了二次元源头的庞大“粉丝”。从最初的亚文化和亚产品，2.5次元正在逐渐成长成为一种主流演出形式和作为次元衔接的过渡产品，对于日本的《火影忍者》迷来说，舞台版的音乐剧、舞台剧，是一次精神补偿，作为一种异次元的延伸，它的出现势必遗漏一些原画中的情节，却也以一种浓缩和密集的方式表现，毕竟对于已经逐渐长大的番剧追随者来说，被带入现实世界的演绎或许才是这类动漫的真正结局。

《火影忍者》舞台剧也是一部音乐剧，除了延续了动漫作品中的“燃”风格，同样破壁的配乐也注入

了更多与人物情感有关的声音元素，舞台上上虚拟场景的表现手法又不用于其他音乐剧，视频、声效以及光影的舞蹈都被恰到好处地运用到浓墨重彩、刀剑遍地的情节中。当元木圣也所扮演的漩涡鸣人站在舞台中央，随着我爱罗的出场、大蛇丸的潜入、佐助的咒印、兜的闪现等情节闪回，那首经典的主题曲最终被全场观众演变成大合唱：落叶飞舞的地方，火，就会燃烧。☑（实习记者糊糊对本文亦有帮助）



“《火影忍者》是每个人的成长故事”



舞台剧《火影忍者》的导演儿玉明子

三联生活周刊：最开始怎么想到要制作像《火影忍者》这种题材的2.5次元的作品？

松田诚（奈尔可集团董事长）：日本的动漫文化有非常久的历史，漫画、动画、游戏有着非常多的“粉丝”，我们的公司在20年里创作了包括音乐剧《火影忍者》《网球王子》《死神》《黑执事》《咖啡王子1号店》《美少女战士》《全职猎人》《摇滚莫扎特》，以及舞台版《乌龙派出所》《赤壁》《七武士》，还有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动漫迷们非常熟悉的作品，我们目前专注于日本的漫画作品的改编，之后也会关注日本以外的作者和作品。在日本，2.5次元非常具有人气，观众人数、剧目数量也开始上升，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题材具有非常广大的读者基础；另一方面，2.5次元用真人出演的方式还原了动漫的故事。《火影忍者》在2014年完结，2015年的播出伴随了很多人的成长，我知道这部动漫在中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三联生活周刊：在原作漫画中有许多虚构的场面和场景，你是如何把这些视觉效果搬上舞台的？

儿玉明子（编剧、导演）：首先，我认为音乐舞台剧的魅力之一就是剧情，我们将一部700集的动漫浓缩在2个小时内需要反复推敲故事的结构，毕竟台下的不少观众对于这部剧是非常熟悉的，打动这些观众是很具有挑战性的。此外，我们还要综合演员的演技、音乐、灯光、音响、视频等要素，再结合观众个

人的想象，这个虚拟的画面才能在现实中展现出。比如我们表现演员飞起来的时候，如果借助了像蹦床那样的道具，就会让观众误以为鸣人在修炼爬树，当我们用到视频和音效这些效果时，才能更好地让观众体会到这些虚拟的特效和技巧，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火影忍者》中的虚构设定。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故事和角色在这场2.5次元的作品中是否需要忠实于原作？

儿玉明子：我认为忠实于角色是第一位的。但是其中加入演员自己的理解，或者说“活成这个角色”也是不可缺少的。就像其他类型的舞台剧的角色塑造一样，要将自己饰演的角色当成真实的自己去演绎，否则观众不会产生共鸣和感动。在排练和准备过程中，我重新投入《火影忍者》这部作品，再次感受到这真的是一部非常精彩的漫画作品。2.5次元并不是肤浅地将“二次元复制到三次元”，所以需要打破一些“传统”不仅是演出创意，我在平时的生活中也会有所留意，因为我们常常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被“常识”“思维惯性”所束缚，我常常思考遇到的瓶颈以及障碍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如果一开始就认定“这不可能在舞台上表现出来”那就真的什么也做不出来，什么也开始不了了。

三联生活周刊：与去年的公演相比，这次公演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儿玉明子：不仅是我，只要参与过去年演出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一样，我们都体会到了将原作漫画《火影忍者》搬上舞台的压力。现在我们慢慢从这种压力中解放出来，重新冷静、客观地把它当作舞台剧来看待，在整体，甚至于细节都有了升级。虽然是一些小的修正，但累积起来就是这次公演最大的变化。

松田诚：全新创作的音乐是最大的不同了，可以说音乐的不同赋予了此次再演作品的全新感受。其次是在公演的城市，我们对整个舞台效果也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中国观众的反应与日本观众完全不同，不同的观众群体所关注的点有所不同，这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入的演员，尤其是扮演鸣人的圣也君，他特别擅长腾空和翻转动作，对身体把控得非常好。这次在中国的公演会去很多城市，有

非常多的新挑战等待着我们。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元木圣也，你怎么看《火影忍者》这部动漫？

元木圣也（漩涡鸣人的扮演者）：我认为《火影忍者》是能够代表日本，并且被世界人民喜爱的漫画作品。相信在中国也有许多人喜欢。我从非常小的时候就在看《火影忍者》，不只是漫画，动画我也看，游戏我也玩过。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扮演的角色和你本人的共同点和不同点都是什么？

元木圣也：开朗、直率、顽皮，我有很多和鸣人相似的地方，也经常有朋友说我和鸣人一模一样（笑）。不同的是鸣人童年的孤独吧。

樱井圭登（宇智波佐助的扮演者）：我认为宇智波佐助是一个孤独、痛苦的角色，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点佐助和我完全一样。但是，我平时并没有佐助那么酷（笑）。

伊藤优衣（春野樱的扮演者）：我理解的小樱天真烂漫、率直，一直到最后都相信着所爱的人，并且追随着他。我认为这是非常有魅力的，我很尊敬小樱为爱而生的执着，但可能我并不会这样。我们的共同

点是喜欢吃梅干，为了在公演中更靠近小樱，我尽量每天都吃。

元木圣也：我对身体表演很有自信，我擅长运动、跑酷、平地翻空与各种极限特技，朋友们觉得我和鸣人一样开朗。我认为鸣人的魅力在于，他直率地贯彻自己所坚定的事情并且为之努力，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喜欢鸣人的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认为《火影忍者》这部音乐舞台剧的魅力在哪里？

元木圣也：要说不同的话，一定是现场表演给观众的震撼，影视作品传达不出来的舞台特有的临场氛围，观众的参与感也是电视、电影无法做到的。

樱井圭登：每次公演都会在一些细节上有些许不同，这点是舞台剧区别于其他媒介、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每次演出我都能体会到观众不同的现场气氛，我们这些演员每天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也不同。

伊藤优衣：舞台剧不像电视剧或电影那样有固定机位、固定视角，所以每个人都能从不同的视角自由地观剧。每次演出我都在用眼睛、身体，尽情地享受舞台，感受火影世界与现实生活的相似与不同。■

（本文图片由 KM, S/S/LSN2016 提供）

《读书》2016年第十期目录

刘 统 长征：历尽艰辛的求生之路（下）

刘 禾等 走出文明的金字塔

短长书

宋代衍圣公的历史命运（孔勇）·台静农的文章与酒（朱航满）·卫视节目版权引进面临拐点？（王润珏）·机器人：法律行业的终结者还是开路者？（张宸宸）

李大兴 关于《浮想录》的浮想

朱鸿林 一道德，同风俗

陈胜前 溯源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

周林 陈博梅 立法不光是个技术活

陆跃祥 唐洋军 十年后，重读弗里德曼

康子兴 革命时代的亚当·斯密

张宝明 重申启蒙：再说新文化运动的名实

袁一丹 “黑暗河谷”上造塔

张铁荣 鲁迅致徐懋庸公开信的前前后后

品书录

我与《杜伊诺哀歌》（刘皓明）·老去的是时光（王以欣）·暴力的情境逻辑（陶郁）

张承志 轻轻地触碰（一）

孙 歌 寻找亚洲原理

韩东育 东亚的表达

钱永祥 韦伯：“大国崛起”的思家

朱 浒 历史真实与异域想象

读书献疑

《吾妻镜补》对《吾妻镜》的误解（王玉玲）



《读书》
生活需要读书，
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防护林真的有用吗？

文 / 袁越

撒哈拉沙漠是全世界面积最大的沙漠，其南端位于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境内。这些国家的居民每天都要和黄沙做斗争，日子过得相当艰苦。事实上，撒哈拉沙漠南部地区是非洲最穷的地方，伊斯兰极端势力之所以选择这块地方作为基地，原因就在这里。

为了阻止撒哈拉沙漠对农田的侵蚀，上述这 11 个非洲国家决定联合起来，在撒哈拉沙漠的南端建造一条防护林带。其中相对较为富裕的塞内加尔早在去年就开始了试点，据说已经种植了超过 1200 万棵树，绝大部分是当地特有的金合欢。

这个植树造林项目最终被命名为“绿色长城”(Great Green Wall)，其灵感显然来自中国的万里长城。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已经得到了非盟、欧盟、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的大力支持，最终目标是在撒哈拉沙漠的南端建造一条长 8000 公里、宽 15 公里的绿化带，把非洲最西端的塞内加尔和最东端的埃塞俄比亚连接起来。

曾经有人说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从人造地球卫星上所能看到的地球上唯一的人造物，这个说法完全是臆想出来的，没有根据。但这个绿色长城一旦建成后，从卫星上将很容易看到它，因为这条绿化带的背景是黄色的撒哈拉沙漠，两者的颜色对比太明显了。

经过计算，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一共需要种植 1000 亿棵树，种植和养护的成本加起来将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据说该计划已经募集到了 40 亿美元的资金，



但最终所需资金总额肯定要高于这个数字，具体高多少谁也说不清。

如果这条防护林带真的能像支持者保证的那样，能够防风固沙、保护水源地、为牲畜提供避风所，最终阻止撒哈拉沙漠的南移，这笔钱也算花得值了。但不少生态专家认为，问题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资料显示，撒哈拉沙漠本来就是一个随着气候变化而不断进退的沙漠，上世纪 70 ~ 80 年代降水量下降，沙漠最南端确实曾经南移，但 90 年代该地区降水量回升，本来南移的撒哈拉沙漠便又退了回去。这一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关系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尤其是牧民的游牧行为，甚至反而会对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有好处，因为牲畜的存在往往会促进牧草的生长。

当然，局部地区的土壤退化现象还是存在的，但一家名为“湿地国际”(Wetlands International)的非政府环保组织的负责人简·玛德维克(Jane Madgwick)认为，问题不是出在牧民过度放牧上，而是水资源没有合理地利用。她举例说，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端的乍得湖总面积已经比几十年前下降了 90%，但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不是过度放牧，而是上游河水被大坝拦截，河水被用于农田灌溉。事实上，为了让绿色长城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很可能将不得不从其他地方引水过来，或者开采地下水。这两种做法都相当于转嫁矛盾，要么让其他本来不缺水的地方变得缺水，要么导致地下水位大幅下降，都不见得是好事情。

但是，绿色长城计划最值得讨论的问题不是人工林带能否控制沙漠对农田的侵蚀，而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沙漠本身。不知从何时开始，沙漠变成了生态系统崩溃的代名词，全世界绝大多数环保组织都把沙漠视为敌人，一看到沙漠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加以“治理”。其实沙漠并不可怕，它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沙漠并不是一毛不拔之地，沙漠中生活着很多只有沙漠才有的动植物，其中不少种类都属于濒危物种，应该加以保护才对。如果把沙漠改造成森林，反而会破坏沙漠动植物的栖息地，减少生物多样性。

另外，传统牧民在沙漠中生活了很多年，也已经学会了如何和沙漠相处，他们更不是沙漠的敌人。

也许我们应该转变观念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人工防护林都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需要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加以验证。☑

九大公学也有“对口学校”？英国小学首次来华招生

一场“小别离”引爆了全民对于低龄留学热的思考，关于其利弊的讨论层出不穷。然而，急剧上升的低龄留学热，将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家长面前：出国读中学的人多了，竞争力随之水涨船高，要进入优质中学也越来越难。

以英国著名的九大公学为例，每年的新生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某些特定的小学，也就是所谓的“对口学校”，如果在这些学校读书的话，能考进九大公学的概率会比一般人高上许多。今年的10月26日、28日、30日，精英寄宿学校联盟招生峰会首届小学专场将于深圳、上海、北京逐场展开，九大公学和其他知名英国中学的“对口学校”，将首次来华招生，对于想要赴英留学的孩子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时机。

何时是入读英国小学的恰当时机？

英国预备小学是1年级到8年级，其中1~2年级是属于学龄前，只向英国本土学生开放，是非寄宿制学校，学生年龄为5~7周岁。从3年级到8年级则是向国际学生开放的寄宿制学校，学生年龄约为7~13周岁。8年级结束后进入中学的第一年，不过女生可以在完成6年级或8年级课程后直接进入寄宿制中学。

每年的9月、1月和4月是英国小学的入学点，也就是说，学生在每个学期的开始都可以入学。6年级之前的位置是比较多的，而8年级基本不招生。

面试直招：九大公学的“对口学校”

在本次峰会上，来华面试直招的英国小学共有四所，其中阿尔德罗预备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进入了九大公学中的切特豪斯公学、汤布里奇公学，以及极为著名的惠灵顿公学；比尔顿农庄预备学校40%的学生进入了九大公学之一的拉格比公学，其他学生也有许多进入了伊顿公学、哈罗公学和阿宾汉姆中学；米尔菲尔德预备学校，顾名思义就是米尔菲尔德中学的预备学校，93%的学生都进入了这所为英国在里约奥运会上夺得4块奖牌的体育强校；而布兰伯特预备学校是“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母校，有不少毕业生入读了汤布里奇公学、博耐顿女校等优质中学并获取了奖学金。

这次招生峰会为学生大开方便之门。一般而言，要入读英国小学，必须经过信息注册、申请材料准备、校方面试、通过统考这四个阶段，但是在本次峰会上，通过初试的学生可以直接跳到面试步骤，省却了之前繁琐的准备，招生官甚至会为特别优秀的学生发放有条件录取通知书。

教育论坛：海外私立小学与国内有何区别？

为什么在小学阶段就选择留学？英国小学的教学目的和中国小学一样吗？中国的家长会舍得这么早就让孩子出国吗？除招生官的一对一面试直招外，还将同时举办低龄



留学教育论坛。四所学校的招生官，以及学生家长嘉宾将就家长和孩子最关心的问题探讨，四位招生官也将从不同的角度介绍海外私立小学的特色。

著名国际教育专家艾玛·范伯根曾经参观过阿尔德罗预备学校，在那里，阅读是一件乐事。一个孩子挥舞着手臂向范伯根展示了一个徽章，上面有个戴眼镜的小猫头鹰立在一本书上。只要学生当年达到一定的阅读量，就能得到这个象征着荣誉的徽章。可以看出，在这所学校里阅读不但会得到奖励，而且还被小孩子们认为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而在比尔顿农庄预备学校的木工课上，孩子们面对锯子、钉子等工具毫无畏惧，反而能正确利用它们做出一件件充满童趣的作品。

海外私立小学并不仅仅为学生成功入读优质中学打下基础，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发掘孩子在体育、音乐、戏剧方面的天赋，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培养孩子的领导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将孩子打磨成熠熠生辉的模样。

无论是已经决定入读英国小学，抑或还没拿定主意，想要了解英国教育体系，这场教育论坛都能让你满载而归。预约教育峰会活动或预约招生官面试，可以电话咨询400-850-4118，登录必益教育官方网站www.behk.org，或关注必益教育官方微信（BEeducation）。



跪下，为了可以屹立不倒

文 / 张斌



9月12日，旧金山49人队四分卫卡佩尼克（前）与安全卫埃里克·里德在对阵洛杉矶公羊队比赛中于国歌奏响时单膝跪地，表达对种族不平等的抗争

老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接连发生的白人警察射杀有色人种事件，把种族撕裂的痛感传导给了每一个美国人。今夏，ESPY颁奖盛典，史无前例地将开场表达交给了勒布朗、韦德、保罗和安东尼四位NBA巨星，美籍非裔人士为尊严和生命的抗争通过一字一句的郑重表达，声声入耳。

冲突没有停止，枪声还在响起，大选前戏的鼓噪更让种族对立的情绪不断升温。9月1日，NFL季前赛，旧金山49人队四分卫科林·卡佩尼克在赛前国歌奏响时，身着比赛服，单膝触地，以此方式来表达对于种族不平等的抗争。此前，两场比赛，卡佩尼克已显端倪，他身着便装在场边，当国歌奏响时，并不起身，而是安坐在球员席上。

8天后，费城伍德罗·威尔逊高中橄榄球队聚集在训练场上，教练布朗面对球员们宣布，他将声援卡佩尼克的抗议行为，将在高中联赛赛季的首场比赛中，聆听国歌时单膝跪地，他不要求队员们都跟随他，请自愿选择立场。结果，全队仅有两名球员在第二天奏响国歌时选择了站立。这所高中所在社区中52%的孩子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高等教育率不过9%，孩子们的选择也就再自然不过。

从职业联赛到高中比赛，再到国家队海外比赛，卡佩尼克的一跪激起了巨大反响，无声的抗议引发了

全社会的情绪和观点的进一步碰撞。“9·11事件”15周年当天，多名NFL球员在球场内伴着国歌跪求平等的场景再次触动人心。15日，美国女足与泰国队交锋，队中公开同性恋取向的拉皮诺耶毅然单膝及地。在接受采访时，这位国脚为自己辩护说：“我是慎重考虑的，我知道看着国旗时，心里知道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利。”

从“二战”开始，美国体育竞赛场景中逐渐形成了赛前升旗奏国歌的传统，凝聚人心，共赴国难是最初的意图，职业联赛则长久以来凭此将爱国作为品牌塑造的重要元素。因此，你可以想见，那一次次单膝及地会引得怎样的纷争。卡佩尼克旋即接到死亡威胁，社交媒体上的留言也是赞誉与诋毁交织在一起，这位合同身价达到1.14亿美元的NFL球星从容应答：“如果我真的被杀了，那无疑在说明，我的跪下是多么的必要。”

在数百万电视观众瞩目下的一跪是再好不过的政治议题，有的议员斥责卡佩尼克“贬低爱国主义”，行为意在“同情IS”。加州地区警方威胁不再为49人队提供安全保障。NFL联盟一位高官直接将卡佩尼克描绘为“叛徒”。特朗普冷冷地说了一句——“他选择另外一个国家作为祖国。”

争论的焦点最终集中在对于国旗和国歌是否应该始终保持绝对忠诚？选择公众娱乐的比赛场景做出政治化的表达是否恰当？支持一方认定，越来越多的职业体育明星不愿面对社会现实装聋作哑，他们步先辈后尘，努力成为“球员—社会活动家”，以往经纪人都会规劝球星们尽可能规避社会纷争，以免影响自身的商业价值，如今有了群体性的勇敢行为，表明着社会的艰难进步。而在国歌声中，做出极端行为，只是想告诉公众，国旗和国歌所彰显的平等承诺时至今日仍然未曾真正实现，弱势群体遭受着死亡的威胁。选择在比赛场景做出姿态就是为了造成更为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与1968年奥运会领奖台上，黑人选手在国歌奏响中低垂头颅手臂高扬的精神完全一致。

纷争还会继续，个体和机构都要站出来以各种方式表达立场，也还会有运动员继续单膝及地，触及公众心灵。关键在于抗议行为如何才能最终促动种族平等的达成，这个过程依旧漫长，但我们至少可以相信，有自由可以勇敢表达的社会总不至于太坏的。☑

用中国制造推动“亚太再平衡”？

文 / 宋晓军

9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中文版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悲剧前景》的专栏文章。其大意是:奥巴马政府不仅难以阻止中国在南海“造岛”宣誓主权,而且其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越来越受到怀疑。看了这篇文章,让我想到前几天围绕着《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的讨论。

9月15日,《华盛顿邮报》记者罗因(Josh Rogin)发表了题为《为什么最大的海军船厂要找中国分包商?》的文章。文章大意是:美海军舰艇最大制造商英格尔斯造船厂采购人员在船厂所在的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参议员、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科克兰(Thad Cochran)的举荐下,已经前往中国求购用于大型军舰修、造的浮船坞。罗因采访的一些安全专家对此表示:中国企业为美国海军的制造商提供浮船坞存在着实际的安全风险,因为所有中国大型企业都与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而罗因本人在文章的结尾处则写道:美国国内工业在21世纪居然不能支持自己的造船业,这真是一大耻辱。美国国防供应商在走出去与“美国海军最大的对手”做生意时,最好多想两遍。对此,第二天美国《防务在线》副主编弗里德伯格(Dney J. Freedberg)则在网站上撰文称,美国造船厂在建造海军舰艇时使用了中国设备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闻。他

还引述一位业内人士的话说: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我看不出从他们那儿买艘浮船坞和从他们手里买电视机有任何区别。严格说,浮船坞又不涉及什么敏感技术,它仅是在物理上起到支撑船体的作用,并没有与电子系统的连接。

值得注意的是,弗里德伯格还列举了为美国海军修、造舰艇的另一家大型船厂——位于西海岸、隶属于英国BEA系统公司的圣地亚哥船厂在2014年就斥资5000万美元从中国采购了一座大型浮船坞,为美国海军舰艇提供舰艇修、造服务。有意思的是,沿着这条线索,可以查到《圣地亚哥论坛报》记者罗宾斯(Gary Robbins)在2015年3月26日发表的一篇题为《BEA增添500个造船就业岗位》的报道。该报道称,BEA系统公司为了承接在西海岸不断增加的业务,已斥资1亿美元从中国引进一座长950英尺(约290米)、宽205英尺(约63米)、设计起吊能力达5.5万吨的浮船坞,并计划为这座目前美国最大的浮船坞修建配套设施。该浮船坞预计2016年底可以运抵船厂,2017年可以正式投入运营,届时这个大型浮船坞就可以为美海军维护两栖攻击舰等大型舰艇。值得注意的是,罗宾斯在文中还特意引用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专家乌尔海默(Eric Wertheim)的话说,圣地亚哥船厂作为西海岸美国海军最大的船厂,在美军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亚太地区面临着“反介入/区域拒止”和援助盟友受阻的敌对行动挑战。

话说到这里,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位于东南海岸、面对大西洋的美国海军最大的造船厂要采购中国制造的浮船坞,却遭到了美国安全专家反对;而位于西海岸、面对太平洋的另一家海军造大型船厂为了节省成本、拉动当地就业,却接连采购中国制造的浮船坞以支持美军实施主要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反差现象,也许恰恰从一个侧面为《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的观点提供了一些佐证。尽管浮船坞属于劳动密集型没有什么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产品,但是用中国制造推动遏制中国发展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奥巴马政府而言确实有些“纠结”。



(新华社陈杰摄/视觉中国)

2013年5月16日,我国第一艘自航式浮船坞“华船一号”首航

肯尼斯·克拉克与《文明》

主笔 / 薛巍

詹姆斯·斯托顿在《克拉克传》中说，克拉克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人：一位喜欢行动的作家，一位成了艺术普及者的学者，一位住在城堡里的社会主义者，一个鄙视体制的委员会成员，一个傲慢的自我反对者。



詹姆斯·斯托顿与他的著作《克拉克传》

《文明》让一些人放弃了自杀念头

20世纪60年代，60多岁的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跟BBC的拍摄人员一起，用了3年时间，走了8万英里（约13万公里）、访问了11个国家，拍摄了130处地方，花费了13万英镑并且提炼了克拉克毕生的阅读和思考，制作了艺术史纪录片《文明》。有人说，这部纪录片本身就是对文明的一大贡献。节目播出后，克拉克每天收到70封观众来信，有人在信中说，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他们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詹姆斯·斯托顿在《克拉克传》中说：“克拉克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人：一位喜欢行动的作家，一位成了艺术普及者的学者，一位住在城堡里的社会主义者，一个鄙视体制的委员会成员，一个傲慢的自我反对者，一个不喜欢对立的无情的人，他非常成功

却认为自己失败了。”

1934年3月25日中午，乔治五世国王和玛丽女王走进伦敦国家画廊。这是在位的君主首次前往这一画廊。表面上前去的理由是观看画廊收藏的绘画，但真正的目的是会见新任馆长、30岁的肯尼斯·克拉克。之前69岁的国王亲自说服克拉克接受这份工作。他问克拉克：“你为什么不愿意为我工作？”克拉克说：“因为我没时间做好这份工作。”国王有点生气地说：“都要干些什么？”“哦，要照看那些绘画。”“那些画没什么问题。”“还有人写信询问关于画的信息。”“不要回复。我希望你接受这份工作。”乔治五世从未如此努力过，比如他从未去过唐宁街。是什么使他对克拉克如此热心呢？智力、魅力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只他有这些。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艺术的专注和完全的沉浸。他把这种沉浸跟他不同寻常的分析能力结合在一起，以一种融合了思想和感受的灵活的文风加以表述。他很早就发现了他对美的感受力：“从我能记事起，也就是说从大约7岁起，词语、声音或形式的某些组合就给了我特别的愉悦……我从未怀疑过我的判断力会出错。没有它我就只会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羞怯的花花公子。”

对克拉克影响最大的人是约翰·拉斯金和伯纳德·贝伦森。克拉克解释说，《文明》的基础是拉斯金的一句名言：“伟大的国家用三部曲稿来书写它们的历史，一部写它们的事迹，一部写它们的言语，一部写它们的艺术。每一部都要阅读其他两部才能被读懂，但三部之中唯一值得信赖的是最后一部。”克拉克接着说，他相信拉斯金的话是对的：“如果我必须说哪个讲出了关于一个社会的真相，是住房部部长的演说，还是在他那个时代建造的真实的建筑，我相信是建筑。”因为绘画和文学主要依赖于个人，而建筑是群体艺术。他的许多兴趣都是在拉斯金的影响下形成的：哥特复兴、画家透纳、社会主义、艺术评论可以成为文学的分支的信念。最重要的是，拉斯金告诉他，艺术和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他在他自传的第二卷《另一半》中回忆说，战后有一次他在巴黎遇到毕加索，他拿出一本关于亨利·摩

尔的书给毕加索看，之后毕加索一直坐在那里，像一只抓着它打不开的罐头的老猴子那样，一直在那里翻看。

在《文明》中，克拉克喜欢做出一些惊人的概括，如“艺术上伟大的运动，就像革命一样，不会持续15年以上”。法国的沙特尔大教堂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被覆盖的空间之一”（另一个是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像克拉克看过世界上所有带屋顶的建筑似的。在最后一集中，他说：“在过去40年间，‘伪善’一词已经成了19世纪的一个标签，就像理性一样，轻浮是18世纪的标签。”“19世纪最大的文明成就是人道主义。我们已经习惯了人道的观念，以致我们忘记了在文明以前的阶段它是多么没有地位。如果你问但丁或米开朗琪罗生活中重要的是什么，他们可能会回答说是对下贱和不公正的鄙视；如果你问歌德，他会说是活得完整、漂亮。但不会有人说重要的是好心。”在关于18世纪的那一集中，克拉克说：“从巴赫到莫扎特，音乐表达了那个时代最深层的思想和感受，就像绘画在16世纪所做的那样。”

克拉克的真面目

《文明》1969年播出，它是BBC首部长篇彩色纪录片，之后又有了其他几部既有思想性又受欢迎的纪录片，包括雅各布·布朗诺斯基主持的《人之上升》（1973）、加尔布雷斯主持的《不确定的年代》（1977）、罗伯特·休斯主持的《新的冲击》（1980），这些纪录片重新确立了BBC提供公共服务的形象。但《文明》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批评。约翰·伯格撰写的《观看的方式》被认为是对克拉克“巨人”艺术史的回音，伯格是左翼学者，强调高雅艺术和流行文化之间的联系。他上来就说“看看那些西方人的伟大作品”，非西方文明，如印度、中国、中美洲和南美、非洲文明被提到过几次，但被置于边缘位置。克拉克的高低排序也受到了怀疑，如“阿波罗的雕像比维京的船头体现了文明更高的层次。北方人的想象采用的是恐惧、黑暗的画面。希腊人的想象是比例和谐、人类理性的画面”。

《文明》中女性的身影非常少，这是一部关于乔

托到贝多芬等少数男性天才的纪录片，他们被视为西方艺术的创造者。所以BBC近年重新制作《文明》时，将在节目中涵盖西方之外的文明，主持人中除了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教授西蒙·沙玛，还有剑桥女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有尼日利亚血统的历史学家大卫·奥鲁索加。

应该把克拉克的著作丢进垃圾桶吗？他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奴隶制。“我经常听一些想表现得很聪明的人说，文明只有在奴隶制的基础上才能存在。如果你把文明定义为闲暇和奢侈，这种说法有些道理。但我一直用创造力和人类能力的扩大来定义文明，从这个角度来说奴隶制是令人憎恶的。不幸的贫穷也是如此。”

克拉克也不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他在回忆录中说：“什么是文明？法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乔治·萨尔的起居室里书一直堆到天花板那么高。画摆在画架上，有马蒂斯、毕加索和雷诺阿晚期的一幅杰作。桌子上是玛雅人的雕刻和伊斯兰式的罐子，还有来自托雷斯海峡的面具，是阿波利奈尔送给乔治的，曾经给毕加索提供过灵感。”后面一句话就提到了三种文明，而且都带着很大的敬意。接着，他在书中对印度、日本和埃及的艺术表示赞赏。他写道：“我喜爱的东西涵盖了很广的领域——埃及的、拜占庭的、印度的、中国的、日本的……莫卧儿艺术的杰作，无论是建筑还是在玉器这种媒介上，都达到了从未被超越的完美地步。日本艺术家是高超的肖像画家，至于东大寺中和尚的肖像，在欧洲艺术中没有那样如此动人地融合了现实主义和尊敬之情的作品。”

克拉克下结论时显得过于自信。但自信是一种必需的素质。他在片中谈到了自信对文明的重要性。“缺乏自信会杀死文明。文明需要一些物质上的繁荣，能够提供一点闲暇的繁荣。但它更需要自信，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自信，相信它的哲学、它的法律，相信自己的精神力量……人们有时以为文明由精致的感受力和优秀的谈话组成。这些是文明的结果，但不是文明的成因。如果有人问希腊和罗马文明为何崩溃了，真正的答案是它们精疲力竭了。”

洪堡的旅行和自然观

文 / 夏兰



英国学者安德里娅·伍尔夫与她的著作
《自然的发明：洪堡的新世界》

“今天，亚历山大·冯·洪堡在学术圈之外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至少在英语世界是这样，但他的思想依然在影响我们的思维。”

今天一说到德国人洪堡，许多人想到的可能是洪堡大学的创建人、教育改革家和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至于他的博物学家弟弟亚历山大·冯·洪堡，则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虽然亚历山大·冯·洪堡是名字被用于命名其他事物最多的人：智利到秘鲁海岸有洪堡洋流，阿根廷有洪堡镇，巴西有洪堡河，厄瓜多尔有洪堡泉，哥伦比亚有洪堡湾，格陵兰有洪堡冰川，中国北部、南非、新西兰和南极有洪堡岭，坦桑尼亚和新西兰有洪堡河、洪堡瀑布。单在美国就有4个洪堡县、13个洪堡镇，还有加州的洪堡红杉公园。有近300种植物和100种动物以他的名字命名，包括洪堡百合、洪堡企鹅、洪堡乌贼。有几种矿物质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月亮上还有一个区域叫洪堡海，还有一个绕着太阳飞的小行星叫亚历山大。

洪堡的著作曾经启发了达尔文、波利瓦尔、梭罗、华兹华斯、歌德、爱默生等人。1869年9月14日，亚历山大·冯·洪堡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莫斯科、

布宜诺斯艾利斯、墨尔本和美国多个城市都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美国总统格兰特在匹兹堡参加了一场大型的颂扬洪堡的活动。《纽约时报》用整个头版报道了全球范围的纪念活动。后来随着科学的专业化，洪堡的声誉开始下降，到了重视环境保护的今天，洪堡又被拥戴为预言家。

英国学者安德里娅·伍尔夫在《自然的发明：洪堡的新世界》一书中说：“洪堡的著作、日记和书信显示，他是一个有远见的、远远超前于他的时代的思想家。他革新了我们看待自然界的方式。他在所有地方都看到了关联。他说在自然这个巨大的原因和结果的链条中，没有哪个事实是孤立的。由此他发明了生命之网，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的概念。把自然想象为一张网，它的脆弱性就显而易见了。一切都是结合在一起。如果有一根线被扯下，整张网就会散掉。”

亚历山大·洪堡1769年出生于普鲁士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普鲁士宫廷里的一位大臣，母亲是一位富有的制造商的女儿。亚历山大和他的哥哥童年时很孤单。在亚历山大9岁时，他父亲去世了，而他母亲很严厉。洪堡很想摆脱这种环境，但又不敢抛弃母亲。大学毕业后他成了矿产部的一位勘探员，这份工作使他得以周游全国，并开展他自己的地质学、解剖学和电学实验。

直到他母亲在1796年因病去世后，洪堡才感到他获得了自由。他都没有出席她的葬礼。因为继承了大笔遗产，他辞去了在矿产部的工作，计划去遥远的地方壮游。去哪里都可以——他考虑过西印度群岛、芬兰、希腊、西伯利亚，最后确定去南美，因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给了他一个护照，允许他前往西班牙在美洲所有的殖民地。卡洛斯觉得派一个矿产专家前往新世界能够找到新的财富。洪堡带着42箱装备出发了。他没有什么特定的研究对象，他将分析一切，从风的模式、云的结构到昆虫的行为和土壤的成分，他将收集种子、测量气温。他希望发现自然的统一性，揭示自然界中所有的力量是如何相互交织的。

在旅途中，洪堡探索了委内瑞拉、古巴、墨西

哥、哥伦比亚和秘鲁，去了许多未曾被科学家观察过的地方。他识别了2000种新的植物。他发现了磁赤道。他是第一个开展电鳗实验的人，他把切开的电鳗拿在手中，受到了强烈的电击。他把这种亲自动手的实验做到了极端。他喝过河水（奥里诺科河的河水特别恶心，阿塔巴波河的河水则很好喝）、嚼过树皮、用天空蓝度测定仪测量天空的蓝度、用显微镜研究他自己身上的虱子。他在奥里诺科河的鳄鱼、蟒蛇之间洗澡。他感染过痢疾、血液感染和一些没有名字的亚马孙河流域的疾病。他跟他的同伴一起爬上了安第斯所有的山峰。鞋子坏了之后，他光着脚继续走。

南美之旅花掉了洪堡的大部分财富，随后，为出版他的发现导致他把剩下的钱都花完了。洪堡雇了一群艺术家和雕刻家给他的著作绘图，结果导致他的书卖得很贵，在美国一整套要卖20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万美元，甚至连他自己都买不起一套。写作时，他的手跟不上他的大脑，他在纸的边缘都写满了他的想法。纸上都写满了之后，他会写到桌子上，把他的想法刻到木头中。

他经常会见政治家、科学家和贵族，好像人人都很敬佩他，只有拿破仑是一个例外。拿破仑讨厌他是因为嫉妒他的成功，洪堡的《新大陆赤道地区游记》跟拿破仑率领的200位科学家编写的23卷《埃及记述》几乎同时出版，洪堡一个人取得的成就比那200多人取得的成就还大。

在巴黎，洪堡从一场晚宴赶往另一场晚宴。有时他一个晚上会出席五场沙龙。在巴黎，人人都知道他的帅气、渊博和健谈。有一位钢琴师受邀前往一个派对上为他表演，但他刚开始演奏，洪堡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整个曲子演奏期间他都没有闭嘴。

1827年，洪堡在巴黎住了20多年之后，普鲁士皇帝要求他返回柏林。那时，洪堡靠这位皇帝发的薪俸生活，所以他只好答应。回到柏林几个月后，他开始做一个系列讲座，讲解气象学、地质学、植物地理学和洋流，以及化石、磁学、天文学、人类的迁徙和诗歌。讲座本来是在柏林大学做的，因为太受欢迎，

洪堡又在一个音乐厅讲了一遍。有出版商给了他一大笔预付金要出版他的讲稿，但洪堡拒绝了，因为他需要重写。他用了20年才写出这部名为《宇宙》的著作的前两卷，最后的五、六两卷直到他去世前几天才出版。

安德里娅·伍尔夫是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一位设计历史学家，为了写洪堡传，她重走了洪堡走过的道路，去了委内瑞拉的热带雨林，在优山美地远足，攀登了海拔6000多米的钦博拉索山。她曾前往加州、柏林和剑桥的档案馆，看到了达尔文读过的洪堡的著作。她找到了洪堡1802年攀登厄瓜多尔的安蒂萨纳火山时住过的小木屋，在基多发现了洪堡当年使用的西班牙护照。

《纽约客》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认为，伍尔夫夸大了洪堡的贡献。她说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真正去读洪堡的著作了，洪堡的书跟他的旅行一样，充满活力但漫无目标、经常跑题，他的旅行、实验、著作和讲座中也没有什么重大的能改变人们的宇宙观的洞见或发现，他提供给世界的是他对自然的热爱。伍尔夫在“序言”中也阐述过这一点：“洪堡不是一个全凭动脑的学者。他不满足于待在书房里，而是投身于身体活动，把自己的身体推至极限。他前往委内瑞拉神秘的雨林冒险，沿着安第斯山狭窄的岩架向上爬，去查看活火山内部的火焰。他迷恋科学设备、测量和观察。自然当然需要测量和分析，但他还认为，我们对自然的反应大部分应该基于感觉和情绪。他希望激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当其他科学家在寻找普遍法则时，洪堡说应该通过感受去体验自然。”

“洪堡不是一个全凭动脑的学者。他不满足于待在书房里，而是投身于身体活动，把自己的身体推至极限。他迷恋科学设备、测量和观察。”

马丁·瓦尔泽和他的《童贞女之子》

记者 孙若茜



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和他的作品《童贞女之子》

“信仰就是一种能力，它就像音乐天赋，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有些人有能力获得，但有些人不然。信仰比知识更重要。信仰往往会引起人最大的不安。”马丁·瓦尔泽说，“信仰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主题。”

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2008年，受歌德学院（中国）之邀。当时，他和莫言进行了一场两个小时的文学对话。那时的莫言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说，和瓦尔泽同坐在一张长椅上的他不断地举起高脚杯喝着桌上的葡萄酒，并自嘲说：“我来了这里以后就喝酒，因为我很紧张。”“跟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学家对话，我得先喝酒，把胆壮起来。”莫言还说道，“1957年他写第一部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婚事》的时候，我只有两岁。”而坐在他面前的马丁·瓦尔泽，当时已经81岁。

称马丁·瓦尔泽是德高望重的文学家，当然并不只是因为他的年纪。在德国战后文学史上，他与君特·格拉斯、西格弗里德·伦茨、海因里希·伯尔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他始终活跃在社会活动中——尽管他不认同自己为知识分子身份，他说：“知识分子总想证明自己说的话是正确的，不想证明反面，任何事情要在反面成立我才讲，所以我不是知识分子。”但是，连续几年，他都在德国权威的政治学杂志《西塞罗》颁布的500名德国知识分子影响力排行榜上名列前茅，2007年时，他还曾位列第二，而当时的第一位是教皇本笃十六。

前几日，马丁·瓦尔泽再次接受歌德学院（中国）的邀请前来。距离上一次，他为了小说《恋爱中的男人》在中国出版而来，已经相隔6年，如今的他89岁。这6年中，他依然在持续写作，先后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童贞女之子》《第十三章》和《一个寻死的男人》。我们最先读到的是《第十三章》，一本书信体的

爱情小说，瓦尔泽建议译者、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黄燎宇打破德语世界的出版顺序，先对它进行翻译，理由是其篇幅相对短小、好读，厚度只有其后写作的《童贞女之子》的一半。而《童贞女之子》——瓦尔泽在接受采访时说，虽然他无意将它当作某种总结，但它几乎囊括了他一生所关注的所有问题，爱情、信仰、语言等等，它们的存在和可能性。

《童贞女之子》的书名就有着明显的宗教色彩——男主人公珀西的母亲告诉他，当初怀孕时，自己并不需要任何男人。作者似乎是在赋予珀西耶稣式的圣人色彩。而珀西自己也始终相信母亲的话，即便到他成人，拥有了一定的常识之后依然如此。他是一所乡间精神病院的看护，依靠讲述和倾听来“救赎”里面的病人，也在与病人的交流之中寻找生命的意义，他所扮演的正是一个小世界中的救世主。他讲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书中有他大段大段的独白，精神病院的院长法因莱茵教授对他说：“你讲起话来有时像个瀑布。我们真想到这瀑布底下站一站。”

在这种鼓励之下，珀西开始了公共演讲，而不再只是一个人无穷无尽地说着。但是和大多数的讲者不同，他坚持完全即兴式的讲话。他说：“我不会提前准备的。我认为这样做不好，自己有准备，却对着一群没有准备的人讲话。”珀西的观点既是对小说情节的推动和表达，也是作者在语言上的一种实验。“他为什么觉得自己不能做准备，不能对着众人念一篇讲话稿？”马丁·瓦尔泽解释说，“稿子很可能是一周前写的，并不是他面对着听众时那一刻的想法。但是，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其实是他现在的存在状态，他想要和下面的听众说此刻他的头脑中在想什么，此刻他的心理是怎样的，分享他当前这个时刻的内心经历，因为这个时刻和之前的、之后的时刻都不同，类似于和正在听你讲话的人之间的一种神秘沟通。”

照此，作家几乎永远也不可能和读者之间完成这种所谓神秘的当下的沟通，这会是一种困扰么？“对对对，你说得非常对。”瓦尔泽兴奋地拍了一下桌子，“在德国，有作家朗读的传统，一部小说可能会被作家朗诵30遍、40遍，然后和大家讨论。但小说都是提前写好的，并不是和别人分享你当下的想法。”接

着他告诉我，他每次都会尽可能地尝试去分享他当下的想法，有时候甚至会尝试只说当下的想法。就像他在书中拿珀西这个角色来做实验：“写下珀西的那些讲话也是在做一种展示，展示一个人毫无准备地特别真诚地跟别人讲话，心里在想什么，这是一种尝试。”

“但是，”瓦尔泽强调了转折，“这样做，有的时候可能会让场面有些难受，或者让我自己也不是很舒服。你要知道，在所有的交流场合当中，你永远都做不到一个彻底真诚的人。在人类社会所有的模式当中，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要戴着面具。人都要去扮演自己的角色，总是要去适应别人或者适应自己的角色，所以不可能完完全全的真诚。”

写作《童贞女之子》的那段时间里，有两位神学家到瓦尔泽处做客，当他们聊起珀西这个人物，以及他这种毫无准备的讲话时，其中一个神学家说了《圣经》中的一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接着，他又引用了一句耶稣对其门徒说的话：“有人把你们接去受审的时候，不要事先担心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圣灵。”瓦尔泽听后，在书中加上了两个神学家的形象，并让他们在书中说了同样的话。最终，主人公珀西就是因为这种公开的讲话，引起他人的恼怒而被枪杀。杀他的人，正是他在书中的一位“精神上的父亲”埃瓦尔德的12个“摩托门徒”中的一个，因此他的死也有充足的宗教意味。

埃瓦尔德这个角色，年轻时亲近民主德国，参加过工人运动，珀西的母亲在他的一次演说中帮他举过话筒，将他视为心灵寄托，给他写了无数封信，但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他因左翼活动丢掉教师工作后成了一名摩托车教练，有了自己的12个所谓摩托门徒。因治疗口吃，他结识了语言矫正师埃尔莎并一见钟情与其结婚，后来又因参加摩托比赛出轨心理医生西尔维娅。在矛盾的爱情中，他精神分裂，住进了珀西所在的精神病院，从珀西口中听说了他母亲的故事。最终他在医院自杀。

马丁·瓦尔泽的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童年起就使他受到很深的影响。这不奇怪在《童贞女之子》里面，他将信仰作为最重要的主题。书中谈论信仰最

恋爱中的人，很可能会忘掉自己的年龄，更不会去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而更多的是趋向我和她有没有可能，当他认为不可能性大于可能性的时候，就陷入了危机。

多的人是法因莱茵教授——这间医院之前是修道院改建的，法因莱茵的祖先曾是这里的修道院长。因此，除了医术之外，他还潜心研究修道院珍藏的耶稣圣血圣髑的历史。“他的很多话，可以作为理解信仰最基本的东西。”瓦尔泽说，“其中最重要的‘我们相信的永远比我们知道的多’这句话完全可以被放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检测，比如恋爱中，或者其他地方。”他认同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信仰的高度永远和不信齐平。

“信仰本身总是要伴随着对信仰的怀疑，没有一种信仰是纯粹的，让你不加怀疑的，你会经历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的过程。”信仰到底是什么？“我喜欢的一个神学家卡尔·巴特说，你不可能在某一时刻说这个就是信仰，就像你给正在飞行的一只鸟拍照，照片上看到的永远只是影像，而不是那只真正的鸟。”

法因莱茵的命运是这样的：他时刻感觉被副院长布鲁德霍费博士迫害，恰恰，初恋女友对他有两次背叛，第二次的出轨对象就是布鲁德霍费。后来，他出手偷窃了圣髑，被诊断患上了精神病，终日扮成雕塑站在前女友的居所下，最终被一群醉酒的混混打死——瓦尔泽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由衰老而来的自然死亡。“好像‘死亡’作为名词，对我来说不能产生什么感觉，我所能想到的‘死亡’是动词的那个‘死亡’。”直到他最近的小说《一个寻死的男人》中，也依然如此。遭遇朋友背叛、破产的男主人公游走在自杀论坛里，而“自杀”正是指向另一种非正常死亡。“我没有亲身经历过动词的死亡，所以也没有办法去写。”瓦尔泽打趣说。

珀西和他的母亲、埃瓦尔德、法因莱茵，几个人的命运让小说跨越了70多年的时间距离，可以看到的是，瓦尔泽关于语言、信仰以及爱的探讨，一直架构在从上世纪30年代起一直到本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心理的发展问题之上，而不是纯粹的形而上的讨论。其中，小说的很多细节甚至让评论者们认为瓦尔泽有具体所指，比如主人公珀西将缺乏爱和接

纳的文学批评家称为“糟糕的诋毁者”，有可能还是在影射2002年，他的小说《批评家之死》出版前后，那些恶言相向，诋毁其书中有反犹倾向，而引起轩然大波的评论者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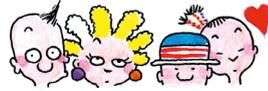
这一次的中国行，瓦尔泽依然被反复问到有关《批评家之死》事件的情况。“在中国，想要解释它为什么会在当时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显然是不太容易的，它是非常德国式的丑闻。”当初的评论者们如今已经停止了对他的责骂，但这个“非常德国式”的事件恐怕依然在对他的生活产生着持续的、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是，不论怎样，不论他的作品中是否还偶有指涉，它都不会是马丁·瓦尔泽笔下唯一关心的重要问题。

在近期的几部小说里，瓦尔泽多次书写着一种老年危机，这种危机发生在爱情里。《恋爱中的男人》讲的是歌德的老年危机——74岁的歌德爱上了19岁的乌尔莉克·莱苇措，他想要将自己从这种危机中解救出来，但是无能为力。《一个寻死的男人》里，72岁的主人公特奥·沙德遭遇朋友的背叛、公司破产，但是这些都没有真正影响到他，直到他在妻子的店里帮忙时，对一个顾客一见钟情。瓦尔泽认为，到这里，真正的危机才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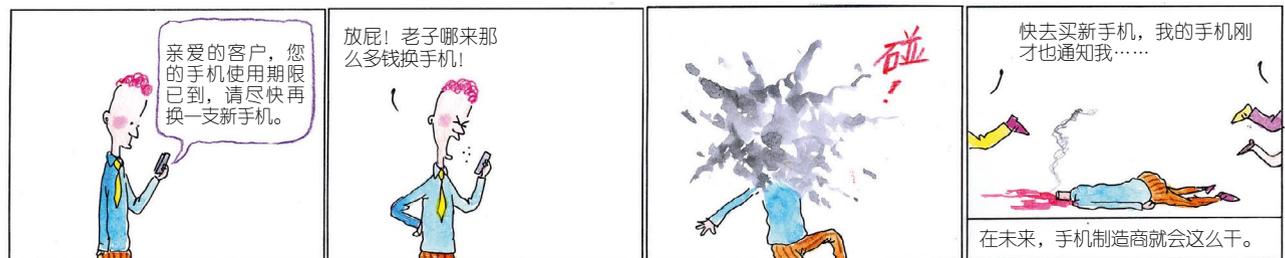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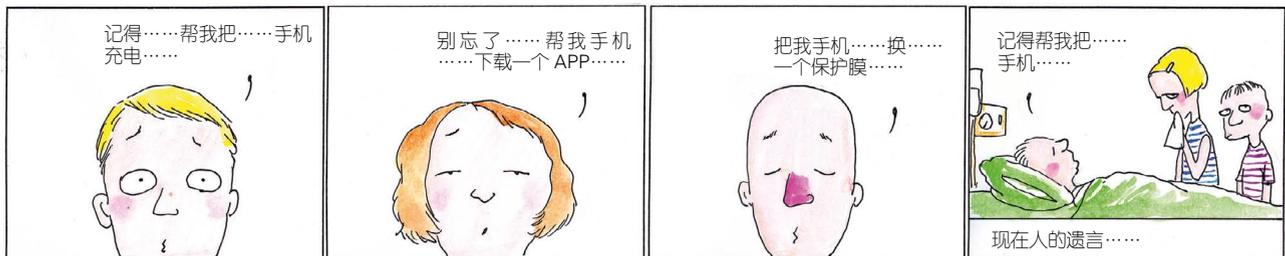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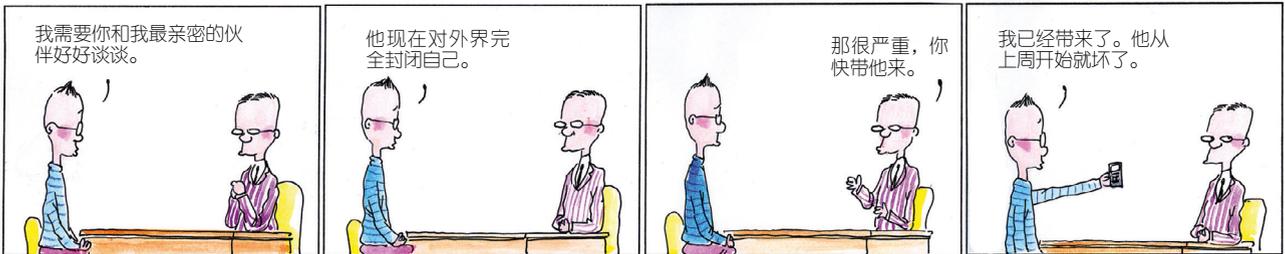
真正的老年危机是什么？瓦尔泽告诉我，并不是身体的老去和心理依旧年轻之间的矛盾，而是一种不可能性。在《恋爱中的男人》里，歌德有一句内心独白：“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已经74岁了。”换句话说，恋爱中的人，很可能会忘掉自己的年龄，更不会去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而更多的是趋向我和她有没有可能，当他认为不可能性大于可能性的时候，就陷入了危机。“在我的作品里面，经常出现男的一方比女的大好多的爱情故事，对于这样年龄的男人来说，爱情是不可能给他带来现实幸福的，这是一开始就注定的。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会引发我很多的感慨。”

瓦尔泽说：“我曾经写过一个角色，男主人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爱情，但他预见自己的爱情肯定不会有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自言自语了一段话来描述当时的状态，在那段话里他发明了一个词——在德语里是可以将一个名词加上另一个名词变成一个复合名词的——这个词前面的一半是‘不幸’，后面的一半是‘幸福’，组合在一起就是‘不幸的幸福’。用不幸的幸福来形容是唯一合适的词，那个主人公在当时的情境下想要表达的是，完全没有不幸的幸福几乎是谎言。换句话说，所有的幸福里面包含着不幸。”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3）

文 / 朱伟

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中，写得最好的是爱情——从初接到情书的惊慌失措、语无伦次，到镇静下来又隐隐生出些骄傲，回味信中内容，便悔于自己的反应，开始偷寻、窥视他而将回味变成自己的“节日”。之后，变成忐忑盼待来信，到真见到信尾出现“我爱你”之狂热，又惊呆而幸福。从第一次相约的心跳加剧，紧张，慌乱，为慌乱而尴尬，到真正接触、熟悉后反倒感觉到距离，因这距离感而矜持，直到降落到特别实际的生活，见到他另一面后的失望，面对身份差异后有意的躲避……其中层次太丰富了。这样的初恋悸动，那种刻骨铭心的体悟，也许我们都经历过。但纤微难搜，大约也难有王安忆这样的分辨力。分辨力是一个作家的资本，它真切表达了上世纪60年代环境中，一个纯真少女，对爱情认知的全过程。

《69届初中生》开头第一章描写的角度其实非常有震撼力：婴儿的视觉与触觉，由母亲的怀抱、父亲胡子扎人的感觉始，延及水——洗澡与奶瓶；触觉转味觉——棒冰与包子；再抬眼环境——马路与弄堂口；感官能力真的太强了。王安忆以此长篇，有条不紊地写了一部50年代哺育、60年代磨砺成的雯雯自尊的形成史。雯雯的自尊建立在那个年代真实的谱系中，感人而有社会学意义。王安忆之了不起的是，她几乎是以鄙视当时戏剧性控诉的态度，在所谓的“家长里短”“见素抱朴”中，就写成了这一届人更深刻的青春史。辛酸吗？当然有。被耽误的一代吗？当然是。更重要的是，她写出了集体主义熔炉锻造中，一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强大个人的长成。尽管雯雯只有实际的小学学历，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下乡知青，进了城也只是柜台后一个很普通的售货员，最终也只在里弄工厂一个压瓶盖女工的位置上，成了一个拥有五味杂陈的新娘。相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部怎样的炼成史呢？我以为，这就是一部很精彩的69届的“文革”史。最后结尾，新婚夜，雯雯与任一的对话是——

“我和你，完全是误会。假如不搞‘文化大革命’，假如一切正常，我们不

会相遇的。”

“‘文化大革命’本不该发生。”

一切都在轻描淡写间。写完这部长篇，王安忆不再用“雯雯”了，她已经完成了雯雯的塑造史。

《69届初中生》1984年3月最后改定，1984年底她就写成了《小鲍庄》，发表在1985年第二期《中国作家》上（与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于同一期）。说实在的，1985年读到它，我先懊悔是，为何《庸常之辈》后就中断了与王安忆的联系，“假如这小说能经我手发表……”这是一个编辑的本能。按《小鲍庄》篇尾记载，它1984年底改定于北京，那正是我在《人民文学》跃跃欲试的时候，尽管我那时不负责上海。

《小鲍庄》的故事其实简单：农民鲍彦山家生了个孩子，因为已是第七胎，最末的收尾，小名就叫“捞渣”。“捞渣”出生，刚好鲍五爷的孙子去世。鲍五爷的老婆、儿孙都死了，鲍五爷就认定“捞渣”是让他孙子“抓了替身”。家里太穷，“捞渣”的大哥建设子到19岁还说不上媳妇，鲍彦山媳妇就收留了要饭的丫头小翠子。但小翠子却喜欢建设子的弟弟文化子，到避不了婚事，就只能跑了，跑了还偷偷回来与文化子幽会。“捞渣”长大后与鲍五爷越来越亲，发大水的时候，这一老一少没出来，村长带人去找，鲍五爷在树上，“捞渣”在树下。等“捞渣”被捞出水面，鲍五爷也死了。“捞渣”为鲍五爷而死经村里小文青鲍仁文的添油加醋，引来一级级记者和作家，便成仁成义，成了村里的地标。鲍家因此就有了房子，建设子因此就有了工作和媳妇，小翠子也因此可以与文化子配对了。这是主线。副线呢？鲍家山那边小冯庄的“大姑”在路边捡了个“拾来”，大姑一辈子没嫁，晚上就抱着拾来的脚丫睡觉。等拾来的脚指有了在温暖“峡谷”中的知觉，就不能住一起了。大姑就说：“我给你置副货郎担子，你走吧。”于是，拾来挑着货郎担，到鲍家庄遇到了二婶。鲍家兄弟不容他这个外来者，而他因为下水去捞“捞渣”，也就成了人物，在鲍家庄立足了。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的《小鲍庄》



2005年王安忆（左）与史铁生（右）、陈村在上海朱家角

鲍秉德媳妇本是美女，因为怀了三四个都是死胎，便时好时疯。这媳妇不想再拖累鲍秉德，发大水时候自己挣脱到了水里。鲍秉德再娶了一个难看媳妇，就生了娃，鲍秉德于是觉得是“捞渣”拽走了他媳妇。“他见我日子过不下去了，拉我一把哩。”“捞渣”是结构的中枢。

1984、1985年，寻根的背景。当时的评论家将它归到寻根的盘子里。可它寻的是什么根呢？难道王安忆写的是缘分吗？

当初令我意外的是她控制基调的能力——那村庄就像沉睡在清冷的月光下，没有狗吠，那样安静。王安忆在小说中多次写到夜空下那条弯曲而白花花、苍茫茫的路，空中有上弦月或下弦月，弯弯的一勾，天暗着，水却亮着。这样空旷的基调，开头就是，媳妇在屋里要生了，鲍彦山却夹着锄头，不慌不忙地回家，到家就在墙根蹲下了。与长辈唠家常，他的回答只三个字：“就那样。”在男人的家常中，孩就生下了，生个孩就像“老母鸡下个蛋”。鲍二爷问：“家里没小麦面了？”鲍彦山嘿嘿一笑：“没事，这娘们吃草都能变妈妈（奶）。”命很薄，也很硬。

王安忆说，这小说，其实是她当时去江苏宿迁，采访一个在洪灾中救了老人的牺牲少年的副产品。也就是说，她的身份，本是个作家，采访的那个因房

塌救了同睡在一起的五保户老人的女孩，变成了“捞渣”。而它变成《小鲍庄》，我读到了什么呢？

我读到生之轻易，生下的孩，轻易就能满地爬，吃红薯秧就能长大。山那边，同样，小慧子出门要饭，轻易就带回个娃，成了“大姑”；窗洞塞团草便过冬了，凉席上一个枕头一条被，就算是家了。等“大姑”意识到拾来成人了，说声“你走吧，你不能守我一辈子”，拾来就径直走了，再不回头。这轻易简陋的生与轻易简陋的死构成了乡土的生生不息——“捞渣”被从水底捞起来，嘴角像在笑，鲍五爷就咽气了。一老一少躺在筏子上，都如安睡了。鲍秉德媳妇意识到自己成了拖累，就自己要走了。鲍秉德舍不得她走，她就在大水中扳男人的头，使他失去重心后挣脱而去。在《小鲍庄》语境里，死是为了成全生，即所谓“让路”。不仅鲍秉德媳妇是让，“捞渣”是让，鲍五爷的孙子社会子也是让，让出弯弯曲曲的生路。一个少年与老人的素材，到了王安忆的容器里，竟发酵出这样的乡土构成。王安忆从“捞渣”的出生写起，写的是承袭，在子孙承承的温存中，就有了乡土的悠久。

1984年底有关“寻根”的说法，不可能对王安忆没影响。《小鲍庄》里有一个“捞渣”，韩少功的《爸爸爸》里有一个“丙崽”，两人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截然不同的思索点。☑（待续）

爱慕虚荣

文 / 喵小鱼（江门） 图 / 陈曦



老Z是我们宿舍的相亲大户。她还在读大学，家人就开始为她操办人生大事。老Z非常不乐意，但碍于情面，还是断断续续见过几户人家。老Z向我们提及这些中坚青年，总是索然无味。不外乎是匆匆一瞥，她嫌弃别人长得不够帅，别人嫌弃她蠢矮胖，一个爱情故事就瞬间没了下文。老Z非但不叹气，笑着讲给我们听的时候，还觉得对方挺有内涵的，头次见面就能把她的三观提炼出来。没错，蠢矮胖，多么具有标志性！可惜三姑六婆一点也不体恤死胖子，眼看市场崩盘货物囤积，介绍给老Z的男人越来越多。就这样，老Z成了相亲大户。

老Z大学毕业就投奔广州。工作不好找，碰了几次壁，灰溜溜回家，回到家又立即后悔了。小县城的生活比北上广的车水马龙黯淡得多，吃饭睡觉工作不过几步路，本来就袖珍的县城，越住越小。她讨厌这种狭窄的生活，削尖脑袋去找城市的工作。她打电话跟我打赌：“小妹，我很快就会离开这里了。”然后嘴里啪啦讲了自己的计划。高矮肥瘦的相亲对象在她的生活换得比走马灯还快。Z妈问她：“你觉得那男的怎么样？”她总是搞不清她妈问的是哪一个。

工作实在不好找，老Z杯水车薪，终于忍不住感慨事业的停滞、感情的无谓和养只狗都那么贵。这时她发现，原来父母心里同样堵得水泄不通。每淘汰一个对象，Z妈都没有动力买菜煮饭，一家五口天天喝番薯粥，喝得八路神仙都尿频尿急。Z爸的行当是首饰加工，手艺非常精细，通常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他跑厕所跑得不耐烦，对Z妈说：“我真的很讨厌番薯！”

小县城的安逸把人的庸常越埋越深，老Z渐渐丧失了离乡别井的能力。作为失败的代价，也作为剧情的延续，老Z又被押去相亲。老Z的霉气通过无线电嘴里啪啦传过来：“小妹，又有人介绍男人给我了，搞装修工程的。”

工程男家底殷实，举止沉着，什么都好，只是大

概是因为自己长得丑，所以对别人的容貌要求也不高，对老Z说：“不用减肥了，我觉得现在的你就挺好的。”周末去爬山，老Z穿了件肚脐装。山上蚊子多，她被叮得浑身不舒服。工程男脱了件外套给她披上，说：“我觉得你这样穿挺好的。”Z爸盯着她肥圆的腰，样子很悲伤：“女儿呀，我会好好工作，让你把衣服的下半截也买回来。”

之后再见他，所有想法都无关爱情。老Z开始领悟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类似于锁和钥匙，从彼此相识交谈的那一刻，你就在不断试探对方的钥匙能不能打开你的锁。老Z总是执着于开锁，并不急着拥有这扇门后面的生活。她磨掉最后一点向往，跟工程男说：“你走吧，我不想耽误你。”

工程男非常疑惑：“我不挑剔你，为什么你还不爱我？”老Z说：“嫌货才是买货人。”

这时难题来了。工程男问老Z：“难道是因为我没有钱吗？”一身正气的老Z当场拍烂桌子：“这是鄙视女人的言论。”

老Z说：“更令人生气的是，我妈很喜欢他，说他这么有钱，嫁给他不用吃苦。我不肯嫁，就制造舆论，说我念了这么多年书，年纪也那么大了，还不会思考问题。”适龄、单身、未婚……婚嫁在即，我们很难置身事外。女人的贪慕虚荣特别可恨吗？其实不然。即便是现在离婚率居高不下，接过玫瑰的那一刻没有女人会觉得今生还会再结一次婚。只有当爱情离开时，女人才会拼命安慰自己：得失太平常了，你看看离婚率就知道。

我结婚前的最后一通电话，老Z精神爽朗：“小妹，我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找工作、找男人，唯独没有找到自己。”我哈哈大笑。是呀，无论将来我们会遇见谁，生活都是先从遇见自己开始的。☑